

劉宏 黃堅立 主編

大視野 海外華人研究的 與新方向

王賡武教授論文選





目錄

| | |
|---------------------------|-----|
| 編者的話 | v |
| 理論和方法論：回顧與前瞻 | |
| 單一的華人散居者？ | 3 |
| 海外華人：未來中的過去 | 32 |
| 海外華人研究的地位 | 60 |
| 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華僑，也不是華人 | 78 |
| 再論海外華人的身分認同 | 97 |
| 民族主義：海內與海外 | |
| 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 | 119 |
| 民族主義與儒家學說 | 136 |
| 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復興 | 147 |
| 民族主義、族群性與亞太區域 | 173 |
| 區域和全球視野：海外華人與中國 | |
| 中國革命與海外華人 | 203 |
| 大中華與海外華人 | 222 |

| | |
|-----------------------------|------------|
| 中國在亞太區域的地位：尋求盟友與伙伴 | 257 |
| 社會紐帶與自由：移民社會的選擇問題 | 276 |
| 東南亞華人與中國的發展 | 300 |
| 華人新移民：何以新？為何新？ | 325 |
| 研究課題與資料建設：從地方史到世俗主義 | |
| 海外華人社會與地方史文獻 | 345 |
| 香港華人的過去和未來 | 354 |
| 同化、歸化與華僑史 | 368 |
| 關於文化中國的四個疑問 | 385 |
| 亞洲價值觀與世俗主義的前景 | 394 |
| 附錄：王賡武教授主要論著目錄 | 405 |

編者的話

一年多前，八方文化企業公司出版了《坦蕩人生 學者情懷——王賡武訪談與言論集》(劉宏主編)，本書為該文集的姐妹篇。前書較為側重王賡武教授作為“參與型”知識分子的生涯(包括他的成長與治學道路、對人生與社會問題的關懷，以及出掌香港大學校長的經歷等等)，本書所收的論文則較集中地展現了王教授作為“學院型”知識分子對國際學術界所做的貢獻。

眾所週知，王教授的學術涉獵甚廣。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在1983年曾評論道：“王賡武教授具有至少三個學術角色：中國歷史學家(Sinological Historian)，馬來西亞事務的權威性評論者(Pundit)，以及南洋華人問題的專家”。本書所收入的論文主要集中在第三個領域的延伸與擴展——海外華人研究。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逐漸興起的一門新興學科。作為這一學術領域的開拓者和導航人，王教授對該學科的發展及成熟起着重要的領導作用。從他於1955年出版的《南海貿易》一書(1998年再版)到2001年問世的四卷本文集之一的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他就不斷地從實證的和宏觀的角度闡釋了海外華人社群的多元性和

複雜性，並指出中國、當地社會以及全球歷史進程對華人群體的深刻影響。

本文集的論文大多為王教授近年來在不同的國際學術場合所做的主旨演講、基調報告以及專題評論。它們以宏觀視野為出發點，深入地分析了海外華人研究領域的理論、方法、資料等重要問題，並指出了該學科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作為深具全球觀點的歷史學家，王廣武教授還從跨區域的角度，論述了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的不同模式及其同中國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我們相信，本書對讀者瞭解世紀之交海外華人研究的最新成就和發展前景有着很大的幫助。

本書的論文大多原以英文發表或撰寫，經翻譯後收入中、港、台、新等地出版的學術刊物或專著之中。雖然本書的編者之一曾參與了其中一些論文的審校工作，在收入本文集時，我們又比照原文將之進行了重新整理，並根據英文修訂稿增補了若干篇章的注釋。

作為本書的編者和部分論文的審譯者，我們十分感謝王廣武教授的充分信任。八方文化出版公司的唐文靜編輯的專業精神和效率使本書得以較快面世。最後，我們也要感謝中文論文的原出版者及譯者（在本書相關篇章中均有註明），尤其是韓方明博士主持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和張秀明主編的《華僑華人歷史研究》（北京）等期刊。本書能夠順利出版，也是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的。

劉宏 黃堅立

2001年11月27日
新加坡國立大學

理論和方法論



回顧與前瞻

—— 單一的華人散居者？ ——

我首先感謝里德教授和他的同事建立這個研究海外華人的新中心。它源起於紀念我們難以忘懷的朋友詹尼弗·庫斯曼 (Jennifer Cushman) 的系列講座。這個系列講座幾年前由托尼·里德結集為《僑居者與定居者》出版。¹ 他不滿足於此，策劃建立這個中國南方散居者研究中心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Centre)。他和他的同事確信向南方移居的華人這個課題是值得認真研究的，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恰是設置這種中心的理想場所。我同意這種看法。澳大利亞確實需要鼓勵這個領域的教學和研究，而且澳大利亞具備開展這項工作的良好條件。如今看到它已經起步，這是最令人欣喜的。我非常高興托尼邀請我發表開幕演講。我不必要更多地強調這是一個我想與其交往的中心。今天晚上我必須對為創建這個中心而努力的群體略表慶賀之情。

在座各位如今可能已經習慣對中國南方散居者這個詞耳熟能詳，因此也許會對我要在這裏就散居者一詞的用法發表反思感到奇怪。無論如何，我將王靈智與我最近合編的兩卷本論文集稱為《華人散居者》。² 我不得不對此進行某些內心的反省。長期以來，我始終主張海外華人應該被置於他們各自的國家背

景下進行研究，需要擺脫佔主導地位的中國中心論。每個海外華人社群都需要面對比較研究，不僅與他們內部的社群比較，而且與其他移民社群比較。我們的兩卷本論文集強調定居——如“落地生根”³一詞所反映——和六大洲社群間的差別，三十五篇論文強調了在世界不同地方找到新家的華人的多樣性。

我依然對使用散居者一詞有些不安，不是因為在英語中這個詞直到最近依然只用於猶太人（參見《牛津英語辭典》），不是因為這個詞指流離失所（希伯來語）或散居異鄉（希臘語）——它們都是關於僑居和移民現象的特定概念。⁴當然將東南亞華人與穆斯林世界的猶太人進行比較不僅誤導人，而且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但如果現實促成這種比較，就聽之任之吧。

我的保留意見來自華人由於華僑（sojourner）這個概念以及中國和敵對國政府從政治上利用這個詞而遇到的問題。從中國的觀點來看，華僑曾是一個關於單一的海外中國人群體的頗具力量的名稱。它被公開地用於造就國內和海外的所有中國人的族群的（如果不是民族的或種族的話）團結。在華人少數民族數量較多的國家，這個詞是懷疑華人少數民族永遠不會效忠於居住國的主要根源。經歷大約三十年的爭論，如今華僑一詞已經不再包括那些持外國護照的華人，逐漸取而代之的是其它詞，如（海外）華人和華裔，這些詞否認與中國的正式聯繫。我心中揮之不去的問題是：散居者一詞是否會被用於復活單一的華人群體的思想，而令人記起舊的華僑一詞？這是否是那些贊同這個用詞的華人所蓄謀的？倘若這個詞廣泛地付諸使用，是否可能繼續將其作為社會科學中的一個技術性用詞？它是否會獲得將實際改變我們關於各種海外華人社群性質的觀點的感情力量？

托尼·里德知道我的保留意見，他鼓勵我回顧並反思迄今為止的海外華人研究歷史以及過去的方法對現階段研究的貢獻。這同樣給了我一個考察自己觀點的機會。我早期對海外華人歷史的興趣來自三個主要的學術源流。第一個是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他們賦予海外華人以單一的認同——華僑，即中國僑居者。這始自十九世紀末的滿清官員，接着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改革者和革命者及其日本支持者。⁵最後，李長傅、劉思慕、溫雄飛及上海暨南大學的群體開始研究這個課題，他們在1920年代建立第一個華僑研究的重要中心。隨着他們而來的是陳達、張禮千、許雲樵和姚楠，後面三人1940年在新加坡幫助建立了南洋學會。⁶

第二個源流是殖民地官員及其鼓勵和委任研究東南亞不同地區的華人的學者。這是由他們早期與各種華人的貿易經歷發展而來的。隨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擴張他們在東南亞和中國沿海的貿易利益，他們與這些中國人進行了交易。後來，荷蘭、英國和法國殖民地行政官員分別對他們特別關注的華人群體進行了研究。⁷他們既將中國人看作潛在的同盟者，又將其視為對其統治的可能威脅。在二十世紀，維克多·巴素從1930年代開始嚴肅地撰述華僑華人，他在1951年出版的關於東南亞的綜合研究，成為這個群體的最佳樣榜。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殖民地事務局（British Colonial Office）資助優秀的學者如莫里斯·弗雷德曼（傅利曼）和田汝康，他們的田野研究確立了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新標準。⁹

第三個源流是晚近的田野學者的著作。這些學者包括社會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他們原想研究中國，但在1949年共產黨

勝利使其不可能在中國從事研究後被迫轉向海外華人。這個流派的開先河者是研究泰國華人的比爾·史金納(施堅雅)，其他學者研究印度尼西亞、馬來亞、菲律賓以及柬埔寨各具特色的社群。¹⁰ 後兩個學者群的中國傾向性是顯而易見的，弗雷德曼和史金納領導實施了著作豐富且意義重大的倫敦——康奈爾項目(London-Cornell project)，這個項目將香港和台灣作為非華人學者唯一能夠進入的華人社會進行研究。第二和第三個流派造就了新一代的學者，包括華裔東南亞人。¹¹

重要的是他們都有所保留地採用強調海外華人認同的一致性的“華僑”一詞，而沒有人使用“散居者”一詞。莫里斯·弗雷德曼是《猶太人社會學學報》的編輯，最熟諳散居者的猶太人含義，他並不認為這個詞適用於華人。相反地，非華人學者熱衷於兩種各具特色的方法：首先是關於不同環境裏的各類華僑及其保持的中國特色的研究，其次是關於華人能夠同化並接受他們作為東南亞新的民族國家的公民地位的研究。¹²

我們知道本世紀早期華人被與歐洲猶太人進行了比較。¹³ 在納粹迫害和大屠殺後，晚近學者對直接運用比較方法裹足不前。第一個對我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不是海外華人研究者，而是印度尼西亞研究者。他就是已故的哈里·本達。他的家庭是捷克斯洛伐克大屠殺的犧牲者，他在荷屬東印度群島生活多年，轉向研究印度尼西亞這個新國家。¹⁴ 1959年我們會面時，他指出東南亞華人的命運類似德國猶太人的命運，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事實上，就我所知，他在著述中盡量不使用散居者一詞。這可能是因為他確實認為每個華人社群都在形成它自己與眾不同的認同，這種認同與民族主義的中國學者和官員以及某些當

地社群領袖試圖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單一認同相異其趣。他知道1950年代東南亞新的政治條件迫使重新考慮在中國以外的民族主義對他們意味着什麼。

我原來並沒有打算研究海外華人。我的興趣始終是在中國歷史。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是作為一個中國僑居者——華僑而開始生活的。假如條件許可，這種人最終是要回歸中國的。我也不例外。我的父親來到這個地區，曾在新加坡、吉隆坡和馬六甲的高中教書，後來擔任我的出生地泗水的第一所華人高中的校長。他離開泗水後，成為霹靂州怡保華人學校的助理監督。怡保是華人居多數的城鎮，而馬來人則住在附近的郊區山村，多數印度人住在歐洲公司或政府官廳提供的住房。在華人中，堅打山谷的礦工多為客家人，城鎮的商家多為廣東人。此外還有福建人、潮州人、海南人以及少數講其他方言的人。簡言之，這是一個英屬馬來當局統治下的多社群的城鎮，在馬來亞四個馬來人聯邦州中是頗為典型的。

我很早就意識到許多與我共同成長的華僑家庭將在某一天回到中國，其他家庭則處在矛盾之中。他們樂於住在中國之外，擁有相當安穩的生活，而且似乎滿意當地並不過多干涉他們生活的政府。然而，在我上英文學校所交的朋友中，我發現許多中國對他們幾乎沒有意義的人。他們的家庭完全適應了當地的生活方式，通常是說、讀、寫馬來語和英語，而不是華文。對他們和多數教師而言，我對中國事態及中華事物的關心是難於理解的。

對我而言，突出中國認同的事件是日本對中國的入侵，日本的侵略隨着1937年全面入侵而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此時，

多數華僑已經習慣於海外華僑居民中華民族主義情緒的興起。中國政治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已經波及到海外華僑中間。¹⁵ 它吸引華僑的興趣是因為世界各地反華的歧視性案件，惡毒的案件發生在美洲、澳洲和南非的移民國家。¹⁶ 總體而言，這類案件在東南亞較少傷害性，因為殖民地當局與歐洲移民國家的勞工階級相異其趣，他們發現華人對於他們的貿易和工業企業不無裨益。

華民族主義在學校和報刊中迅速傳播，這些學校是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在這種情況下，華僑研究獲得中國的公開支持。通過家父及其教師和記者朋友，我知道了這類研究書刊，但沒有多少想法。確確實實的是某些人進行的號召海外華僑從日本的鐵蹄下挽救中國的宣傳。1937年後，成群結隊的人到處遊說，為中國的戰爭募捐金錢，奉勸所有華僑購買國貨，抵制日本的一切。¹⁷ 各方齊心努力，勸說海外華僑從單一華民族的角度思維，這種單一華民族在某種程度上恰似單一和統一的華人散居者可能意味的。他們的成就包括募集龐大的捐款幫助戰爭和努力召募年輕的華僑和學生回國參戰。¹⁸

在日本佔領時期，華人認同意識在每個華裔身上滋長。這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因為他們被視為潛在的敵人。他們究竟是關注中國還是更忠於當地或殖民地政府是無關緊要的。這種背景解釋了為什麼許多人只是將自己看作中國人。他們應該學習中國的語言，像中國人那樣生活，假予機會還應該回國服務，這是自然而然的。就我自己而言，我準備在將來回中國，因此以與日俱增的興趣和責任跟我父親學習中文。¹⁹

這並沒有使我遠離各種朋友。在學習、遊玩以及鄰里中，特別是在戰爭結束後，我與馬來人、印度人、歐亞混血種以及不講中文的華人鄰居和同學渡過的時間超過了與想法像我一樣的華僑在一起的時間。與日俱增的作為馬來亞人的意識是我所理解和同情的，因為顯而易見，一個新的國家將在某一天從英國人捏合在一起的殖民地保護國脫穎而出。這個帝國行將結束。一種當地民族主義感情在我的朋友中滋長着。²⁰ 我願意與他們分享這種感情，但我還有更重要的責任。1947年，我進入父親在南京的母校。²¹

中國急劇的政治變化改變了我的生活。內戰即將推進到南京，大學關閉，這使我在1948年底回到怡保與父母團聚。²² 翌年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我進入在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學習，回到了在學校所交各種朋友的中間。他們多數在華人居少數的城鎮長大，接受英語教育。²³ 我很容易將他們等同於華人，儘管他們多數未曾像我一樣是華僑。對他們而言，他們是在祖國，規劃中的獨立的馬來亞國家充滿希望。對我而言，騷動的中國日益成為一個抽象的存在，它獻身於一種這個地區視為異端的意識形態。通過馬來亞流行的反殖民主義和英國式社會主義視角，我獲取了一種新的民族國家認同。這是從作為僑居者向自覺地決定定居在中國之外的第一步。我最終何去何從依然不得而知，但學做一個馬來亞聯邦的公民是一個開端。儘管如此，認知中國的責任感仍然保留了下來，這就是完成我已經開始的工作，理解這個古老文明可能出現的偏差及其依然具有的前途。在僑居和定居之間，我發現作為華人並不是障礙，而是支點。於是，轉向研究中國歷史看來是最自然不過的。

蒂固的傳統？再者，我的中國歷史研究已經贏得注意，我必須做出困難的選擇。在這個關鍵的變化關頭，我是應該留下繼續研究這個地區的華人；還是應該回歸我的初愛——中國歷史，因為中國歷史正在重新被考察和解釋，以迎合大陸的變革。對我而言，我希望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能夠兼顧兩者——在留在比較大的東南亞鄰國的同時研究中國。在澳大利亞，我至少從未遠離許多附近的海外華人群體。

1968年我來到堪培拉，沉迷於各種書籍、傳單、學報、雜誌、報紙和各類文獻，這些材料來自從1966年瘋狂開始的文化革命。我在吉隆坡工作的許多年頭，這些材料在馬來西亞是無從獲得的。我過了幾年才發現我已經為中國事務所吸引。然而，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撰寫的最早兩篇論文是《馬來亞華人政治》和《馬來西亞：競爭中的精英》。²⁷如今，我既能夠研究中國，又能夠研究海外華人社群。因此，我總是將中國對這些社群的看法與海外華人的自我認識的互動放在心上。這種互動引導着我的主要著述，直至今日。

通過將兩種視角結合起來，我沒有接受中國的觀點，即惟有中國能夠給予海外華人以保持華人性所需的一切。中國官方總是低估海外華人已經能夠群策群力在他們中間培育新型華人性的能力。²⁸另一方面，還有一種文化自卑感經常困擾着中國以外的華人。在我看來，這似乎使他們對他們自己的成就格外謙虛，無論是在商業、教育，還是在技術。他們的自我估計從來就不是固定和正確的，他們習慣於從一個時刻的文化卑屈轉向另一時候的盲目自大。²⁹在中國與其遊民微妙而不穩定的關係中，存在着許多層次和層面。

於是，我決心成爲一個中國史學家。儘管馬來亞新的民族國家政治不無吸引力，但我堅持這條道路。但是，民族國家建設是微妙的，認識歷史需要新的方法。我和同事努力促進馬來亞歷史研究，特別希望能夠在我們的學生中培養出新一代的民族歷史學家。就我自己而言，我將致力於研究馬來亞華人，因為他們已經從僑居者變爲公民，他們知道作爲馬來亞人意味着什麼。1958年我發表了一系列廣播談話，出版時題爲《南洋華人簡史》。²⁴我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使我能夠結合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開始——南海貿易、鄭和海軍遠征和防禦性朝貢體系，還有苦力貿易、南洋商人網絡和愛國華僑——闡述這個故事。我閱讀當地書刊、歷史文獻，並以更大的注意力閱讀關於變化着的華人社群的學術新著，尤其是1950年代西方社會科學家的著作。與此同時，這個國家發生最急劇的發展，包括1961年至1965年間採取步驟吸納幾個具有大規模華人社群的原英國領地組成新的馬來西亞聯邦。²⁵這爲我從事關於各種試圖適應新的政治現實的華人社群的比較研究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起點。

馬來西亞的合併伴隨着與印度尼西亞的衝突，以失敗的試驗而告終，這威脅到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良好關係。1965—1966年成爲我研究生涯的重要年頭。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這個地區，越南戰爭已經真正爆發，蘇加諾政權以恐怖的流血事件而垮臺。²⁶這對東南亞的發展是一個轉折點。更爲激烈的則是毛澤東的解放及其用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鞏固中國革命的努力。在廣泛的無政府狀態下，沒有人指望這最終能夠闡明毛澤東的觀點。

關於中國的難於置信的報導修正了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毛澤東的狂熱中是否存在着方法？革命是否必須擺脫中國根深

至於學術方法而言，我從未試圖系統地採用莫萊斯·弗雷德曼和比爾·史金納的作法，即將研究海外華人所得的觀點用於解釋中國社會本身。³⁰ 我既沒有強調華人同化的許多歷史和當代模式，也不同意只是考察華人回應東南亞民族主義的新方式的研究。取而代之，我的研究總是在兩個充滿希望和含義模糊的立場之間運動。一個是中國的希望，中國希望最終將所有海外華人視為僑居者，是中國人大家庭的成員，他們的忠誠和愛國主義在切實需要時是可以指望的。另一個是華人移民和定居者的希望，他們希望他們的子女某種程度上在文化上依然是華人，而且至少確保幾代的血統。³¹

深入研究中國歷史有助於我理解中國在何種程度上為大量華人所排斥和迷戀，這些人由於生活在海外，由於許多人不想回歸的原因，由於使他們以異國情趣代替中國文化的事物，而頗為成功。與此同時，緊跟關於世界各國本地化華人的最新研究使我能夠從許多角度考察這些社群。一方面，許多華人總是期待着與中國重新開始的更密切的聯繫，這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其他許多人，特別是北美的，對於來自台灣和香港的華人新移民愛恨交加。他們注意到這些新移民熱衷在中國之外生活，獲取外國護照，而且還依然打着他們的中國牌。對外部刺激和內部機遇的反應已經變得如此多樣化，以致這個課題不僅沒有變成許多人所期待的單一問題，而是變成一個充滿矛盾和可變性的課題。

我談論了讓我決定遷居澳大利亞繼續研究的關鍵年頭1965—1966年。這使我記起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期間，關於東南亞華人社群的研究項目大為減少。倫敦——康奈爾項目已經將主

要注意力轉向香港和台灣。1960年代以來關於中國事務的新研究基金集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越南戰爭確實將注意力吸引到這個地區，但華人社群對學生沒有什麼吸引力。唯獨在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受到密切關注，來自這個地區的學生包括許多華裔，因此學術興趣得到了維持。顏清湟、楊進發、傑米·梅其、查爾斯·柯佩爾等學者燃起了烈焰，而其它地區只剩下餘燼。³² 在這個地區本身，只有新加坡的廖建裕不屈不撓，他不怕印度尼西亞官方不同意，使我們繼續瞭解情況。³³

學者們脫離將華人少數民族作為文化的和政治的社群加以研究的更根本的原因有二。其一，由於安全的或不信任的原因，新的建國過程中的東南亞國家政府不歡迎關於尚未被完全融合入所謂主流社會的華人少數民族的研究。它們不僅不鼓勵外國學者，而且不鼓勵本國學者從事這類研究。其二，中國1966年後處於動亂之中，文化革命轉而反對任何與生活在海外的華僑華人有關的人和物。關於他們的否定觀念包括資本主義傾向和資產階級方式、缺乏原則性、願意妥協而與仇恨中國的外國人親如兄弟。革命者甚至不相信愛國歸僑，放棄了他們早期勸導他們回國的政策——史蒂芬·菲茨傑拉德曾對這種政策做了仔細分析。³⁴ 結果，中國國內大約十五年時間對這個課題沒有研究。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華僑華人而言，對文化革命的反應是否定性的，因此作為華僑華人成為一個痛苦的問題。多數人將眼光轉向革命造成的災難。

海外華僑華人再次只能依靠他們自己的資源。正如他們反復證明的，他們是充滿活力且組織良好的，足以最大程度地發

揮他們的技能和才智。他們的商業活動吸引了新的注意力。在他們在中國以外的整個歷史上，這畢竟是他們最擅長的。³⁵新鮮之處是日本在1960年代後期作為一個經濟大國重新崛起。這使我們記起關於海外華僑華人的政治和文化已經論述很多，而關於他們的日常作為卻闡述得不夠。無論如何，他們的核心活動始終是貿易和交易，在感興趣的時候冒險和贏利，在政治條件極端惡劣的時候運用才智和勇氣。在1960年代，他們迅速地適應了東南亞新獨立的民族國家，為他們自己建立了商業網絡的新模式。他們中的膽大者還學會為這個地區及其外的全球性商業和工業城市服務。更前瞻的人還將子女送到西方接受教育，準備讓他們為未來沒有邊界的世界提供當地代理服務。

簡言之，印度尼西亞蘇哈托軍事政變、中國孤立、東南亞華人大規模歸化、印度支那華僑華人大批外逃，這些事件似乎永遠地終結了華僑的故事，但新的力量開始為各地華族造就了不同的條件。由於它們所建立的國際聯繫，香港和新加坡提供了這個變化的中心。四小龍——它們已經成功地對日本模式做出了反應——開拓了華人經濟作為的方途。新一代社會科學家被吸引到這個地區，他們將研究引入這個奇跡般的現象。在早期闡述華人如何回應機遇的學者中，琳達·林、里查德·羅賓森、吉原久仁夫湧上了我的心頭。³⁶他們與將日本、韓國和台灣視為新的成長發動機的學者一起，激起了對華人在東南亞的作用的新興趣。

這個方途是與沒有邊界的全球化，最終與華人經濟活動的散居者特徵相聯繫的，這並不令人奇怪。但是，高峰尚未來臨。毛澤東辭世後鄧小平的復歸猶如中國京劇中紅臉英雄的獲

勝。中國在孤立三十年後重新開放，掀起了舉世皆驚的經濟波浪。我們可以說中國打開前門、接着敞開窗戶、最後開啓後門的步驟，決定了香港和台灣的中國人、東南亞地區的華裔、以及亞太地區的華人的新的行為模式。結果對這個地區的華人而言是如此巨大而難於計算，因此學術研究依然未能趕上變化。取而代之，他們推出諸多聳人聽聞的著述，從鼓吹華人經濟共同體的沙文主義呼籲，到新一輪“黃禍”的恐怖描繪。³⁷

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是眾多大陸中國人隨着台灣和香港的中國人之後前往北美和澳洲，並選擇了滯留不歸。到1980年代中葉，中國再次出現了關於新華僑的學術論著，它尋求結合這些新僑民前往的各個國家的學者的著作。這次新活動的規模自1930年代和1940年代以來是空前的，這種激情與邀請海外華僑華人投資的熱情是密切相關的。在經濟機會向各地華僑華人開放的程度，新的華僑綜合症應運而生。³⁸與早期側重反帝國主義環境中的政治認同相異其趣，這種綜合症首先是與經濟活動、與扮演貿易散居者的華人社群相聯繫的。所謂經濟散居者，借用阿伯納·科恩被廣為引用的話，即“一個由在社會上獨立，在空間上分散的社群構成的民族”。³⁹

如今解釋中國奇跡般成功的著述潮流是勢不可擋的。它們多數以最包容的方式提及海外華人的作用，這與早期往往強調各種區域社群特性的政治和社會學研究大相逕庭。新的著述傾向於將香港和台灣的中國人與分散在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所有其他華僑華人相提並論。⁴⁰當代市場技巧的進步以及信用金融服務的性質已經模糊了早期的差別。政治認同日益被認為是不相干的，陳舊的詞彙受到了挑戰。如今許多社會科學家準備

屆大會將面臨第一次真正的考驗。⁴³ 倘若網絡規模顯示巨大的生命力並證明持續性，學術界將對它所代表的事物產生興趣。

3. 第三是超越已被賦予活力的商業之外的一系列互相加強的組織。例如宗親社團、同鄉團體和各種文化(如音樂、表演藝術、文學和學術)組織的國際大會，它們如今正常舉行國際大會，試圖加強華人的社會和文化聯繫。⁴⁴ 這些活動採用現代形式，熟練地運用現代通訊工具。它們具備細胞的特徵，但經常是無定形和可變的，迅速形成，飛快分散。但是，他們斷言的華人認同並不是本質主義的，它們的成員漫無邊際地為他們需要什麼而爭論。然而，鮮有疑義的是它們形成一種達成目標的華人方式，而這是每個集團夢寐以求的。

這三個現象的潛在基礎是中國的影子和無言的假設，即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對華人和非華人同樣重要。與日俱增的關於重新恢復的中國與海外華人的聯繫的論著，特別是關於涉及華人貿易集團的跨國網絡運作的論著，是需要考慮在內的。從這類文獻來看，散居者一詞的現代特色顯然是比較少，這與其說是因為貿易，毋寧說是因為全球散居者模式的急劇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融合和同化政策的衝擊。

在這裏密切相關的是對始自北美和澳洲移民國家的多元文化主義的試驗性步驟。它的起源與華人殊無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居民與移民之間的緊張關係迫使轉向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同化觀。理想主義者堅決主張移民應該盡快同化於多數民族的文化。但是，大屠殺後反猶太人運動的恥辱、美國黑人-白人民權運動判決的撤銷、西方自由的人權價值的確認，

使用散居者一詞闡明華人現象的新層面，這同樣不會令我們感到奇怪。令人迷惑的是，這是否會再次鼓勵中國政府遵循早期所有海外華僑華人乃是華僑——僑居者的觀念思路，確認單一的華人散居者的思想？使用散居者是否還會導致中國以外的作者，特別是以華文寫作的作者，復活更加熟悉的詞彙——華僑？華僑這個詞是東南亞各國政府及華人在過去四十年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試圖加以摒棄的。

潛在的修正主義是由若干相關的事態發展造成的。最近學術研究認為重要的三個發展根源於經濟集團行為，展示了其他散居者的特徵。

1. 在沒有官方贊同和支持的情況下，海外華人在幾個世紀間逐漸形成了多層次和多類型的“非正式帝國”，他們運用現代通訊技術的能力使他們成為全球經濟中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在“賤民企業家”和“本質的局外人”的形象背後，他們已經建立了靈活的所謂“無根基帝國”。⁴¹ 他們願意從強大的傳統貿易基地出發加以創新，這賦予他們以與西方競爭的實踐和理論的機體，高偉定及其同事將其提升為他們所謂的“華人資本主義”。⁴² 這種觀念顯然支持了單一的華人散居者的思想。

2. 1991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成功地舉辦了第一屆世界華商大會，這證明全世界的華人企業家熱衷建立不遜色於猶太人和其他散居者少數民族的活躍和統一的全球網絡。1991年以後，在香港、曼谷和溫哥華先後舉行了三次大會。溫哥華大會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開始的時候舉行的。1999年，墨爾本第五

這一切造就了代替所有國家認為必須倣效的民族國家建設的舊“熔爐”原則的多元文化主義。這個轉換掃清了散居者一詞付諸普遍使用並運用於任何需要它的集團的道路。就華人而言，在北美尊崇猶太人散居者的凝聚力以及為以色列工作的猶太院外活動集團的成就的人與日俱增。⁴⁵ 他們認識到他們與猶太人之間的差別，希望遵循合適的模式。對他們而言，這意味着偏向單一的華人散居者的觀念。

我們已經脫離《牛津英語辭典》的狹隘用法，將這個詞擴展到過去的含義不會困擾我們的廣度。使用範圍越廣，定義將越模糊且不明確。除了希臘人和亞米尼亞人外，如今還有其他散居者如愛爾蘭人、非裔美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等。即使英國人在他們曾是“主流”多數民族的前殖民地亦不能免，特別是如今散居者一詞也用於新加坡華人。⁴⁶ 這可能意味着華人散居者與他們之間具有許多共性，但可能還意味着這個詞是靈活的，恰如其它許多社會科學和歷史用詞。接着學者們應該將每個散居者決定它可能是什麼的複雜方式分門別類。目前海外學者開始接受使用這個詞定義“分散的華人社群”，這說明他們肯定為將來多年造就了許多工作。我越是思考，越對這個詞已被用於華人而不快。我曾以極大的不情願和遺憾使用這個詞，但我依然相信它帶有錯誤的含義，除非精心地避免描繪一個單一的華人散居者的形象，否則最終將給海外華人帶來悲劇。

讓我用兩項觀察結束演講。當去年五月強姦華人婦女的消息傳遍世界的時候，人權團體強烈抗議。此外，還有人努力建立全球網絡，呼籲所有華人支持政治抗議，尋求懲罰犯下獸行

的罪犯。⁴⁷ 香港和台灣做出同等強烈的告誡，某些是針對北京政府看似無力的反應。最終，大陸的中國人民知道了悲劇性事件，許多人以可以理解的憤怒做出反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着決定公開評論這個事件，但對印度尼西亞政府而言是適度的。在東南亞地區，對不穩定的印度尼西亞政局更加瞭解的政府沒有做出反應。當世界各地的幾個華人社群就這個悲劇事件舉行抗議集會時，這是否是潛在的散居者凝聚力的先聲呢？抑或它使我們記起華人社群已經變得何等多樣，因此任何人，包括中國政府和台灣當局，要組織一次散居者的反應是何等艱難？

我的另一項觀察是隨問題而來的。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在中國積貧積弱而遭受外國侵略的時候，在中國以外的多數人是近期移民而沒有其他忠誠的時候，中國獲得了愛國的海外華僑的支持。如今海外華人之間的差別則要大得多。當代散居者包括許多類型的華人，對他們而言，名稱相異，認同不同。⁴⁸ 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海外華人不可能恢復他們與舊中國的關係，無論是滿清帝國、國民黨中國，還是毛澤東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變化是深刻的。再者，中國亦深深地分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而且中國政府和台灣當局均能維持它們各自的海外支持者，並使之互不信任。單一的統一中國的思想未必像想像的那樣神聖不可侵犯。倘若從歷史來判斷，是否會出現一個單一的華人散居者是充滿疑問的。更加可能的是，單一的華人一詞可能越來越難於表達日益多元化的現實。我們需要更多的詞，每個詞需要形容詞來修飾和確認我們描繪的對象。我們需要它們來捕捉如今可以看到的數以百計的華人社群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我開始時指出在最近王靈智與我合編的論文集，我接受了散居者一詞。我自己的著作傾向“海外華人 (Chinese Overseas)”，而不是華僑 (Overseas Chinese)，1992年舊金山會議後成立的國際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ISSCO: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以及新近出版的潘翎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Lynn Pan, ed.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同樣如此。⁴⁹ 然而，根據內容，我依然相信我經常使用的華僑、(海外)華人和華裔這些詞是正確和有用的。在去年十一月你們有些人參加的馬尼拉會議，洪玉華使用了華族 (Ethnic Chinese) 一詞，我在發表主題演講時接受了這個詞。⁵⁰

我與他人是否不一致呢？我們是否會混淆我們的讀者呢？我希望如果我們沒有更精確地說明使用某個詞的理由及其含義，將會產生混亂。但是，在與這個問題共渡了四十年後，我不再認為必須有一個詞來定義這樣複雜的現象。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認識到條件變化，必須找到更多的名稱來說明更顯著的變化。我們需要的是以警覺和開放的心態，準備確定我們使用的每個詞的含義範圍，預見為特定目的而使用每個詞的結果。倘若我們承認存在許多種類的華人，而且有時華人比華族更可取，抑或華裔和華人比華僑更精確，那麼，我們應該能夠接受在比較研究中散居者有時優於其它詞彙的想法。畢竟已經存在許多類型的散居者（一個最直接的例子是你們中心名稱中國南方散居者研究中心！）。我們需要形容詞確認我們所指的特殊類型。在果斷地擺脫將一個相當排他性的描述一種人的詞不加區別地用於幾乎每一個人後，我們也許不難說沒有單一的華人散居者，但有許多不同類型的華人散居者。

* 本文是王慶武教授1999年2月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南方散居者研究中心成立儀式上的演講，趙紅英譯，劉宏和陳文壽審校。原載於《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3期（1999年9月），頁1-17。

注釋

- 1 Anthony Rei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Kristine Alilunas Rodgers,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in Honour of Jennifer Cushman*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and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1996).
- 2 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Two Volum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 3 “落地生根”是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王靈智和他的同事1991年在舊金山主辦的會議的題目。
- 4 參見1970年前後各版本的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及 *Webster's Dictionary* 等書。
- 5 Wang Gungwu,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Hua-ch'iao”, in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elected by Anthony Reid (Singapore and North Sydney: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nd George Allen & Unwin for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1981). 該文最初於1977年發表於 Lie Tek Tjeng, ed. *Masalah-Masalah Internasional Masakini*, vol. 7 (Jakarta: Lembaga Research Kebudayaan Nasional, L.I.P.I.), pp. 71-8.
- 6 1920年代和1930年代暨南大學學者的大量論著篇目收入許雲樵編輯的書目《南洋文獻續錄長編》（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59年）。陳達關於僑鄉名著《南洋社會與閩粵僑鄉》出版於南洋學會建立的1940年。
- 7 某些早期的例子是 J.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79); Gustav Schlegel, *Thian Ti Hwi, the Hung League or Heaven and Earth League* (Batavia: Lange & Co., 1866). 法國學者，如 Paul

Pelliot 和 Henri Maspero 更注意的是中國歷史和文化，而不是海外華僑，但他們的著作確實闡明了中國與印度支那國家關係的重要方面。

- 8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2nd edition 1965). 他的更詳細的研究 *The Chinese in Malaya* 初版於 1948 年，數十年來同樣是權威的著作。
- 9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1953) 最初是作為報告提交 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和新加坡殖民地政府的。T'ien Ju-K'ang,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Dept. of Anthropolog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53) 同樣是英國政府資助的。他們兩人均為 Raymond Firth 的學生，費氏 1948 年提交關於在馬來亞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報告，為他們的田野研究準備了基礎。其他著名的學者是 Alan J.A. Elliot, 他提交了關於新加坡華人精神信仰的報告 (1955 年); Marjorie Topley, 她提交了關於新加坡婦女彩堂的社會組織的報告 (1958 年)。
- 10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1957) and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195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onald E. Willmott, *The Chinese of Semarang: A Changing Minority Community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0). 關於馬來亞著名的研究是 Lucian W. Pye,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William H. Newell, *Treachorous River: A Study of Rural Chinese of North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2).

George H. Weightman of Cornell University 關於菲律賓華人的及 Jacques Amyot of Chicago University 關於馬尼拉華人家族主義的兩篇博士論文均完成於 1960 年。另外還有 Edgar 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關於柬埔寨，William E. Willmott 的著作是在倫敦經濟學院完成的，此即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Vancouver: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ublications Centre, 1967) 和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0).

- 11 例如，Tan Giok Lan, Mely, *The Chinese of Sukabumi: A Study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ccommodation*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61); Anthony S.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A Study of Their National Awakening* (Quezon City: R.P. Garcia, 1972); Leo Suryadinata (Liauw Kian-Djoe) [M.A. Monash, 1969], *The Three Major Streams in Peranakan Politics in Java, 1917-1942* (後於 1976 年出版)。Tan Chee Beng [Ph.D Cornell, 1979],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 12 Freedman 的報告、Skinner 早期的論著以及 Willmott 兄弟和 Weightman 的著作是第一種類型的很好例子；而 Purcell 和後來的 Skinner 屬於第二種類型。
- 13 最初的比較被歸因於泰國的 Vajiravudh 親王。他在歐洲民族主義刺激下，尋求發展泰國的民族主義。從他對泰國華人的觀察出發，他描繪了泰國華人與歐洲猶太人的相似之處，並實施促進華人同化的教育政策。Walter F. Vella, *Chaiyol, King Vajiravud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ai Nationalism*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8).
- 14 Harry Benda 對印度尼西亞政治，特別是將華人視為對手的穆斯林土族貿易商的潛在政治力量具有敏銳的眼光：*The Crescent and the Rising Sun: Indonesia Islam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The Hague: Van Hoeve, 1958). 儘管他未曾撰寫關於華人社群的論著，但他對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當時的西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社群興致盎然。在 1969 年他就任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首任所長前，我們曾就這個課題交談幾次。
- 15 一些歷史學家將其追溯至 1877 年滿清帝國第一任駐新加坡領事之任命，而另一些則認為中國政治是從康有為和孫中山的追隨者向從日本、東南亞和北美洲的海外華僑尋求財政援助開始的。從涉及大量華僑的現代政治活動的角度而言，我贊同後一種觀點。關於前者，參見 Wen Chung-ch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mperial Chinese Consulat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Unpublished M.A. thesis, Singapore, 1964; 關於後者，參見 Wa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15.2 (1959): 55-68; Yen

- Ching-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16 Tsai Shi-shan, Henry,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8-1911*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83); Edgar Wickberg, ed. *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2); Charles A. Price, *The Great White Walls Are Built: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to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1836-1888*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rew Markus, *Fear and Hatred: Purifying Australia and California, 1850-1901* (Sydney: Hale and Iremonger, 1979);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7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Lawrenc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 Stephen Leong Mun Yoon,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1941",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6.
- 18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pp. 113-158. 在 1999 年 2 月於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舉辦的一次關於馬來亞緊急狀態歷史的討論會上，提說 1939 年僅 16 歲的陳平 (Chin Peng) 曾坦言相告他在中日戰爭的早期就想回中國抗擊日本人。
- 19 這並不是完全自願的。爲了我，父親承諾向他的朋友的兒子教授古文，並時常要求我要比已經在華文學校上學比我三四歲的男孩們做得更好。我就兢兢業業學習，隨着中文水平的提高，開始被難度更大的文章所吸引。
- 20 在我回到怡保的安德森學院的最後幾個月——從 1945 年 9 月至 1946 年 12 月，這種民族主義感情已經很強烈。我的同桌、已故的 Aminuddin Baki 抱持着的民族覺悟最令我難於忘懷，他 1968 年英年早逝，時任馬來亞聯邦教育局長。
- 21 我父親 1925 年畢業於南京的東南大學，他總是希望我進入他

1928 年更名為中央大學的母校。1947 年夏他帶我到南京參加入學考試，結果發表在 1947 年 9 月 6 日的《中央日報》。我被外語系錄取。

- 22 我從 1947 年 10 月至 1948 年 12 月在中央大學上學，1948 年 12 月國民黨軍隊在淮海戰役被擊敗後，我決定回馬來亞與父母團聚。
- 23 馬來亞大學由愛德華七世醫學院和萊佛士學院 (文理學院) 構成，1949 年 10 月 8 日建校。它是英屬馬來亞 (新加坡和新近建立的馬來亞聯邦) 唯一的大學，三分之二的學生來自聯邦。這所大學的學生幾乎都出自這兩個地區的英文學校。華人明顯佔多數，錫蘭人、印度人、歐亞混血種爲數不少。在這所大學的早期歷史上，馬來人寥寥無幾。
- 24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Singapore: Donald Moore, 1959). 1992 年重新收入在我的論文集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pp. 11-39.
- 25 我在同事的鼓勵下編輯了 *Malaysia: A Survey* 呼應這一發展。該書 1964 年由 Praeger in New York 和 Pall Mall in London 出版。
- 26 關於印度尼西亞 1965-1966 年事件的可靠敘述依然難以獲得。Benedict R. O'G. Anderson and Ruth T. McVey,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ober 1, 1965 Coup in Indonesia* (Ithaca, NY: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Cornell University, 1971); Robert Cribb, ed.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1966: Studies from Java and Bali* (Clayton, VIC: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1990).
- 相反地，關於越南戰爭的著述很豐富。Robert D. Schulzinger, *A Time for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41-197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提供了關於戰爭主要特徵的概述。
- 27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43 (1970), pp. 1-30; "Malaysia: Contending Elites", *Current Affairs Bulletin*, 47.3 (December, 1970), pp. 1-12. 這兩篇論文均發表於 1970 年。此外，我還對 1969 年西馬來西亞的暴亂做了評述，"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sia", *Pacific Community*, 1.4 (1970), pp. 687-696.

- 28 所期待的華人性的質量導致了不同的估計。在中國者從海外華人在何種程度上依然喜愛中國的事物和忠誠中國代表的立場來衡量這點，而住在國外者通常滿足於講華文、遵循某些習俗和能夠卓有成效地運用中國的方式和關係。但是，重要的是他們的中國淵源得到尊重，而且他們作為華人沒有遭到歧視。
- 29 我只有軼事般的證據，但足以辨認華人的自卑，這種自卑是殖民地居民因他們的鄉下淵源而產生的。恰如澳大利亞的原英國殖民地居民，他們對來自“鄉下”的人也表現了類似的惱怒之情。對於某些華人而言，這與他們在沒有中國幫助的情況下而在中國以外功成名就的自滿是相伴隨的。這些極端的態度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而不僅僅在東南亞。
- 30 Freedman 著作中兩個最好的例子是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8) 和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6)。其他重要論文收入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Skinner 對中國社會學貢獻良多，他的記錄同樣令人稱羨：*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64) 及參考書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31 Wang Gungwu, “Among Non-Chinese”, *Daedalu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Spring 1991), pp. 135–157; reprinted in Tu Wei-ming, ed.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7–146。
- 32 在這些年，Yen Ch'ing-huang 出版了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參見注 15)、1995 年結集為兩卷本論文集——*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和 *Studies in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的系列論文、*Coolies and Mandarin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和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Yong Ching Fatt 也扎實地發表論著，他的論文後收入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這個時期他的主要著作是 *Tan Kah-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76 年，J.A.C. Mackie 出版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Five Essays*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其中收入 Charles Coppel 的重要論文。1983 年，Coppel 出版了他的權威研究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這兩個作者均發表了若干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

- 33 Leo Suryadinata (Liau Kian-Djoe) 這個時期的著述包括：*Indigenous Indonesians, the Chinese Minority and China: A Study of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University, 1975)、*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Java, 1917–1942*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6)、*The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 Seven Papers* (Singapore: Chopmen Enterprises, 1978)、*Eminent Indonesian Chinese: Biographical Sketch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8)、*Political Thinking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1900–1977*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和 *China and the ASEAN States: the Ethnic Chinese Dimensio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其中若干著作自出版後已作增補。他還發表了系列的論文，後結集為 *Chinese Adaptation and Diversity: Essays o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Indonesi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Published for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NUS by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3) 和 *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97)。
- 34 Stephe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s Policy, 1949–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35 貿易促使普通中國人前往東亞和東南亞，最初是在宋代 (960–1276) 之前，人數不多 [Wang Gungwu, *The Nanhai Trade: The Early*

-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ew edit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接着人數增多，後來形成一個華商集團[Wang Gungwu,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Observing Change in Asia: Essays in Honour of J. A. C. Mackie*, eds. R. J. Maya and W. J. O' Malley (Crawford House Press, Bathurst, 1990), pp. 33–48 (最初在1985年用中文發表);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ed. James D. T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00–421.
- 36 Linda Y. C. Lim and L. A. Peter Gosling, eds.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 One: Ethnic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Singapore: Maruzen Asia, 1983); Richard Robison, *Indonesia: The Rise of Capital* (North Sydney, NSW: Allen & Unwin, 1986); Yoshihara Kunio, *The Rise of Ersatz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最近的有影響的文集是 Ruth T.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2).
- 37 無論是華人經濟共同體、華人共同市場、華人共同體，還是大中華等等，一些作者正在擬想着一個將要到來的所有華人的團結。單一的華人散居者與中國大陸密切關聯則是其言外之意。David Shambaugh,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Harry Harding,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and Wang Gungwu,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December 1993), pp. 635–659, 660–686, 926–948. 至於恐怖的描繪，這些包括最近日本作者關於華僑的若干著作，Sterling Seagrave, *Lords of the Rim: The Invisible Empir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NY: Putnam's, 1995)，以及關於安全威脅的書籍，如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Y: A.A. Knopf, 1997).
- 38 這正由少量捲入其中的人所塑造。關於華僑華人的出版物迅速增加，如今不僅在南方省份，而且在全中國，任何與散居者或定居國外者的關係都得到系統的發掘。這類人對於僑務部門官員的價值獲得承認，如今追尋海外親戚既是人道主義的，又是有利可圖

的。高等院校和學術團體建立研究中心和單位，在全國和地方兩個層次上進行認真而廣泛的學術研究。包括論文集在內的大量書籍以及數十種專業學報、雜誌和通訊提供了關於世界各地華人的日益廣博的研究。這對中國的發展及海外華人命運的衝擊還難於精確的估計，但緊張有效的活動意識乃是不可避免的。

- 39 我最初是在 Philip Curtin,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讀到這點。這裏我引自 Anthony Reid, "Entrepreneurial Minorities,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Essential Outsiders?: Chinese and Jew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Europe*, eds. Daniel Chirot and Anthony Rei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p. 33–71.
- 40 在記者中尤其如此，特別是在 *The Economist* (21 November 1992) 同意這種包容性用法後。倘若香港和台灣的中國人被包括於這個集團裏，海外華人——他們多數是定居在外國的、憑借他們在非華人政權下發達的能力而聞名的少數民族——的角色將容易被誤解和誤傳。一個明確的例子是 Constance Lever-Tracy, David Ip and Noel Trac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 An Emerging Economic Synergy* (NY: St Martin's Press, 1996)，該書“散居者”主要包括香港和台灣的中國人。
- 41 我最初注意到“賤民企業家”的概念被用於東南亞的華人是1963年12月和 Joseph P. Jiang 出席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在新加坡舉辦的一次會議。他在印第安那大學剛剛完成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他的論文後來發表於會議論文集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A Symposium*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pp. 147–162. 最近這個思想被提煉為“本質的局外者”(參見注39)。重要之處是認同並不是靜止不變的。 *Ungrounded Empires* 是 Aihwa Ong 和 Donald Nonini 編輯的論文集引人注目的書名，它的副標題是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7)，我在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eds.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1 也探討了認同問題。

- 42 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Walte de Guyter, 1990). 資本主義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定性為“華人的”是值得爭議的，但這個名份激勵許多華人企業家變得更加自覺，後來還促使學者探尋什麼使他們格外“華人的”。
- 43 1998年決定世界華商大會的秘書處將在一個時期設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這項選擇是在香港和新加坡之間做出的。大會迄今為止是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以外舉行，但北京和台北的機構均熱衷於將大會引進各自的城市。在大會最終在這兩個城市舉行的時候，“散居者”與母國的團結可能是完整的。但被驅逐者或散居者又從何而來呢？
- 44 Liu Hong, “Old Linkages, New Networks: The Global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55 (September 1998), pp. 582-609.
- 45 關於這個問題的公共討論很少，但在私下場合和社群團體會議卻經常就“全球性”華人與猶太人及其多方面活動進行比較。與東南亞不同，北美華人更清楚猶太實踐主義；Chirof and Reid, eds. *Essential Outsiders?* (注 39) 在那裏比在任何地區更受重視。
- 46 我從未見過“英國散居者”，而且總是認為這是由於英國人最熟識他們自己的語言，清楚“散居者”一詞的獨特性。既然這個詞已在某種程度上被廣泛地付諸使用，我們談論在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前英帝國的其他部分的英國散居者還會有多長時間呢？
- 47 新聞傳媒積極支持香港和台灣，但多數引人注目的消息是通過國際網絡的。一些網址鼓勵復仇，但一些則比較積極並尋求“和解”。例如，世界華人聯合會的聲明以關於華人散居者的強有力的闡述開篇。下列引文抓住了這個網上組織的精神：

“華人據估計居住在一百三十六個不同的國家，是世界上分佈範圍最廣的族群集團。這種多樣性確實是令人敬畏的。然而，造成人們之間隔閡的是同樣的多樣性。”

“我們經常遇到美國華人或加拿大華人，他們對其他地方的華人知之甚少或毫不關心。這種毫無所知和漠不關心必須予以改正。我們的使命是造就華人與華人次集團之間以及華人與非華人之間的和解，這個使命無疑充滿了挑戰。”

- 48 “華人”一詞並非來自任何具備如今稱作中國的國家的人民的意義的語言的詞彙。中國人具備許多關於自己的詞彙，這取決於時間和地域，部落、族群或文化起源，以及他們對話的對象和場合。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同樣如此，甚至更為如此。“我們”具有許多次集團，只有面對“他們”，特別是他們感到被欺侮或被歧視的時候，才有一個共通的名字。例如，歸化的華人（美國華人等），以方言群和地名區別的華人（客家人和上海人），和以外國國籍區別的華人（土生華人、泰國土生華人），等等。
- 49 1998年在新加坡由 Archipelago Press、在倫敦由 Curzon Press、在美國由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中文版同時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 50 1998年11月馬尼拉會議是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第三屆會議（繼舊金山和香港之後）。主題是華人的文化適應——文化改造（Intercultur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Ethnic Chinese）。我演講的題目是“海外華人：未來中的過去”（Ethnic Chinese: The Past in Their Future）。

海外華人：未來中的過去

我曾有幸參加過多次有關海外華人的學術研討會，然而，這一次前來馬尼拉赴會，卻令我格外傷感。自從1994年年底我們在香港聚會以來，東南亞地區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形勢都發生了巨變，其中絕大部分受到金融風暴摧殘的國家都一蹶不振。不過，我們怎麼也沒有料到印尼華人會在今年五月遭受到如此慘絕人寰的浩劫。對印尼發生的這場悲劇，或許我們不該這麼驚訝。因為，在1997年年底時，已經有種種跡象表明印尼的經濟正面臨崩潰。降至今年年初，許多印尼人已在擔心類似1965年的動盪局面或許會在印尼重現。先是印尼盾的幣值一落千丈，物價騰飛，通貨極度膨脹，繼而是糧食和藥品日漸匱乏，全國各城鎮數十萬人口失業，舉國上下籠罩在一片惶恐不安的騷動之中。人們普遍有種預感，覺得這個國家隨時將發生巨變。緊接着，便是腥風血雨的五月。在短短的三天時間內，四名大學生飲彈喪生，成千上萬的群眾湧上雅加達、梭羅、棉蘭、泗水、巨港等城市的街頭示威，社會秩序完全瓦解。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燒殺擄掠和猥褻強姦，而受害者則絕大多數是印尼華人。

本屆大會期間，我們將召開一次專題會議來討論印尼華人問題，因此，對印尼華人在五月暴亂中慘遭迫害的事件，我也不準備在此詳細論述。¹總之，許多印尼華人被迫再次親身經歷往昔的悲痛，親眼目睹家園化為灰燼，親人陳屍街頭，自己商店裏的貨物被洗劫一空。不過，與印尼歷史上歷次類似的排華暴亂相比較，這次暴亂至少有兩個重要的區別之處。首先，在這次暴亂中，所有的印尼華裔受害者都是印尼公民；其次，在這次暴亂中，部分華人的妻女竟然慘遭強暴。婦女遭人強暴，是任何民族都最難以承受的暴力行爲。而對於華人來說，自從令人發指的南京大屠殺之後，華人就未曾遭遇過如此大規模的迫害。²我們都知道，南京大屠殺事件給所有的華人留下的是多麼痛苦的回憶。這一次，印尼的華人被迫從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基本立場來重新體驗歷史的創傷，一批華人受害者爲此付出了特別慘重的代價。這一切，促使我近月來不斷地反思：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或許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華人亦如此）必須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即今天的海外華人究竟應該認同人類歷史長河中的哪一段歷史？如果海外華人無法確定某段歷史爲自己的歷史的話，那麼，他們應當選擇誰的歷史來認同呢？海外華人是否能夠拋棄既有的歷史而重新譜寫自己的歷史？

我們首先必須提出一個問題：什麼叫做認同歷史？有趣的是，印尼著名作家普拉穆迪亞·阿南達·杜爾（Pramoedya Ananta Toer）上個月就印尼華僑問題發表演說時，也提出了類似的考慮。他是在其名著《印度尼西亞的華僑》一書再版發行時發表自己的想法的。在這部完成於1960年的著作中，普拉穆迪亞敘述了印尼仇視華人的政策是如何在漫長的荷蘭殖民統治時

期逐漸地形成、發展和實施的。他之所以要回溯這段歷史，目的是要抗議蘇加諾總統時代的印尼政府在 1959 年通過實施排斥華人的第十號總統法令。普拉穆迪亞將該法令稱之為“正式的種族主義政策”。他的這部著作當時馬上被當局禁止發行。他在十月份發表的那場演說雖然很簡短，但他在結束演講時仍呼籲眾人以史為鑒，共同制止類似印尼五月暴亂的“反人性的罪行”。他當時演講的題目是“以史為鑒睦鄰相處”。³

對普拉穆迪亞的主張，我深表贊同。我本人對海外華人歷史的研究亦使我深信，一個族群若要生存和發展，就一定要面對自己的過去。在早期，當飄洋過海的華人絕大多數是商家或短期寓居者時，情況相對比較簡單。後來，當這些僑居異鄉的華商成了“華僑”，而且應祖國的要求必須成為愛國華人時，情況就開始變得複雜了。這是因為他們效忠的對象是 1911 年滿清王朝崩潰之後新興的中華民國。⁴ 自此之後，海外華人的聲音變得日趨混雜，眾說紛紜。有的人認為，既然作為新興獨立國家的少數民族，海外華人就必須在二者之間作一抉擇：他們要麼效忠、順從於居住國政府（即便如此，他們還是經常被人懷疑是否忠誠），要麼以某種方式繼續維持華人的特性。可是，連海外華人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該以何種方式來維持華人的特性。他們是否只應該專注於賺錢而避免捲入政治風波？抑或只需要埋頭苦讀，冀望他日成為學者或科學家？他們應該從中國的歷史裏尋求自己的根呢？還是乾脆將中國歷史一股腦兒全盤拋棄，轉而只認同其海外新家園的歷史？

讓我把話題轉回到剛才所提的問題上來。對海外華人來說——我這兒指的不僅是那些印尼華人，而是所有居住在中國本土

以外的華人，將自己的未來與歷史相聯繫究竟意味着什麼？倘若海外華人的未來必須要有一段歷史的話，那麼，這該是什麼樣的一段歷史？迄今為止，海外華人基本上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傾慕、認同於中國歷史，要麼接受所定居的國家的歷史。我將簡要地概述這兩種選擇的特徵，同時對這兩種選擇由於二者只能擇其一之前提而造成的緊張狀態加以探討。

海外華人欲將自己的未來和歷史相聯繫，有兩條主要的途徑可選擇。

(1) 通過復述為眾人所認可、接受的那些史實，海外華人將自己族群歷史中既有或已知的部分予以確認，並盡可能地將這段歷史向前回溯。這種認同歷史的方法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形式，不過，最常見到的形式就是到中國歷史的各個層面去追根尋源，然後擇取出中國歷史中的某些部分予以認同。

(2) 海外華人與所居國的其他國民一道尋求一種新的歷史，而這些擁有不同文化和歷史背景的同胞也正在努力詮釋自己國家的歷史。這種現象在東南亞的某些國家比較普遍。不過，更為常見的是這些國家通過重新撰寫自己國家的歷史來塑造出一種新的歷史。

除此之外，另有兩條更具包容性的尋求歷史根源的途徑，這兩條途徑不僅都不強調種族和民族國家的角色，而且在現代社會中更為可行。這兩條途徑包括：

(3) 為了跟上全球化時代的步伐，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均跨越各自的國界而認同一種全人類所共同擁有的歷史。

(4) 海外華人以某種較具包容性的方法來編寫各自的歷史。由於現代教育和科技的普及，這條途徑應該行得通。

我將依次論述以上所提到的這四條途徑，看看海外華人如何可以利用過去來更好地瞭解自己的今天和未來。我相信，我所要談的對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已定居的海外華人來說都將是適用的。不過，我此處將主要討論居住在東南亞的華人，並將討論重點放在以下這兩類海外華人身上：

- A) 那些通過借鑒歷史經驗來規劃自己的未來的華人；
- B) 那些已經認同於某種歷史，而且他們的未來已經為該段歷史所決定的華人。

海外華人族群自身既有或已知的歷史

前兩條可供選擇的途徑是由海外華人族群自己創造出來的。所謂海外華人族群，指的是居住在外國的華人群體。無論海外華人族群的規模是大或是小，也不管他們在居住國總人口中所佔比例是多或是少（例如在新加坡，華人佔總人口中的比例高達 75%，而在亞洲以外的許多國家或在北美，華人佔總人口中的比例甚至不到 1%），⁵ 關鍵在於他們如何運用歷史來向本族群成員以及向非華人同胞或居住國政府表達自己的願望和身分。換言之，關鍵在於海外華人族群是否有能力促使絕大多數的成員認同本族群，抑或認同於居住國，或是二者皆予以認同。

在海外華人間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即像第一代移居海外的華人先輩那樣，盡可能完整地將家鄉的文化傳統移植到

海外僑居地，從而締造出該華人族群自身既有或已知的歷史。這是最顯而易見的做法，也是廣大海外華人長期以來最易於瞭解和認同的途徑。⁶ 在十九世紀末葉之前，正是這些飄洋過海的華人先驅，而且往往是他們，責無旁貸地到中國家鄉的家族、村落或社區中尋找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族群標誌，以便為華人在海外的新生活增添榮耀。早期的海外華人多是商家或手工工匠，他們通常是結伴而行，並通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形式的互助組織把自己組織起來。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因此對中國歷史作為一種統一的民族性的概念基本上沒有什麼認識。可是，他們至少還知道自己家鄉的名字，而且對各自家族的傳統習俗相當熟悉。他們記憶中的歷史，實際上主要是一部以男性為中心、父子相承、延綿不絕的家族史。其中部分人或許在家鄉還有家室，故而即使他們在海外僑居地已另外建立家庭，他們還是會定期匯款回鄉，贍養家小。他們通常會繼續遵行華人的傳統節日習俗，也會以最繁縟的傳統禮儀來祭悼亡友。大多數的這些早期海外華人希望能夠沉湎於自己所熟悉的往事之中，除非僑居國的歷史影響了他們賴以為生的商業活動，否則他們是不會費神去關注當地歷史的。

降至十九世紀，一些能夠斷文識字的新僑民加入了以男性為主的海外華僑社會。這些新僑民從家鄉帶來了許多有關中華民族英雄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他們不僅知道《三國演義》中那些故事的梗概，瞭解這部內容豐富、知識廣博的著作，更熟悉書中所歌頌的那些為國捐軀、為社會獻身的男子漢英雄氣概。除此之外，《水滸傳》中所謳歌的那些“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故事也深深地印在他們的腦海中。⁷ 可以說，中國的每一個男

(Claudine Salmon) 主編的那部論述“文學遷移”的論文集，就有大量的實例說明海外華人是如何非常成功地以這種方式保留了自己的文化。⁸

到了二十世紀初，隨着現代民族主義思潮在中國的興起，所有這些對中國歷史的粗淺認識開始發生變化。在西方殖民政權公然歧視當地民族和華人的地方，以及在華人族群規模較大、有能力自己籌辦新式華文學校的地方，這種轉變尤為明顯。海外華人創辦的這些現代華文學校，均以民族主義的中華民國的學校為榜樣。與此同時，中國與諸列強（包括日本）之間的緊張關係，進一步促使海外華人同心同德，同時令他們確認自己的新的效忠對象是中國。中國不再由令人可恨的滿族人統治，而是由海外華人所熟悉的廣東人或福建人來治理，自然大大地加速了海外華人對祖國認同的過程。因為，執掌中華民國政府的廣東人或福建人對祖國的抱負和熱望，得到了絕大多數海外華僑的理解和擁護。接着，由於軍閥混戰，國民黨人執政失敗，導致中國國內戰火頻仍，政權更迭。可這更激勵部分滿腔熱血的華僑矢志返鄉，為中國而奮鬥。當然，另外也有一部分華僑因此而卻步不前，不願意再支持腐敗、混亂的政權。然而，即便當這些愛國華僑之間的分歧日漸擴大之時，對那些願意認同中國歷史的海外華人來說，沉浸在中國歷史之中，意義仍然是非常重大的。

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眾多的華文學校在東南亞各地湧現，而且大多仿效中國國內的學校，所使用的教科書也是在中國國內出版的。於是在長達五十年的時間內，華校將中國歷史極其有效地傳播給了自己的學生們。儘管當地政府時不時地會

子，在他年輕的時候，都曾經聽到過這些故事。這些故事不但為漂泊異鄉的華人移民提供了身處逆境時爭取成功的策略和奮鬥的楷模，而且也直接或間接地向他們灌輸了與儒、佛、道三教傳統一致的道德價值觀念。無庸置疑，所有這些都是他們在異鄉奮鬥時所需要的行為準則。

許多長期僑居在海外的華人漸漸地在當地結婚成家，有些人更生兒育女，開始在當地紮根定居。那麼，他們的這些子女應該擁有怎樣的一種歷史根源呢？只要能力許可，海外的華人父輩們一定會竭盡全力地讓自己的子女受教育，讓孩子們學習中華傳統文化。因為，他們認為，無論是對華人族群而言，還是對華人所從事的社會行業來說，中華傳統文化都是至關重要，必不可少的。倘若家境富裕，或是家庭人丁興旺，他們還會為家中的男童們延聘私塾先生，教導孩子們學習中文，以便孩子們日後能夠像真正的華人那樣生活和工作。關於當時的私塾先生具體教導些什麼知識，我們所知甚少。不過，有一點是很顯然的。孩子們通過學習基本的中文閱讀和寫作知識，勢必對中國歷史上有關善行義舉的典故，以及中國神話、傳奇故事、甚至於當時清朝的一些聞名的史實均會有所接觸、瞭解。隨着十九世紀末從東南亞回中國家鄉的交通大為改善，一部分家境更為富裕的孩子還能夠回祖國深造。至於那些中文程度較差、尚無法閱讀中文原著的孩子，可以用他們自小就掌握的當地語言來閱讀那些已翻譯成越南文、泰文、高棉文或馬來文的中國古典故事。正是通過這種途徑，他們不但把一部分中華神話歷史傳遞給了自己的下一代，同時也把中國文學和一部分中華傳統價值觀念介紹、傳播給了當地讀者。克勞汀·沙爾夢

堅持把一些本土的歷史編寫入華校的教科書中，可中國歷史、中國人物傳記、中國詩詞和小說仍然是海外華人族群教育的主流內容。華校學生所學習的教科書中還包括了中國近年所蒙受的國恥歷史。海外華人對這些奇恥大辱均耿耿於懷。對那些長期生活在海外、因為祖國的貧困衰弱而備受欺凌的華人來說，感受尤為強烈。這種經過選擇的不太完整的中國歷史就這樣很好地溶入了大多數海外華人的意識中，並且至少影響了整整兩代海外華人。於是，當地的報章不僅轉載曾在中國國內刊登的文章，同時也發表由本地華人撰寫的文章，宣揚一個更為富強繁榮的中國，一個所有海外華人都引以為榮的中國。⁹

對那些接受當地教育的海外華人來說，當然還得學習其他國家的歷史。例如，泰國的華人就必須懂得泰國卻克里王朝(Chakri Dynasty)的歷史；而居住在西方殖民地的華人或在殖民地學校就讀的華人還得學習大量有關英國、法國、荷蘭及美國的歷史，有時甚至還要學習一些居住國國家的歷史。不過，對注重歷史的海外華人來說，學習這些外國歷史畢竟是次要的，他們對中國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的新認識，才是最重要的。那些受過華文教育的海外華人對中國國內的知識分子、政黨領袖、作家和藝術家尤為欽佩、仰慕。在他們的心目中，這些人不僅正在復興中國的傳統歷史文化，而且正在創造性地發揚、光大這種歷史遺產，創造出一種全新的、充滿活力的中國歷史，以回應現代社會的需求。令海外華人興奮的是，這股推動現代化的力量能夠重新塑造中國歷史，從而有助於下一代年輕的海外華人摒棄傳統歷史文化中過時的或迷信的內容，轉而接受進步和科學的事物。

在約半個世紀的時期內，如果海外華人願意的話，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確能為中國的繁榮進步做出貢獻，通過重溫祖國光輝燦爛的過去來描繪其未來的新藍圖。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海外華人對祖國的貢獻達到了頂峰。儘管當時東南亞本土亦被日軍所佔領，大多數海外華人所能奉獻的極為有限，可他們對全民族的抗日救亡運動所給予的種種支持有史為證，足以令海外華人引以為榮。¹⁰ 中國的歷史，無論是古代的歷史還是近現代的歷史，就這樣與海外華人自身的歷史融為了一體。正是因為具備了這樣的一種歷史觀念，海外華人才充滿了自信。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認同觀念是先經由家中的父母、親友或海外華人族群的領袖們進行傳播，然後再通過學習教科書和教師們的傳授而得以強化，形成正統的觀念。我們不可低估口述傳統在傳播歷史知識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但使年輕一代的海外華人能夠根深蒂固地接受中國歷史傳統的主要渠道，卻是正統的華校教育，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華校中那些具有高度政治意識的教師所灌輸的知識。正是通過不斷的復述這麼一種途徑，海外華人族群常常重溫本族群歷史上的某段特定或已知的經歷。除此之外，以華文教育為基礎而形成的華人經濟網絡的某些特徵，以及血緣、地緣紐帶所產生的社會與文化上的力量，均使得至少兩代的海外華人有能力再造自己的歷史文化。他們所移植、創造出的這一歷史文化，不僅為海外華人族群所認同，而且被公認為是有利於華人族群未來的成長與發展。

海外華人族群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抱有特殊的感情，這是十分自然的。廣大海外華人追隨本族群的自然傾向而熱愛中國的

歷史，也是無可厚非，可以理解的。不過，若然不慎，有可能失之過度。倘若海外華人族群一味地強調中國歷史傳統，以至於到頭來凡事都得依賴中國，則海外華人族群就會喪失自己在異鄉他國適應新環境、自學新東西、以及不斷創新和創造的能力。在形勢急劇變化的東南亞國家，這種令人擔心的情況尤易發生。若果真如此的話，未來的海外華人族群便再也做不到獨立自主，而可能變得完全被動和仰賴他人，繼而與自己所定居的國家漸行漸遠，成為陌路人。

定居國家或其他民族的歷史

在過去的數十年內，海外華人對中國歷史的熱愛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和考驗。這一方面主要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後的前三十年裏內部動盪不安，另一方面也因為海外各定居國家中民族主義的崛起，以及世界在不斷地進步和變化，這些變化都對海外華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形勢下，世界各地的華人不得不做出種種不同的抉擇。在大多數情況下，海外華人所能夠做出的最直接抉擇，就是認同於那些新興國家的歷史，而這些新興國家的歷史無一不是以本土歷史為基礎建構起來的。

當時，因過度沉醉於中國歷史而引致的弊端，已很明顯地顯現了出來。那些傾心仰慕中國的海外華人對所居國的本土歷史竟然漠不關心。倘若這種情形發生在短期寓居的華僑身上的話，尚情有可原，因為他們在短暫的逗留一些日子之後，畢竟還是要返回中國去的。可是，那些打算在海外定居的華人如果

由於某些政治上或文化上的緣故而全心關注中國的歷史的話，則往往會因此變得漠視所居國的本土歷史。其結果，造成這部分海外華人只對直接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本地事務感興趣，而對當地人民所重視的本土歷史毫不關心，甚至認為這些本土歷史與自己毫無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南亞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國民族主義紛紛崛起，西方殖民政權相繼撤離，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也獲得了勝利。於是，東南亞各新興獨立的國家開始期望在當地定居的海外華人能夠認同東南亞各國的本土歷史。我在前面曾提到過泰國的例子。在泰國，經過一段時期後，當地的華人似乎沒有多大困難就接受了泰國王朝的歷史，並將之與海外華人的歷史融為一體。¹¹ 可對於那些定居在東南亞的西方殖民地的海外華人來說，欲將兩種歷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恐怕就沒有那麼容易。在這些國家的殖民地學校裏，教師更多的是教授西方歷史，向學生宣傳西方文明偉大、勝利的光輝形象。這一切，加上當時正在蓬勃復興的中華文明，使得海外華人愈加瞧不起那些曾被西方人征服的本地民族的歷史和文化。¹²

海外華人之所以會忽視所在國家的本土歷史，其根源在於歷史上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歷史上，海外華商在尋求發財致富的過程中，或在為當地國家謀求某些其他利益的活動期間，多與當地社會上層的政治、經濟精英密切合作。可是，貿易往來及狹隘的經濟利益並不足以令海外華商認同於當地國家的歷史。這種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的現象是完全可能出現的。就像如今我們可以清楚見到的那樣，某些經濟實力雄厚的大公司

(如許多跨國公司)為所在國家創造了大量財富，可這些公司卻始終被當地人民視為是外來的、高高在上的外國公司。倘若這些投資者不參與當地的政治或文化，那麼，無論他們對所在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多大的貢獻，單憑經濟投資是絕對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的。換言之，欲真正地融合進一個國家的歷史，所要做的遠較發財致富複雜，它要求有關人士首先必須把當地民族的歷史當作是自己的歷史。

在東南亞民族獨立建國的初期，絕大多數的海外華人處於彷徨、不知所措的狀態，其背景即上述的選擇認同當地歷史的問題。當時，許多海外華人都曾希望，他們所從事的經濟活動以及在金融方面所做出的諸多貢獻，即便不為當地人民所感恩戴德，至少也該足以令其為當地人民所接受。至於那些純粹接受華文教育的海外華人，事實上根本就不懂得該如何去看待本土歷史。即便是那些曾和當地社會精英或富商大賈的子女一起在殖民地學校接受教育的海外華人，也沒有多少人會認真留心那些對當地同學來說具有特別意義的本土歷史。如果說，這部分曾接受殖民地學校教育的海外華人與當地同學之間在某些問題上確持有共同看法的話，那就是他們對歐洲歷史有着一致的認識，以及對歐洲人的統治或許皆滿懷憎恨。但是，他們從來就沒有機會將各自所可能瞭解的當地歷史和中國歷史融為一體，以便彼此能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共同緬懷過去。

由此可知，當時的海外華人可以通過兩條不同的途徑來使自己認同於當地民族的本土歷史。一條途徑是投身加入當地的民族覺醒運動，與當地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在新一代民族主義領袖的領導下共同反抗殖民政府；另一條途徑則是通過在新

興的民族學校中接受教育，並有意識地在課程設置中側重對當地歷史的認同。

第一條途徑尤其重要，並多見於那些曾發生激烈反抗行將撤退的殖民政權的東南亞國家中。在很早的時候，例如在本世紀初，菲律賓的華人就曾積極地參與當地的政治活動。¹³ 我們還看到，在1945年之後，印尼的華人不僅全力支持印尼民族解放力量反抗荷蘭人，而且還親身投入，與印尼人民一起並肩作戰。¹⁴ 不過，總的來看，海外華人在參與當地民族解放運動中的表現並不都是這麼積極的。例如，當時的馬來亞華人(包括今天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和法屬印度支那的華人就不是如此。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中，這兩個地方的海外華人覺得，他們所提出的反殖民統治的豪言壯語及所從事的反殖民統治的活動與中國國內民族主義運動或共產運動中所提出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是一致的，二者很難區分開來。更何況中國國內所興起的這些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所代表的是一種國際性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力量，並且聲稱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正因為如此，海外華人參與東南亞各國反殖民鬥爭及民族建國等歷史性的變革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而且往往因時而異，變化甚大。

很明顯，海外華人在積極參與當地人民的政治社會活動的過程中，發覺這種參與符合華人自身的利益。於是，他們就會比較容易地認同於當地歷史。在這方面，泰國是一個最佳的例子，這是因為泰國從來就沒有什麼殖民政府插手干預華人和當地人民之間的關係。但是，在另外的一些國家，即使殖民統治當局刻意將定居當地的華人與當地居民分隔開來，仍然阻止不

但在馬來西亞和印尼，由於種種不同的原因，海外華人與當地歷史的認同過程顯得格外複雜。華人在這兩個國家的認同之所以會遭遇到困難，其最重要的原因或許就在於這兩個國家都是新興的國家。而且，在五十年前，沒有一個國家稱得上是一個擁有明確疆域和連貫歷史的獨立政治實體。就印尼而言，直到1963年西伊利安(West Irian)被併入印尼版圖後，印尼才開始有其固定的疆界。倘若我們把東帝汶也考慮在內的話，印尼疆界形成的開端就得再向後挪到七十年代中期。¹⁷ 至於馬來西亞，也只是在1965年之後才形成了今天的疆界。¹⁸ 這些歷史距今不過三十餘年的時間。因此，海外華人在這兩個國家中認同當地歷史的途徑主要是上述的第二條途徑，即通過在國立學校接受教育，與當地的人民一起學習本土歷史。以這種方法來使海外華人認同所在國家的歷史當然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有的時候甚至需要等待整整一代人或更長的時間，海外華人才能真正地做到與當地人民一道共同分享該民族的標誌，並將其徹底地吸收、消化，繼而能以當地人民的觀點來看待所有的問題。

不過，在華人認同問題上，印尼和馬來西亞兩國之間還是存在着明顯的不同之處。在馬來西亞，海外華人所參與的社會活動自一開始就不限於經濟領域。¹⁹ 英國人鼓勵華人的這一做法，而大多數馬來西亞華人也認為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是十分重要的。正因為如此，自建國伊始，馬來西亞華人就積極參與由十三個州組成的馬來西亞聯邦之建國奮鬥，從而也就接受並認同了馬來西亞聯邦之簡短的歷史。也正因為曾經積極地參與當地的政治活動，馬來西亞華人才能不無自豪地回首往事，更加認同馬來西亞獨立前的那部分早期歷史。馬來西亞華人認識

了有部分海外華人與其當地的朋友及鄰居密切來往，同甘苦，共患難。諸如此類的事例在緬甸、越南和柬埔寨等國均可發現，而人們也可以從中學到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這些事例說明，只要海外華人有意識地積極參與其海外定居國的活動，與當地人民一起共同譜寫該國的現代歷史，他們就能夠認同這個國家的整個歷史。¹⁵ 正因為他們曾和當地人民一道共同參與當地的政治或文化組織，所以他們不僅會以同情、支持的態度看待當地民族飽經滄桑的歷史，而且願意和當地人民分享一個共同的未來。

至於東南亞地區的其他國家，菲律賓與馬來群島地區的另兩個國家(馬來西亞和印尼)略有不同，這是因為菲律賓很早就劃定自己的疆域。本世紀初，美國人的殖民統治令菲律賓具備了自己的歷史焦點，而大約九十年前由艾瑪·布萊爾(Emma Blair)和詹姆斯·羅伯森(James Robertson)聯合編輯的那部五十五卷本的珍貴的史料匯編，更進一步鞏固了這一歷史焦點。¹⁶ 對於菲律賓華人來說，與這一歷史焦點認同比較容易，這也因為強大的天主教教會四百餘年來在菲律賓奠定了十分堅實且統一的基礎。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絕大多數的早期菲律賓華人社區都成功地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菲律賓所獨有的這些社會條件不僅確保當地的華人混血兒被社會承認，而且使得他們很容易地就融入獨立後的菲律賓社會。然而，由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美國將其本土實施的排華移民法律延伸、推行到這個新殖民地，故而使得新來的華人移民遭遇到較大的困難。不過，即便如此，在這些初抵菲律賓的華人新移民中，也不難找到一些願意認同菲律賓民族歷史的十分明顯的先例。

到，他們在經濟上所做出的貢獻是馬來西亞國家發展過程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而，儘管馬來西亞華人對政府實施的一些帶歧視性的政策頗有怨言，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似乎還是願意將華族社群的歷史與該國的整個歷史融合在一起。

印尼的情況卻不是如此。早自本世紀三、四十年代起，部分印尼華人就積極地投入印尼民族主義運動，林群賢及其印尼中華黨 (Partai Tionghwa Indonesia) 的同僚即為範例。其餘的部分印尼華人則在印尼獨立革命戰爭時期與當地民族愛國志士一道並肩作戰，普拉穆迪亞·阿南達·杜爾在其著作中曾提及這些華人。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還隨着印尼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們進入新政府，擔任要職。至六十年代初，大多數的印尼華人都已願意將自己當作是印尼民族的一分子，印尼國籍協商會 (Baperki) 的主席蕭玉燦為其典型代表。²⁰

然而，1949年到1965年之間，印尼、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台灣國民黨政府三方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使得印尼華人參與當地政治活動的進程漸趨緩慢。後來，到了1965年之後，印尼政府的政策改為鼓勵當地華人將自己局限在經濟活動的領域內，不得在政府或軍隊中擔任任何官職。這一切均阻礙了印尼華人將自己認同於印尼的歷史。如果說，這就是近幾個月來印尼華人遭受迫害的悲劇因素之一，則未免將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不過，華人未能真正地以印尼公民的身分參與到印尼社會中去，確實使得印尼華人被迫處於主流社會的邊緣，而無法參與印尼的未來。這樣的一種狀況，導致絕大多數的印尼華人淪為一個沒有中國歷史根源的族群，他們所擁有的只是一個既不完美、也不完整的印尼本土歷史的經歷。這種狀況還轉而招致社會輿論不公平地指責印尼華人，批評他們對國家沒有歸屬

感。類似的不公平的指責，或許會逼使印尼華人重新回到僑居者的心態，變得心灰意懶，冷酷無情。

對所有那些關心印尼前途的人士來說，自印尼傳來的消息必定使他們沮喪不已。在後蘇哈托時期的這半年裏，唯一令人高興的好消息恐怕就是印尼華人如今已經決心在各個層面上參與到印尼的社會中去。倘若這個好消息可以解釋成是印尼華人開始審慎地接受印尼的歷史，並和當地人民一起探索如何為這段歷史下定義，那麼，印尼華人為自己在印尼社會中尋找一個屬於自己的新的空間還為時未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這還得取決於印尼華人能否被視為是印尼的一個合法的族群 (*suku-community*)。²¹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環顧世界各地海外華人的經歷，印尼華人的經歷似乎的確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華人族群一再地向人們證明：一旦他們在海外某地長期居留，瞭解了當地的社會狀況後，華人是十分願意參與當地社會事務的。當海外華人有機會享有公民權時，這種參與當地社會事務的意願尤為明顯。

認識並關心自己所定居國家的歷史 (我指的是東南亞所有國家的歷史)，其本身就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如果這一歷史過程能夠逐漸地、和諧地、自然地促使海外華人走向同化，相信無人不為之高興、欣慰。倘若海外華人所居國能夠在平等和自由的環境中日益富強的話，華人與當地社會的同化就更令人欣喜了。最終，海外華人族群自身的歷史將會與其定居國家的歷史完全地融合在一起，海外華人與東南亞本地居民亦皆將因此而受惠獲益。

全人類共同擁有的歷史

以上我所描述的這兩種選擇，不僅使得海外華人與當地族群之間出現矛盾和摩擦，甚至在海外華人之間也產生分歧或齟齬。之所以會如此，主要是因為這兩種選擇帶有排他性，而且老是互相衝突。不過，這兩種選擇導致出現困難重重的局面，還在於他們往往被視為是整個族群所做的選擇。我現在要轉而討論另外兩種看待歷史的選擇，一種是小部分人所做的選擇，另一種是個人所做的選擇。由於這兩種選擇較具包容性，所以在當今世界中比較行得通。第一種選擇多見於一些海外華人身上，他們希望能夠超越國界的限制，進而認同全人類所共同擁有的統一的歷史。在全球化的時代，這一選擇是適宜的。我曾提及教育、科學發展、以及人們所擁有的共同經歷在邁向現代文明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換言之，任何人都能夠認同於自己國家的歷史或其本族群的歷史，或同時認同於兩者的歷史，這並不排除我們同時可以認同於人類的發展史，也不意味着我們無法比我們的先輩做得更好。當然，我們必須在此假設說，所有關於歷史的詮釋都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可以共存的。倘若對某個國家的歷史之定義問題已經得到圓滿的解決，國民的身分亦已得到保障的話，那麼，這樣的一種選擇當然是有所裨益的。倘若海外華人族群並非陷於恐慌、混亂的狀態之中，而是在其各自所歸化的國家中已經取得了自主權的話，選擇走這一條路無疑會更加理想。²²

我以為，在這個世界上，少數族群一般都不滿意自己在其國家中的地位或現狀。至於東南亞各國的少數族群，他們在建

國初期時，所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確認自己的身分及共同的命運。在這樣的歷史階段中，欲從人類發展的角度來討論他們的未來，似乎言之過早。可是，如果東南亞各國總是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視野來考慮問題，則其眼光未免失之短淺。對任何開明的政府來說，鼓勵其國民放眼世界，胸懷全球，到頭來一定獲益非淺。東南亞各國及其華人族群也應該如此，為全球性的現代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我想，至少可以列舉出兩方面的理由，來說明追求全人類的發展進步與各文明國家的自身利益是相一致的。

首先，如能圓滿地對某個國家的歷史作出定義，便可讓該國的多數民族和少數族群一道共同分享一個國家的歷史，這將能確保該國充分利用國內所擁有的人才。大量的事實說明，海外華人所展現出的各種聰明才智不僅能為全人類的福祉做出卓越的貢獻，而且可以裨益於其所在國家的發展。有關政府不應該僅僅因為海外華人是來自他國異鄉而將他們的聰明才智棄之不用。恰恰相反，應該更加廣泛地善加利用他們的才幹，並有系統地鼓勵此類海外華人掌握各學科最前沿的知識，以及各種難能可貴的技能。這些海外華人所取得的成就最終可以被用於服務其所在國家的利益。許多事例表明，效忠於其所在國家的海外華人在學習、掌握了國際上先進的科學知識或其他知識財富後，往往都會將這些知識財富帶回來，從而對其所在國家有所貢獻。

其次，認同於一個範圍更為廣泛的全人類的歷史，並不意味着無法再效忠於自己的國家或族群。現代教育的好處就在於使得人們有能力從多個不同的層面來審視這個世界。東南亞各

國的政府或許會要求定居在各國的華人優先關注參與其所在國的國家事務，而後才關心華人族群內部的事情。與此同時，有關政府也應該更加開明，允許當地的華人自由地到國外去學習或工作。無論如何，即便這些海外華人得不到有關政府的支持，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會自行接受現代化的挑戰。所謂現代化的挑戰，亦包括認同於某段全人類所共同擁有的世界歷史，從而使得海外華人可以融合進人類發展的主流中去。

個人的選擇

請允許我從另一個不同的層面來進一步探討個人的選擇。在當今這個現代教育昌明、通訊科技飛速發展的世界裏，人們完全能夠以一種兼容並蓄的方法來編織各自個人的歷史。編織個人的歷史的方法多種多樣。人們可以側重撰寫有關個人回憶的部分，而以十分靈活的手法從昔日的歷史中擇取自己認為適合的部分，將之編入自己的個人歷史中。對於東南亞的華人而言，他們可以擇取部分中華文化的遺產作為自己文化方面的歷史，再擇取部分中國歷史或某段他們可以接受的東南亞本土歷史來構成自己在當地的歷史。諸如此類的選擇甚至可以延伸到包括其他國家或大陸的歷史。至於為何要擇取不同種類、不同階段的歷史，選擇的標準如何確定，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譬如，這種選擇可能純粹是一種對人類歷史上的某種特徵之美學上的反應，也可能是對某項科學發明的驚嘆，或可能是對某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敢行為之欽佩，甚至可能是對另一個國家的民族歷史的高度讚賞。問題的關鍵在於，一部兼

容並蓄的個人歷史必須是開明的和自由的，而且不會影響到個人對其族群或國家的效忠。

像這樣的一種個人選擇可不是容易做到的。倘若不為他人所諒解的話，很可能會釀成悲劇。由於我們現在是在馬尼拉開會，這使我想起了一件涉及個人歷史的往事。大約在五十年前，我聽說了一個有關菲律賓混血華裔詩人兼畫家何梅諾·張·維羅索 (Homero Chiong Veloso) 的故事。我從未遇見過這個菲華混血藝術家，因為早在我於 1950 年初訪菲律賓之前，他已在當地的基督教青年會大廈內割脈自殺，因流血過多致死。據我當時瞭解，他之所以選擇自殺，既因為無法使自己的個人回憶適應於新的社會現實，也因為在菲律賓及菲華社會面臨巨大變革的前夜，無法承受個人生活所帶來的痛苦。他以死來解脫自己，並通過自殺這種方法來向人們訴說他當時所承受的那種難以忍受的痛苦。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轉折性的時代。當時，菲律賓剛剛從 1945 年的太平洋戰爭中重生，新興的菲律賓民族主義與中國的民族主義正在相互爭奪着類似何梅諾·張·維羅索這樣的菲律賓華人的身分認同。我從未忘記這個故事，而且仍在思索着他走上絕路的原因。我想知道的是：他無法面對的究竟是他個人歷史中的哪些東西呢？²³

中國人一向都沒有進行個人反思的傳統。我相信，海外華人也是如此。中國人中間從未見到有什麼偉大的自傳或人物傳記，以記述某個人自己的往事或經歷。除了喊冤叫屈或尋求公道之外，中國人也從未有向外人披露個人私生活的習慣。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始終保持沉默方為君子之道，若獲得了成功還能保持緘默，就更令人敬佩了。聰明的中國人從不向他人訴說自

己的失敗，因為那只會招人厭煩。在過去的這兩個世紀中，東南亞地區華人所撰寫的個人傳記寥寥無幾。不過，就是從這幾本屈指可數的傳記來看，也不難發現海外華人已經把中國人的這一甘寧淡泊、默默無聞的傳統帶到了海外。

隨着教育的普及，特別是通過現代媒體的傳播，人們得以讀到其他人所寫的傳記，從而使得上述的這種情形正在發生變化，儘管其變化的速度還相當緩慢。²⁴ 近數十年來，所有的海外華人都可以讀到那些公開而又坦白地訴說自己個人生活的作品。此類現代的作品不僅強調個人的價值，着重剖析每個生命所獨有的特徵，而且還引入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來解釋每個人之需要的普遍性，說明詩歌和小說中的“我”，事實上遠比中國傳統歷史中的任何東西都更具滲透力，也更具自我分析能力。除此之外，現代法律中所蘊含的自由、對個人人權的保護、以及形形色色鼓吹民主體制的呼聲，均有助於年輕一代的海外華人從其棲息、眷戀的個人歷史中解脫出來。

這種個人的解脫能否成功，還得取決於海外華人所居住的具體環境。在東南亞，華人普遍不願意多發表意見，當地人民和政府對華人的猜疑及敏感，使得他們更加沉默寡言。這種狀況導致現代的海外華人也不願意以具有創意的方式來探討自己個人的歷史。

然而，時代畢竟已經是不同了。無論是族群還是國家都必須更加開放，個人與個人之間應該要有更多的接觸。越來越多的海外華人希望能夠選擇自己的未來，而讓海外華人瞭解可供他們選擇的各種不同的歷史，勢必有助於他們作出自己的擇決。

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時，常常會遇到居住在不同地方、生活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的海外華人。這些海外華人中間曾作出個人選擇的人數之衆多，每每令我大為驚訝。令我驚訝及佩服的不是何梅諾·張·維羅索之類決定自尋短見的海外華人，而是像林群賢、蕭玉燦以及普拉穆迪亞·阿南達·杜爾筆下所描述的那些為印尼革命奮勇鬥爭的海外華人。這些海外華人參與當地政治活動的動機或許各有不同，他們各自的命運肯定也有所不同。可是，他們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選擇自己個人的歷史，並通過這種選擇來尋找自己的未來。今天的海外華人——我指的不單單是東南亞的海外華人，而是全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均比那些早年的海外華人有着更多的選擇，因而也就能夠在爭取自己的未來方面比當年的先輩們做出更大的貢獻。換言之，今天的海外華人一定能夠做得更好。

* 本文是王廣武教授 1998 年 11 月在馬尼拉“海外華人國際研究學會”年會上所作的專題演講。中文稿原載《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9 年第四期，頁 1-11。錢江譯。

注釋

- 1 有關印尼華人在五月暴亂中慘遭迫害的詳情，見 Geoff Forester and R.J. May, eds. *The Fall of Soeharto* (Bathurst, N.S.W.: Crawford House, 1998) and Jamie Mackie, “Tackling ‘the Chinese Problem’” in Geoff Forester, ed. *Post-Suharto Indonesia: Renewal or Chaos?*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pp. 187-197.
- 2 在南京大屠殺的六十週年紀念期間出版的刊物包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與南京市檔案館所出版的兩冊照片與文獻，《侵華日軍南京大

- 屠殺圖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英文的著作有 James Yin (edited by Shi Young and Ron Dorfman), *The Rape of 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 (Chicago: Innovative Publishing Group, 1997),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and Erwin Wickert, ed. (John E. Woods trans.) *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1882-1949)* (New York: Knopf, 1998).
- 3 現年七十四歲的普拉穆迪亞·阿南達·杜爾 (Pramoedya Ananta Toer) 為印尼著名作家，曾創作、發表多部小說。最有名的著作是 *Buru Quartet* (*This Earth of Mankind*, *Child of All Nations*, *Footsteps* and *House of Glass*, all translated by Max Lane)。他的印尼文名著《印度尼西亞的華僑》(Hoakiau di Indonesia) 一書於 1960 年在雅加達初版面世 (Penerbit Bintang Press)。
- 4 有關“華僑”這一名詞的運用與意義，我的著作有“The Origins of Hua-ch’iao,” in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St Leonards, NSW: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with Allen & Unwin, New edition, 1992), pp. 1-10, and in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Southeast Asian Huaqiao in Chinese History-Writing”, in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 3-21, 22-40。
- 5 海外華人族群的人口都一般難以估計。一個比較細心的預算，可見於 Lynn Pan, ed.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Oversea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6 只有一小部分的中國婦女能在十九世紀末葉移居東南亞，詳見 Lim Joo Hock,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in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60-1901”,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22 (1967): 58-110 and Joyce Ee, “Chinese Migration to Singapore, 1896-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1(1961): 33-51。有關北美和澳大利亞的情況，見 Charles A. Price, *The Great White Walls are Built: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to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asia, 1836-1888*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06-109, 215-277。

- 7 這兩部書的英文版本可見於 J. H. Jackson, trans. *Water Margins*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1963), Two Volumes and Moss Roberts, trans. *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 8 Claudine Salmon, ed. *Literary Migra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 (17th-20th Centuri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7)。此類中國文學也曾被大量翻譯成馬來文，見 Claudine Salmon, *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 A Provision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ari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 l’Homme, 1981)。有關泰國的情況請參考 Craig Reynolds, “Tycoons and Warlords: Modern Thai Social Formations and Chinese Historical Romance”, in Anthony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t Leonards, NSW: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with Allen & Unwin, 1996), pp. 115-147。
- 9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經驗最能反映這一區域的教育與政治效忠問題，見 Victor Purcell, *Problems of Chinese Educatio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and Truber, 1936); Philip Loh Fook Seng, *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 1874-194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the three essays by Sally Borthwick, Tan Liok Ee, and Sharon A. Carstens, in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5-59, 61-74 and 75-95。
- 10 Wang Gungwu, “The Limits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1912-1937”, in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St Leonards, NSW: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with Allen & Unwin, 1992), pp. 142-158;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Lawrence, KA: University of Kansas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70); Stephen Leong Mun Yoong,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194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6。

- 11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 12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econd Edi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Douglas Murray, "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e China Quarterly*, 20 (1964): 67-95; Francis Wong Hoy Ke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utheast Asian Education* (Kuala Lumpur: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1); Chai Hon Chan,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 The Malayan Experience* (Canberra: ANU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re, 1977).
- 13 Antonio S. Tan, *The Chinese Mestizo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ilipino Nationality* (Manila: Asian Center,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Occasional Paper, 1983); Teresita Ang See and Go Bon Juan,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Revolution* (Manila: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1996); Isagani R. Medina, "Chinese Mestizos and the Ethnic Chinese in Cavite during the Philippines Revolution, 1896-1902", in *The Ethnic Chinese as Filipinos*, Part two, edited by Teresita Ang See, *Chinese Studies Journal*, 7 (1997): 54-66.
- 14 李學民和黃昆章, 《印尼華僑史》(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 ch 7; Twang Peck Yang, *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 in Indonesia and the Transition to Independence, 1940-195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5 柬埔寨的情況可見 W. E. Willmott,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67) and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70). 比較普遍性的論述可見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Lynn Pan, ed.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 16 Emma H. Blair and James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Cleveland: Arthur Clarke, 1903-1907).
- 17 John O. Sutter, *Indonesianisasi: Politics in a Changing Economy, 1940-1955*, Four Volu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59); Merk C. Ricklef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since*

c. 1300, Second E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arts V and VI.

- 18 James Ongkili,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1946-1974*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1998).
- 19 K.J. Ratnam, *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Gordon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0).
- 20 印尼華人的物傳記見於 Pramoedya Ananta Toer, *Hoakiau in Indonesia*; Leo Suryadinata, ed., *Political Thinking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1900-1977*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Prominent Indonesian Chinese Biographical Sketches*, Third Edi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5).
- 21 Wang Gungwu, "'Are Indonesian Chinese Unique?': Some Observations", in J.A.C. Mackie, ed.,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n* (Melbourne: Thomas Nelson, 1976), pp. 199-210.
- 22 Wang Gungwu,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The 1997 Reischauer Lectur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3 這次的演講過後, 我才獲悉, Homero Chiong Veloso 的一些畫與詩最近已出版了, 但還未能獲取。
- 24 最近有兩本有關華人在東南亞的傳記, 見 Lien Ying Chow, with Louis Kraar, *From Chinese Villager to Singapore Tycoon: My Life Story*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92) and Hsuan Owyang, *The Barefoot Boy from Songwad: The Life of Chi Owyang* (Singapore: Time Editions, 1996). 口述歷史有時比傳統的華人傳記還要明確, 如 Chan Kwok Bun and Claire Chiang See Ngoh, *Stepping Out: The Making of Chinese Entrepreneur* (Singapore: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Prentice Hall, 1994).

海外華人研究的地位

在今天中國之外的華人中，生長在不同國家或地區者之間有着明顯的不同。例如，美國土生華人對世界的看法就與新的中國移民或東南亞華裔的再移民不一樣。在西歐、印度、朝鮮或日本、斐濟、澳大利亞、新西蘭、大溪地或毛里求斯等有一定規模的定居華人社會裏，情況也相似，而這些社會裏的華人又與那些新近直接從香港、台灣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的移民不同。

這樣，人們的研究從何入手呢？顯然，有些華人社會有自己的悠久歷史可以敘述；有些則規模之大足以吸引人們進行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研究；同時，還有一些則是外交政策、政治與安全所關注的問題。今天，更多的華人已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功，以至引起了經濟學家、大學研究者和第三世界的計劃制訂者們進行個案研究的興趣。一些華人群體在中國之外有了數代的繁衍，許多華裔已與當地居民通婚並已完全同化，還引起了醫學家和衛生學家的極大興趣。

在此，我無意於撰寫一篇書目提要式的文章或作文獻的概述，也非羅列各地華人的諸般特徵。我知道專家們在以後三天提出的論文中的中心內容，因而，這裏我只是十分簡要地說些我想說的話。首先，我將對迄今為止的海外華人研究作一概

述，並指出作為一個究竟是衰落還是發展似乎還難以斷定的領域所存在的某些明顯的不足。其次，將對兩個重要的傳統與研究方法作些分析。其一是集中在各個極力成為僑民和移民的小中心的海外華人社區。其二是着重研究通常是每個這樣的小中心所屬的範圍內的矛盾現象。在過去幾十年裏，這兩種研究有了迅速的發展。我認為，在未來的研究中，二者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最後，我將舉例說明使海外華人的形象增大的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是：(1)作為移民商業社會的經濟適應性與成功的問題；(2)在經濟成功同時的文化意識問題。越來越多的學者、記者、遊客和其它觀察家們以及海外華人社會本身對這兩個問題的興趣日增。而且，我將指出兩者在將來的重要性。為此，我所選擇的許多例證都是來自東南亞，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東南亞的華人影響最大，並為世界學者所矚目，而且還在於我希望東南亞的經驗對於那些研究美洲和大洋洲的華人社會或其它較小、較孤立或較新的華人社會的學者們能有所幫助。

關於海外華人研究簡史。

中國人從北部中原南移西遷的歷史長達 2500 餘年，許多人在兩千年前即已到達滿洲、北朝鮮和越南北部。有關這些定居點的記載已成為中國悠久歷史的一部分，但是從來沒有“域外華人”的觀念或研究。漢朝以後，少數中國商人從海路抵達朝鮮、日本和“南海”。迨至唐朝，此種情形有增無減。大約在

這是在從十九世紀歐洲殖民研究的傳統發展成爲一種少數民族和種族研究之前的大致情形。有些人會認爲，這是早期東方主義傳統的一種延伸，當許多中國人被作爲苦力引入殖民地之時，這種研究愈益政治化。正是在此時，還不能把華人視爲商人和工匠。勞工移民的蜂擁而至，礦場和種植園中的緊張勞動，造成了管理上的新問題，稅收的新來源，甚至對法律與秩序的新威脅。爲了使殖民當局與土著官員能夠對華人進行更有效的控制，這就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因而，描述性著作的水平提高了，而許多行政管理與經濟的報告水平堪與近年來所做的專題研究相比擬。

十九世紀後半期，爲了尋找工作 and 商業機會而離開中國的華人數量急劇上升。一些華人社會的財富也在增長。在具有殖民傳統的學者之外，不久又有兩個對華人懷有同樣興趣的集團與之並駕齊驅。一是中國國內少數感到自己有責任瞭解外國事務的官員與學者；一是美洲和澳洲等移民國家的記者、律師、政治家和工會領袖。儘管引起他們興趣的來源不一，動機不同，但他們的作品卻多爲政治性的。作爲殖民管理的事務，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西海岸、澳大利亞的金山，對白人居民來說，“華人問題”已從殖民統治問題發展成爲移民和勞工政治問題。在清代中國，華工爭端成爲有關主權和政策的嚴重問題，中國保護海外子民的能力受到懷疑。迨至十九世紀末，人們認識到這個“問題”最終是不能與現代民主主義現象分開的。

從根本上來講，這是海外華人“問題”政治化和“黃禍論”的一部分。十九世紀後期，中國與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和在太平洋的英帝國)之間的爭論發展成爲二十世紀初期一系列有關

一千年前，已出現小的華人定居的跡象。有關這些華人的記載是斷簡零篇，且通常是附屬於有關外國的報道或記述中，這除了作爲中國歷史的一個延伸或一部分之外不值得另加注意。沒有什麼可稱之爲“海外華人研究”的。即使是在大批華商到達南洋活動的前夕，關於鄭和下西洋這樣較重要活動的記載也是簡略之至。諸如《明實錄》等官方文獻曾順便提及一二。直至二十世紀，海外華僑社會還不是中國國內的歷史學家們研究的一個題目。中國商人和僑民在朝鮮、日本、越南或東南亞其它國家的歷史文獻中也不值得進行認真的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最早意識到“華僑”僅僅是十七世紀初的事情。這便是張燮的《東西洋考》。一個世紀之後，有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問世。十九世紀初，有謝清高的《海錄》；接着在首次中英戰爭(1840)後不久又有魏源的《海國圖誌》。所有這些作品均爲關於外國的報道，沒有能稱得上“海外華人研究”的。說實在的，較之原住民或中國人自己，十六至十九世紀的歐洲人則對東南亞華人注意得更多。在歐洲人關於東南亞主要貿易港口的文獻中，有對中國商人和工匠的描繪與評論，這些地方歐洲人都是將華人視爲競爭對手，或者能夠既僱傭他們又把他們作爲合作的伙伴。葡萄牙人在馬六甲，西班牙人在馬尼拉以及後來在菲律賓各地，荷蘭人在巴達維亞和馬來群島的其它地區，都留下了有關華人社會的最早記載。爾後，當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殖民官員在逐漸建立了對諸如檳榔嶼和新加坡等日益興起的港口城市的統治時，他們開始認真看待華人社會，而有關華人經濟活動的報告也更加豐富和準確。

海外華人效忠的問題，當這些問題無法解決之時，新生的東南亞土著國家在交戰時期的領袖們對於中國政府呼籲海外華人愛國的做法，深懷恐懼。孫逸仙和他的國民黨與海外華僑有着很深的淵源，將華僑視為該黨的主要支持力量之一。後來，中國共產黨對這些華僑依賴較少，但1949年他們的勝利在東南亞引起了對中國通過華僑進行擴張的更大恐懼，這是幾十年來海外華人研究著作產生的背景。自越南戰爭結束以來，這些恐懼多少已經減輕，但它決非一去不返，而是仍然易於復發。

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幾乎主要有關東南亞華人的研究都具有強烈的將華僑“問題”政治化的色彩。無論是在殖民當局的或議會的或國會的報告中，無論是在對當地、殖民者或中國等方面所面臨的該問題進行生動記述的報刊雜誌中，在近百年的時間裏要將華人問題與政治、外交、防務和安全諸問題相隔離開來看待，那是何其之難。

在過去近百年的著作中，可能有好的，有壞的或無足輕重的，為我們所稱的海外華人研究可能奠定或沒有奠定某些基礎。然而，不管怎樣，其着力之處與不足之處確實需要進行考察。在此，用幾句話是難以公正地評述這些作品的廣度與深度的，但它有助於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我們究竟由此向何處努力？”這些著作可以粗略地分為四類，即殖民官員、白人居民和土著領袖們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國官員和學者們的著作；當地華人（無論定居與否）的作品以及現代國際上的和華人的著作。

總的說來，東南亞殖民官員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這是因為他們有同時統治土著居民和中國移民的職責。對每一個殖民

地不僅進行土著居民與華人之間，而且進行該地華人與其它殖民國家華人之間的比較，這是很用處處的。當他們的目的是幫助各自的殖民政府更穩定地進行治理時，他們發現有必要去瞭解每個華人社會的經濟地位以及社會與文化的動力。對東南亞華人進行超越表面的和一般化研究的經典之作有格魯(J. J. M. de Groot)、弗萊明(J. L. Vleming)、維尼(W. L. Wynne)和巴素(Victor Purcell)等人的作品。與之相反，北美和澳大利亞白人居民的著作題材則過於狹隘，而且通常更多的是向人們顯示他們的種族主義態度，而不是生活在他們中間的華人。直至最近，才有學術性的作品問世。亞洲土著民的作品當表述的只是他們的民主主義與仇外主義的熱情時，便不具有學術性。現在，真正的研究工作已經出現，但主要是當地華裔，他們的著作與第四類研究著作加以同樣看待。

第二類是中國官員和學者們的著作。他們主要描述海外華僑與中國歷史上的聯繫，華僑的愛國主義與政治活動，其經濟成就，他們的學校、報刊以及清朝、國民黨和共產黨政府所執行的華僑政策的演變。儘管有些人的確在其所涉範圍內力求有所見地，但其基調仍然是中國認同論，包括強調投資以及政治與文化的效忠。最著名的學者有馮承鈞、陳達、李長傅和姚楠。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與台灣都將華僑問題高度政治化，很少有學者受到鼓勵去進行認真的學術研究。值得提出的例外情況是一些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如田汝康（人類學家，回到中國後轉向歷史研究）與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園。近十年來這一研究有了明顯的復蘇，但大多數作品即使沒有那麼多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色彩，也依然局限於對華人經濟成就的民族主義

自豪感，只有極少數的學者有機會對華人社會自身進行研究，同時他們也需要建立起有特色的海外華人研究的方法。

第三類是當地華人自己。無論他們是僑民還是居民，他們都比較傾向於着重探討因政治效忠（無論是對中國或對當地或殖民政權）而引發的複雜的、多種多樣的問題。二戰前在東南亞，這方面的學者有宋旺相、郭德懷、林天祐和梁友蘭。戰後，在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接受訓練成為現代學者的新一代土生華人開始作為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和語言學家在不同的學科內進行寫作，他們大多數已認同於各自的民族國家。然而，即便如此，在他們大多數研究中，政治效忠和文化整合問題仍然是一個基本的主題。從廖建裕所編《東盟各國華人》一書中的一系列論著中可以發現，一批優秀的當地學者已經與後殖民時期在這一領域頗有建樹的西方學者齊頭並進。

第四類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由兩位傑出的人類學家領導的，他們是倫敦經濟學院的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康奈爾大學的斯金納（G. William Skinner）及他們在倫敦——康奈爾的年輕學者隊伍。他們關於新馬、中國南方（弗里德曼）、泰國和印尼（斯金納）的著作是具有權威性的。緊隨其後的有人類學家威爾莫特兄弟[其中雲達樂（Donald Willmott）研究印尼、雲達忠（William Willmott）研究柬埔寨]以及歷史學家魏安國（Edgar Wickberg）研究菲律賓。此外，還有克勞婷·蘇爾夢（Claudine Salmon）關於華人作家及其馬來文作品的重新發現的引人注目之作。他們的專業化風範給新一代土生華人學者以很大的影響，並幫助他們作為認同於當地民族的堅定

分子去提出新的觀念。與之鮮明對比的是，這種專業化風格並沒有激發土著學者對華人進行認真的研究。一旦土著學者有意識地對他們的少數民族進行很好的學術研究，這將是知識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

對東南亞華人的研究與對其它地區華人的研究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最顯著的不同或許是關於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年前對美國華人的研究。在此，我不僅是指佔支配地位的關於移民、勞工關係及其它政治與法律方面的著作（特別是美國學者的著作），而且也指華人自己著作中的矛盾。在華人著作中，很少有關於經濟機遇和移民成就的故事，而更多的是向美國人學習，作為瞭解西方文明的窗口。同時，還有大量作品是關於歧視、對美國教育、文化和社會的真實的驚奇，這是延續至今的羨慕與困惑的混合體。

還有一點不同的是，在本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向東南亞的移民完全停止之時，北美則開始向中國人和朝鮮人開放門戶，至少有四種中國人是可以辨別出來的：來自台灣的；來自香港的；來自東南亞及其它地區的再移民；以及最近直接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們幾乎可以稱之為一個新的華僑潮，不過多數是學生（不是選擇成為過客，而是預期的移民），比起過去有更多的人傾心於永久定居。毫不奇怪的是，許多有關這些華人及其先輩們的學術著作已經開始出現，至少是作為種族研究領域的一部分，這在美國甚為流行。

當我最初看到這些不斷增多的著作時，我認為在華人移民研究方面出現了一個“復興”，並且不知道如何將之與中華民國（1912-1949）的華僑研究和1945年至60年代之間東南亞具有

印度和中東等地區的其它移民社會。這個問題我將重點作些分析，首先，討論一下兩種學術研究的傳統問題，即把華人作為社區的或作為一個圈子。然後看看作為海外華人的經濟和文化影響這樣兩個現實的問題。

二

“華人社區”這一概念引起了許多不同的反應。從對一個商業社會的容忍到對一個僑居社會的不信任，從對一個少數民族的同情到對一個有似隔離區生活方式的輕蔑，各種論調應有盡有。但是，要界別一個華人社區並不是那麼容易的。除了在新加坡華人是一個多數民族，或在馬來西亞的幾個城鎮和東盟國家的首都，那裏的華人至少是重要的少數民族之外，其它海外華人群體不一定構成爲社區。特別是在鄉村地區的小鎮上的華人，或是在美洲和大洋洲分佈更稀的華人，都難以稱之爲華人社區。住在一起的一群或幾群華人什麼時候構成一個社區呢？有一座廟宇、一條雜貨鋪的街道、一塊墓地、最低限度的成年男女，這就足夠了嗎？或者必須有一家俱樂部、最低限度的家庭、一份華文報紙、一所華校或一些人們可以稱之爲唐人街的地方？或者主要的條件僅僅取決於在一個國家裏有一個重要的華人集中區而它可以爲散居更廣地區的小群體所認同？如果有成千上萬的華人或華裔，分散在一個大城市，但不再感到有必要形成一個社區，那情形會是怎樣呢？一個複雜的組織和社團(包括秘密會社)網絡是一個華人社會所必備的條件嗎？

我們對東南亞華人做過若干區域研究，還對幾個國家，如對泰國、菲律賓、日本、美國、加拿大、英國、新西蘭、巴布

政治色彩的人種學著作進行比較。不過，隨之而來的卻是這一研究長達幾十年之久的顯著衰落。近年來大量湧現出關於“四小龍”以及儒家文化對東亞經濟成功作用的著作似乎標誌着對海外華人社會興趣的復蘇。很自然，這已導致對有關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新移民的性質與潛力的研究。然而經過仔細反復思考之後，我感到“復興”的說法爲時尚早，而且過於簡單化。

海外華人社會已經發生了一個質量的變化，它不僅表現在該社會的性質方面，而且在於教育與經濟的全球化已經造就了各種不同的華人。這些變化意義深遠，其中有些需要的不是按照固有的模式去進行更多的和較好的“華僑”研究，而是需要對新移民的基本現象進行全新的考察。我在下文中將嘗試歸納在中國以外的華人社會延續較久方面的已發生的變化。我希望藉此揭示出把對這種社會研究推上一個新台階的可能性。

先讓我來作一概述。目前的海外華人社會研究缺乏比較研究。在過去三十年裏，美國學者通過對種族和亞裔美國人的政治方面的研究，使這種情形有所改變，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在東亞和東南亞，這種比較研究仍被忽視。因而，許多領域仍然停留在學術交流之外(如果不是相脫節的話)，而且有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國爲中心，並由於種族自衛或民族自豪而結合起來。這樣，今後海外華人研究前景所面臨的第一個考驗將是：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學者們是否有足夠的興趣去進行一系列的比較研究，如對各個華人社會之間、華人社會與佔支配地位的土著民和其它已定居移民的社會之間，尤其是在東南亞和北美和澳大利亞的華人社會之間，那裏有許多來自歐洲、非洲、

亞新幾內亞等國華人做過一些個案研究。我們對新加坡、檳榔嶼、曼谷、雅加達(巴達維亞)、三寶壟、馬尼拉、西貢、金邊和紐約、舊金山、倫敦和多倫多等城的華人社區以及在歐洲、美洲和大洋洲或許可稱為華人社區的一些小鎮做過出色的歷史分析與研究。但是，我們也知道一些正在設法謀求生存或在極力形成的華人社會，以及那些已經微縮、分散或簡直已經消失的華人社區。顯然，我們只是開始涉及到這一問題的表層。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或許還在於所有這些社會(1965年成為獨立共和國的新加坡除外)，無論其大小、實虛，幾乎在各方面都是附屬於更大的實體。例如，在與當局的關係方面，他們總是處於權力之外或在其邊緣。他們在外國的司法下經商和勞作，大多數時候為中國國家的保護所不及。即使是他們自己的文化和制度也源自中國的邊緣地區，而且已難以保存，因為其教育水準總體來說較低，與家鄉的聯繫斷斷續續。多數中國人開始在國外生活時是作為過客，通常他們的社會是一個大旅館或出租的客房。定居下來後，他們會竭力全面重建華人的象徵，然而由於缺乏任何形式的權威或是針對他們所作所為的合法性，以致這種努力都失敗了。更多的情況是(特別是在西方)，他們的子女在當地的學校受教育，並期待在別的地方尋求永久的權力。或遲或早，他們所處的環境會不知不覺地破壞他們建立一個強大而有凝聚力的社會的願望。

在那些官方歧視不明顯的、外國宗教與土著學校持友好態度的以及當地經濟較開放與走向工業化的地方，尤其如此。在本世紀前半期，在亞洲各地定居的機會要大於在北美和在大洋洲。二戰以後，華人新移民在北美、後來在大洋洲及其它地區

更受歡迎，而東南亞新的民族國家則開始緊閉門戶。不過，自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來，現代民族主義問題，對中華民國(1949年之後為台灣)和共產主義中國的不同效忠問題，以及同樣重要的對居留國的新的效忠問題，不斷困擾着所有的海外華人。

這些不只是明顯的政治效忠問題，而且還是社會與文化認同以及個人自我發現的問題。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左右着他們歷史的仍然是權力當局的問題，他們面對的問題是：哪一個政權承認他們？他們應該接受哪一個權力當局？對生活在中國之外的每一代華人而言，權力當局的本身意味着什麼？這是一個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系統研究過的大問題，更不用說對過去和今天的海外華人社會進行比較研究了。

讓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曾試圖進行過什麼研究工作。關於華僑愛國主義(即部分海外中國人認同中國和中國政府的願望)，已經作過許多研究。另外一些研究表明：無論何時一位中國高級官員，不論他是政府的還是黨派的官員，在任何一個華人社會露面，都會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典禮與儀式以示歡迎。然而，究竟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們的效忠或是接受該官員權威的真實感情呢？這是很難說的。的確，另外一些研究已經表明：對這種中國官員的禮節較之該華人社會對一位高級的土著官員或殖民官員、政治領袖或其它一些權威人物的歡迎並沒有多少不同。由此可見，我們看到的是對權力當局的一般的態度，而不是對任何特別的權力當局的服從。

其它研究卻是通過華人社會捐獻給某種特別事業的金錢數量來衡量華人的效忠的。這些研究結論不是無可爭議的。人們可以指出，為孫逸仙、康有為及其各自政黨而捐款，為支持抗

日戰爭或共產主義革命運動而捐錢。但是，同樣地人們可以發現也有向當地和中國的慈善事業所作的大量捐獻，如捐獻給學校和其它慈善事業，援助因饑饉、水災及其它自然災害的受難者。甚至還有向當地土著或殖民政權表示忠誠的巨額輸財之舉。

幾個種族研究已經表明，大多數華人存在着與許多來自血緣、地緣或方言群、寺廟、商業行會以及或多或少的秘密會社（包括三合會）等方面基本制度進行抗爭的問題。然而這些組織或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曾具有權力的意義呢？其間存在着權力層嗎？中國以外的權力制度與中國內部的權力制度一樣嗎？或者在沒有官僚體制限制人們選擇的海外他們取得了不同的地位嗎？一旦不得不作出選擇時，他們是怎樣面對外國權力象徵的呢？

而且，還有許多與傳統相背離的例子。這在每一個足以對其所處環境作出種種反應的大的華人社會裏都可以發現。例如，決定改信伊斯蘭教或基督教，成為某土著國王或蘇丹的臣民，棄商從文成為一位使用宗主國語言或當地語言的作家，或選擇做一名畫家或表演藝術家，這些都可以視為尋找其它權力來源的努力。它甚至還反映了年輕華人從邊際走向可以取代已經失去的中國中心的某種中心的願望。這些例子是不是力圖擺脫舊社會存在的危險、逃避不再相關的社會傳統呢？或者反映了他們因決定定居和作出新的承諾而引起的態度方面的變化呢？還是僅僅反映了他們同化的程度和自覺地拒絕華人特性呢？

尤為重要的是，這些例子告訴我們：無論是作為一個政治實體或是一個文化中心的中國，對生活在它控制之外的華裔的魅力是什麼。昔日中國的榮耀對無論走到哪裏的大多數第一代

華人依然產生影響力，但是這種影響力究竟有多大，存在多久呢？可以持續多少代呢？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所遭受的恥辱與失敗可以引起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但是華人特性的神秘感僅僅在於那些年輕時接受過較多華文教育者的身上，而在那些海外出生和在非華文學校受教育的華人社會中間已失去光澤。不過，仍有許多東西為我們所不知。這包括價值觀的當地化；新的生活方式、行為與語言類型當地化的途徑；與定居在同一國家共享當地政治文化的其它移民集團相比，華人的適應能力，以及與非華人居民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等課題。

由於家庭與教育背景、職業、居住地點、與中國和其它華人社會聯繫的程度以及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想法等因素的影響，華人之間會有很大的不同。對許多人而言，幾十年來他們對中國政治甚至中國文明的興趣日趨淡化。只是在過去十年裏隨着中國經濟的復蘇以及規模更大、速度更快的經濟發展前景給中國的未來帶來了新的希望。如果經濟發展繼續給中國人民帶來繁榮，那時中國會對海外華人發生什麼樣的權威作用呢？如果不是今天海外華人對中國現政權所擁有的那種效忠，中國所形成的往日榮耀的理想形象將怎樣經受今日海外華人容易受到的更開放和現代的文化、社會乃至是政治的變化所帶來的挑戰呢？

這些都是關於海外華人社會某些傳統問題的延伸。由此引出了我將要分析的兩個問題，即作為中國以外華人的經濟與文化的影響問題。儘管二者是相互關聯的，還是讓我將之分開，並從我所指的經濟影響談起吧。近年來，有關“東亞奇跡”、“四小龍”、甚至“亞太世紀”的論爭以及其它關於儒家文化

目標。這種力量使得有關社群的學者得以集中精神於華僑社會的研究，並使這一研究對於其它地區在海外華人研究也有所幫助。然而，大多對海外華人的研究已轉向對中華文化特質的更深認識上來。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這種研究面臨着除了某些學者和那些希望藉此維繫其民族自豪者之外無人問津的危險。一旦這種情形出現，那麼海外華人研究就不太可能超越本地化的少數民族的研究，它將永遠滯留在中國史和各所在國歷史的邊際。

如果在研究時把對海外華人企業家及其對當地經濟的影響與華人社會對當地執政當局的態度兩者的研究結合起來，同時接觸到有關海外華人的政治化與同化等老問題，那麼將會有更好的效果。例如，早期華人的經濟成就不是依靠中國政府或是任何類型的外交保護，而是在專制的、封建的或殖民的政權統治下取得的。這一點可以說明他們對專制權力的偏愛和對現代民主政治的迴避。由重信守諾、有權勢的決策人士私下達成協議，是華人習以為常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處事方式。與此同時，他們又能充分適應自由市場經濟，依靠建立在強大的法律與政治權威保護的跨界和國際金融體系而發展自己的事業。在一個龐大的經濟網絡中，他們有能力發展，即使是處在居住國實行歧視外僑政策下也能生存。

同時，還有反對同化、因其經濟成就而保持華人價值體系的重要性問題。這就涉及到與之相關的第二個問題，即文化意識。人們會問：作為華人是華人企業家成功的原因嗎？如果是，那麼需要成爲一個什麼樣的華人呢？什麼樣的華人特質會有益於而什麼樣的特質無益呢？如果不是，那影響的因素又是

對資本主義的貢獻和海外華人在東南亞發展中作用的同樣誇張的語言層出不窮。一些作品坦率地表示問題還可以爭論，因而提出了更多問題，卻未作出科學的回答。許多作品卻達到了以前文獻包括我在上文提到過的文獻不曾有的牽強附會的地步。由於重視實際調查，現在可以把對華人社會比較研究得到的數據匯聚起來，以開展專門的研究。在商業、國家和國際政策等較實際的領域，要估計東亞發展包括貿易、工業和移民類型對世界其它地區經濟起了怎樣的作用，這是相當容易的。

關於海外華人經濟成就方面的種種研究，出現了兩個絕然不同的方向。其一是把包括海外華人在內的東亞模式推向社會科學與商業研究的主流之中。這是令人鼓舞的。因爲在過去數世紀以來，這是亞洲所發生的變化第一次擺脫了負面的形象，並且提高了地位以致可以直接對產生於西方的學科作出貢獻。當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爲這些經驗對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進行更高層次的理論工作毫無益處。但是，至少在發展和現代化的領域，西方學者已經不能忽視東亞和東南亞所發生的種種變革。因而，這些數據與分析遲早會被納入理論之中，成爲全球化知識範圍的一部分，這將是非常接近於早期西方學者努力探尋的全人類歷史。

第二個方向，尤其對漢學家和華裔學者而言，是要重振和擴展海外華人的研究領域。前面我已簡要分析了早期研究工作的興衰。在我看來，這些經驗證明這一領域的力量和特點，最重要的力量來自華人社會已逐漸變得自覺，並有良好的組織。他們似乎有能力在某些發展中國家充分擴大它們的經濟資產，在不需要依賴他人太多的幫助的情況下，達致本身的現代化的

什麼呢？是具有舊經商傳統的歷史背景，或是嚴密的血緣組織與強烈的對社會的忠誠，或是個人的膽量、智慧與精明，或是他們作為僑民與移民的事實，還是所有這一切的綜合作用？我們確實不知道如何去歸納，但不管怎樣，如果我們忽視近年來引起廣泛注意的文化因素，那將是愚蠢的。

當然，大部分華商都側重於同其他華商合作，同時無論在哪裏，都歸屬於一個強有力的華人社會。可是，也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他們也可以與當地的或國際上的伙伴合作，適應非華人環境的商業文化，吸收最新的法則與條例、制度與技術的變化而繼續茁壯成長。假如一個人的先天條件業已具備，那麼問題是，自由市場條件下的現代商業知識，或是作為華人長大並依靠華人關係一定會提供的有利條件，這二者誰最重要呢？如果海外華人研究要成為一個特有的領域而不是對全球華人成就的簡單的愛國主義的研究，那麼，它將取決於：作為華人並充分保留其特性是他們獲得經濟成就的基本前提，而反過來，經濟成就又是海外華人社會生存的一個必要條件。

有鑒於此，我們不可能寄希望於海外華人研究輕而易舉地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領域。它在一百餘年後才成為人們認真對待的研究領域，說明在這一學科最終獨立之前還存在許多大的阻礙。不過，在海外華人經濟上獲得成功和中國近年來改革其經濟結構的道路上，還會有重大的變化。目前，有一個特殊的機遇，即華人研究至少還是漢學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相信，海外華人研究可以進一步成為種族研究和少數民族研究的一個次生領域，甚至取得與其它社會科學學科同等的地位。這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本次會議即是一個很好的、新的開端。

- * 本文是1992年11月王賡武教授在美國“落地生根：全球華人問題國際研討會”上所作的主题演講。原載《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總第22期)，頁1-8。譚天星譯，梁英明校。

移民地位的提升： 既不是華僑，也不是華人

我講演的主題是：“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華僑，也不是華人。”這裏所有的關鍵詞項都需要界定。那麼，我就先從移民的概念談起。移民的概念是漸漸演變而來的。移民(包括移入民和移出民)一詞含義的變化，在二十世紀一直特別引起人們的注意。廣義來講，這個詞指的是這樣一批人：他們或是背井離鄉，或是流落異邦。但是，談及從一個國家移入另一個國家，早期西歐民族國家的邊界是相對開放的，歐洲人移入各自的帝國及其殖民地正是這種情況的佐證。工業革命之後，首先在西歐，然後在美洲、澳大拉西亞以及整個亞非大陸，移民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三要素(土地、資本和勞動力)之一日趨重要。因此，移民這個詞最常與勞動力的流動和遷移聯繫在一起使用。

直到二十世紀的前半期，貴族、富人、資產階級、受過教育的各類專業人才以及那些自認為是紳士的人(當然也包括女士)，甚至包括有階級意識的商人和生意人，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移民。他們去旅遊、訪問或僑居，有時是為了科學研究，有

時只為了去冒險，有時出於厭煩，有時則是為了賺取利潤。如果條件合適，他們就決意定居下來，在外國安家。他們中有許多是好發異想而又不安分守己的人。另外，也有為了逃避迫害、暴政以及各種歧視的難民，還有許多人是為了逃避法律的懲處。但是，直到近代，他們只是進行殖民活動或到處遊歷，然後定居下來，而不像那些貧窮、挨餓、走投無路、沒有土地的人及失業者那樣移居別處。這種變化是很重要的，我將在下文中加以說明。

就這一點而言，在中國引進工業化之前，為什麼在中文裏沒有相當類似於移民的概念，是很容易理解的。在農村社會，男人自願離開家園，不僅是一種不忠的行為，也造成了家庭和鄉村勞動力的流失。只有因公務被派駐外地，或被強征為勞役，被送去學習，或是為了謀求家庭安全，或為了補貼家庭收入的外出工作，或為了經商去冒險，才被認為是合理合法的。因此，所有離家或出國的遷徙都只是暫時的。由此，產生了“僑”或“僑居”的概念，這就是華僑含義的由來。所有行為良好的男人，如果能夠的話，最終都要回家的。否則，政府官員，甚至其家庭成員就會將他們視為流浪漢、逃亡者，是對社會秩序的一種威脅，正如你們中許多人所瞭解的，在現代詞彙裏，“移民”最初並非指自願遷移的人，而是指官方將人們遷離家園的政策，以及因此而遷移的人。當前最好的例子就是，由於三峽工程的興建，中國政府決定將上百萬的人遷離長江中遊地區。

移居勞工大體上作為一個階級的概念；而移民則作為官方強制行為和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概念。儘管二者間存在不同之

講，移民最初的提升可以說是在移入國根據勞工的健康狀況選擇移民之時開始的。但是，真正意義上的提升則是指移民變成該國的國民，並且在他們的使用價值耗盡之後也不會被遣返回家。誠然，最早的統計把所有選擇定居的人也納入移民之例，而不管他們的種族血統和階級背景如何。但也可以說，一種實質的提升已經發生了。

第二個階段就是移入國決定接收更高素質的移民。這就導致了移民政策的變化：按優先權將移民分成等級。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不再需要大批移民勞工之後，即開拓一項新的產業所需要的體力勞動的階段已告結束，或者說不毛之地以及落後邊遠地區的開發已告完成。隨後，政府就會鼓勵受過良好教育的成功人士來擔任當地人才不足的職務，提升就是以這種形式出現的。最後，爲了吸收新移民，新近又規定了移民質量標準，並據此建立了配額制度，所有這些都用以保證提升的系統性和連貫性。

移出國還無力按素質將移出民分類。但是，在那裏提升還是發生了，儘管政府未必是有意識地通過某項法案來促使其實現的。讓我們再從歷史的視角來看，爲了能簽訂更好的合同以謀求長期的服務及更多的外匯收入，就必須保證勞工的健康，這樣他們中更多的人才能適應普遍的需要。移出國對勞工留居當地不歸這一點表現出矛盾的態度。但是，只要留居者繼續寄錢給家，那麼這一損失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大多數移出國是在很長時間後才意識到移民的提升可能會導致同化並最終失去那些富有經驗和技能的人才，而如果他們選擇回來的話，他們是多麼可貴啊。一旦這些國家意識到這一點，就會出現這樣的

處，然而，移民現象在歷史上卻是一個客觀事實。對於整個部族、家庭和家族、戍邊的軍事單位、勞工集團（近來的技術用語叫做生產單位）是出於何種動機而不斷地遷移，我們已有這樣的記載。直到近代西方的擴張和全球資本主義到來之前，移民並非針對個人而言。但是，最終即使是地位優越的人，不管出自何種原因和動機，所有那些離家未歸者，所有在外安家落戶者都被統稱為移民，即作爲移入民和移出民。這是個客觀事實，是歷史的統計資料。

我已在許多文章中討論過華僑和華人詞義的變化，不再贅述。這裏我只想說，在今天，華僑和華人的正確使用要比過去更爲清楚了。華僑指的是中國國民（包括沒有其它地區居留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以及香港的居民），他們離開上述地方而住在國外；華人指的是加入外籍或具有永久居留權的華族。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移出國和移入國，這兩個詞的使用卻存在很大差別。移出國，特別是中國堅持將華僑與華人連用，而移入國則常常無法決定他們對華人移民應抱有怎樣的想。他們遊移於非歧視性地使用類似像“海外華人”這樣的術語，或者使用足以顯示出華裔，而又帶有國籍的稱謂。近年來，華人移民加劇了這種混亂。在過去五十年裏，華裔和專業人才在經濟領域裏的卓著表現使華人感到自豪，但卻引起了非華人的恐懼。這一事實也使正確使用這一術語變得越來越困難。

下一部分我將討論“移民地位的提升”現象是增加這一難度的主要原因。移民地位的提升過程好像是一種漸進的選擇和接納的過程。上文已說明了移民含義的變化，並已指出華僑和華人的定義，現在我進一步談一談“提升”的含義。從歷史上

傾向，即將很可能永遠定居外國的移民同只是暫住海外的旅居者的種種稱謂混淆起來。

前面所述是針對至少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的海外華人。自從中國政府第一次重視在國外華人的價值以後，移入國提升移民的政策就被當作是一種威脅。十九世紀末，中國政府開始意識到海外華人可以成爲國外投資的大量來源、海外的巨大商業資產以及從先進工業國家獲取新知識的有用橋樑。因此，政府將各種各樣意指商人、勞工和南方居民的術語換成了更有禮貌的提法，從而表明他們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最後，則變成了明顯表示出官方認可其地位的有力標誌，即華僑或中國僑民。這一術語的使用，表明中國政府準備將海外僑民作爲重要的國民而提供保護。它以自己的方式將海外移民從反叛者、冒險家、勞工提高到受尊敬和受重視的國民地位，並極爲重視他們的效忠。

過去五十年裏，在全球範圍內，移入國提升移民的趨勢變得更爲顯著。通過提升移民的新政策，以大量合同勞工來承擔工業化基本任務的習慣做法不再產生移民了。同樣，許多輸入半熟練勞工從事服務行業的國家，在合同期滿後會要求勞工離境。通過提升移民的政策，移入國越來越實行更加嚴格的控制措施，並採用選擇性很強的配額制度來決定哪些人可以作爲永久居民。另一些國家則根本不接收移民，或出於同情，只接收政治難民。還有一些國家則採取帶有種族與宗教色彩的標準，而實際上完全否定了現代移民概念。考察這些政策的不同並不是我的目的。我論述的中心議題是回顧 1945 年以來華人移民的經歷及其對我們採用像華僑和華人這樣的慣常用語產生的那些

影響。這反過來又會使我們思考爲闡明過去五十年來華人移民的歷史，要進行怎樣的 research。如果我們能提出確切的問題，並對此進行很好的研究，我相信，這不僅對我們瞭解海外華人，而且對於世界範圍的移民的廣泛研究都是有益的。

我首先從 1945 年前接收移民而此後又改變其移民政策的國家談起。最重要的國家是在東南亞擁有殖民地的帝國政府，即英國、法國和荷蘭以及獨立的泰王國。總的來講，英國是從其帝國，尤其是從南亞次大陸（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香港以及中國通商口岸向這一地區輸入外籍勞工最多的國家。他們在緬甸和英屬馬來亞設有移民健康和特殊技能（包括辦公室工作與教學能力）進行審查的管理機構。他們提高移民的質量是通過輸入女性以促成移民在當地定居，繼之，又將英國臣民權授予一批精選出來的效忠移民以提高其地位。但是，在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後，他們相信已定居下來的移民家庭會及時大批地補充勞動力，因而開始對移民的數量進行嚴格的限制。1945 年以後及非殖民化前夕，他們繼續推行限制移民的政策。但是，移民的地位因被授予當地公民權而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在馬來亞聯邦（以及現在的馬來西亞）獨立前執行的法律，在新的民族主義政府成立後得到了繼承。這個提升移民政策直接導致了在新的民族國家中，具有華人和東南亞人血統的少數民族國民地位的提高。在前殖民地新加坡，類似的法律使絕大多數華裔成爲新加坡人。

在法屬印度支那與荷屬印度尼西亞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他們對移民勞動力的需要不如英國人那樣大，也不具有與英國同樣的現成勞動力資源。然而，他們也採取了某些提升的形

式，這包括輸入婦女以鼓勵定居，及最終允許數量有限的華人獲得法國和荷蘭公民權。總的說來，法、荷兩國政府對移民的限制比英國更為嚴厲。雖然他們也推行了使移民有權成為當地公民的法律，但是，由於越南在法國離開後發生了內戰，荷蘭在印度尼西亞引起了民族主義革命，這就使兩地有關移民的法律沒有健全地發展起來。美國統治下的菲律賓則有一些不同。美國是繼西班牙在菲律賓實行殖民統治的，但它卻沒有自己的帝國傳統慣例。因此，它沿襲了西班牙人的一些習慣做法，但也把美國自己的限制移民的法律引用在剛剛獲得的領土內。華人移民就這樣從一開始就受到嚴格的限制。當地公民權的法律是仿倣美國的法律而制定的。美國統治期間，移民地位並沒有提升。這在菲律賓獨立後的移民政策中反映出來。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此國的移民地位才開始有所提升。

泰國是東南亞第一個提升移民地位的國家。它鼓勵移民與本國人，甚至包括王室家族成員的通婚，由此可以使移民獲得合法的社會地位。泰國是有選擇性地給予移民國籍的。但從最初，政策就承認了這種新國民的平等地位。不管移民的血統和社會背景如何，只要他們接受了這種形式的提升，就意味着沒有歧視。該項政策經過定期的回顧和政治論辯後，一直貫徹至今。這被稱為同化政策。但是，這樣說是太過強調了這一政策的一個方面，而且並非是最重要的方面。的確，如果實施同化的嚴格標準，那麼華人血統的泰國人就會很少了。但是，他們中絕大多數泰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政治效忠是毋庸置疑的。這要歸於泰國這種特殊的移民政策使華人及其祖先都得到了社會地位的提升。

東南亞地區新建立的民族國家實施的移民政策有明顯的不同。共同的一點是，在過去五十年內，移民到這一地區的華人是很有限的。相反，它是一個提升過去移民及其後裔的地位、鞏固和建設國家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移民獲得了國民的角色。然而，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在這些移民中發生的一個明顯的發展就是他們中的一些人，特別是取得成功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最近出現了重新移民到世界其它地區的傾向。毫無疑問，這在東南亞的華裔看來，與西方發達國家移民地位的提升，有很大關係。我注意到，在講英語的北美和澳大利西亞移民國家的情況尤其這樣。

這就是過去五十年華人移民歷史的主要事實。我認為，從移入國的觀點看來，它與這些移民國家對移民的提升密切相關。讓我通過1945年以後世界歷史中對移民最有影響的兩個顯著變化來解釋這種現象的主要特點：其一，即美國勢力的全球化，特別是它作為超級大國出現在太平洋地區；其二，也就是二戰結束後，世界範圍內的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行動。這兩種變化對於美國對中國以及華人移民政策都有直接的影響，這反過來又深刻影響着現代華人移民性質的變化。

讓我先來談第一個變化。美國繼承了英帝國勢力，但特別是在太平洋地區又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區別，如它沒有領土。因此，它只能從遙遠的地方進行干涉，所以它不得不煞費苦心地依賴它的盟友。並且，美國也受到了來自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的挑戰。蘇聯一部分的領土是在太平洋地區。它的意識形態與美國所倡導的一切都截然相反。美國對盟友的需要使它與前敵人日本結成了歷史性的同盟；支持它所不信任的中國政權以及

作為其新基地的台灣；武裝干涉朝鮮戰爭；作為削弱中的西方勢力的代表在東南亞施行積極的外交政策；直至最後陷入越南戰爭。所有這一切，中國的因素顯然是很突出的。結果，這就必須強制訂出對大陸以外華人的新的移民政策。當然，並非所有的政策都是戰略性的或出於政治目的的，其中有經濟的、人道的和宗教的問題以及社會和文化價值等方面的問題。但是就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政治難民、知識分子和學生而言，提高移民的地位是最佳政策。這與前一時代的反對殖民地的、帝國的和種族的遺產是一致的。隨着美國移民政策所保留的反華特點的消失，提高移民地位就不可避免。在此，我是指國會在有關移民、各個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多元文化差異、實際存在的歧視以及教育機會均等等一系列方面進行的系統的立法改革。這些改革與西方各國最先進的法律相比，如果不是更好，那麼至少是與其一樣的完善。對於華人移民而言，這些改革確實對他們在美國未來的機遇開闢了新的前景。這些改革的措施並非僅使用於來自台灣的華人。所有有資格的華人，也就是說所有在教育、家庭背景和經濟潛力等方面符合提升標準的人，都可以加入到申請移民和永久居留權的長長的隊伍中。

這些變化在某種程度上，與英聯邦及像法國、荷蘭這些前帝國的發展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在其它講英語的國家，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亞，我們可以看到最具特色的細節性的特點。這兩個國家領土遼闊，需要移民，而且都不能再依賴其它歐洲人來填滿其空曠的土地；它們都對各自在太平洋地區的地位極為敏感。並且，他們對美國在戰略和意識形態領域政策的支持，使其更容易步着美國の後塵。這鼓舞了他們對移民問題進

行新的思考，從而使它們進行了與美國相似的移民法改革。還有一點就是，這三個國家在經濟上都是強大的，具有共同的經歷。尤其在涉及華人的移民方面，已有一百多年的相似的經歷。在這裏，應該指出與前英帝國和美國殖民地講英語華人的令人感興趣的聯繫。從東南亞再移民的華人，即想要離開東南亞但又不想回到中國或其它中國領土去的華人移民，大多數是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這些講英語的國家再移民的，而北美和澳大利亞成為他們首選的目的地。毫無疑問，至今仍在英國人治理下而且講英語的香港也呈現出這種趨勢。

這樣，盎格魯人的美洲國家似乎統治了1945年以後的華人移民的新世界。但是，就提升移民的政策能進一步修改到多大幅度，這些國家又能接受多少移民來說，是存在明顯限度的。自1978年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當以美國為主導的一些國家開始將其移民政策應用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團聚的家庭成員、學者和知識分子時，這些限制就很容易地被突破了。於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不得不尋求其他的地方如拉丁美洲、歐洲各國、其它亞洲國家以及與華人的聯繫較弱的南非及非洲其它地區。但是，華人在這些國家的人數還比較少，他們對新環境的影響也微不足道。同樣，各地區都有提升移民地位的想法。尋求大批農民和無產者出身的移民勞工的國家已不復存在。它們更傾向於移入投資者、商人和一些專業人才，幸虧過去二十年來，東亞和東南亞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足夠的有興趣移民他國的人才。這些地區只有提供最佳的發展機會使其自身繼續具有吸引力，才使素質提高的移民不會大批離開。

在我深入討論移入國提升的移民之前，讓我簡略提一下移民主要的移出地，即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地區。這些地區1945年以來輸出了大量的新移民。提升移民的政策對這些地區有何影響？當然，它並沒有減輕這些地區的人口壓力，相反，卻使大陸在1949年以及整個五十年代出現了突然的“人才流失”。與此相同，台灣的“流失”雖然緩慢，但卻持續了將近四十多年，絕大多數人才都流向美國。毫無疑問，這些素質較高的移民提高了海外華人的水平，並對科學技術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許多人後來在商業和工業企業中也幹得很出色。香港在六十年代末高素質移民的流失情況相當嚴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再次出現這一情況。此後，由於澳大利亞、加拿大與美國一道採取歡迎華人移民的政策，移民人數持續穩定上升。在過去七年中，每年都達到了五至六萬人。這三個地區，特別是中國大陸對於人才和技術人員流失的後果，幾乎是無法承受的，當然，現在回流已開始。富有經驗和受過高教訓練的人員從西方回到了台灣和香港以迎接挑戰，在較小程度上也向中國大陸回流。它的影響尚難預料，但是這一趨勢對未來研究提升的華人移民來說，顯然有很大關係。可以肯定，從接收移民的國家看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移民的提升現象要求我們重新考慮用來描述世界範圍內各種華人和華裔的術語。我們尤其需要對華僑和華人之類的術語的施用進行深入的考察。

我先從現在的兩個截然相反的看法談起。一種極端的觀點堅持認為沒有華人，也沒有加上所屬國籍的華人，如華裔美國人和印度尼西亞華人，而只有國民。一種不那麼走極端的觀點則容許這樣的提法，一些國民是華裔或部分華裔。另一種極端

的觀點也不使用華人一詞，而是將中國之外的所有華人都包涵在“華僑”一詞中。這一術語包括台灣、香港的所有中國人或具有部分中國血統的人以及可能在世界任何地區被發現的華人。

這兩種極端的觀點已存在了幾十年，但由於該地區經濟的驚人發展，兩種觀點的對立大大增強了，在過去十五年裏，在中國國內也同樣如此。1989年以來，隨着發生天安門不幸事件、蘇聯的解體以及冷戰的結束，美國成爲唯一的超級大國，西方“七國集團”經濟的衰退，東亞和東南亞所取得的經濟成就都非常引人注目。衆所週知，中國的發展、台灣和香港的作用以及東南亞華人企業的貢獻，導致了“大中國”一詞的各種用法。這一術語聽起來多少帶有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色彩。一方面是沙文主義者的驕傲，另一方面是民族主義者的驚慌，兩種極端的觀點日益引人注目。我認爲現在迫切需要學者們做出努力來駁斥這種極端主義並澄清這些術語的含義。這種兩極分化的觀點引起的激烈情緒遠超過啓迪人的見解（如果有什麼見解的話），而現實情況要複雜和微妙得多。狹隘和極端態度政治化的危險是很大的。歸根結底，這種態度只能使那些不希望看到這一地區繁榮興旺的人獲得好處。

我認爲應該對下列問題加以深入研究。雖然這些問題大都與東南亞和講英語的移民國家有關，但也關係到世界其它地區存在的類似問題，儘管在那些地區，華人移民不是一個與政治有關的問題。這些問題如下：(1) 在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前移民地位的提升程度；(2) 在西方國家中華僑成爲華人的速度；(3) 作爲華人地位提升的最高形式的政治參與的實質是移民；(4) 移民地位在經濟和知識領域的提升中，中國這一因素，尤其是通過中

美關係所起的作用；(5) 移民遷入國的看法；它們對此是否在意？

移民地位的提升在東南亞是複雜而不平衡的。到目前為止，移民地位提升最徹底和深入的國家是泰國。在那裏，華人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相當大的少數民族。即使在政界和軍界，人們也很少留意到泰國國民中華裔的存在。華人從事着各種各樣的職業。大體而論，已經沒有華僑。以前的移民及其後裔融入泰國社會組織已達到如此程度，以至可以說，對他們中的大多數而言，現在即使使用華人這樣的詞語也不合適了。沒有比泰王國這些國民更為忠實的臣民了。由於完全不同的原因，在新加坡實際上也沒有華僑，因為新加坡 80% 的人是華裔，他們現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華人這一術語。

比較來看，東南亞其它地區華裔地位提升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接收移民為公民和國民的政策是比較有效而徹底的，因而已經很少人仍可被稱為華僑了。然而，華人是否可以作為適用於那些華裔國民的確切術語仍然是個疑問。例如，菲律賓人包括幾百萬華人和有部分華人血統的人。但是，如果他們將自己視為華人，他們就會受到嚴格的限制，其扮演的角色就只能當任政界和軍界以外的職業，而從事商業活動。至於像緬甸、越南、老撾以及飽受戰爭破壞的柬埔寨這樣一些國家，它們的經濟封閉那麼長時間，以致認同於華人並沒有任何好處和機會可言。在這些國家中，提升移民地位的做法貫徹得較早。儘管生活在那裏有一系列可怕的問題，留在這些國家的大多數華人早已放棄了將自己稱為華裔公民的想法，而是尋求融入為國民。只要他們不是次階級或低級的國民，而且沒有在平

等外表下的持續的歧視，那麼對於那些選擇定居的人來說，完全融入當地社會就指日可待了。

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有着不同的經歷。印尼民族主義的民主革命是通過確立認同和效忠於新的民族國家的標準來提高前移民的地位的，但大多數華人都感到難以接受這些標準。這種無條件的選擇使幾十萬華人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回到中國。此後，儘管中國與印尼的關係緊張持續了二十多年，但那些留下來的華人使自己適應了成為歸化民的條件。但是，這種提升尚未完成，政府意識到有中國血統的人將自己視為華人，他們中的多數人在正常情況下只限於從事商業活動和某些技術性專業。

前中國移民和印度人後裔佔馬來西亞人口的 40% 以上，他們地位提升的幅度更大。依靠現代法律和行政管理傳統獲得鞏固的一套強有力的貴族制度，使以前的移民有較多的時間調整自己的作用而得以在國家建設過程中成為直接參與者。一些人由此在政府和軍界中謀得了一席之地。此外，由於外國投資的不斷進入，強大的國際貿易聯網，以及原住民中產階層的迅速崛起，使華人在經濟領域成功所構成的威脅較小。馬來西亞民族政府對於前華裔移民的效忠懷有較大信心，而且它與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的關係比以前有所緩和。儘管華僑實際上已不復存在，但華人這一術語在馬來西亞的使用，可能比在其它任何地區的時間都要長。

簡而言之，即使對鄰近的東南亞，雖然華人移民的歷史最長，但情況的差別是很大的。人們不能輕易地對其作出概括性的結論；而類似“所有的華人都是相同的”、“一旦成為華人

就永遠是華人”這樣簡單化的說法也都是無根據的，同時也容易使人產生危險的錯覺。我們有必要立刻駁斥所有那種將華裔都統稱為“華僑”這樣草率而懶惰的做法，也要反對那種故意含糊地使用華僑——華人這樣混淆的術語。

我的第二個問題轉到西方國家，但主要只涉及北美和澳大利亞講英語的國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華人移民大多流向這些國家。在這裏，過去存在着相當嚴重的歧視，這與現在相對來說比較自由的氣氛是鮮明的差別。我已解釋了戰後提升移民地位的政策變化背景。這些國家的移民政策脫胎於現行公開的種族主義政策，直到最近才發生了轉變，因而，這種轉變就尤為顯著。作為接收移民的國家，它們對華人移民的政策發生了絕對驚人的改變。在過去大約四十年裏，這些國家接納了一百多萬名華人移民。在這個時期，老華僑大多數已去世，而新華僑的數量一直不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將移民提升為永久性居民，繼而又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國民，其速度相對來說是迅速和一貫的，除了成千名偷渡到這些國家的非法移民感到脫離唐人街就難以生存之外，在這些國家中，那些地位之提高的移民幾乎是在到達之後不久就可以躍過華僑階段而準備作為華人來思考問題和行事。唯一的問題是，這些國家同化主義者的力量是否強大到足以使華人一詞只適合在短期內使用，或新的多元文化政策將鼓勵給華人移民一個中間的或過渡的階段，使他們在文化和思想上可以長期作為華僑和華人而存在。當然，移民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華人成為移民。他們陶醉於華人的價值觀念中，對他們的文明感到自豪，並且能夠保持華人的社會和文化生活，而這在以前的華

人移民中是難以想像的。結果可能是在這些華裔國民中出現了分化，即分成享有完全同化成果的華裔以及在當地法律允許的情況下，喜歡在一種模稜兩可、含糊不清的情況下生存的華僑——華人。

我的第三個問題是繼前兩個問題而來的。我們可以問一下，在東南亞和講英語的國家中，有多少華裔血統的外籍國民既不是華僑也不是華人？答案由於每個國家華人參與政治的性質和程度的差別而各不相同。顯然，對政治進程的直接參與，特別是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民主政治，是移民地位提升的最高形式。如果華裔國民積極參與政治是理所當然的，那麼，保留華人這樣的術語不是過時嗎？如果要保留“華”的觀念，那麼，已有“華裔”這樣的術語來保留這一聯繫。否則，正確的術語應該是印度尼西亞人、越南人、澳大利亞人、泰國人和美國人，等等。在東南亞，華人經歷了漫長的土著帝國、王國和公國的封建政治和中間商的殖民政治。今天，卻是對國家建設進程作出貢獻的商業政治；同時也存在着種族或社區的民主政治。問題是，這樣的參與是否將引導回歸社區的團結，即回歸到政治家們組織起來是為了獲得本種族的選票，而不是為了進一步融入全民族的社會中去。除了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以外，當上述人數很少時，華裔小群體如何組織起來，以及他們在實際上如何投票是無關緊要了。

在北美和澳大利亞，對同化主義政治的壓力相當強大。參與這種政治活動的人將不得不從種族集團之外尋找盟友。在美國，反對盎格魯撒克遜後裔勢力的彩虹聯盟的思想擡頭是有趣的現象。即使這樣的聯盟最終不會有任何結果，但亞裔美國人

在政治、文化和藝術等方面覺醒的事實就意味着對任何純粹華人的認同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我上面提到的華僑——華人這一範疇的重要性可能不會繼續存在下去。即使存在，為時也不會太久。基於目前的種種跡象，我認為華人參與國家政治越充分，這一觀念就會越快地受到衝擊並被取代。

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以及那裏華人移民為國家所承認的速度快於其它地區，使我想到了第四個問題。這與中國以及中美關係有關。說到中國的因素，我指的是中國成為該地區下一個經濟大國以及成為對美國霸權潛在的主要挑戰者。在許多人看來，這明顯表明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成為吸引華人或華裔的磁體。這就是“大中華”及其所有類似的說法產生的原因。這一說法是為了表示建立在市場社會主義或“儒家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地區性“中國公司”將在某一天形成一種威脅。加上使用“華僑華人”這樣的術語來包括所有中國之外的華人，就意味着一種不可阻擋的擴張和伸展勢力的警報。

美國華人對中國經濟成功採取的這種潛在的態度對中美關係會有怎樣的影響？人們曾設想在可能的情況下會以一種適當的方式幫助支持這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和科學的合作，或者至少確保雙方的理解以避免重大的衝突。但是，至少會有兩種保留的情況。這兩種情況都以提升移民的政策所可能帶來的結果為轉移，這些政策使一百多萬名華人很快地成為美國人。問題是，這一過程是否太快了？如果一些剛剛入籍的美國華人不那麼忠誠，他們就會發現自己正在為擴張中的生機勃勃的中國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另一方面，如果對美國的熱情是真實的，那麼具有這種熱情的人可能更願意成為中國國內的自由民主與

人權的政治文化觀點的支持者。第一種行動表明不管華人的國籍如何，對中國，他們仍然保持着中國人式的效忠。第二種情況則表明他們準備成為愛國的美國人，並將中國的政治改革視作一種美國人合理合法的事業。無論哪種情況，對中國和美國政府而言都是很嚴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像華僑華人這樣的術語是否足以說明他們的立場，是值得懷疑的。

最後，我將以第五個問題來結束我的講演。讓我們回到在過去五十年來許多接收華人移民並採取提升移民政策的國家的觀點上來。這些觀點的差別很大。例如，一些國家對於具有商業、科學和專業技能以及文學、藝術天賦的華人表示出熱烈的歡迎。然而，其它國家就不那麼慷慨，不那麼願意提高移民的地位。他們放棄了現代文明準則的要求，即尊重移民的一些基本權利，只要移民地位的提升沒有對國家的安全構成威脅。

但是，不管出於何種原因，所有接納移民的國家對於新公民都寄予相同的期望。每個國家以其自身的方式承認華人作為自己的國民。他們都希望提高華人的地位，華人就會以對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作出貢獻作為回報，最終是對接收國的完全的政治效忠。從這一方面來看，華僑這樣的術語是不適用的（除非對那些保留中國公民身分的人）；即使華人一詞也是不恰當的，至少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是如此。而最不可取的是，將華僑——華人聯接起來使用，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是為某些目的而使用的，那裏的學者們也喜歡這樣用。從接收移民的國家來看，如果提高了華人移民的地位，那就既沒有華僑，也沒有華人。在被他們的新國家接納為國民的移民眼裏，這一觀點無疑事關重大。

- * 本文是王廣武教授在1994年12月香港大學舉辦的“五十年(1945-1994)海外華人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原載《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5年第3期(總第31期), 頁1-8。吳藜譯, 梁英明校。

—— 再論海外華人的身分認同 ——

王潤華教授剛才介紹的時候說得很清楚, 我本來不過是想跟劉宏博士的學生談談他現在重視的一些問題, 有關身分認同, 特別是海外華人身分認同的問題。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十多年來, 就是我寫了那篇文章之後的十多年來,¹ 有什麼新的發展, 應該怎樣重新探討這個問題, 最初不過是如此而已。不曉得怎麼樣, 後來就變成一個演講。所以, 希望大家瞭解這個背景是如此, 是想跟你們討論一些有關海外華人身分認同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在1985年時寫的, 我們編那本書的時候, 我就考慮到海外華人身分認同的問題。到底在東南亞怎樣演變到八十年代的那個情況, 那是十四、五年前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 回顧身分認同這個概念, 其實不是什麼太新的概念, 詞彙是新的。當時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連 identity 這個中文譯名都搞不清楚。我問了好多人應該怎麼翻譯, 可見沒有一個適當的詞彙來表達這個意思。因此, 後來怎麼譯成“身分認同”呢? 還是別人替我譯的, 我自己倒不敢決定應該怎麼譯才好。不過既然譯成身分認同了, 我也把它當成是英語的 identity, 就是認同。但其實認同這個字也是新的。我看大陸的朋友也好,

台灣的朋友也好，他們對這個詞彙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現在我要說，這個詞彙是有問題的。不過，這個概念倒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有相當長的歷史。這個認同的概念怎麼樣翻譯的，我不管它，暫時用“認同”吧！

這個概念其實是有一段歷史的，不管任何人都有一個認同的概念，這很自然。古代史裏，我們都很自然地認為我們的最早認同的就是自己的家庭。小家庭和父母親，給了我們身分認同。我姓王，那麼姓王的都是認為親家的話，就是一種認同。我姓王，我認同姓王的；或者認同某地的一個某地方，這都是最早的認同的概念。最早的也有認同某某部落，或者某某民族，這些都是很早就有的。這種概念其實是一種血統論，從血統這方面演變出來的。當然，演變之後不是純粹血統的也可以。所有姓王的可以說是我都認同，但是認同的程度就不同了；那麼就變成一種遠跟近的認同，各種不同層次的分別也漸漸地明顯。小小的家庭，小小的部落，這種認同問題很簡單。到一個社會比較複雜的時候，成爲一個很大的帝國也好，一個國家也好，那問題就複雜得多了。人越多，怎麼認同，怎麼樣去考慮這些問題，變成一個很困難的事。但是我們在古代許多書籍裏和歷史材料裏，並沒有注意到這是什麼大的問題。回顧起來，認同應該有的，向來就有的，但當時的材料裏好像並沒有怎麼重視這些問題。大概因爲以前的看法是以自然認同爲主要的。換句話說就是以家庭、部落爲主，很自然地一個自己的、社會的，圈子也很小，那麼就比較容易瞭解。在中國社會裏，這個認同還是從家的觀念演變成天下，所以連皇帝都有家天下的觀念，還是由這個家庭觀念一直演變到很大的大家族的

概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就是家庭關係延伸到各種政治層次，最高的層次用的也還是那種詞彙。所以這詞彙好像不是什麼問題，大家都瞭解的；跟血統，跟那種孝，那麼再加上去就變成忠孝、忠義。家庭裏的孝，變成效忠、忠義；皇帝都是用這一類的詞彙。那當然是儒教裏講得比較多一點。其實不僅是儒家，在中國的整個社會裏，傳統演變出來就是以這個爲主：這種自然的、從血統開始一直到大家庭；天下、兄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是從這種概念演變出來的。所以認同好像也不怎麼複雜。就是我們都是一家人，這個家越來越大，比較難瞭解，比較難吸收，但是都是一家人。

所以，早期的時候認同並不成爲一個問題，但是其實已經有一種認同的概念。就是我是某某，是某某家的人，那麼就是變得某某朝廷的人了；皇唐、皇宋、皇明、皇清。皇明的忠臣，皇清的忠臣，以後你看這些稱呼都有的。皇明的遺民，到清朝的時候就是皇明的遺民。到民國的時候，還有清朝的遺民。所以概念也是一種認同：我是認同清朝，不認同中華民國。當時我還認識這些人呢！但明朝遺民不承認清朝的更多了。你現在看有些材料裏說什麼天地會啦，這些私會黨都自認爲是明朝的遺民。在南洋華僑社會裏也看到這些材料，不承認清朝，這也是認同的關係，所以這是以朝廷爲主的認同。

所以這個概念本身是很普遍的，只不過沒有人特別去注意它。那麼接下去到了海外，移民到海外的這些商人、工人，他們的認同是怎樣的？沒有什麼太明顯的材料。不過一般來說，我是廣東人，我是福建人，我是某某地方人，漳州人，泉州人，廈門人，這些都是認同的一種方法，也很簡單的。到清朝

的時候還加上一些，漢人，這在從前是不用的。漢人，就是滿漢之分，所以說有滿人漢人。至於中國這個詞什麼時候用的？我到現在還不怎麼清楚。一般來講，我看中國人這個詞彙普遍地使用，還是二十世紀之後用的比較多一些。以前還是清朝的，或者某地方的人：廣府人、閩人、漳泉人、潮州人、客家人，這些還是比較普遍一點。那麼再廣一點，就是我想講的唐人，南方就講唐人；北方人因為滿清的關係就講漢人。那麼，到最後什麼時候開始用華人呢？這又是很有意思的，與政治變遷有關。因為在中國國內，滿漢分得清楚。如果把滿人跟漢人放在一起的時候怎麼稱呼呢？那麼就叫華人。

我舉這些例子主要理由就是說認同這個概念本身就有很多種的含義。所以，這個多重認同的概念，其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向來就有的。你說你同時是：我是廣東人，我是王家的人，或者我是某某村的人，我同時也是漢人，也是唐人，也是中國人，也是華人，都可以的，但是基本上還是同一個圈子裏頭的人。總之，我不是外國人，我是這一家的人。這就是一種認同的概念，認同裏面分成很多層次，這是很自然的。什麼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就給不同的答覆。廣東人問我的時候，我說我不是廣東人，我是某某人，我是福建人，或者我是北方人。但是同一個縣的人問我什麼地方人，我就講我是某某村的人，我是王家，某某村的王家，或者某某村的陳家。看誰問這個問題，你怎麼回答。所以這個多重認同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很自然的，每個人都有的。

那麼，為什麼到1985年時我提出這個問題呢？其實我那篇文章寫的是怎麼樣來研究華人認同這個問題。我是以此為出發

點來追問這個問題。其實我自己知道的，我1958年開始寫那本《南洋華僑簡史》，² 那個是在馬來亞廣播電台的講演。其實那是一本很薄的書，裏頭我並沒有用認同這個概念，但是我寫的時候其實就有這個意思。我那時候已經感覺到認同的變化，正在變化。最明顯的就是“南洋”這個詞已經被取代了。官方的和國際化的稱呼，是“東南亞”。“東南亞”是個新的名詞，1942年1943年以後抗戰時期，由英國軍隊裏開始用的。基本上就是“東亞”跟“南亞”之間就是“東南亞”。以前沒有一個共同的名詞，以前有“印度支那”，印度跟中國之間的那一塊地；有些用“馬來西亞”，但“馬來西亞”不是現在的“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就是馬來群島的，馬來人的地方叫做Tanah Melayu，老的名詞，所以沒有一個共同的名詞。後來就是抗戰時期，他們叫着The Southeast Asia Command的時候開始用。接着，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就慢慢地用了。到1958年我寫那本書的時候已經相當普遍了。

“東南亞”跟“南洋”有什麼分別呢？因為中國人是用“南洋”，西方人用“東南亞”。但是這個取代已經很明顯，已經開始了。不久之後，“南洋”就沒有什麼人用。大概那時候最有意義的就是南洋大學保留這個名稱，所以到現在還有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大學是很重要的，因為南洋大學的概念本身就是所有的東南亞華人都可以去的大學，不屬於某一個國家的，它的概念是整個南洋。後來當然就成問題了，因為到新興國家成立之後，每個國家分得那麼清楚，“南洋”這個名詞就越來越不適合用。所以我1958年寫那本書時，這個正在轉變。就到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每個地方都用當地國家的名稱加在華

人的身上，就變成：馬華、印華、菲華、泰華等等。這些名詞越來越普遍了，這還是五十年代才開始的。到六十年代之後，

“南洋華僑”這個詞就沒有什麼人用了。其實到那個時候連“華僑”這個詞都成問題了。最初還保留着的，但是每個國家的政府都覺得敏感，華人領袖也很敏感。漸漸地排除用“華僑”，改用“華人”，或“馬華”、“印華”，避免用“僑”字。大家都知道，“僑”字的來源是如何。所以我那時雖然沒有正式地面對認同這個問題，其實我所講的就是這種變遷：整個海外華人，包括東南亞華人都在變，從“南洋華人”變成“東南亞華人”，變成某某國的華人。

所以，認同這個概念是可以變的，它不是一個很穩定的概念；它本身的意思就說它能夠活用的。我剛講中國國內已經有很多層次的不同類的認同，在國外就更複雜了。你可以說我還是認同中國，那麼我是中國的華僑，暫時在外國的，我是認同中國；但我同時如果在當地住了好多代，住了很久的，在當地入籍的怎麼辦呢？這個認同怎麼講？當然也可以說我仍舊是中國人，這個是完全看你自己怎麼稱呼。這就提醒我們，這個新的認同概念跟舊的概念有一點不同。這個詞彙其實最初來自西方的心理學，後來社會學和其他的社會科學也用了。但最初談 identity 這個概念時，它講的是自我的一種個人的 identity；它重視個人 (individual)，一個人怎麼樣從年輕到年老的時候經歷什麼經驗，他的 identification 可能會改變；最初是自己怎麼樣發掘他自己的 identity，這是最重要的。它的最大的貢獻就是使我們對這問題特別注意。這個跟我們中國傳統的概念是完全兩樣的。因為我們中華文化中傳統的概念，好像孩子是有什麼

identity question，沒有什麼問題，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嘛！這是我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父母，很簡單的，他有什麼 identity 問題？沒有的，沒有這回事。所以 Erikson 的這個看法完全是西方的看法，³ 他的出發點不同。他的出發點就是一個個人，他有他的 identity 問題：他有他的父母，他有他的宗教，有他的國家，有他的社會，有他的學校，都有；但他仍舊有一個 identity 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中國，至少我所知道的傳統文化裏和文學材料裏，並沒有看到，這是新的。所以這個詞彙的用法本身是新的，出發點不同。所以我以前談的認同問題跟這個新的“自我認同”不是一個純粹的“身分認同”，不是人家看我；與“自我認同”這個問題有相當大的差距。我後來才慢慢感覺到這個也值得注意。這個認同問題就有點不同了。

所以到我 1985 年寫那篇“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的時候，我已經受了西方的“個人自我認同”的這種概念的影響，看法就有點不同。那麼如果從另外一個出發點，就是從個人的出發點來看，這種傳統的認同概念要重新考慮。我感覺到海外華人有沒有這個問題呢？如果我們從中華文化這個出發點來看的話，沒有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我是誰，我是某某地方人。再說下去，因為世界變得那麼快，西方的這些學術的新的發現，跟他們的這種新的研究方法，影響到我們這個觀點，使我們也會對某些問題發生興趣，或者是知道以前沒有注意到的一個問題，現在成為大題目。有這個可能，這個是很平常的。但是我寫的時候呢，還是不大能接受這個問題。所以我寫這篇“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的時候，基本上還是受當時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影響；主要還是以新興國家作為出發點。因

為我講的是東南亞，東南亞的海外華人，所以還是以東南亞國家為出發點和主體。也就是說，作為個人，你怎樣跟新興國家建立怎樣的認同？是否認同到跟其他的關係都要完全斷絕的程度呢？還是能夠保持你各種各層次的認同的概念？

如果以國家為主的話，那麼你在一個國家裏，某些人還有不同的認同對象：你可以有你的種族，或者是族群性，Race 跟 Ethnicity 的這種自然的認同；同時你也可以有效忠於新興國家這種政治的認同。就是認為我是某某國的國民，我認同這個國家，我效忠於這個國家。這個跟種族性，或者是族群性的這個認同並沒有矛盾，就是你可以這麼解釋。再說下去，我也用另一個概念，就是從經濟這方面來講，也可以有階級的認同，我是某某階級的人。社會階級分得比較清楚的話，那就可以很容易地辨明我是某某階級的人，或者我是工人，我是商人，我是某某階級的人，也可以這麼講；這也是一種認同，它與國家的認同，族性的認同，沒有什麼矛盾的地方，是可以共存的。到最後我還提出文化認同。我雖然是來源於某某種族，效忠於某一個國家，屬於某某階級，但是我的文化認同可能是另外一個。或者我是認同中華文化，或者我是認同當地文化，或者我是認同全球化的文化，或者是西方文化，好像也不一定有什麼矛盾。

所以我考慮到這點，就提出多重認同的這個概念，每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認同對象。回過頭說，這十多年來，我再回顧當時寫的那篇文章時，那個出發點當然又有新的問題。我們不一定要以國家為出發點，也不一定要像 Erikson 那樣以純粹的個人，從嬰孩起為出發點；其實有各種不同的出發點。如果我們

採取另外一種出發點的話，這個問題該怎樣分析呢？可能就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出發點相當重要。不過我想，剛才我用的這四個對象，到現在來看怎麼樣？我也發覺到這四個對象都很成問題的。而且這四個對象和每個概念的歷史都不同。剛才我說的種族的觀念是最自然，最早的，從人類開始的時候就有的，是最古老的一個概念。但是國家概念就不那麼久。國家概念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經驗的，有些部落根本沒有國家的。

其實到近代才可以說是全世界大部分人才有國家。近代以前，可能在十八世紀以前，國家這個概念還不普遍，至少在亞洲並不普遍，開始還是西歐那邊開始的。國家這個概念本身就相當新。所以怎樣效忠於國家，跟我們中華文化裏老的國家概念不同。其實那時候已經有那個朝代的概念，剛才說的，對這個皇帝的概念，某某皇朝、皇明、皇清之類的概念，不是一個國家的概念，那種天下的概念又是另外一回事。天下是包羅萬象的，什麼都可以的，所以根本沒有矛盾的。因為有一個天下，底下什麼認同，都可以的，只要你不反對某某皇帝，他就不干涉你，可以說是非常自由的，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國家就不同了，新興國家這個概念相當嚴格。最早在西方發源，在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之後，那麼後來又有德國、意大利這些新的國家。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民族國家的概念，慢慢就建立起來了。這所謂的 nation-state，那它就嚴格得多了。它最初要看你是不是同一個民族，同一個宗教，同一個文化，同一語言，定得很死的。當然，這個是他們的一種理想，其實並不能做到，不能百分之百做得到。不過總之它的趨勢是如此，就是講你每個國家都要很純的，每個人都要愛護這個國家，每個人都要效忠

這個國家，每個人都能夠替這個國家去犧牲。這個概念是 nation-state，從十九世紀開始差不多整個歐洲都有了。

其實你們知道，注意到歐洲歷史時，這個問題到二十世紀還是很嚴重的，就是奧匈帝國解體之後建立的那些新興國家，其實跟東南亞的經驗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它也是一種帝國裏頭建立出來的新興國家。它們把這個國家的定義定得非常嚴格。它最初就是以什麼語言為主，很多還是學者搞起來的。就是學者先研究在某個地方的方言、語言。研究好了之後就把這個語言定好，這個是某某國家的語言，跟其他的國家不同。因為有了一個獨立的語言，應該有它獨立的國家，所以從那個出發點。也因為如此，打了好多仗。這一百多年來，從十九世紀到現在，不停地在爲了這個理想，不曉得犧牲了多少人。一直到現在，南斯拉夫一垮的時候怎麼樣？也是某個語言，或者某一個宗教，一定有一個很嚴格的定義，這才是一個國家，這種才是真正的效忠。其他的所謂效忠，所謂認同，都沒有意思。唯有這種認同，才有意義，是非常嚴格的。

這個是國家的概念。我們知道，種族和種族認同的概念，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已經被很多人攻擊了。主要是因爲納粹黨人對猶太人的待遇。此外，還有其他民族歧視的事例，以種族概念來欺負和虐待其他的民族。總之，從那時起，大家都對種族概念很不滿意。所以漸漸地，種族概念就被衝淡了。到了五十、六十年代時，這個 race 的概念大家都不談了，我記得那時還有人攻擊說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就是種族概念。我那時候還覺得不應該這麼講，但其實它是有點道理的。其實孫中山那個民族主義裏頭帶一點種族概念的成分。不過到中華民

國成立之後，他就改成“吾族”、“吾族的中華”，他就沒有純粹的漢族的這種狹義的民族主義的概念。

總之，五十年代之後整個西方對種族概念非常反感，這因此也影響到其他地方。所以我連我那篇文章都不用種族這個字，我用 community 和 communal，這個當時也是受東南亞詞彙的影響。所以這兩個概念（國家和種族認同）都是很有問題的。但在新興國家裏，反對這個概念也不方便。由於新興的國家特別重視怎麼建立國家，而建立國家的時候一定至少要使大家認同這個國家才有希望。不然的話，有什麼希望呢？如果大家都有不同的概念，國家是建立不起來的。所以在那種環境下，五十年代的東南亞，不管是印尼、菲律賓、泰國、還是馬來亞，對國家這個概念是很重視的，而這又是新的概念。但是他們是否完全瞭解這個概念裏頭的問題呢？很難說，這個要有人詳細地來研究才行。但如果他們考慮到西歐的經驗的話，他們也應該要對這個問題要小心一點，就是不要把這個問題講得太嚴格，否則又會冒出許多別的問題，尤其在這個國家裏有不少的少數民族存在的話。在那種國家裏，不能把國家的定義定得太死，太嚴格。不然的話就反應不一定太好。但是國家的概念已經有人懷疑是否應該如此嚴格。

西方也知道這個概念有問題，不過他們也避免不了。因爲他們有兩百年的經驗了，到最後他們每次給國家下定義時，都有不同的反應。他們知道問題很多，但是政治上是無法避免的。老實說現在全世界都無法避免的。全世界現在有一百多個國家，在聯合國裏那叫國家，都以這個 nation-state 的原則爲主，所以問題很多的。它也影響國際關係。同時，每一個國家

的對少數民族的待遇，還有少數民族的權利問題，這些都變成國際法律中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換句話說，對於國家概念本身有開始表示懷疑。

所以我剛講的四個概念，頭兩個概念都有問題。那麼再接下來，階級概念也成問題了。階級概念在五十年代，至少在我寫那篇文章的時候還有人談。1989年後就很少人談了。但那個時候也是很重要的。在歷史上，這一百多年來，從十九世紀起，在馬克思以前就有這個概念，早期英國社會主義裏已經開始有這個概念了。到馬克思一直到列寧，到後來的英國的社會主義，還是講階級，社會上的階級，尤其是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的矛盾，已經談了很久。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就變成冷戰這個基本矛盾。所以從我當學生時一直到七十年代，不管是在歐洲還是亞洲，尤其我們研究中國歷史的，對中國當時的階級概念十分重視。毛澤東對此也重視，整個這個世界所有左傾的共產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家都重視階級概念。所以我們那個時候，馬來西亞、印尼，以至整個東南亞很多人都關心這個問題。所以我認為這也是一種階級認同，也是一種認同的對象，值得我們注意。

但是這個概念也很成問題。現在來講，階級已變得不重要，都是資本主義。但是中國還保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到底會演變成什麼，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恐怕到幾十年後才能知道會演變成什麼新的體制。但至少在現在來講，經濟發展的方法基本上是取自於資本主義的方法。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階級概念和階級認同就很少人談了。學術界裏還有些人談，不過主流裏已經沒有多少人談階級觀念，所以，我1985年

時還考慮把階級作為四個認同概念之一，它現在變得是最衰弱的一個。

那麼，第四個概念，文化認同，是否比較簡單一點呢？現在這個問題更加複雜了。大家知道，culture本身就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所以cultural studies中的postmodernist culture的看法，與以前的culture又是兩樣的。culture本身就很難把它解釋清楚的，再加上現在這也是個爭論的大題目，到處都懷疑culture到底是什麼意思。可不可能有一個culture是固定的？如追問的話，立刻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所以culture是不停地在演變。如果它不停在變，你怎麼認同這個culture？如果整天在變的話，你認同一個culture有什麼意思呢？culture怎麼樣你也跟着嗎？還是culture變的時候你可以說：我現在不認同這個culture？因為這個文化變得不一樣了，我不喜歡，我要改過來，我要認同另一個culture，可以嗎？似乎好像靈活一點。現在對一般人來講，全世界、全球化的環境跟以前不同了。以前我們認為culture跟宗教、信仰、家庭、社會、社群和族群的概念關係非常之密切。就是我效忠於某某，我認同於某某，這一生到底都是如此，不變的。至少我年輕的時候以為是如此。但是，我看現在不同了。文化這個概念是非常活躍的，而且大家都好像對文化有一種相當自由的態度，可以自由選擇。可以選擇？文化可以選擇！因為說起來你種族可能選擇不了，國家也不容易選擇，人家要不要你還是個問題，不完全由你選擇。階級可以選擇，但也不一定。你因為工作崗位的問題，你也不能自由選擇。但是好像文化你可以比較自由選擇，我選某某文化，我否認某某文化，完全由你自由選擇，好像是如此。當然，你真

正是信仰神的，信仰某某宗教的，那不一定。不過，除了宗教之外的世俗文化就可以似乎比較自由一點。

另一方面，現在的文化是分不開了。什麼是中華文化？什麼是東方文化？什麼是西方文化？什麼是某國的文化？根本說不清楚。所以這個文化概念可以是很鬆的，好像可以自由選擇和認同某種文化，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又回到西方心理學家Erikson的出發點，變得認同的問題是個人的問題，個人的出發點，你有選擇的。當然你的經驗，你的生活經驗，你的家庭經驗，你的社會經驗，你的學校經驗，會影響你怎樣選擇。不過到最後，你還是可以自由選擇，好像跟這個有一點關係。換句話，這個重點就移到個人本身，有自由去選擇他的文化認同。如果這樣的話，這個概念本身就很有問題。怎麼樣去研究，怎麼樣去把它分析清楚，很不簡單。

我在1985年提出的四個概念都有問題的。每一個都捉不住的，而且大家都有爭論。總之它們可以說是爭論的四個大題目：國家、種族、階級、文化。既然這四個概念都那麼有爭論，要怎麼去分析認同呢？如果這四個認同都有點多重性，那麼，這個概念好像就是捉摸不定，無法把它定下來，無法把它找出來。而且，如果認同還可以自由選擇的話，這個概念有什麼用呢？我還要考慮一下。不過我現在只講到我1985年所用的這些概念，現在來看就看到很多的問題，所以我就提出來。

我再提出一個問題：我想到海外華人的認同問題，最終總避免不了中國的問題。換句話說，你如果看這兩百年來海外華人的認同問題，跟中國的關係是非常的密切。中國強盛的時候，如從康熙到乾隆那一段，清朝根本没考慮過這個問題。中

國弱的時候，就來了一個孫中山。民族主義跟弱國有一點關係的。中國很富強的時候，不必談的，根本不必注意這個問題。國家弱的時候呢，你被人家欺負，那麼民族主義就可以很容易地提出來。我們要靠這個民族主義來抵抗外來的欺負，怎樣抵抗它們，怎樣排除它們，怎樣保護自己的國家，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目標。換句話說，中國弱的時候，就來了一個民族主義，海外華人也受這個影響。就此問題我寫了好幾篇文章，所以我不必多講。⁴ 華僑的概念就是從這時開始的，這也不是孫中山發明的。那時一般的有思想的士大夫階級就考慮到中國在十九世紀末年的時候是多麼地受外國的欺負，知道海外有很多華人，知道他們都是很想念家鄉。“華僑”就漸漸地演變成一個詞，華僑這個詞本來是沒有的，十九世紀末才有的。它的意思很簡單：就是你們在海外的，都是想念你們家鄉的，總希望回到中國來的；以前中國是不管你們的，也不理會你們，而且還要罰你們，說你為什麼到外國去。現在我們認為還不錯，你們出去了之後還很成功。尤其在薛福成等人經過新加坡的時候，⁵ 他看新加坡很好，華人好像都很有錢的，蓋房子，請他們吃飯。他就很敏感地就覺得這個很值得滿清政府注意。後來就希望能夠承認海外華人，很想中國保護他們，而且保護他們抵制外國人的欺負，以免被人輕視。所以這個概念就傳到皇帝那邊去，他們說這也是皇帝的責任，華僑也是皇帝的臣民，應該保護的，所以這個概念就從那時候開始。因為要保護他們，要承認他們，要使得他們不會覺得自己被拋棄了；而且希望他們也嚮往中國，那麼就好好地招待他們。大概從那個時候開始，還給他們官銜，也不把他們當做犯法的人，而是把他們稱為“商

／紳”。不僅是士大夫了，紳士階級本來是士大夫階級的，它把商人也那麼叫了。其實在上海和廣州已經有這個稱呼了——商紳，給他們官銜，他們捐款啦，如災難的時候捐款可以買個官銜。那麼，現在可以賞到海外去，那是很大的進步。在賞賜的時候，就承認這些海外的人也是我們自己人，也是我們清朝的臣民。皇清臣民，怎麼稱呼他們呢？沒有一個適當的稱呼。那麼，就慢慢演變成“華僑”這個詞：你們都是僑居在外國的，那邊回來的，而且是華族，那麼我們要特別地注意你們。所以滿清就開始注意這個問題。

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更瞭解海外華人能夠如何幫助他們。因為他們在中國立足很困難，很危險。在海外他們得到華僑的幫忙，“華僑為革命之母”這些詞彙就是那時候開始的。所以華僑這個概念就是表示中國關心海外華人的生活，就建立了一種特殊的關係。希望他們能夠表示他們對中國的愛，也就是愛國的概念。從清朝垮臺、民國建立之後，愛國就變成現代化的國家主義的概念、民族主義的概念。當時因為滿清是滿洲人的，所以這裏還有點複雜，當時清朝的皇帝不能夠談純粹的民族主義。其實孫中山最初的民族主義就是反清的，是要把滿清趕走的，所以這個民族主義就不好講了。但是到民國之後就可以講了，真正地講民族主義的，就是漢族，以漢族為主的。所以很快地、很容易地就變成大漢主義了。

所以，從一開始海外華人的認同問題就跟中國分不開的。中國怎麼樣，海外華人就會受到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這似乎是避免不了的。所以中國弱的時候，這個愛國的概念非常地強，而且非常容易地興起，尤其在中日戰爭的時候，大家知

道，東南亞華僑的反應是非常熱忱的。可見，中國被欺負的時候，中國弱的時候，這種反應非常地強，一直到1945年。但那個時候東南亞是特殊的。東南亞那些國家除了泰國之外，都是殖民地。它沒有自己的國家主義，沒有自己的國家，沒有自己的民族主義。在這一個環境裏，你可以表達，你用你的中華民族主義來談政治的話，除非這些殖民地的政府不高興，本地人沒話說，因為他們自己沒有自主權。

到五十年代之後，他們獨立了，新興國家獨立了，這裏就有矛盾了。他們有自己的民族主義了，他們有自己的國家概念了。那麼這個認同問題呢？到底怎麼解決呢？就變成一個很困難、很敏感的問題了。當地政府通常強迫華人要有一個選擇，政治的選擇。這不完全是自由的選擇。你不選擇為當地的公民的話，那就離開。回祖國也好，或者離開到別的地方去。這就導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開始的一種再移民的現象。很多華人因為已經在東南亞住了很久的，二、三代是很普通；三、四代，四、五代的都有。他們怎麼決定？在那種環境之下，一定要他改，他不能夠維持華僑的地位，中國也保護不了。那麼，怎樣選擇，是跟中國有關係的。中國基本上也不能夠不接受這種國際的定義。既然這些是新興的國家，而且這些國家先後都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那麼中國政府也要考慮到這些新興國家的利益。所以周恩來總理1955年到萬隆去的時候，他就第一次說出來，讓當地的人自己決定。但他意思也很簡單，他說你們要留下來的話，你們應該入籍，效忠於這些新興國家；不然的話，你要回國去的我們也歡迎，基本上是如此。

知道，我猜想不會太簡單的。所以這個問題還是懸在那兒。當然，新加坡特殊，大多數都是華人，但這完全是例外。全世界所有國家，大概有一百多個國家都有相當的華人人數，但都是少數。從千分之一到百分之十，最多是佔百分之十，而馬來西亞特殊一點，差不多佔三成。大部分都是在百分之三，百分之四左右，最普通的是百分之一以下，海外華人是少數民族。所以在那種情況之下，會有怎樣的反應，實在說不清楚。有些地方無所謂，完全由你自己選擇。因為你人數太少了，人家國家也不在乎你到底選擇效忠於他的國家，或者效忠於中國，小事情，無所謂。你人數多，就稍微嚴重一點。你人數實在多了，到了百分之十，那就嚴重得很了。像美國那樣才不過是百分之一，就是兩百萬人。那算是相當多的，兩百萬的話是很多人的，跟新加坡華人人口差不多，但它不過是百分之一，那可能沒有問題。你大國百分之一怎麼樣？效忠於誰？無所謂的。那你比較小的國家就不同了。所以這個我想很難預料到的將來會怎麼樣。

總的來說，我看海外華人的認同問題，無論如何同中國都分不開：中國的政策、中國的發展、中國的興旺、中國的成敗，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問題。我今天就講到這裏。

* 本文是王廣武教授於1999年10月7日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榮譽班選修“海外華人專題”的學生所做的專題演講。由劉宏、黃淑玲根據錄音整理，另加注釋。

當時的反應是很壞的。我還記得當時老華僑對周總理的這些話反應非常的壞，就是說你們怎麼放棄了我們這些華僑？我們是愛國華僑。從前南洋華僑是非常愛國的，中日戰爭也好，其他也好，我們捐了多少錢，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你現在怎麼放棄了我們？就讓我們留在這兒，不保護我們怎麼辦？所以反應是很糟的，不僅是東南亞。我後來才知道：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的華僑，特別是老華僑，反應也很糟，就是等於中國放棄了他們。不管反應如何，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如此，那是一種外交上的需要。所以再下一代的，年輕的，在海外的華人慢慢就入籍了，不然就回國去了。大家也知道，新馬不少的學生那一代都回到中國去，印尼更多，因為不接受當地的印尼的國籍，他們就回中國去。所以那是一個很困難的時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一個過渡期，每個人都要選擇的，但是這不是個自由的選擇，老實講，也不是個人的選擇。這個選擇是政治上的選擇，就是跟中國有關係的：你是回中國去，還是不回中國去；認同祖國，還是不認同祖國。這些變得非常痛苦的。我懂得這一點，因為我是年輕一代的。我的父母親那一代，他們的心裏的苦衷，我是瞭解的，那個時候他們非常傷心；放棄他們的祖籍，來入外國籍，是不可想像的。

如果說五十、六十年代是很大的關鍵，這基本上是跟中國有很大關係。這個不是一個純粹的本地的問題，其實跟中國有直接的關係。所以如果談起認同問題，將來怎麼樣，可能時間不同，將來情況或許不同。不過照我看，可能還是與中國分不開的，看中國怎麼樣。中國富強了怎麼辦呢？剛才講中國弱的时候是一種反應；中國富強，海外華人的反應會怎樣呢？我不

注釋

- 1 該文為王教授的“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載於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eds.,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譯文載王廣武《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 商務印書館, 1994), 頁 233-262。
- 2 此處指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59)。中譯本見張奕善譯注《南洋華人簡史》(台北: 水牛出版社, 1969 年和 1988 年版)。
- 3 Erik H. Erikson, 1902 年生於德國法蘭克福, 後任教於哈佛、耶魯、伯克利加州大學。他認為心理發展分成八個階段, 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的心理社會要求。個人在為下一個發展階段作準備時, 必須克服和內化一系列危機才能取得人格發展。主要代表作有 *Childhood and Society* 和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 4 王教授在這方面的最新論述, 可參看《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新加坡: UniPress, 1996) 及〈民族主義、種族性與亞太區域〉, 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1999 年春季號, 頁 17-30。
- 5 薛福成 (1838-1894), 清末外交官、改良主義政治家。1889 年被清廷委任為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大臣。為保護海外華僑, 曾與英國談判, 先後在新加坡設總領事, 檳城設立副總領事。他還奏請清廷廢除不準出洋華民歸國的禁令。

民族主義



海內與海外

—— 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 ——

民族主義是一個來自西方的概念，在西方國家的政治處於支配地位，已經是一百多年了。又因為西方勢力擴張到了全世界。所以，近百年來，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受到這個概念的衝擊。最近這幾年，很多國家又面對民族主義的挑戰，很多民族恢復他們的民族意識，堅持要獲得鄰國或者聯合國的承認。也有許多的國家境內的少數民族也建立了他們的民族集團，或者政治上或軍事的組織，來爭取他們的利益，甚至要求獨立，自成爲國家。海外華人也是多次而且多方面地經歷過民族主義的。他們也經驗過別人民族主義的待遇，甚至受過外族民族主義的攻擊。

我們在亞洲所見到的民族主義，也不過一百年左右。日本的民族主義是開始，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運動則次之，以後在印度、泰國、菲律賓等。到太平洋戰爭之後，東亞、東南亞與南亞先後發動許多反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運動，都是與民族主義有着許多關連的。連後來的韓國戰爭、越南戰爭，都是與民族主義有關。

民族主義也有它的建設性。國家獨立後，要人民團結，集中力量把經濟建設好，把政權穩固，培養人才，使國家能夠好

海外華人跟民族主義有什麼緣分呢？我們可以斷定的是，自從華僑最初接受民族主義到現在，已經有超過一百年歷史了。

這一百年歷史可以分爲四個時期來談。第一個可以說是新概念的衝擊時代，大概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二十年代；第二個可以稱爲愛國華僑時代，是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第三期是華人華裔的選擇期，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選擇的意思是，在這個時候，華僑要選擇到底是入籍外國還是認同祖國才好？第四期是七十年代到現在。

第一時期是新概念的緣起，大約在1890年代到1920年代之際。傳統中國是沒有民族國家(The Nation State)的概念，有的是帝國的制度，只有封建帝王的關係，沒定的邊界，也沒有固定的領土，一切都要看中央政權強弱而定。另一方面，中國的民族，華化的中華民族，守着中國，並沒有去侵犯別的國家。別的國家，別的文化，華外的民族，對中國來說，都是貪心的侵略的民族，所謂蠻夷戎狄等。中華民族所以有文化國家或文明國家的稱呼。

在海外，當時的華商、華工都是南方的福建、廣東人，並不以他們是滿清的臣民而自傲。其實他們愛的不是清國，而是他們的家鄉，他們的鄉土，有方言的關係，也有利益的關係。因此，如果談民族的話，他們所瞭解的只不過是外國蠻夷，在國內來講呢，有漢滿之分。

民族(Nation)這個概念，意思是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政權。這個概念本來就帶有一種種族的意思，所以最早梁啟超、孫中山開始用這個概念的時候，就難免以漢人與滿人之間的矛盾爲主要的概念。民族主義的第一期是以滿漢政權開始的。

好地建設起來，這是民族主義能夠喚醒全國人民，激勵他們把國家富起來，要一代一代地忠於、愛護自己的國家。

可是，民族這個概念，仍是不容易解釋。要跟國家、愛國等主義加以怎樣的分別呢？例如，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成功，經濟發展非常快，領導人很少講革命，也不多講各種政治或者思想上的主義。但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有討論，引起很多人注意，也有不少的爭論。其理由很簡單，有兩點我認爲特別和今天的講題有點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成功，這是全世界都留意的，如果富強之後會怎樣？這是第一個問題。從企業家的觀點來看，中國大陸的市場那麼大，大家都有機會在中國賺錢，那是一件好事。但從國防戰略家的觀點來看中國將來變成一個強國，那會成爲一種威脅，不論對於本區域還是全世界，都是一種威脅。

中國人講愛國主義，對海外華人會有什麼影響？愛國主義在中國的領土內，包括香港、澳門和台灣，是建設性的，但伸展到國外的華人或華裔，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大家都知道，海外華人跟台灣、港澳的企業家紛紛投資中國大陸，給沿海各省的經濟改革很大的刺激，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對海外華人會不會響應愛國主義的號召？西方國家尤其關心，部分東南亞國家也發出了一些比較帶有警告性的口吻。常常會問的一個問題是，海外華人將來會不會忠於大中華？會不會將文化中國演變成爲支配性的新東亞文明？換句話說，海外華人會不會響應中國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看歷史。先講海外華人和民族主義的淵源，再講現在的新愛國主義跟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經驗有什麼關係。

配其他的少數民族。這是民族國家的原則。所以多元民族的國家，在歐洲來講是不正常的。

其實，多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對一般中國人，漢人在內，也是很生疏的一個概念。雖然官方文件把五族共和解釋得很清楚，但是，五族大多數的漢人，都以爲中國是漢人的中國，其他民族不過是附庸的少數民族而已。當時的海外華人，包括華商、華工，大部分都是漢人，他們對這個多元民族國家的理解，也覺得很新鮮。具體的反應，要看他們個別的經歷，他們的地理環境和歷史經驗。

在南洋華僑裏，多數都是反清排滿的，他們在傳統的私會黨，如三點會、天地會的影響之下，還有本地的許多公司，如義安公司、義興公司等等，都是認爲中國應該是漢人的國家，但是只要漢人當權，其他的民族也可以叫中國人。從海外華人的觀點來看，其他並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中國富強，要中國政府能夠有能力保護華僑的利益。因此，他們的反應基本上是支持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和反清革命的。除此之外，華僑在南洋各地的殖民地，多有受過外族的歧視，尤其是西方殖民地的政府官僚，所以對西方的民族主義也有一點瞭解，很憎恨他們的這種民族優越感，很想中國人將來也能夠恢復原有的自尊心，因此對新的民族主義概念反應很強，會很激烈。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南洋各地的反應有不同的地方，不是一律的，從一開始就不同。例如在泰國，泰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不是殖民地，泰國政權對當地華人的政治活動非常的注意，而且從各方面加以限制。其他殖民地也有不同政策。

孫中山自己對民族主義的看法，也改變了好幾次，這很有意思。在共和國剛建立的時候，他以爲三民主義之首的民族主義已經成功了，因爲已經把滿清趕走了，所以之後就很少談了，把注意力放在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後來他發現自己不對，新的共和國受到外國勢力的干涉，外國利用民族之間的矛盾，來鼓動蒙古族、滿族、藏族，要求他們獨立。俄國跟日本就支援蒙古的獨立。俄國軍隊派到新疆去，英國的軍隊到西藏去。所以孫中山要修改他的理論。到了最後，他又有一次覺悟，在改組國民黨的宣言裏講，“只要有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的內政，民族主義是不可少的”。可見，他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判斷不同了。

新建立的共和國，很快就瞭解到反對滿清，以漢族排滿這個革命政策是不足夠的，所以採取一種新的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策。這個改變是很有意義的。它表示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其實是一個多元民族國家。用五族共和政策，就可以號召全國民族效忠於中華民國。這五族，只不過是代表國家有多種民族這個原則。這五族，從人數最多的漢族，到人數最少的藏族，都是佔地比較多的大民族，他們的地位是公開受到承認的。其實中華民國何止有五族，從現在人民共和國的計算，除了漢族之外，最少還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所以，多元民族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

多元民族的帝國是很平常的事情，世界到處都有過，但是多元民族的國家，也就是 Nation，那就很少了。很多西方的強國以爲，每個國家的境內，應該只有一個民族爲主，用一種語言，共享一個文化，一個社會，一個宗教等等。主導的民族支

像荷蘭在東印度，也有阻礙，不許華人從事各方面的運動。但是他們仍然有相當強烈的反應，很願意接受這個新的民族主義概念。

菲律賓又不同，因為菲律賓在西班牙和美國政權交替時期，孫中山是支持菲律賓的獨立運動的。所以，當地的華僑對民族獨立用武裝革命，是比較同情的。由此，很早就志願地回國參加革命隊伍。

法國的越南，也是限制華人的活動，但是它也不完全阻止華人的民族革命，也讓華人的革命人士借用當時的北越邊界去做他們革命的戰略地。當時華人在越南也得到一些越南本地的民族的支持和同情。

這些歷史提醒我們，當時的所謂南洋已經是一個複雜的區域，區內各種反應不同，並不能一概而論。南洋華僑並沒有劃一的行動。中國的革命黨員到處去宣傳、去籌款，但是也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政策，遇到不同的反應。華僑的團體雖然支持，但支持的程度又不一樣。這不同的反應，雖然是來自各種不同的理由，但這也表示一般華僑對民族這個概念並不是很瞭解。他們所知道的是反滿清，要強大中國，同時表示愛國，同時也照顧到他們自己。

其他地方的華僑，就更不相同了。當時日本很特別，學生反應非常強烈，但這也要分兩期。初期呢，日本政府和政客，是幫助和同情反滿的運動，讓梁啟超、孫中山等在日本自由地活動。後來，因為日本政府野心越來越大，公開地施壓力於辛亥以後的中國政府，不再允許學生遊說於華僑之間，鼓勵華僑參與中國政治。這也給日本華僑明白，別人的民族主義，即日

本的民族主義比中國的要強得多。在兩個民族有衝突的時候，國家的民族主義的力量要遠超過個別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可以說，住在日本的華僑，早就懂得日本人熱忱的民族主義是來自他們民族的團結，他們的效忠愛國精神已經很普遍，不像中國人那樣的渙散。當時的學生跟一些華僑，還有一些少數的台灣人，也有一點羨慕日本的民族主義，希望將來中國人也會同樣地愛國。

至於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殖民地，如北美、澳大利亞、紐西蘭、南美、南非也有不少華僑，大多數是華工，流動性比較強，回國的也比較多。這些地方的華工跟南洋的華工有些不同，大多數在契約完之後就回國，少數從商的也是做些小生意，很難賺大錢。極少數的，被允許居留的華僑，就有機會深入移民社會，受當地的教育，如基督教教育。有些成功的，如書唸得好的，就變成後來的專業人士，他們的社會地位就提高了。

在這種拓荒的社會中，華僑的經驗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們受到歧視和極不平等的待遇，受到排擠和妒嫉，使得他們感覺自己的民族不如人，因此就很熱心地支持孫中山和同盟會的武力革命，協助孫中山籌款。另一方面，他們接受外國教育，他們的子孫脫離了中國傳統文化，因此在不同意用武力革命的情況之下，他們會回到中國去堅持採取改革的方法，不贊成武力革命，認為應該慢慢來把中國現代化。也就是說，他們自己之間也有不同的看法。這些人都是比較保守些，而主張穩定和改進，不同意革命。美國從中國去的學生，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很有影響，給當地的華僑很有幫助，鼓勵他們讀書愛國，用知識來建設新的中國，同時也能增強一般華僑的民族自尊心，

這點跟其他東南亞國家不同。所以，學生這一層，也就是知識分子這一層，在美國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第二個時期，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就是愛國華僑時期。在這個時期，民族主義的現象此起彼伏。在中國，先有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後有內戰，又抗日，又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太平洋戰爭，又再一次的內戰，共產黨戰勝國民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海外的華僑與華人，就在這個時期達到了華僑最愛國的時候，又是最多華僑回國參加革命或其他的救國運動，或者回國建設。同時也是一個有考驗性的時代。怎樣地愛國？愛黨又是怎麼一回事？愛革命又應該怎樣地去進行？同時這又是各地掀起了本居民自己的民族主義的時代，尤其是反殖民地政府，反帝國主義，爭取他們國家的平等、自由和獨立的時代。這是一個新的矛盾，也發生在當時華僑的身上。就是說，華僑不僅受到中國政治的影響，同時被本地興起的民族排外思想有所攻擊。

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這三十年間，全世界都有華僑，但他們差不多到處都不受歡迎。在歐美、日本、大洋洲各國，是華僑人數最少的時代，排華風氣很強烈，逼得華僑更是要依靠中國，牽動他們的愛國心和民族情緒。南洋華僑也不例外。原有的人數本來就很多，長久居留的華僑人數也大大增加，有所謂華僑社會。他們的經濟力量也雄厚。這些華僑社會，多半都是嚮往中國，和南京政府建立了很密切的關係；也有支持當時反對中央的黨派，如跟國民黨對立的共產黨等等。換句話說，華僑社會有直接參入中國政治的傾向。由此，各地的政府有不同的反應。

再舉些例子。泰國政府 1932 年發生政變後，本地的民族主義興起，排華的熱衷更加激烈，採取各種各樣的方法禁止華人參加中國政治，鼓勵華人入籍，歸化泰文化，接受他們的語言、文字、宗教等。

荷屬東印度也是如此，盡量地限制華人參加中國政治，也禁止革命組織，當時他們也顧慮到印尼本地民族獨立運動。所以，反荷蘭的組織，根本不允許存在，各種政治運動都受限制。

英國的殖民地，像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就比較容忍一點。華人社團民間的愛國運動和救國運動，只要不反英，它們就可以活動。就算是反日本，英國也不太管，只要不用武力去發動就可以。

法屬印度支那也限制得很厲害。他們顧慮到越南人自己的民族主義，即本地的獨立運動的影響，也怕華人華僑幫助越南人反對法國政府。

菲律賓又不同，當地政府雖然不鼓勵華僑參入中國政治，但也不限制華僑各種的愛國活動。在每個地方都不同，這是太平洋戰爭之前。到太平洋戰爭後，情況又大不相同。

一是因為日本佔領時期各地的獨立和民族運動紛紛地起義。除了反西方之外，日本當時也鼓勵一些反華的傾向。華僑反日，而本地的政黨領袖則藉助日本來建立他們更強固的力量，爭取他們的獨立，跟華僑有些矛盾。但是同時，也有些華僑就開始同情這些反殖民、反帝國的集團，支持當地的民族解放。

另一方面，由於列強和蘇俄的共產國際合力反對納粹和法西斯國家，東南亞各地的共產黨勢力也得到多多少少的承認。因此，華僑愛國抗日分子也跟中國共產黨合作，與當地的共產

黨和民族主義組織合作，來共同抵制日本帝國的野心。在這個時期，政治上就比較開放，連歐美、大洋洲的華僑，也能夠公開地愛國、抗日、大量地展示他們的中華民族主義，也有已經入籍的華裔參加西方國家武裝部隊，認同當地的民族和國家主義，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民族主義最大的轉變時期是從五十年代開始到七十年代，這是第三期。在這個時候，海外華人面對了最大的考驗。從五十年代起，是他們極重要的、有意義的選擇期。選擇什麼呢？是入籍外國好呢？還是保留中國國籍，認同祖國，以至於回國去效忠才好？當時，這種選擇是不簡單的；不要因為現在大家入了外國籍，甚至許多移民都願意入籍，而以爲從前也是很容易。其實，在五十年代，熱心愛國的華僑要轉變爲當地忠誠的公民，不僅是選擇國家的問題，而是一個心裏過不去，遊移不定，也是一個內疚，問心無愧，又覺得不得已的大事。

東南亞的新興國家政策不同，華人華裔的經驗也難得相比，現在不少人研究，也就不必詳細介紹。值得重視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大陸共產黨與台灣國民黨的分裂，當時對許多華僑尤其是反對者影響很深厚。近來是慢慢地淡化，一般對兩黨的政治不是很瞭解，也不感興趣。

第二，日本、歐美、大洋洲雖然對華政策不一樣，但是反共的勢力很強，華人也受其影響，尤其是入籍的華裔。支持國民黨，還可以得到右派的認同；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同情共產黨，就要小心，不僅不能夠討論，也要顧忌當地的民族主義。

第三，最複雜的情況是在東南亞。有些國家承認北京政

權，有些承認台北政府，有些則避免任何官方關係，兩邊都沒有官方來往，兩邊都不討好。那麼，每個地方的華人華裔都要就地適應新政權，就是獨立以後的新興國家的政府跟當地已經建立好的，而且很有勢力的民族主義。

上面已經談到過，南洋華僑的概念是多方面的，不宜一概而論。這裏改用東南亞，更是明顯不同了。東南亞有多種政權，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歷史傳統，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政治理想，不同的民族政策，還有每個國家有不同的對華政策，不同的入籍條件，不同的效忠對象。

用以前的幾個例子，像泰國的同化政策，很明顯，入籍的華裔要尊重泰國國王，受本國教育，要改名換姓等等。但是有一點很特殊，就是入籍後就完全平等待遇。印尼也受泰國的啓示，強迫華人受本土教育，改名換姓，但並不歡迎華人入籍，入籍後仍有尊卑關係的考慮，要求的同化程度也有跟泰國不同的地方。這兩個國家採取同樣的同化政策，但是具體的民族分類不同，政法體制大不相同，宗教不僅不同，而且各有不同的社會和政治運用。再說，泰國佛教的民族概念和印尼回教的民族概念也含有不同的因素。前者同華人華裔本身的儒教、佛教並沒有矛盾，後者是接受華人華裔信仰基督教的，也接受他們信佛教，但並不歡迎他們支持儒教。這是因爲他們認爲儒教是華人民族性的基礎，會阻礙華裔被同化。

另外，菲律賓的政策是鼓勵通婚，鼓勵受洗天主教徒的同化政策，已經好幾百年了。一直到七十年代，基本上不讓那些來得晚的華人入籍，把入籍手續弄得非常複雜，要華人大量破費，才允許他們入籍。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本來是英屬馬來西亞，所以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兩國分開之後，各自為政，這當然是跟人口的民族成分有關。很明顯的是，民族成分一定會影響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這兩國並不用同化政策，也漸漸地少講民族主義，關心的是民族之間的和睦共處，能生活得融洽。既然承認是多元民族的國家，那麼就不好講民族主義，而應該重視國家獨立，國家統一的愛國主義。

其他地方又不同，像緬甸的同化政策並不顯著，各地華人混合居住，雖有貿易上的困難，但能夠避免民族間的矛盾。主要理由是緬甸境內的民族問題太多了，所以人數比較少的華人社會並沒有什麼困難，和當地人通婚也很普遍，宗教也不是一個阻礙。

印度支那的越南和柬埔寨本來有不少華人，但這個悲慘的局面，受罪的不僅是華裔。國人內戰，互相殘殺，外國干預境內的政治，影響非常的大。戰後新建立的統一國家政權等等，還在建設期間，到底將來會有什麼樣的民族主義，到現在還無法肯定，留下的少數華裔，在這幾十年的滄桑史，是一個大悲劇，仍有待歷史學家去研究和撰述。這兩個國家的民族鬥爭，給華人華裔又看到另一種的民族主義。

這裏我要強調的是，海外華人經驗的多元化，他們多數都有選擇的。入籍，或者保留中國國籍？留下，或者是回國？或者移民？或者再移民？只有少數沒有選擇。那麼，在選擇的時代，民族主義在華人社會淡化，西方國家也沒有像過去那麼重視。現在華裔人數最多的東南亞新興國家，正在建設新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或愛國主義，當地的華裔則不得不十分留心關

注，用敏銳的視角來觀察這些發展，同時也要斷定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社會地位，想辦法如何在新國家的法律範圍之內，維護他們少數民族的權益。

最後要注意的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間的人民共和國講的是世界革命，用的是社會主義的外交來團結社會主義兄弟國，並不講民族主義。後來，由於中國大陸的大躍進，又遇上文化大革命，給海外華人的影響非常大。中國大陸既然重視階級革命，反對狹義的國家民族主義，海外華人在這個時期就比較容易接受歸化為外籍華人，或干脆承認是個外國人。另外，這個時期，從台灣、香港、澳門移民出國的人數慢慢地增加，分佈在世界上各個地方。海外的中華民族，也就是華僑在當時正在轉變為外國的華人華裔。他們的共同點呢？是民族概念的政治化、多元化，民族主義給國界所限制或者圍繞，因此，民族就是國家的看法就佔了主導地位。

第四期是新愛國主義時期。亞洲近二十年來的最重要發展，無疑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其影響之大，是全世界都承認的。我剛才說過，因為經濟改革的需要，人民共和國現在少講主義，更少講革命，但是最近就常提起愛國主義的口號，也有討論民族主義的，因此引起外國專家和政府官方的注意，也引起海外華人的注意。他們提出很多疑問。這是什麼意思？會有什麼結果？將會怎樣影響到海外華人？

如果中國的愛國主義其實是變相的民族主義，那麼，海外華人會不會有一天返回二十世紀前半期，恢復愛國華僑的角色？如果考慮到近二十年來大量的港台和大陸華人紛紛移民到北美、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地，這個問題可能就不簡單。再考

慮到這些新移民很願意入籍歸化，但也高興地回流到港台和中國大陸去謀生。而他們在國外的生活，跟以前的華僑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例如堅持繼續華文教育，成立華人社團組織，保持大部分的華人風俗習慣，盡力地維持同中國的關係，保護少數民族的權利。那麼，骨子裏和前期的愛國華僑有多大的分別呢？再進一步問，這些新移民帶有華僑性的態度和觀點，將來不是可能變為愛國華僑嗎？

還有一個考慮，新移民的教育水平遠高於早期的華僑，又不限於小型的工商行業，有很多是專業人才，經驗豐富的管理和行政人才、科技人才、學者、文人、記者、美術演藝人才，在經濟領域又有銀行財政專家、大企業家，房地產業、旅遊旅館的大企業家等等，真是數之不清。他們都有便於攜帶的本事和資格，移民再移民，出國再出國，出國再回國，都不是一個大問題。那麼移民回歸、入籍，重新歸化中國這一些考慮，華僑、華人、華裔這些詞彙，是不是暫時的呢？這些問題都很難有答案。就是有的話，也是屬於一種未知性的揣測。

不過，如果回顧海外華人這一百年來的歷史，或許有一些值得我們斟酌的線索。最少有兩種看法可以幫助我們找出答案，就是說可以從兩個出發點來進行討論。

首先，本世紀上半部跟世紀末和來臨於二十一世紀的這幾個時代，大不相同，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世紀初期愛國華僑的概念是絕對不可能再次出現的。這樣的看法跟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當時亞洲基本上沒有民族主義，華僑對民族主義也不是很瞭解，只是知道愛國、抗日、救國、趕走帝國主義等

等。下半世紀是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興起，華僑的經驗也豐富了，而且各種各樣的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的團體也被多方面的專家研究得很清楚，大家都明白了。再次，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又經過美蘇冷戰鬥爭，經過國際主義的階級鬥爭，又有歐美法定的民主和個人權利學說，加上政治理論和行動，又有聯合國保護小國家和少數民族的利益的各種要求，又有區域性的跨國合作組織。再加上全球的科技進步，人類各種社會與民族的自愛自尊等等。那麼，本世紀初的愛國華僑現象是過去了，不會也不應該再恢復了。至於二十一世紀，就更不用說了。這世紀的變化太大了。我們可以用歷史來提醒我們，警告和教訓我們，已過的歷史現象，是不可能再生的。

但是，如果用另一種看法或出發點來找答案，就可以得到另一種答案。這也牽涉到民族主義的概念，不僅是國家民族主義的階層，也是境內少數主義的階層。每一個民族文化都是有持久性的，中華文化的持久性特別強，海外華人對此可以做見證。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鮮明的華人民族感，而且這種民族感有互相支持、支援，互相增強的傾向。例如，他們的團體生活、文化組織、工作習慣有靈活性，有投機性，能適應不同的環境。他們懂得競爭，在有需要的時候也能夠合作。他們的人生哲學是入世的，講實際，而且他們也重視教育，尤其願意學一些比較實用的知識。從他們在海外的經驗來看，最理想的環境不外於有法律的保障，行動的自由，教育職業的平等，經濟狀況穩定，而且有改進的機會。有如此適當的環境的選擇，不管是華僑也好，華人也好，華裔也好，不管名稱如何，他們

會選擇自己的去向。用這個小民族主義的歷史觀點來看，我們對海外華人如何適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愛國主義，就會找到一點頭緒。

讓我引用我二十七年前一篇文章。那個時候，我是分析馬華的政治。我的結論是當時馬華有三種反應，或者三種選擇。甲種是認同中國，參入中國政治；乙種是效忠本國，但仍盡力地維護華人社會；丙種是投入本國政治，所愛的是本國的領土社會和國家文化。

現在我們面對中國富強而號召愛國主義的時期。雖然這個號召是針對本國的人民，而不是對海外華人。但海外華人的反應和選擇是不可避免的，而很可能跟上面、我剛才講的三種反應有相同的地方。以每個國家境內的小民族主義為框架，就可以把甲、乙、丙三種反應乾脆稱為華僑、華人和華裔三種不同的選擇。

首先看華僑或者新華僑的反應。他們將來也許決定回國，或者保留人民共和國的國籍，仍僑居國外。入了外國籍的，他們願意放棄外籍回國去。

其次是華人的反應。他們將來仍保留外國國籍。他們所謂愛國，愛的是本國而不是中國。他們已成為忠誠的當地國民，但仍舊堅持中華文化，盡力地保護華人少數民族的權益。

第三是華裔的反應。他們接受本地文化，參入本地一切的社會、政治、經濟集團的活動。他們對中華文化的態度已從尊敬到不否定，再進一步積極地去支持本地文化。將來，如果本國和中國有衝突，他們可能會盡忠於本國。他們不一定會鼓勵

子孫和外族通婚，但是如果通婚的話，而後代被外國同化，他們也不會批評或者反對。

華僑、華人、華裔有不同的反應。到此，讓我做一個小的總結：

(1) 早期海外華人歷史能幫助解答我們面對的難題，懂得歷史是很重要的；

(2) 中國新愛國主義是屬於中華民族的範疇，必定引起鄰國外族的關注，也必定影響海外華人認同的選擇；

(3) 海外華人文化與社會有相當的連續性，到二十一世紀，仍會有華僑、華人、華裔之別，他們會根據自己對民族主義的不同看法，決定選擇不同的去向。

* 本文是王廣武教授在1996年11月29-30日神戶舉辦的紀念孫中山誕辰130週年“孫文與華僑”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的文章。

而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她維持統一的力量是文化和文明。因此，二十世紀以前，一些歷史學家把中國稱作“文明”而不稱作民族。

儒家學說也是一個多重含義的詞彙，最普通的含義是指構成中國文明和支撐這個帝國延續兩千年的思想體系。我這裏注重的也就是這個曾經成功的、廣受尊重的、影響巨大的傳統，這個傳統包括：國家倡導學習儒學、以儒學選拔官吏、用儒學標準判斷所有公共道德和決定維持統治制度的各種職責與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家學說與中國的形成密切相關，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性和民族意識的一個基礎，因此，它也是民族主義的根基。還有，儒學中的個人義務觀念，與儒學相關的社會家庭倫理價值觀，在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中繼續而且永遠發揮着重要的作用。還要注意，儒家學說並非中國人所獨有，它也被東亞其他族群所尊崇，例如：朝鮮人、越南人和日本人。

今天要談民族主義與儒家學說的主要原因是，從八十年代初以來民族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不同形式復活，與此同時，出現了重新評價“新儒家”貢獻的動向，這些新儒家包括像梁漱溟、馮友蘭這樣的哲學家，包括讀過許多現代西方哲學著作的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包括新一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澤厚和他的學生及批評家，也包括像錢穆、余英時和杜維明等歷史學家。

重新評價本身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更為重要的問題是，民族主義與儒家學說在什麼程度上相容互補？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多數中國人還記得，本世紀初中國經歷過那麼一個階段：過分強化了的民族主義誘使青年人不加分辨地反對儒家學說。

民族主義與儒家學說

民族主義和儒家學說是兩個常見的詞彙，其實兩個衍生的許多意義，使它們變得難於理解。我對民族主義的興趣主要在歷史方面，即民族主義在中國和本區域的起源，本世紀以來它在不同條件下的發展，它對現代化的貢獻，它在各國建國過程中對社會和文化所造成的差異等等。這裏不可能涉及這許多課題，我僅僅談些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儒家學說的關聯問題。

民族主義通常產生於那些在同一區域居住、長期分享歷史和文化、自認為是一個民族的人們中間，最成功的民族便建立國家，即“民族國家”，就是說國家由單一民族或族群統治，以便使國家能夠更快地改變、回應、適應和現代化，人們蓄積的感情給“民族國家”指明了方向和目標，從而產生了現代民族主義。在亞洲，這種民族主義的最好例證就是日本。在民族主義形成之前，它已經具備構成民族的所有要素。民族主義的概念一被引進，它在日本便輕而易舉地風行開來。

事實上，多數“民族國家”或多或少地由多個民族組成，像印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多民族的國家是明顯的例證，從前曾經是歐洲殖民地新興國家也是如此。中國的民族主義相對來說是一個新的現象。到二十世紀初，中國顯然是一個帝國，

這些事發生在五四運動之後，它的影響延續了幾十年。到文化大革命以更具毀滅性的形式，試圖消除傳統價值觀的一切遺跡，這些遺跡中，最為顯要的便是儒家學說，儘管這些活動是以共產主義革命的名義進行的，但是背後還是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動機，排斥那些被認為導致中國落後於時代的因素。

我今天要提的主要問題是，民族主義與儒家學說之間的長期衝突已經結束了嗎？民族主義到底能不能與漢代以來作為建國理念的儒學體系相分離？

還有，民族主義是主導的力量嗎？儒家學說是否僅是給民族主義賦予道德內涵、使其受人尊重的一種方式而已？這是否意味着一個小倒退，回到本世紀初的狀態？那時候，儒家學說曾經有機會證明自己可以適應新事務，但是它沒有能夠說服當時的急躁的年輕人。

還有，我們是否面對一個全新的儒家學說？這個新儒學果真那樣現代、不同於傳統的形式、能夠支持現代民族主義嗎？它是否擺脫了“封建殘餘”，能否像數千年前那樣，再次成為建國的理念，不僅整飭道德，而且還要統一政治？

這些問題表明了對儒家學說的未來存在不同程度的信心。構成這些信心的某些前提，在本世紀初尚不具備。儒家學說還有多強的生命力以及它還將延續多久，對於這個問題顯然沒有一致的看法，有人問儒家學說與現代城市生活究竟有何關係？也有人認為儒家學說比人們所認識的更加充滿活力。儒家學說果真如此蓄積豐厚，那麼離開它的襄助，民族主義就是否無緣復興？

作為歷史學家，我偏好採用歷史的探討方式來解答所提到的一些問題，最核心的問題即是：民族主義與儒家學說之間的長期衝突已經結束了嗎？

所謂長時期衝突是指從 192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半個世紀，其間的三代年輕人激烈地排斥儒家學說，崇尚西方民主或共產主義，這個問題暗示，在 1920 年代以前，民族主義與儒家傳統並無矛盾，儒家文人樂於容納民族主義，如果自十九世紀末便能夠做到這一點，為什麼此後不能延續呢？

對於 1895 年中國被日本打敗之後三十年的情況，我們發現兩種民族主義的呼聲最為響亮，它們主張以激烈的步驟挽救中國，一種聲音來自康有為，一位非正統的儒家學者。康有為自視為愛國者，而並非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許多年輕追隨者，包括梁啟超，卻毫不掩飾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另一種聲音來自孫中山，一位香港的醫生，與他對西方科學和政治制度的熟知程度比較起來，他對儒家經典的瞭解顯得比較粗淺。毫無疑問，他是中國的第一個偉大的民族主義者，代表了普通百姓推翻滿清統治的呼聲，他比其他人更進一步，自豪地稱自己是革命的民族主義者。

在梁啟超之後，孫中山滿腔熱情地採納了民族主義這個詞彙，用來鼓舞那些準備為國家復興而獻身的愛國華人。與此同時，康有為也由於個人對孔子思想的古怪解釋而遭到其他儒家學者的激烈批評。在批評他的大儒家之中，也有激烈的民族主義者，章炳麟便是其中之一。在這些民族主義批評者的眼中，儒家學說是中國文明巨大成就的支柱，因此也是民族精神的精髓。對他們來說，離開儒家價值觀的貢獻，中華民族簡直不可

著名的有蔡元培和吳稚暉(他們直接經歷過歐洲的民族主義),還有于右任、胡漢民和朱執信(他們在日本的時候便開始介紹民族主義的刊物)。他們自己對儒家學說深信不疑,但是他們明白,年輕的國民黨黨員質疑儒家學說的未來價值。他們除了強調民族主義者應該把儒家學說視作傳統的一部分之外,很少在公眾場合談論這一題目。到1920年代末已經很清楚,那些公開提倡回到儒家價值觀的人們,得不到年輕人的響應。

到國民黨政府在南京成立的時候,民族主義者基本上對儒家學說沒有敵意。他們理所當然地把儒家學說當成中國人性格的一個主要來源,雖然很少公開強調這一點。那麼,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是什麼東西擾亂了這種消極的關係呢?

國民政府與儒家學說並沒有決裂,事實上,各種傳統形式逐漸恢復並被嚴格遵守,孔子後裔在國家等級制度中受到尊崇,宗教儀式被恰當地奉行,國歌詞句體現了最佳古典傳統,新的教育目標包括傳授儒家價值觀。1934年,政府發動新生活運動,重申繼承儒家遺產,政府遷往台灣後,他們依然如此。

五四運動造就了一代向文化遺產挑戰的知識分子,包括教師和學生,他們聯合抵制盲目接受儒學在歷史上的支配地位,以進步思想和民族解放為名,拋棄這個導致中國戰敗於西方的主要因素。然而,持有這種觀點的人畢竟是少數,他們主要居住在現代城市,特別是上海和其他租界口岸。在廣大的鄉村人口中,對孔子的懷疑並未佔據主導地位。

有兩個因素很可能是造成儒家學說黯然失色的原因。第一,使用革命的新概念;第二,政府沒有能夠履行對人民的承諾。讓我來加以解釋。

思議,這一點如此顯而易見,以至於一些出色的學者甚至認為無須為儒家學說辯解。

但是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不久,一些頑固之士想用儒學的名義去復闢君主制度,如1915年的民國總統袁世凱、1917年的張勳都是如此,但是他們卻因而身敗名裂。到二十年代,儒家的忠實信徒目睹了青年積極分子如何以五四運動反對偶像崇拜為武器,反對所有傳統,到那個時候,任何形式的儒學都已經無濟於事。在絕望之中,一些儒家學者退出了公共舞台,少數人自殺了,多數殘存的人退回課堂和書房,面對西方哲學的挑戰,重新檢討儒家思想的根基。一些接受儒家學說的人加入了國民黨;那些摒棄儒學背景的人則選擇了不同的政黨,包括新生的共產黨,這些人發現維持兩千年中華帝國的基本思想變得無關緊要。

二十世紀初,許多人夢想把新興的民族主義與部分的儒家思想結合起來。有人強調回復儒家原始經典的純潔性,康有為和他的許多同時代人都不同程度地抱有這種期望。他們強調孔子是聖明的預言家和傑出的儒教導師。這種回復本源、清潔民族心靈的努力成為現代民族主義的一種強烈表現形式。

另一類儒家學者,相信傳統思想的連續性,他們大多指出偉大的儒家思想在歷史上始終表現出適應性。這些儒家學者的確不簡單,因為每當儒家學說受到嚴重挑戰的時候,每當它的缺點被新思想所揭示的時候,特別是當來自外部的新思想,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湧入的時候,他們總能夠使儒家學說再度復興。

孫中山的一些追隨者和國民黨的忠實支持者,也有嚴格的儒學教育背景,但他們對來自西方的新思想更為開放。他們中

明自己一貫正確。他們堅信，作為優秀的民族主義者，需要以革命救中國，而革命不需要儒家學說。有些人走得更遠，他們說儒家學說讚美過去，追求延續性，因此是反動的，是革命的障礙。對他們來說，儒家學說代表着中國人中所有的封建、落後的和後退的東西。

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確認了革命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革命成了打敗帝國主義、實現國家統一的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恢復民族獨立和自豪，重新實踐早期民族主義者未能履行的諾言。結果在他們的眼中，革命成了民族救亡的良藥，因而也是更為切實和更為偉大的民族主義。所以，在毛澤東年代，沒有必要求助於民族主義。

當前的民族主義的明顯特點，是以愛國主義的名義出現。愛國主義的呼聲響亮清晰。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國際主義和革命意識不再能夠吸引多數中國人。與此同時，復興儒家學說的議論也在興起，這是否意味着儒家學說被用來給民族主義它的道德內涵，是使其受人尊重的一種方式而已？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從表面上看，民族主義目前的地位似乎回復到民族主義最初興起的二、三十年，那個時期儒家學說有機會證明自己能夠適用於現代社會，但是它沒有能夠吸引年輕的政治活動分子。如果依此類推的話，儒家學說是否還有第二次機會與民族主義融和交會？

革命時代已經結束，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去除了革命的包袱，民族主義者理所當然地可以追溯往日的光榮。由於民族主義植根於過去的土壤之中，因此儒家學說往日的重要作用便會得到尊重。

“革命”是一個古老的詞彙，本來意思是改朝換代，奪取“天命”。用此詞來表達現代西方的劇烈的變革，確是一個巧妙的借用。由於強調革命才是挽救中國的方法，孫中山把國民黨向共產黨和其他支持社會和文化革命的激進分子開放。在這樣的情形下，反對偶像崇拜的“五四”一代人在挽救國家衰亡的名義下，尋求更加激進的變化，革命已經成為具有推動力的理想，像在法國、美國和俄國革命中那樣，超出了改朝換代的意義。

因此，作為中華帝國支柱的儒家學說的歷史作用顯然已經過時了，新的革命已經不僅是民族主義，它實際上成為一個變革過程。現代思想被迅速接納，諸如國家資本主義、民族社會主義或國際共產主義，似乎它們都能夠為解決中國問題提供更多的答案。在革命過程中，儒家學說被棄置一旁。

第二個因素是政府失信承諾。國民政府主張承襲儒家遺產，但是它無力統一國家，不能抵禦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日本，無法維持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很多，並不都是民族主義領導人的過失，他們在恢復民族聲譽和民族獨立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同時又遇到外部勢力的干預。

儒家學說雖然並未因此而受到責難，但是提倡儒家價值觀並不能表明儒家學說對國家的成功有何貢獻，也不能說明它對防止失誤有何作用。從這個角度看，它與時事不相關，並導致這樣一個結論：即它對現代國家毫無用處。

內戰期間和中日戰爭前後，沒有時間來公平地評價儒家學說。那些詆毀儒家學說的人期待着它的衰亡，此時他們可以證

對儒家學說的訴求主要來自兩個方面，而且都是間接的。一個是來自大陸以外的中國人，特別是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非凡的經濟成就。許多中外學者把這些成就歸功於儒家價值的存在，它通過家族結構、教育理念、習俗和企業家精神體現出來。從官方的公開表態中，我們難以明瞭現在的北京領導人在多大程度上贊同這樣的觀點，儘管在政府的支持下已經有幾個關於孔子和儒家學說的會議在中國召開，在省縣基層，傳統習俗的復興則很少被限制，許多證據顯示，地方官員很重視孔子思想對企業家精神的激勵作用，儒家經典著作被重印出版，並且配有白話譯文和注釋。有關哲學和歷史的講座、研討會、座談會經常舉行，在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之下，儒家價值觀被精選之後為現代需要所利用。

另一個訴求來自更深層次，一些知識分子關心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支撐力，丟棄了曾經指導先前幾代幹部的革命觀念以後，什麼理念可以使中國免於陷入唯利是圖的社會呢？在共產黨內經過多年的批孔運動，很難臨時向儒家學說求救，但是遍及全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卻可以抵制依賴外國價值體系的傾向。民族主義越強烈，就越有必要探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尋找新的道德規範來填補文化官員所看到的真空。因此，新民族主義間接導致回歸到歷史上曾經凝聚中華帝國的力量，而這些力量中沒有比儒家學說更值得尊重和重視的了。所以說，民族主義是一種啓示，儒家學說可以賦予它道德內涵，使其受人尊重。

這一點引出一個重要問題，儒家學說是否因為民族主義的復興而面臨第二次機會？它能夠成功嗎？新的儒家學說能否支持現代民族主義？

過去十年中，關於新儒家的爭論十分熱烈，在台灣、大陸和香港的不同層次中展開。有人重新崇拜梁漱溟和馮友蘭的早年著作，重新評估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和錢穆的學術成就。人們也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澤厚以及他對中國傳統思想的再詮釋產生濃厚興趣。在中國以外，像余英時和杜維明等歷史學家的觀點也被人們關注。

在這個層次上，儒家哲學才名正言順，它不再是、也不能是民族主義的伙伴。杜維明提出的“文化中國”的概念在明確儒家思想獨立性方面尤其卓有成效，他強調，儒家學說在與中華民族需求不相關的情況下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這提醒我們一個事實：華人定居海外以後，或者那些非華族，即使不成為民族主義愛國者，但卻可以成為儒家門徒，非華族的人顯然與中國民族主義毫不相干，但是他們如果願意也可以成為儒家。

新儒家可以幫助在中國人中間建立新的認同感，因此它不僅有助於統一領土，而且可以融和台灣、香港和大陸同胞的心靈，“文化中國”的口號也許可以將儒家價值觀同國籍和愛國主義問題分開。這將使儒家學說容易被接納，並為那些實用目的服務，間接地製造出一種文化統一體的感覺，來支持民族主義者的抱負。恢復活力的儒家學說還有另外一種實際作用，它可以幫助中國重造刻苦、忠誠、守法、照顧家庭、意志堅強和值得信賴等品質，這些都是一個繁榮有序的社會所必不可缺少的。

我已經提到過中國大陸以外華人的成功，對海外華人的吸引，都是從親屬關係、家鄉情誼、語言和方言、省籍、神話、傳說、考古和歷史遺址以及其他感情方面入手，不論是吸引他們投資還是旅遊。報刊雜誌的通俗讀物；電影、戲劇、歌劇和舞蹈表演；電子媒介上的談話和討論；學校的新課本，包括新

版三字經，都幫助傳播日益高漲的復興精神。不僅如此，在中國以外，經濟成功與儒家價值觀被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被居住在中國城市中的中產階級所廣泛欣賞。因此，人們還會更多地與那些居住在其他地方的華人比較，既比較生活方式，也比較與儒家學說的聯繫，不管這種聯繫多麼間接。

然而，相互作用也會導致更多矛盾心理，因為多數在別國定居的華人，會表現出許多矛盾特性，這些海外華人或者從居住國、或者從與西方的接觸當中已經吸收了許多別國的價值觀，也許在個人的層面上儒家學說對他們還有影響，但是他們很難把儒家學說與民族主義聯繫起來。在海外華人中間，很難找到清楚的證據可以表現儒家學說與民族主義相輔相成。

讓我回到我的第一個關鍵的問題：現在，民族主義回到中國，儒家學說重新受到尊重，它們之間的衝突已經結束了嗎？從上面我的敘述可以發現，我顯然相信這將成為事實。我這樣說的主要原因是，革命這個詞彙已經被愛國主義所取代，而愛國主義則是民族主義的委婉說法。

愛國主義一旦取代了革命，它與儒家學說便沒有矛盾了，因為儒家學說是構成祖國概念的最重要的思想。如果這一點是正確的，我就可以解答我的下一個問題了：民族主義再也不能否定儒家學說在中國過去與未來的中心地位。同時，我們也要承認，儒家思想並不需依靠民族主義或民族國家才得生存。這個思想體制有它自己的堅忍性和復活力。

* 本文是王賡武教授於1997年6月在新加坡舉行的“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研討會所做的主題演講。

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復興

一 引語

在過去的十年間，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樣的詞彙又在中國再次流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但人們認為主要是由於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降溫，或是因為中國重新崛起於民族國家之林，或許是兩者有力的結合。從民族主義的概念而言，這種徵兆既可視為衰弱和不安的產物，也可同樣認為是力量增強的象徵。再者，孰為因，孰是果，實難區分。到底是因為政府強大了，煥發起民族主義的情感？還是因為衰弱之故而導致國家領導人去求助於民族主義的誘惑？因也好，果亦罷，該詞本身就足以激起歷史漣漪，一旦提及即可喚起對曾遭受的侵略和不合理壓迫的恐懼心。

當中國政府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演習時，西方世界對中國民族主義崛起的評論甚囂塵上；當中國認為台灣問題只是早年内戰遺留下來的內部事務，而使用強烈的語言時，這類評論更是達到了頂峰。竟有評論者將此比擬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德日兩國的民族主義都是在本世紀早期形成的，那時中國為了反對帝國主義而轉向蘇聯共產主義

去尋求啓示。對中國人而言，如若那時的啓示現在來個 180 度的大轉彎，變成構成侵略意圖的起因，則將是莫大的譏諷。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西方政治和學術研討中，民族主義一直只有負面形象。只是在一些後殖民地發展中國家民族主義才有個比較正面的意義，用來象徵自尊和團結以及那些殖民地人民所從未有過的堅強意志。人們也往往利用這種民族主義把渙散的民衆團結在一起，以期創建新的國家。民族主義在開始階段又總是盡力自衛，但隨着時間的流逝，那些新建的民族國家大多會很快成熟起來。至此，該詞雖然還能喚起一些熱情，但是原有的那種洶湧澎湃的激情已經不復存在。但是爲什麼當運用到中國的時候又會讓人聯想起令人擔心的強權政治呢？

顯而易見，中國的國土廣大，人口衆多，有赫赫帝國的昔日風采再加上它的巨大需求，都足以令人產生疑懼，何況近年來在鄧小平的改革政策引導下，其經濟表現極佳；沿海省份在港台企業家和來自海外的其它華商投資的刺激下，反應積極並取得了幾乎令人無法置信的成就。況且，還感覺有個大中華（有時也稱作華人共同體）在不斷成長中，即使它不是全球性的，也起碼是個地區概念。儘管它是一種經濟上的聯繫，但也代表了起源於南方沿海一帶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的衝擊力。這部分中國人長期以來總是放眼遠隔重洋的他處尋求生活的出路和家庭的繁榮。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它是內陸農村中國。它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反映了傳統官吏和文人學士的價值觀，但往往通過農民對文化變革的猜忌和疑惑抒發出來。就這部分沉默的多數派來說，過去十年的經濟奇跡對他們還很遙遠，甚至可以

說是力所難及。他們認爲所有發展是由海外外力造成的，並且僅僅是在沿海地區和一些大城市中才能享受發展帶來的各種好處。伴隨而至的是這些地區和內地之間在生活水準上的明顯差距，以及道德文明的下降。如果把窮鄉僻壤地區的內心激情喚醒起來，將會引發的是完全不同的回憶和感覺。

外部世界所看到的民族主義的擡頭是多方面的。而在中國本身內部，並無任何民族主義的高漲激情，反而有不少懷疑和擔憂的看法。和招喚愛國主義形成鮮明反差的，恰恰就是有人指出民族主義的極大危險性並加以嚴肅的質問，至少掛着某些招牌的民族主義的確是極其有害的。舉例而言，有人曾說過：¹ “民族主義可能對外對付不了西方，對內引發少數民族分離，成爲一把傷己不傷人的雙刃劍。”

另外再舉一個“理性民族主義”倡導者的例子，² 他說：“狹隘的民族主義要求中國放棄對外開放制度變革，並通過堅強中國特有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來與西方相抗衡。在我看來，這樣的中國是一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足可自慰而大幅度犧牲民族的整體和實際利益的中國。”

上述兩個聲音來自於上海和香港的青年知識分子，這一點也許不能算作偶然的巧合。中國人對此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因爲思考其更深一層的來龍去脈促使我舉筆探討本文的主題：“民族主義在中國的重新擡頭”。

二 復興型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往往還用名詞或形容詞加以修飾，最常見的無非是在它之前有個國家或地區的名稱，或者在前面還有個把自己

看作是這個或那個民族的人民。爲了其它目的，還可用類別形容詞，普通常見的就例如有什麼政治的、經濟的，和語言學的民族主義，而且更有宗教的、發展型的、跨國性的、思想的、文化的、歷史的、革命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在本世紀的這個或那個時刻，這些用法中有一部分，都曾在中國逐一使用過。但沒有一個曾得以保持長期的激情。只有一種文化和歷史性的民族主義形式似乎可以持之以恆並加以發揚光大。它並不是中國人所特有的，但由於它的獨特之處使之與衆不同。基於我後面所要解釋的原因，我把它稱之爲復興型民族主義。安瑟尼·史密斯用了兩個詞來勾劃各種形式的後獨立民族主義。其中之一是“維護”，而另一個則是“新興”。他用第二個來說明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各種民族主義。³ 我所概之爲復興型的民族主義結合了維護和新興兩個因素，把對光榮的過去所持有的真摯信念和對偉大未來的期望更直接地聯繫在一起。

復興型民族主義擁有好幾個方面。最常見的無非是涉及政體的問題，強調收復主權，統一被分割的領土和維護國家的自尊。另一個就是文明的面目，它強調道德規範並且要保持或重新發現傳統的價值觀。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就是要追溯孔孟之道，再加上一些通俗的宗教禮習，其中最重要的往往是佛教和道教的那一套。在中國的精英分子中，他們真要恢復的是關注並普及近來稱之的“文化中國”。⁴ 可是它也有個負面，渴望主宰其它民族，還對昔日赫赫帝國的風采戀戀不捨。最後還有週邊性和象徵性的一面，主要寄寓於那些僑居在中國之外的華人，他們的財富甚至於生存都被視爲和中國的繁榮富強休戚相關。

這些復興主義者所敦促的是希望把未來和廣爲人羨的過去聯繫起來，並且要求重點突出一個民族的認同感和連續感。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曾多次借助復興的形象出現，並在前十年中又反復重演。正如前面所述，這種復興型民族主義有多個面目。其中最爲重要的我可以在下面很好地總結一下，並用作本文的題材，內容選自一百年之前孫中山在1896年寫給翟理思的信：“擬驅除殘賊，再造中華，以復三代之軌，而步泰西之法，使萬姓超蘇，庶物昌運，此則應天順人作也。”

當時，孫中山剛從倫敦的中國公使館放出來不久。孫中山的這些話是爲了應翟理思的要求爲其《中國名人傳記》一書提供資料而寫的，此書後來於1898年出版。⁵

當前，論述民族主義的概念的模糊性的文獻比比皆是。⁶ 喬納森·恩格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近期論文專集(1996年)探討了哪些力量能對中國領導人和普通民衆起到推動作用。這些力量的範圍之廣，充分說明了無論是中國的文明史也好，過去的封建王朝也好，有潛力而同時又同一般的民族相異也好，或者作爲一個對廣大民衆具有吸引力的革命政權也罷，都有其中國的特色。我本人於1995年所著的拙作《中國之途》，對這些從外界所看到的構思進行了探討。其他的學者也強調了中國民族主義這一概念的局限性和矛盾性，並對這一切提出了嚴肅的異議。

這裏，還必須從歷史的淵源途徑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多層面性質加以闡明。人們往往有能力分析甚至能成功地剖解這個複雜的思維結構和形象組合，可是要把這些衆多層面對中國人民

的全部影響完全表達清楚的最佳方法還是要認真調查在那個特定時刻的國家情況，造成其領導者及人民群眾分裂或團結起來的分歧或原因是什麼，以及當時外界又對他們施加了什麼樣的壓力，等等。在這麼多的層面中——反清、排外、自強、反帝、復興、以及法西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等——不管利用哪一個來執行具體的任務，均可說成是代表了當時的民族主義。每個層次都至少可以用以下幾個問題進行驗證：源自何處？有何吸引力？最大的驅動力是什麼？怎樣才能促使它變得危險起來？怎樣才能使它受到挫折？而且，重要的是還可同樣問一下：在當時能有多大的效果並能保持多久？

三 多層面的中國民族主義

在過去的五年間，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曾不斷地展示各自的民族主義，並產生了不同的反響。許多國家對台灣“民族主義”的表現顯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和猜疑。然而，在談到中國，外界對它的反應幾乎達到了歇斯底裏的程度。中國所顯示的民族主義被冠以一大堆的修飾語，諸如：直覺本能的、武斷自信的、尋釁逼人的、狂妄自大的、恃強凌弱的、獨斷專行的、仇視外夷的、收復領土的、擴張領土的、有領土野心的、反動的，等等。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外界對中國的民族主義產生如此強烈的反應呢？

就其主導形式來說，人們看看歷史就會感到熟悉。它源自於1989年以來的蘇維埃帝國的解體，⁷同時也來源於該事件對中國政府體制所帶來的衝擊。⁸蘇聯的解體是誰也始料未及的，

它讓中國領導知道俄國人的改革方案出了毛病，中國卻找到了更好的方法，但這一點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多大的欣慰。正因為是出人意料之外而且又是災難深重，這個事件使許多中國人回想起了他們自己的歷史，想起了清朝末年的那些動盪的歲月，還有對其國家主權和中華文明本身所帶來的威脅。中華民國垮臺後，許多當前在位的領導人至今還活生生地記得民國政府從1911年至1949年間為建設道德或政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如何失敗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有兩個因素尤為突出。首先，有人認為在經歷了幾次內戰以後，中國曾經達到過部分的統一。再者，還有一種普遍性的文化失落感，中國人被擠在傳統與現代兩者之間的夾縫中。按本人之見，這兩者還促使另一個因素的呈現，即內陸對沿海地區所代表的開放和先進的物質主義所持的反應，這也說明為何回歸復興型的民族主義並非平直坦途。

從上述孫中山的引語出發，我們可以理解這種現象。從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通過外來影響成立起來的政黨——興中會中可以找到線索，該會是由孫中山及其香山縣（現為中山縣）的一批追隨者一起於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創建。上文是在興中會成立兩年後才有，但確實反映了黨章中的主要觀點“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而且還概括地集中體現在黨員的誓詞中：“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這種含糊措詞都是受美國共和民主所啓發）。我們大家都知道興中會的黨員人數極少。其成員正如馬丁·威爾伯所描寫的，均係“商人、小業主、廚師、職員、裁縫、勞工、農友和地方政府的小職員”。⁹他們所代表的傳統與其說是接近我們熟悉的任何現代政黨，倒不如說是更相

似於反清復明的秘密幫會——三合會。單憑其本身，興中會和它的所有分會都無法有多大的能量，但是孫中山和他那些普通的支持者所說的話，的確抓住了海外華人心底裏的強烈感情，也深深打動了在中國沿海生活的中國人的心，這些人和西方人有着直接的聯繫，也懂得西方的成就和力量。那種感情也許開始於週邊地區，但是毫無疑問是帶有國民性的普遍意義。

他們所缺的是歐洲所理解的民族的那種概念，此詞幾年後直到梁啟超把日文中的 minzoku 一詞引入漢語才有。正因為如此，中文裏的“民族”從一開始就有一股強烈的種族的味道。¹⁰它是和興中會宣言裏的“驅除韃虜”貼切吻合。一旦這個概念說了出來，就自然地融入了民族主義的政治之中，並藉以推翻了滿洲政權。這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的第一條，也是1928年後國民黨統治之下進行整個民族主義教育的基礎。¹¹三民主義隨即成爲南京民國政府的精神支柱，而且還隨後和該政府一起在1949年移往台灣。

雖然毛澤東在談起孫中山時一直彬彬有禮，可是毛在世時期民族主義一詞在中國的國土上是很少使用的。只是從鄧小平開始經濟改革以來，民族主義的言論變得可以被人接受，孫中山再次受人尊重，民族主義的思想才再一次出現在公衆的言談之中。但是，在中國“民族”一詞還是有極大的敏感性，至今官方用法也只局限於愛國主義本身，其含意是愛國家或愛政府，而不是指民族主義中的民族概念。

引起廣泛關注的正是這種愛國主義，因爲人們認爲它是民族主義的委婉語而已。我本人所定義的復興型的民族主義也正是指這一層的愛國覺醒和激情。今天，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容

也就是這個意思，並在特定的時刻用來完成某個特定的任務。這個意思或許可以被台灣的許多中國人和海外的華人所接受，但它又和台灣所講的“民族主義”的內容有着明顯的區分，也和中國之外的華人所經歷過的民族主義有差異。這部分華人往往已經改換成外國國籍，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國民環境之中。這種復興型民族主義到底來自何方？又有何吸引力呢？

四 復興型民族主義的起源及其吸引力

在中國國內，它源自於馬列主義理論在實踐中已經失敗，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鄧小平嘗試把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恢復到五十年代大躍進以前的情況，用意是要安慰他的黨內的同志，尤其是他那一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深受其害的人，但顯然這次改革比他許多同代人所期望的更爲廣泛深刻。

改革所帶來的那些變化觸及到共產黨一直視爲神聖的領地，尤其是政治改革和官僚統治的放鬆兩方面。¹²學習外國的熱浪以及它對馬列主義思想的衝擊變得使人越來越感到不安。至於社會公共道德方面，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共產黨的傳統紀律再也無法控制往金錢和物質貪婪對人的誘惑力。¹³自然和應用科學教育的進展也不可避免地犧牲了政治上的“紅色”。只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裏還算可以守住防線，即便如此也只是在一定的範圍內才有效。至於在文學和藝術方面，人們對新事物的渴望是如此之強烈以致外來的思想如同洪水一般地湧入乾涸的平川。政府只得依賴嚴厲的手段來抑制年輕一代受到高度刺激而激發的想像力。¹⁴

接踵而來的是高度不確定性，尤其是那些並沒有從經濟改革中得到多大好處的人們，感到沒有生活保障還失去了尊嚴。這樣就出現了一種新的情況，各種各樣試圖恢復以往的想法都露了頭。誠然，所有的想法還不成熟也還沒有什麼明確的方向，但是包括的範圍卻很廣：從各種老百姓的想法來看，有一定程度地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構架，到恢復傳統的價值觀，不管是孔孟之道或道教或佛教教義。¹⁵ 在眾多的具有吸引力的復興論點中，普遍認為台灣和祖國大陸的分離現在應是個嚴重的問題了，中國統一的問題至今尚未完成。

所有這一切還有個外部的情况，有些較明顯，另一些則不那麼明顯。當然也可以充分說明是外界對中國事務的干涉。例如，恢復毛澤東主義的觀點就能得到不少回響。它不僅使我們想起1861-1874年同治中興時期號召復興孔學價值觀，而且還回想起不久前在俄羅斯及前蘇聯地區出現的號召恢復舊的社會主義體制的情況。對於俄羅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近期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基於不同的原因當然也會有不同的反應。但是有一個類似的共同情感則是對以往那種相對安定的生活的懷念。此外，也有儒學及傳統價值觀本身所有的吸引力。開始時一切都由於日本和四小龍的東亞經濟奇跡的吸引力所造成，但同時也因為得到中國的一些領導人出於社會、道德、甚至因為文化精神方面的考慮所給予的支持，我們從最近召開的國際孔子研究會的成立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講到台灣問題，由於李登輝先生尋求更多的國際空間的努力，促使中國的領導人意識到人們對台灣的“民族成就”的羨慕正好暴露了中國大陸的弱點。中國應該如何應付越來越多的

台灣人由於經濟建設的成績和民主改革的進展所造成的不斷增長的主權要求呢？這樣就講到了第二個問題，這一層次的民族主義為什麼會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呢？

五 復興型民族主義的驅動力

復興思想的現代歷史給我們提供了答案。我剛才提到了孫中山在倫敦以及在興中會裏的情況。那種情況已經超越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改良主義運動，也超過了同治中興時期自強運動所做的一切。對太平天國起義的記憶、美法兩國革命的先例、以及在這之前的十年間滿清政府受到英法日等國的百般蹂躪等等，所有這一切都讓復興主義者堅信必須使用暴力才能推翻一個顯然已經腐敗不堪的政權。一個共同的目的已經形成，要把復興國家的尊嚴、力量和繁榮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

對比之下，任何其它的復興主義主張都失去了吸引力，例如：1915年袁世凱恢復君主制和1917年恢復清帝統治都得不到任何的支持。在民國政府的最初二十年內，關於台灣回歸中國治理的任何言論都被認為是不成熟的，甚至是根本不現實的。那時的中國政府還無暇應付日本對中國大陸領土的不斷進犯。的確，一提到那段時期，中國政府拋棄了台灣人民，不再關注他們的未來，當今中國領導者就會想到台灣的丟失完全是歷史上帝國主義炮艦政策的可恥的一頁，是中國過去受人欺壓的一頁，也是中國孤獨無助的一頁。這樣就突出說明台灣回歸中國，是中國人所堅信的恢復國家尊嚴和民族自豪感的最終未盡職責。

只是在恢復儒學的那段濁亂的年代裏，南京政府中才會有一部分人認為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民國政府在三十年代所開展的新生活運動並不受人歡迎，實行得也很差。¹⁶運動的失敗僅僅證明任何恢復儒學作為國教的嘗試都會遇到極大的阻力。政府最希望得到支持的、那些城市裏受過教育的階層，由於接受了大量西方的文明思想的熏陶，對於恢復傳統價值這類主張報以極深的猜疑。

簡而言之，並非任何復興主張都具有誘惑力，所有其它的復興主張都比不過恢復漢族中國人統治所具有的無比魅力，這就是恢復主權（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爭取獨立、團結和統一的鬥爭。孫中山及其領導的政黨所代表的正是這一切。進行1911年和1949年革命的黨派也是依靠了這些事業所賦予的力量。至今，復興的偉業已經大部完成，剩下未竟的只是統一大業和今後道德規範的確立。就統一而言，1997年的香港和1999年的澳門回歸以後，中國領導人就只有從兩個途徑中來選擇其一了：給予台灣特殊的地位或不惜以生命來換取收復台灣。

外界的因素仍然非常重要。毛澤東在1949年曾決定採取一邊倒的依靠蘇聯的政策，這樣導致中國介入了朝鮮戰爭，也造成美國承諾長期支持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毛澤東可能一直認為他只不過是暫時拖延對國民黨的內戰，可以說完全就像歷史上的類似實例——滿清王朝實足等了四十年之後才收回台灣。毛沒有估計到會在六十年代的初期要和蘇聯的威脅對抗，更沒有想到到了七十年代會被迫倒向美國一邊；還有在他死後，他的接班人會在七十年代的末期放棄中央計劃經濟架構。

七十年代在美國的直接支持下，幾個外交上的勝利加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尤其是恢復在聯合國中的地位。但是，台灣在經濟上的成就也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台灣還在不斷地拓展其國際空間。北京的領導人一定在不斷琢磨怎樣才能重新統一中國問題。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也認識到過去使用的征服和迫降的手段已經無濟於事了；但是，要想出新的可以讓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則需要領導人能拿出更大的膽略和更開闊的思路。

面對這個難題，在百思不解之時，會出現極度的不安，促使他們訴諸於復興民族主義。為此，我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在什麼情況下它會變得危險起來，並且如何才能控制它？

六 民族主義復興的危險及其對策

不少歷史實例證明，一旦當中國恢復主權、繁榮及勢力的嘗試受到阻擾，民族主義就很容易被鼓動起來。從1912至1927年的中華民國早期，民族主義到達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煥發出了最為強烈的感情。¹⁷所有的參與者都使自己極度膨脹，都想表現得比其它任何人更為民族主義化，也就是更為反對帝國主義。事實上，每批領導班底也的確必須比他人更拼命地民族主義化。由於蔣介石在對日問題上表現軟弱，他失去了對付共產黨人的許多優勢；反之，雖然很明顯共產黨的思想也來自外國，可是在表現自己方面卻做得很好，成為真正的愛國者，它所追求的事業就是要恢復中國應有的雄偉。¹⁸日本人是想在1932年後通過其傀儡在滿洲恢復滿族王朝的統治，中國人自然

想到距離祖國恢復應有尊嚴的時日是何等的遙遠。中國領導人沒有能團結起來反對日本的放肆侵犯，對於嗣後的領導者而言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慘痛教訓。在有這麼一連串失敗記錄的情況下，再要出現外界對中國內部事務有任何干涉時，自然會激起民衆的憤慨。當群情激昂時，領導人知道只要反應稍有遲緩，就會被群衆認爲是玩忽職守、膽怯或背叛。唯一可以讓人接受的藉口是軍事行動，不能貿然採取或隨便施用報復，只有在迫於無奈的緊急情況下方可考慮。他們會得出不快的結論，除非能夠通過和平協商解決，否則統一大業只能往後推延。

目前復興型民族主義的重新擡頭並非由於通常外國干涉的威脅所造成。就其外部環境而言，它是因爲中國的全方位地對外開放所引起的。在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之下，這種開放勢必導致中央對財政、稅收和其它關鍵的決策部門的控制明顯地受到削弱。這對中國是一個新的經驗。在過去，中國的任何削弱都來自戰爭中的敗北而不是其它別的原因。1949年以前的共和統治時期，這種削弱更是嚴重，中國完全沒有自己的統一意志或力量去做什麼大事。

有些人也許會說，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倒是面對過一些新的干預——來自西方的帝國主義文化入侵。對此，南京政府看來毫無對策。這裏所談的是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道德價值觀這一層次，甚至也包括來源於西方的敵對宣傳。另一種干預來自蘇聯，它試圖建立一個敵對的政黨，並影響這個黨來塑造一代極端革命分子。由於南京政府實施粗暴的政策和政治管理上的不善，它終於無法壓制共產黨的活動。這裏，對於今天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們也許會有一些方面教訓可作借鑒。他們

中間有人總是擔心美國某些勢力深恐自己的稱霸野心不久就會受到挑戰，而妄圖破壞中國使自己繁榮富強的經濟政策。

無論如何，從美中今日的關係來看，外來的干涉對復興型民族主義還是次要的，而且也可以加以遏制，實際上中國也採取了多種措施明確國家利益的敏感方面以預防外國干涉，例如：宣佈多種活動爲非法，取締極端政治和宗教組織，以及抓緊控制一切和國家安全及防衛有關的事情包括台灣獨立問題和華東華南沿海的特區等等。

近期的一些內部變化實際上更爲重要。經濟改革越成功，對目前政治體制的威脅也就越大。鄧小平的大膽改革要求共產黨改變自己體制中的僵硬和缺乏工作效率的狀況，並從中央計劃的“死手”轉移到“有形手”和“無形手”兩者的新型結合。放鬆控制所釋放出來的能量大大超出人們的預料。發展是不平衡的，受惠的沿海地區比之較受冷落的內地的發展要快得多。由於不少政府部門沒能趕上發展的速度，致使實干能闖和大膽的人受益匪淺，遺憾的是那些貪婪無厭和貪污腐敗之徒也趕着分享杯羹。因之，在廣大民衆中存在着一種心態或情緒——渴望堅強的指導、要求控制發展、甚至滋生了戀舊情結，懷念過去那些安定而又無所牽掛的歲月。

一切都促使一種與衆不同的復興型民族主義的出現：國家需要拯救，爲此應該回到更好的計劃經濟，更嚴格地制止道德敗壞和罪惡行徑；其中應包括內地和沿海地區之間日益擴大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必須得到糾正。對復興的需求也清楚表明這種復興有着時間和空間上的更深一層內涵——意即要恢復中國一直固有的那種大陸性世界觀。按照這種世界觀，海洋地域的利益

上：台灣回歸祖國和復興“大傳統”中的精華之髓。這裏我談談第四個問題，也就是這一次民族主義的效果有多大，今天這種復興吸引力又有多大的合理性？

七 復興型民族主義的有效性及其正當合理性

我在一開始就說過復興型民族主義只是現代中國所經歷過的民族主義中的一個層面。現在再回到孫中山寫給翟理思的那封信，信裏所提的一些民族主義思想在過去的一百年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和修正。在驅除了滿清以後，緊接着就是消滅一切帝國主義。然後，又擴展到所有的主權問題：滿清王朝所遺留下來的領土問題以及失去了的香港領地和台灣問題等。引用孫中山的話，再造中華成了下一個目標。這個目標代表了民族主義的一個不同的層面，它強調政府在民族建設中的作用。孫中山逝世以後的數十年來，民族主義的成長經歷了幾個階段，隨着工商業的興起，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切反過來又培養了大批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使農業生產逐漸現代化起來，能夠生產足夠的糧食供給和本世紀開始時相比增長了近三倍的人口。除此之外，這些進步也為增強人民身體健康，提高平均壽命，消除文盲和改善其它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努力打下了牢固的基礎。每項工作都稱得上成績斐然。

但是，這裏並沒有考慮更為敏感的種族民族主義方面的問題，它們可以直接威脅到整個民族重建理想的本身。中華人民共和國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它承認除了漢族中國人以外的其它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存在。²⁰ 只要政府容許有

總是狹隘而又利己，沿海的炎黃子孫在歷史上的各種表現就以證明這一點。來自中央朝廷的官吏士卒從來就對週邊地帶的那些熱忱的買賣人存有戒心。到了現代，農民革命家打敗了沿海的民國政府的領導，又證明了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現象又再一次地說明了這一點。有一種內在的往大陸中國的歷史地位牽拉的向心磁力，盼望着恢復其凌駕於比較富有的沿海中國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這裏也包括了對以香港和台灣為代表的極端豪富的統治。

復興型民族主義的其它一些吸引力就比較容易得到阻遏。要求恢復傳統價值觀以抗衡腐朽的西方意識四處迅速蔓延的呼聲正在不斷高漲（當前圍繞着胡國亨 [Henry K.H. Woo] 的新書《獨共南山守中國》（1995），正在開展的一場辯論是新儒學研究盛行的復興主義的有趣延伸）。然而，令人懷疑的是，僅僅憑藉傳授古典文學和思想作為對付現代外國的價值觀的一種道德上的解毒藥是否就能管用？但是為了目標明確，還是可以利用不少文化遺產作為備用手段重新出示，以促使中國人找到自己的定位同時恢復它那無愧為偉大文明旗手的應有尊嚴。誠然，為了合情合理地使用過去的一套來衡量現代的可取之處，也可以利用民族主義作為工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區之外，有一些華族傳統正在得以重新評估並加以現代化，可以先從這些開始，尤其對於那些熟悉中國內外情況的學者所做的工作更可以拿來作為起點。¹⁹

事實上，當一個國家團結統一和領導堅強以後，民族主義者說他們所要的就是這一切，人民也就沒有什麼需要再恢復的了。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主義集中表現在兩個問題

可能的事是回來有選擇地接受西方方式，作為促使中華文明現代化、再展雄偉的一種手段。然而，爭論的焦點在於這種選擇是否應該經過更好地瞭解西方方式後反而更深地依賴西方方式呢？還是經過努力後，再造就永不衰竭的中華價值觀的重生？

在有選擇地復興的號召之下，眼前展現的是一幅比孫中山所描繪的還要開闊的復興藍圖。這幅藍圖的基礎是有保障的疆土、不斷增加的繁榮以及對全國各民族大團結的堅定意念。毛澤東在1949年開始時曾擁有這一復興藍圖的許多組成部分，可是他過急地想讓中國盡快重操權力與影響的殊榮，他是不達領導世界革命的頂峰而決不肯罷休的人。這是處在最浪漫和尼采式階段的復興型民族主義，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被人拋棄。在中國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中間，還有一些殘餘的想法存在，希望中國今天所進行的經濟改革試驗不僅僅單純為了在中國維持政權，而且可以為本地區甚至於全世界的其它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範例。²³

無可置疑，這種信念完全是中國的知識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台灣分開存在，而且還蓬勃發展，這自然會礙手礙腳——一個獨立的台灣更會嚴重毀損整個信念。這樣，把台灣融合進來所代表的小復興對於完成中國歷史的連續性這個大復興而言就十分關鍵。我現在接着要談的正是和這個大發展有關的幾個起抵消作用的趨勢。

八 起抵消作用的趨勢

我已經提到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民族主義所經歷過的歷程。在五十年代，對全體中國人而言至少在三個方面掀開

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民族社會存在，這些少數民族中的大多數並不會對整個民族國家的大局增添什麼麻煩。但是西藏、蒙古和新疆的穆斯林地區都是民族建設可能遭到挫折的典型地帶，尤其有外來勢力染指或甚至受到要求前來干涉時，局面就會更加棘手。

可是請再看孫中山信中的第二句話：“以復三代之軌，而步泰西之法”。在談論以復三代之軌的問題上，孫中山並非孤軍奮戰。他在進行此項工作的同時還協同進行循西方之道的任務，可謂反映了他那時代的許多學者和官員的情感。而在處理古人與現代西方兩者孰急孰緩上，他們優先考慮學習現代西方，在這一點上他們較之馮桂芬和張之洞要走得更遠一些；但是又比不上像香港的鄭觀應、何啟及胡禮垣那樣激進，後者極力主張轉向更大程度的西方化。²¹ 那種權衡中西價值觀後而採取的某種中立立場在滿清王朝倒臺之後也大多遭到拋棄。到了1919年，隨着五四運動的發生，恢復“民族精髓”的觀點受到猛烈的挑戰，所有那些反對民國政府的人都已或多或少地放棄了這種主張。在年輕一代中間更是自願西化成風，大大超過了孫中山所願看到的程度。²²

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把主要精力放在利用蘇共馬列實行共產主義革命，對於那些仍活躍在普通民間的而且是有意義的各種傳統習俗的推廣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到了今天，經過四十年的政治思想灌輸，在大陸年輕人中還想真正恢復過去的秩序和體制的人已經是寥若辰星。儘管哀嘆資本主義價值觀今天到處泛濫，但號召復興民族主義思想和價值觀的呼聲卻一直是微乎其微。令人生疑的是否真會發生什麼復興三代之軌一類的重大運動，或者一旦真的發生了，是否會得到多少支持。較之更

了新的一頁。首先，殖民主義的結束迫使大多數身在東南亞的華僑從兩者中作一抉擇：要麼當中國的國民；或者成為由原先的歐洲殖民地演變而成的新興國家的潛在國民。這種抉擇使許多既想要留在這些新興國家而又同時不願意放棄中國國民資格的人頗費躊躇，帶來了很多的苦惱；但是，遲早還是要作出抉擇。許多受過華校教育的年輕人選擇了愛國主義，投奔中國。也有其它人則樂意在當地自然歸化，更有人決定再移往其它一些看來比較能夠容忍中國習俗的國家。對不少人來說都有一個決定性的悟覺——台灣的中華民國算是完了；可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扯在一起又有成為共產分子的意思。且不顧原因是什麼，包括樂意忠於他們已經選擇了在那裏生活下去的新生的民族國家在內，所有一切的決定都經受過和堅強的信念進行徹底決裂這個過程，其中也有復興型民族主義的信念。一旦突破了這個龐然大物的自我防衛屏障，仍想在這個地區當中國人就永遠無法如同以往了。²⁴

其次，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逐漸終止它們移民政策中的種族歧視分類；這樣在多文化的而且也可能是多民族的國家裏，導致對種族認同性的重新定義。這一點更為微妙、還更難抗拒。產生了和現代中國復興型民族主義文化毫不相干的新層面的民族主義覺悟。伴隨它們而至的是由於移民條例的放鬆，為數更多的中國人被容許進入這些國家，並最終獲得當地的國民身分。現在存在着一種中間狀態，做出決定以後所造成的永久結果並非是個簡單的是或否的問題，而是一種即便不是鼓勵但也至少是容忍的狀態，即各色各樣的民族特性均可共存。某些西方國家認為政治忠誠的移情需

要時間，這不僅僅是人之常情而且也是明智的選擇；因此，它們把這一切視作民族主義的成熟和有自信心的一部分。這種看法和中國人對於民族主義的信仰截然不同，²⁵ 他們不習慣各不同政體之間的任何相互忍讓，一開始就會疑惑重重，甚至還會牢騷滿腹，或者就乾脆隨機應變。但是，所有的人都明白一點：民族主義再也不像過去所理解的那樣排斥異己，也沒有那麼多洶湧澎湃的感情了。只要景況合符情理，就有改變的自由。至於中國人對這些變化有什麼反應還有待於進一步敘述，但有一點可以完全相信，那就是即便那些靠着復興型民族主義滋育長大的人中，也有人在情結上感到鬆了一大口氣。

再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兩個都帶有中國名稱的政體，他們的同時並存造成了民族的正統合法的新問題。實際上，在整個五十年代期間雙方都把爭取海外華人視為重要的工作，作為衡量政府“天命”的尺度。後來，事情已經十分清楚，大多數華人已經選擇了別的國籍，就有人多方努力試圖為華人的含義下定義或再定義。儘管如此，海外華人到底嚮往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一直是活生生地留在人們心頭的牽掛。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市場經濟贏得了人們新的敬重，作為反響又一次燃起了爭取外國華人的新烽火。作為一個反措施，台灣政府也再次堅強它同這些華人的聯繫，而且還加緊活動設法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持。

這裏雙方在拉攏支持上發生截然不同的變化。對台灣而言，它一旦決定放棄收復大陸，復興型民族主義對它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所剩下的充其量只是古典傳統裏的文化象徵，包括接受儒學、佛教和道教文化、再有孫中山所領導的 1911 年辛

亥革命的淵源聯繫。可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問題正好相反。兩岸統一的問題是其復興型民族主義的核心。收復台灣不僅是它的合法性構架的一個基本部分，即至高無上的大陸利益；而且也是防禦外來威脅、捍衛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邊疆的最佳手段。1995-1996年間，海峽兩岸關係的緊張變化證明了對台灣命運的這種看法至今尚能產生的情感衝擊力。

然而，對台灣人民來說，時間並沒有停頓下來。他們的經濟成績伴隨着廣泛的政治改革已經引導他們遠離中國民族主義的廣義概念。²⁶ 替而代之的是探索國家地位的性質和民族建設的過程，這一切對台灣的關係要更為密切。現在尚且猶豫不決的是民族及文化的最終特性到底是什麼。也有強大的壓力迫使這些事情的處理必須低調進行，還要防止被懷疑在企圖尋求新的國家身分。毋庸置疑的是從政體和領土的角度來衡量，像復興型民族主義那樣的歷史吸引力已經大大地失勢隱退了。只是在文化欣賞和重建方面，復興的主題還仍然具有活力。至今仍然留在議事日程上的是孫中山的願望“以復三代之軌，而步泰西之法”。²⁷ 現在來斷言此事是否象徵過於現實或許還為時尚早。

九 結束語

在以上簡要總結的所有三個方面，中國的民族主義都受到了質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華人中間出現了不同於大陸本土的各種形態的民族主義。當然，只要大陸的復興型民族主義繼續活躍下去，多數人的觀點會從民族的利益出發，要不時

地把它喚醒。但是，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吸引力可以明顯地看出再也不是那麼強大了，尤其以台灣而言情況更是如此。不過在面對外來壓力時，也不應過低地估計其號召力。

最後，讓我回到外部力量的問題。很顯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隔鄰的一些小國肯定會小心謹慎地關注中國對民族主義的一套說法。他們也需要得到連續不斷的安慰，目前各種形式的復興型民族主義不會針對他們。他們也要向中國承諾，各種區域化的努力，無論是亞細安還是亞太經合組織，或者任何其它的區域組織，都不是針對中國人。此外還有與之競爭的各種民族主義，各自的民族建設計劃的目的與雄心都需要盡可能地透明。總之，在今後的一個長時期內，無論哪個區域沒有美國都不行。這個區域又要美國不在本區域內稱霸才能得以放心。所有的一切同時又取決於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復興型民族主義停留在其歷史的架構中時可能是一個正面的力量，可以增強人們的信心與願望。可是如果被遏制的叫罵把它捅了出來，被隱藏的仇恨把它激怒了起來，甚至被近似歇斯底裏的發作把它感染了，它也同樣可以引發匹配絕倫的感情。不會有任何人，絕對不會有華人，能從中受益。

* 本文最初以專題論文 (Working Paper) 的形式發表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第1期 (1998年4月3日)。

注釋

- 1 葛劍雄，〈民族主義是救國靈丹？〉《亞洲週刊》（1996年4月21日）頁14。
- 2 吳國光，民族主義之文章，《二十一世紀》，輯23（1996年）：頁30。
- 3 A.D. Smith,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 Duckworth, 1971), p. 224.
- 4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Daedalu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Spring 1991); reprinted in Tu Wei-ming, ed.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34.
- 5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輯1（北京，1981），頁46-48。該信並沒具明日期，但翟理思認為應寫於1896年的11月。
- 6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Y.: Colliet, 1944); Karl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 E. Kedourie, *Nationalism* (4th expanded ed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3, originally published 1960); Rupert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Eugene Kamenka, ed. *Nationalism: The Nature and Education of an Idea*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i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Editions and New Left Books, 1983);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 7 Miron Rezun, *Nationalism and the Breakup of an Empire: Russia and its Periphe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2); A.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Mass.: Polity Press, 1995); Montserrat Guibernau, *Nationalisms: The Nation-Stat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6).
- 8 Peter Nolan, *China's Rise, Russia's Fall: Politics, Economics and Planning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linism* (Basingstoke, Hants.: Macmillan, 1995).
- 9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3.
- 10 Frank Diko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1 Cyrus H. Peake,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2).
- 12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13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報告》1996年3月；《法制日報》1996年。
- 14 Geremie Barme and Linda Jaivin, eds. *New Ghosts, Old Dreams: Chinese Rebel Voices* (N.Y.: Random House, 1992); Geremie R. Barme, "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 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 in *Chinese Nationalism*, ed. Jonathan Unger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 15 梁曉聲，《誰是醜陋的中國人——九三斷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Lin Min, "Moral Crusader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Case of Liang Xiaosheng", *Issues and Studies*, 31.10 (October 1995): 54-78.
- 16 John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if.: Published for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17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F. Gilbert Chan and Thomas H. Etzold, eds. *China in the 1920s: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N.Y.: New Viewpoints, 1976); Arthur 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8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19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omas A. Metzger, *Transcending the West: Mao's Vis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Teng Hsiao-ping's Modernization Program*, Hoover Essays No. 15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 20 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1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22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 23 Wang Gungwu, *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4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 25 Wang Gungwu, "Migration and Its Enemies", in *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 eds. Bruce Mazlish and Ralph Buultje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pp. 131-151.
- 26 Peter R. Moody, Jr., *Political Change on Taiwan: A Study of Ruling Party Adaptability* (N.Y.: Praeger, 1992); Gary Klintworth, *New Taiwan, New China: Taiwan's Changing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Melbourne: Longman, 1995).
- 27 請參閱 1994 年在台北所舉行的“中國的分與合”的大辯論，見《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5)。

== 民族主義、族群性與亞太區域 ==

在尋求迅速實現現代化的民族國家中，族群性 (Ethnicity) 與民族主義之間存在明顯的緊張關係。然而，通過協商一致化解這些緊張關係有助於民族的構建。國家總是要反映其佔支配地位的多數種族的意願，但是，在尋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步驟要循序漸進，行動要適度。過去，各國在以這種方式解決民族的發展和繁榮問題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今天出現了與之相矛盾的趨勢。新興的民族國家嘗試着走向聯合，而全球化則鼓勵跨國界的聯繫，從而強化了族群性。新的亞太經濟論壇 (APEC) 至少代表了四種社會形態，在其內部少數種族反映的對未來的期望是多種多樣的。尊重歷史，尤其是尊重這些少數種族的歷史，將有助於成員國避免曾經摧毀世界其它地區共同體的錯誤。

亞太區域的四十個國家或小國不同於任何形式的集團，過去沒有多少共同點。然而，在過去的大約十年裏，它們試圖構想一個大家能夠認同的地區，且於其中創建出一個它們能夠成爲有所獲益成員的組織。其中許多國家真誠地希望找到契合點，通過這些契合點各國可被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從而使它們更加富裕，安全和穩定。與民族主義和多元種族性相關聯的

民族構建突顯出這些國家間存在着眾多的差異而具有很少的相似性。如果它們果真有效地發展出某種形式的地區共同性，那麼這一地區共同性將是異乎尋常的。它會是這樣一個地區，在其內部，繼續存在着世界上的一些舊有的文明和古老文化；同時，後殖民時代的和其它新確定的邊界勾勒出世界上一些最新的民族。在這個地區，還有幾個世紀以來數以百萬計的移民和定居者；一些新的“民族”、“文化”和“國家”爲了應付族群性的特殊問題而進行着鬥爭。

在二十世紀，這樣或那樣的民族主義成了一種變革的力量。不同的人把他們自己看作民族，並且認爲一個民族可以成爲新、老國家的基礎，這種思想令亞洲的至少兩代領導人感到振奮。如何將民族的概念與國家和民族主義相聯繫，這個課題在亞太地區四十個“民族”中產生了一系列不盡相同的經驗。很明顯，沒有一種關於民族主義的定義是適合於所有國家的。

每個國家又包含多種多樣的族群。有些族群構成了民衆的大多數，並且控制着自己的民族國家；另外一些族群不足以強大到組成自己的國家，還有其它一些族群儘管較小且相對較弱，卻對佔支配地位的多數種族深懷怨憤。

把民族國家視爲人民願意爲之犧牲的效忠對象，這是當今世界的重要事實之一。不論是存在一個以力量均衡爲基礎的世界秩序，還是這個世界需要爲一種新的秩序尋找基礎，高漲的民族主義都會激發對每個國家的文化以及其它差異性的捍衛，而這些差異性會溢向相鄰的國家。族群性，或爲沃克·柯諾 Walker Connor 所稱的族群民族主義 (Ethnonationalism)，在近幾十年中顯著增長並非意外。¹

民族主義與族群性的關係植根於歐洲的歷史，但這種關係對於多樣化且巨大的環太平洋地區來說已經變得同等重要了。基於歷史和地理上的差異性，有必要關注那些突顯地區複雜性的種種條件。

以下的三個論點是簡要和爲人熟知的。它們具有長期的有效性。在經受了本地區的危險挑戰，尤其是經受了東亞和東南亞部分地區和金融危機考驗之後，它們仍然可能站得住腳。這三個結論如下：

首先，民族主義有成爲一種強大的趨同 (homogeneity) 力量的趨勢。族群性會繼續存在，但只有通過內部的協商一致，或者，如果必要的話，只有通過面對內戰的可能性和準備尋求外部的干預，才會繼續存在。

其次，國家服務於試圖對民族加以界定的佔支配地位的多數種族。不過，以國內的權力關係爲轉移，國家也可被用來保護其管轄範圍內頑強生存下來的少數民族及其文化。

再次，有兩種本地區特有的族群性表現。一種是美國式的多元種族模式，另一種是所謂的“海外華人”網絡。這兩種表現向更加常規的民族國家觀念提出挑戰，特別值得注意。

基於這些背景介紹性的論點，那麼，可能出現的亞太地區主義是會緩和還是會加劇存在於亞太各國當中的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呢？

一 族群性的重要性

爲族群性作出的界定以及將它與民族性和種族的界定區別開來所作的努力既數不勝數，又種類繁多，沒有必要對其進行

詳細的討論。² 與此同時，在時間和空間方面的差別也起很大作用，尤其是對一個由如此衆多、歷史經歷如此多樣的國家所組成的地區而言。要從民族同質性的意義上理解種族性，就需要知道國家是什麼時候開始形成的；有多長時間和有多少族群曾經在一個或者更多的政府和文化之下共同生活；“我們”和“他們”這樣的概念是如何被運用於邊界兩端的；還有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的大小，以及它們是散佈在廣闊的地域還是局限於狹小的範圍。在選擇某種針對族群性問題的比較研究法以找出每個國家各自認為重要的問題時，³ 以下的分類將顯露本地區的特性和次區域之間關係的狀況。

在大多數語言中，很難把民族和族群加以區分，⁴ 例如，minzu 和 zhongzu (在漢語和一些東亞語言中)；bangsa 和 suku (在印度尼西亞語和馬來西亞語中)。人們經過數十年，才發現給這些術語作出準確和固定的解釋的用處。另外，要把從歐洲和美國衍生出來的民族和族群的定義運用到文化詮釋與歐美不同的亞洲各國同樣存在着問題。本文只對民族和族群作一廣義的區分。民族指的是，具有自己的政治民族主義，並且控制着得到國際公認的民族國家的那些支配性族群。族群性一詞則應局限於描述那些在每個民族國家中，具有特定文化且尋求各自地位的少數族群。除此之外，像“社會”和“社會形態”這樣的術語，在本文中指的是具有超越官方邊界的共同的文化與歷史特質的國家集合。這些社會既有別於“國家”(states)，也有別於那些具有能夠決定其邊界以內發展的中央政府的“國家”。

亞太地區的民族主義是一個近代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亞太地區民族主義是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反應，它借用了

西方民族主義的要素，以適當抵禦西方的擴張。⁵ 在歐洲和由歐洲人建立的殖民地國家，民族主義先出現，並促成了民族國家的誕生。但是，在有的情況下，亞太地區的民族主義也是新誕生國家進行民族構建時所帶來壓力的產物，這些壓力是在邊界被劃定或再劃定以後被喚起和激發的。在世界的許多地方，民族主義仍在被吸收之中，但除了少數例外，大部分新誕生的民族國家的邊界穩定得令人驚訝。在這點上，受到不少非議的聯合國的作用是值得稱道的。不說別的，聯合國基於民族國家至上這一既定利益所起的作用，曾促成了這一地區後殖民地時期邊界的確定。⁶

基於這一背景，可以根據在少數種族於其所在國中所處的位置，區分出本地區的四種主要社會形態。如果每個形態都可以由一個反映出相應社會形態的社會和文化聚合特點的國家充作代表，那麼對它們進行比較就會比較容易。但是，至少同時存在着兩種各不相同的國家類型，另外，還有許多與這裏所辨識出來的四種社會不相吻合的情況。

毫不奇怪，這四種社會形態是不同歷史發展的產物，而且在地理上相互分隔。它們是：(一)東亞的封閉社會；(二)東南亞的比較開放的社會；(三)太平洋上的島嶼社會；(四)環太平洋地區東部和南部的近代移民國家。

首先，是位於東北亞的那些社會，包括中國、日本和朝鮮。它們是封閉的社會，民族主義有初始的發展。儘管它們都欣然接受一種可稱之為具有普遍性的宗教——佛教，但它們仍然是封閉性的。有趣的是，在本世紀它們依然保持了相對的封閉，無論它們採用的是好鬥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如日本)，或

是革命的和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如中國)。中國的革命口號確曾緩和了極端形式的民族主義言辭。但是最終，社會主義的思想卻沒有能夠戰勝它們所被移植的新儒家或部分儒家社會的根深蒂固的歷史，後者的原則構成了安分守己式的、封閉式的發展的道德基礎。⁷

為在中國佔大多數的漢族人所使用的 minzu 一詞，首先是由日本人所使用的。它被用來表達歐洲人關於民族的概念，描述國家地位和民族主義。不管是大陸，還是台灣、香港和澳門的漢族人，都使用該詞。但同樣的兩個漢字也被用於 shaoshu minzu，即“少數民族”這一詞組中。朝鮮人(北方的稱呼，南方稱為韓國人)與日本人一起，同樣以相似的方式使用該術語。然而，相似性僅此而已。中國是一個大陸性帝國，它從文明的角度給自己下定義。它不僅在歷史上是多種族的，而且種族多元化的程度也很高。在近代以前，初始的民族主義主要存在於作為多數的漢人之中，並不被數個世紀來散佈於極其廣大地區的，並且依然佔據那些地區的藏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等少數民族所分享。分散於前帝國之中的眾多少數族群的部落王國，同樣不具有初始的民族身分觀念。⁸ 早在經歷民族主義陣痛之前很久，中國就已經懂得了族群性的各種特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斯大林主義關於“民族”的定義來描述其境內的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並非事出偶然。⁹ 不幸的是，這就造成了使用上的混亂。儘管在人口數量和居住地域上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對這些人群的稱呼，更確切的應是“種族”、“族群”而不是“民族”。這樣方能和世界別處的情況形成一致。

中國少數族群的狀況與朝鮮和日本形成鮮明的對照。在朝鮮歷史上，在新羅人、百濟人和高句麗人這些也許曾經是種族或次種族的人之間，有着差異。但是現在的兩個朝鮮國家都基本上是由單一族群構成的。他們在過去兩千年裏，成功地抵禦了中國人、蒙古人、滿洲人和日本人。他們不包括那些居住於鴨綠江以北屬於中國公民的朝鮮族人，也不包括作為少數族裔而在日本和美國定居的朝鮮族人。1945年以後兩個朝鮮的分裂，純粹出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原因；在種族方面，肯定不存在着使其人民分化的問題。

日本與朝鮮一樣，也幾乎是由單一族群組成的。幾百年來，其境內的少數族群如蝦夷人、朝鮮人和華人，基本上都被同化了。在近代，日本境內的朝鮮人以其人數眾多而曾顯得重要，但此事並未給日本的民族主義帶來問題。確實，日本人所經歷過的好戰的民族主義，曾經獨一無二地不受內部種族問題影響。這使其鄰國感到更加懼怕。

越南也具有以上的某些特點，這主要是由於它受到中國文明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在幾個世紀中它曾抵抗了明、清帝國。這是一個在近代和近代以前歷史之間掙扎的國家的典型個案。它的人民本來可以成為中華帝國的人民永久的一部分，就像廣西、廣東、雲南、貴州的王國或酋長國的人民那樣。但是越南使自己獲得了自由，並在處理自身內部少數族群的問題時，以與中國相似的方式發展出初始的民族主義和帝制的意識。¹⁰ 十九世紀法國的入侵使其三個組成部分(東京、安南和交趾支那)脫離了中國的軌道，為它創造了歸屬新的東南亞地區的機會。不能肯定，越南加入東盟是否可使它面對一個擺脫封閉的過去，

進入一個處於那些未曾直接在中國影響下生活的民族之中的這種可能是更加開放的未來。

第二種社會形態主要指的是那些位於東南亞的比較開放的社會。這些社會的結構是鬆散的。¹¹ 它們相對比較開放，肯定要比前一類型的社會更為開放。像泰國、老撾和緬甸這樣的社會從一開始就有少數族群，但它們最終在由中國和法國、英國等帝國主義列強所劃定或是所同意之下產生的疆界之內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值得特殊注意的，是那些與泰族人有關聯的老撾境內的多數族群，還有緬甸的撣族，以及中國的傣族和壯族。這些少數族群所特有一貫漠視國界的開放性，將會對已成為近代民族國家的泰國、緬甸、老撾的業已變狹窄了的利益，構成極大的考驗。¹²

歷史上的柬埔寨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作為一個古代帝國的殘餘，有幾個世紀，它曾經是泰人和越南人擴張的目標。它在法國人的幫助下得以幸存，它寬慰地接受了淡化了的民族認同。它曾經有一個人數很多的華族，但其今天最重要的少數民族，乃是由來自越南的定居者組成。這些越南定居者現在所帶來的，似乎更多是管理上的問題，而不是對國家的民族整體性的威脅。¹³

泰國比東南亞大陸上的其它國家更為開放，部分原因是它一直向半島南部伸展，並且與馬來人的多樣性匯合，後者通過開放貿易、移民和在群島地區數千個島嶼定居，形成了他們的共同性。這些人所形成的社會以其享有的罕見的“海洋自由”性結構而變得與眾不同。通過其海上帝國，他們為一種發散的馬來人身分奠定了基礎。¹⁴ 但是在西班牙、荷蘭和英帝國的干

預結束之後，新的族群組合興起了。形成了東盟地區的五個國家，即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汶萊。最不同尋常且反映出這些社會所具有的開放性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大多數人都來自該地區以外（由華人和印度人後裔組成）。¹⁵ 在每一上述社會裏，族群性都具有明顯的重要性，尤其對那些仍要進一步鞏固其民族國家地位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¹⁶

第三種社會形態使我們的視線越過了東南亞，進入了太平洋。波利尼西亞人和密克羅尼西亞人比美拉尼西亞人受到更多的外來影響，但是他們的社會結構與馬來人群島地區的社會結構相比是狹小的。其大多數仍然在為養活和管理它們的袖珍國家而鬥爭。它們發現很難擺脫對其發達的鄰國如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高度依賴。¹⁷ 最大的國家巴布亞新幾內亞擁有擺脫這種依賴性的自然資源。如同斐濟，但與大多數其它南太平洋國家不同，巴布亞新幾內亞存在嚴重的種族間緊張關係。在美拉尼西亞，甚至是微弱的種族和次種族分歧，都會煽起強烈的情緒。這個類型的社會很少能夠獲得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前提條件。

第四種類型的社會實際上是西歐的分支，包括了環太平洋地區的一些最富裕和最發達的國家。那裏的人民具有民族國家的經驗，可以毫不費力地在本地區建立起同樣形式的國家。它們是過去五百年間因歐洲擴張而產生的移民國家，但它們又可以被進一步區分為四種次形態民族國家。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屬於第一種，它們具有一些相同的關係。它們都與南太平洋的島國有着密切的關係，且都受到後者的某些種族問題的困擾。澳大利亞更加靠近東南亞和東亞，要

比新西蘭面對更多的“亞洲化”方面帶來問題的挑戰。它是唯一與土著人關係惡劣的；因此，在應付來自各個大陸，尤其是來自環太平洋地區的移民方面，它發展出了更加複雜的方式；在北方，它與東亞和東南亞的新誕生民族有很深的交往。¹⁸因此，雖然澳大利亞的新起來的民族主義乃植根於英國人的價值觀和對英國人的忠誠，但這種民族主義是溫和的，並且深受美國模式影響很大的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¹⁹

第二種次社會形態雖值得一提，但它至今對本地區沒有直接的影響。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屬於這一類，他們的族群與環太平洋地區其它任何地方的族群有着相當大的區別。²⁰在那裏，民族的意識目前仍然歸於俄羅斯民族意識，而俄羅斯因過於遙遠，其影響無法超過毗鄰的日本、中國和朝鮮。

餘下的兩種次社會形態位於太平洋東岸。西班牙征服者到達此地更早，並且向北方和南方拓展，範圍從加勒比地區到墨西哥和智利。²¹ 然而操英語者建立了當今世界最強大和最具多種種族意識的民族——美國。²² 美國西部各州以及加拿大各省被一些亞太民族視為現代經濟與技術發展的最高典範。作為在較大的民族國家中解決族群性問題的既有正面又有反面意義的樣板，美西各州的影響依舊很大。所有有關東亞地區的研究都不能忽視這一事實。

儘管操西班牙和英語的人群作為歐洲社會的向外擴張者取代了土著的“王國”和部族社會，但他們如此成功地適應所征服的新領地，以致他們的社會現在已經完全組合成民族國家。但它們並沒有成為單一英語或單一西班牙語國家，也沒有利用共同的宗教創造一個單一的國家。兩個以英語為基礎的國家儘

管是基督教文化的強大的承載者，但基本上是世俗的國家。環太平洋地區東部的十一個說西班牙語的國家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更好的範例，它們不可能產生在受語言和宗教分化傾向嚴重影響的古老的歐洲世界所產生過的問題。²³

上面列舉的四種社會形態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族群性的概念，反映出紛繁的變數。它們顯示了在新誕生民族中佔主導地位的文化的性質和歷史。它們反映出政治發展與現代化的不同階段，反映出西方社會科學和法律學說的不同影響。它們還受到國家或地區內部各個族群的經濟角色和作用的影響。問題在於，假如會形成一新的亞太地區，這些種族因素將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民族的構建和維護？致力於地區主義將會幫助還是阻礙各個新誕生民族國家在民族身分方面的長遠發展？這些努力將會加劇還是調節過激化的民族主義，尤其是為那些充滿激情的期望在有生之年建成完美民族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所持有的過激化的民族主義？

二 國家的力量

在本地區四十個國家中所看到的四種社會形態產生於不同的政治背景，但反映了其居民在社會與文化上的不同集合。它們是早期帝國、王國、部落及部落聯盟的產物。其人民與統治者的關係是領主同臣民和奴隸，甚至是同朝貢者之間的關係。這些傳統關係是不固定的；它們的宗教相互重疊；大部分政治邊界是暫時和可變動的；人民隨時有可能被俘虜或被征服，而有些臣民會通過離境出走這樣的“選舉”方式改變自己的效忠。

近代國家在對付其居民的種族多樣性方面很少陷於被動。大部分國家可以運用其支配性的權力，按照自己所需要的類型確定和塑造社會。在亞太地區，存在着不同的情況，因為在四種涉及少數族群的社會形態中，只存在着兩種國家類型。它們的主要特點衍生於它們處理主要族群性問題的方式。特別是，如何對待新的種族組合，不管這種組合是由於境內移民造成的，還是由於次種族群爭取種族身分造成的。因此可以劃分出以下兩種國家類型：一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它們把自己的少數族群看作是紮根於歷史的，它們產生的問題多數是可控的；二是後殖民時代國家，它們眼前的任務是民族的構建，少數族群最終要被融合。

歷史悠久的國家通常具有對其若干族群行使帝國權力的背景。它們又可以再被分為兩類。第一類在法律上承認少數族群的地位，並且允許它們的組織有政治上的代表；而第二類則表現出沒有這麼做的需要。

第一類的例子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緬甸和泰國。在這些國家的歷史疆界內，一直存在着少數族群，國家承認其近代形式政治體於其各自境內的合法地位。中國使用“民族”這一詞來使種族區別合法化的概念，在人類學家看來，未必科學。但這些術語的政治含意在於它確認了從漢族人和其鄰居的歷史關係衍生而來的族群性。越南以相似的方式對待它的少數族群，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別。²⁴ 越南沒有像中國的西藏、新疆、內蒙古、廣西和雲南這樣的少數族群的區域，而那些區域中的每一個，其面積都超過或者相等於整個越南。緬甸和泰國這兩個建立於古代王國基礎之上的國家，不願意在法律上對其

境內種族作出確定，它們認為這樣做會鼓勵分離主義。不過，它們現在也承認其境內少數族群的權利。²⁵

第二類歷史悠久的國家包括日本和北、南朝鮮。對它們來說，在過去幾百年中，少數族群問題並不突出，將來可能也會是如此。日本人的民族國家已經顯示出它的力量。²⁶ 如果有朝一日朝鮮實現統一，其深深植根於歷史的，構成又一個強大民族國家的因素，已經是現成的。

兩個歷史上的小王國——柬埔寨和老撾可以歸入這一類別，儘管老撾確有相當數量的少數族群。²⁷ 這兩個國家幸存至今。但如果十九世紀中的事件發生得不同的話，他們可能屈服於向外擴張的鄰近帝國，其人民可能淪為較大的近代國家中的少數族群。它們的經驗告訴人們，即使是那些境內沒有任何大的少數族群的歷史悠久的國家，也必須依靠有利的環境來維護其領土的完整和最終實現未來的民族國家地位。

第二組國家是新誕生的民族國家，它們在殖民地時期和反抗殖民主義的過程中組合成型。它們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兩類：戰後非殖民化過程以後建立的以當地人為主的民族國家，以及較早之前建立的脫胎於歐洲人殖民地的國家。在前一類國家中，有較晚建立的東南亞和南太平洋的國家。它們至少表現為三類：較大的多種族（如不是多族群的話）國家；有存在複雜種族問題的較小的國家；相對同質的國家，其居民沒有大的種族差異。

第一類當中最好和最有力的例子顯然是印度尼西亞。²⁸ 它的疆界是根據荷蘭人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劃定的。它逃過了多次分裂國土的企圖。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它是戰後獲得最顯著成

功的國家之一。在一代人的時間內，組成一個印度尼西亞民族的理想（按照 Benedict Anderson 的說法）幾乎已經變成了其國內人民可以想像出來的現實。確實有一些地方的人還不準備把自己看作是印度尼西亞人，也依然有一些人相信這個民族國家還遠談不上穩固。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這些人是否對這個為蘇加諾總統及其同僚開創的深刻的國家構建過程缺乏信心。

屬於相似的多種族類型而較小的國家有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二者都是被外部勢力牽到一起的土著王國和部落群的集合體。它們在獨立以後找到了足夠的共同之處，這些共同之處可成為新民族的基本要素。兩個國家都有移民少數族群，但其比例差別很大。作為馬來西亞人口的將近一半，移民給民族構建的形式和性質提出了嚴峻的問題。²⁹ 在菲律賓，天主教教會的支配作用和幾個世紀中當地人與移民的通婚，減少了對民族統一的威脅。然而，以南部穆斯林分離主義形式出現的地方族群性的挑戰，顯示出它帶來的問題比馬克思-毛澤東主義革命者帶來的問題更為嚴峻。³⁰

第二類的後殖民時代民族國家包括一些較小的國家，其居民身分差別很大。新加坡和斐濟是明顯的例子。但我們可以把巴布亞新幾內亞包括在內，因為儘管它的領土廣闊，但人口並不比新加坡人口多多少（法國海外領地大溪地和新加利多尼亞是這個類別的潛在成員，一旦法國允許它們獨立的話）。然而，三個獨立國家中的種族問題給這些民族國家帶來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新加坡代表了一種極端，那裏的移民群人口比例最大，他們尋求一種適合國內的所有人的新的民族身分。³¹ 在另一方面，斐濟面對的問題則源於對以種族區分為基礎的政治多元化

的精心平衡。土著居民的領袖需要借助武力來防止具有移民背景的政客取得政權。³² 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情況是另一個極端，它缺乏一個佔支配地位的族群或是次族群。多種族利益的無法預料和難以確定的組合經常問鼎國家機器。³³

第三類由那些相對同質的國家構成，那裏的少數族群是無關緊要的，土著人對國家的控制從未受到移民的挑戰。它們包括汶萊、所羅門群島、瓦努阿圖、東加和西薩摩亞。這些國家的生存問題與族群問題關係不大。

與前一組相對照，後一組的後殖民時代民族國家都建構良好，邊界穩定。這些國家脫胎於歐洲殖民者的殖民地，且在獨立以後大量引進移民。有兩種模式對具有多元種族性質的國家如何可被重新定義為新型民族國家一事，曾經有過並且仍然有着最大的影響，它們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英語國家，和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國家，後者在環太平洋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是墨西哥和秘魯。後者通過單一的佔支配地位的語言和宗教，最大限度地弱化了族群問題，從而特別深地植根於新大陸。那裏仍然存在起因於土著人反對歐洲血統者的種族間緊張關係，但這些種族在十九世紀時卻演變成了更常規性的政治經濟問題，主要集中於階級和意識形態問題上。³⁴ 不過，對於本地區的其它國家而言，它們的經驗沒有多少是可以簡單地加以吸取的。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說英語的移民國家在對民族國家觀念的推廣方面，遠遠超過人們的預想。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是北美殖民地的獨立。啓蒙主義的思想被帶到了新世界，通過移民和奴隸的大量流入獲得重新解釋。這便造就了“第一個新民

族”。³⁵ 在一個多世紀中，“大熔爐”(melting pot)的信念培育了一種希望，即國家可以建立在由來自五湖四海的人組成的新民族之上。大熔爐並不能消除族群性，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未能符合美國憲法的最高原則，這一點是慢慢地被意識到的。³⁶ 但當大熔爐出現時，沒有誰能夠阻擋其旨在建立人們從未想到過的最革命性的民族國家強大勢頭。它直接或間接地幫助了其它反抗殖民主義的人們在民族國家的新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國的榜樣為世界樹立了種族意識的新標準。不管好壞，它使自己成為未來多種族國家的一個典範，這一國家乃由那些在其中尋求幸福的許許多多族群構建而成。

本地區的民族和國家提出了一個共同的主題，即民族主義的趨向是尋求同質化的。族群性的力量顯然是對這一同質化的威脅，而這往往不能為較大的多數族群所接受。如果當今普遍形式的民族國家繼續發展，佔支配地位的族群將企圖利用武力，如果必要的話以內戰，來消除差異。這反過來又會使少數種族相信必須利用外來援助保護自己。除非國家信服合法程序和少數族群的權利，除非國家試圖用協商一致的方法來解決分歧，它往往會放棄有效政府的優點，服從孔武有力但卻無法預料的民族主義的時髦模式。

三 族群性的兩副面孔

對當今一般狹義上的民族國家來說存在兩大挑戰。它們是精心錘煉的美國多元種族性模式和當前被談論得太多的“海外華人”網絡。

美國模式

我們已經對美國的移民種族的經驗作了簡單的歷史陳述。然而，人們對這種經驗所產生的世界範圍的影響，還沒有作出充分的估計，尤其是在太平洋的西岸。上一代人就開始這麼做了，當時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者，曾對美國獨立戰爭表示讚賞。他們對那裏的人民是如何驅逐其殖民統治者或“帝國主義者”並獲得自由進行研究。美國人一方面支持反殖運動，另一方面在冷戰時期支持反對共產主義。這使民族領袖依賴於美國的投資援助和技術培訓。但是，一旦進入民族構建的過程，美國模式就不那麼清晰了。現在流行的樂觀看法是，無論遇到什麼樣的種族的問題，大熔爐的方式將保證國家的最終形式是 *negara bangsa* 或是 *minguo* 的翻版，這兩個詞都是對民族國家概念的翻譯。³⁷ 許多人仍然堅信這一點。

然而另一些人則懷疑，這些處理移民種族的政策，能否對大多數的亞洲新國家的本土化了的且有專門居住地區的少數族群適用。但又有一些人更加缺乏耐心和講求實際。他們認為，即使大熔爐方式是適用的，它花的時間也太長了。還有種種歐洲模式，它們對民族加以界定時更為簡單快捷。德國和意大利的國家興盛，中歐和東歐按照語言和宗教重新劃定民族邊界等，都是這方面的範例。最近發生在前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暴露出過去的這些歐洲民族國家樣版所存在的缺陷。如果對其加以仿效，將鼓勵分裂主義並造成危險的動亂。但是，美國理想本身也部分地失去了它對民族主義者的號召力，因為針對移民種族的大熔爐政策，並未能解決美國內部的黑人的權利和其它種族衝突問題。³⁸ 美國的決策者和學者不

得不重新審視他們的假定。關於族群性的研究持續了三十多年，在族群性如何適應民族統一的問題上，這些研究給世界提供了許多新的觀念。民權和多元文化主義種種特點已經出現，取代了先前民族主義者希望建立永遠神聖、不可分割的民族的希望。這樣，美國就不僅是人權和民主這些正義意識形態的代表，在適合其多種族性和民族多元文化性的若干非常苛刻的要求方面，美國還是成熟的和近代的民族國家中的首要範例。

位於環太平洋地區的其它國家將怎樣看待這個問題？我們早就聽過日本領導人關於美國正在衰落的評論，他們認為這是因為美國不具備同質民族的特性，甚至是因為它似乎偏愛於人種混雜。本地區的另一些國家則公認美國是居第一位的移民大國。這些國家的許多人都加入了移民美國的人潮，他們尋求在一個適合保存各自種族和文化的民族那裏獲得好處。

與此同時，也引發了某種真正的困惑：怎樣對這個似乎威脅民族主義對同質性的嚮往的急進模式作出回應。事實在於，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而超級大國和帝國一樣，因為具有發散、包容和多種族的特點而強大。沒有哪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能成功地產生大帝國。不過，傳統的帝國與現代的超級大國的分別在於，後者同時追求成爲一個民族國家，即一個自稱的多元種族的民族國家。作爲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能否保持這一點？現在下定論也許爲時尚早。唯一的一個一度存在的超級大國是蘇聯。它的解體或許是由於其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的教條主義所致，但有人會說，它的分裂是因為它不堪其多種族性的沉重負擔。³⁹ 很難預言，像美國這樣的開放資本主義經濟能否爲解決其它民族國家中的長期的種族問題提供答案。

環太平洋地區的所有國家都承認，美國作爲超級大國對本地區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它們歡迎美國的積極參與，甚至對鼓舞了美國大多數國民的理想主義表示認同。但美國的多元種族模式對本地區的其它成員來說有多大的適應性呢？它是否代表了一種世界最終所期望的更高級的文明？它是否會最終表現出一個過於脆弱的理想，一個對較小的新誕生民族國家來說無法實現的目標？對於大多數由不同的力量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促生的多種族國家來說，這種模式是否太獨特而不適用於它們？

很明顯，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面對着很多兩難選擇，其中之一是：是應該積極地向國外傳播其多元種族理想，還是應該在保持和捍衛自己的價值的同時，讓其它民族自己去選取其中可適合其發展的部分？由於本地區種族混雜，處理種族間緊張關係的方式多種多樣，因此還遠不能確定美國模式是否將被許多國家所採用。儘管如此，美國在亞洲的繼續存在，注定會使新誕生的民族仔細關注它的經驗。美國模式將可能會繼續是與衆大不相同的，它的多元種族實驗可以提醒其它國家不要做什麼，它又可能會對某些民族構建努力所帶來的極端民族主義發揮降溫作用。

華人海外移民 (The Chinese Diaspora)

另一個向本地區狹義民族主義提出挑戰的因素是遍佈各地的海外華人。他們大量集中在東南亞，同時也對北美和大洋州的發展產生過影響。⁴⁰ 作爲加速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的企業家，他們最近受到傳媒和學者的關注。對他們的許多讚譽是不確切的，因爲大多數給中國帶來變化的投資實際上主要來自

香港和台灣。在這兩個可以稱之為“大中國”(Greater China)之兩條腿的地區(第三條腿是中國大陸南部地區)裏居住的中國人，並不屬於散居海外的少數族群。⁴¹

當然，海外華人對東南亞經濟的影響是超乎比例的。⁴²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但對我們今天談論的主題更為重要的是，華人對本地區種族混合的貢獻，以及他們的存在給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帶來了什麼。華人最初是作為商人，然後是苦力，更近期是企業家和專業人士來到這個地區的。經過幾個世紀，他們學會了在中國以外與國王和大臣、部落酋長、生意上的競爭者、殖民官吏、西方和日本的資本家，以及反殖(如果不是排外的)民族主義者相處。⁴³他們在民族國家出現之前就懂得如何與其它族群一起工作和生活。

這些移民以一種完全不同於美國模式的方式在各當地國家組成了重要的少數族群。他們定居下來並且成為這些新國家的未來國民。這同北美和澳大利亞的情況形成了對照，在那些地方，大部分的華人屬於尋求與老移民競爭的新移民。在東南亞，他們的長期存在和對各國經濟的積極貢獻，以及他們用來挫敗想把他們發展為中國第五縱隊的人的方式，都為本地區新誕生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幫助。

對東南亞本地的民族主義作出的反應取決於華人所處的法律和經濟地位。在有機會得到上升社會流動性的地方，他們的趨向是分化成至少三個群體：人數越來越多的虛情假意地對新誕生國家表示認同的一群；寧願專注於確切屬於自己的種族社區的一群；保留了對中國文化的認同的少數一群。這三個群體人口的比例當然因國而異。例如，在華人人數很少的地區(不論

是行政區、海島還是國家)，在經過一至兩代以後仍然保留中國身分的人相對較少。在華人人數眾多的地方，他們便有可能形成一種自己獨特的本地特性，同時保留其中國文化的基本特點，但可以辨別出他們與“大中國”人的差別。⁴⁴

這種反應與我們在移居到那些較大的移民國家的華人中所看到的情形不同。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期，許多中國人移居北美和澳大利亞，其中包括那些感佩西方經濟和技術成就的人。只要這些地方不對他們大肆歧視，他們便希望自己的子女認同甚至歸化當地。物質上的成功和西方的學校教育掃除了許多舊有的文化屏障。⁴⁵今天，西方的這種吸引力仍然很強。只要中國依然貧窮而那些國家又願意接受他們，朝那裏移民的中國人的數量將會繼續增加。

然而，一方面是中國的復興，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成功的創業精神，使華人的種族性複雜化。這無疑促使華人重新思考自己在環太平洋地區扮演的角色。這是一個多向度的問題。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開放改變了族群性的基本準則。遍佈世界的華人商業網絡發展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這使這些華人的經濟作用得到了擴展，並且使他們對自己未來在中國的位置重新產生興趣。

在華人移民群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國家誕生中生氣勃勃的移民族群性與對外部機遇的多方面的反應的結合。憑借這兩點，這個群體可以成為亞太地區主義的多重推動力，或者反過來成為民族國家支持者弱化這一地區主義的充足的渴望之源。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目前環太平洋地區的發展把族群性和民族主義問題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面。離開了一個歷史

悠久的國家，華人正在使自己適應那些正在地區範圍內甚至是全球範圍內應付多元種族性的民族國家。人們為亞太地區謀求的地區主義能為新型的民族主義做些什麼？以上列舉的針對複雜的族群性所提出的兩種挑戰對此作出了一些回答。

美國の後殖民時代移民國家模式，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從制度上和意識形態上探索該問題的民族主義。在制度方面，這種民族主義是建築在先進的公民社會和開明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上的。這種制度明確地保證公民權利並有意識地保護少數族群。此外，美國具有一種從科學、人道主義和基督教自由主義詮釋中獲得啓示的意識形態。我的意思是所有政策假定都不能脫離這些基本原則。除此之外，還有對資本主義的創造性，技術的創新，領導信息革命，和向世界展示其行動前後一致的民族能力的自信心。經歷了考驗、錯誤和協商一致所產生的這些價值觀，被視為是有約束力的和值得付出巨大民族犧牲的。

海外中國移民當中的華人民族主義的命運是另外一種趨向。一個古老而強有力的種族在離開故土以後承認他們要面對選擇，一種選擇是回到華人民族主義，一種選擇會引導他們接受一種新的由其他種族主導的後殖民時代民族主義。除非出於實用的考慮，否則商業、文化和政治上的強制性因素會說服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作出後一種選擇。作為東南亞當地人國家的外來移民，他們在民族構建中的角色，於是便被定義為政策問題，主要屬於新政府的管理事務。對這些國家來說，在少數族群權利方面作出最低限度的制度上的承諾是必要的，但它們不需要表明任何意識形態的立場，而有意識形態立場這一點在美國模式中或許是政治上正確的代表。這些新誕生民族國家只要

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和地區國際政治中表現出現實主義和講求實效就足夠了。

本文在開頭提出了三種推論。以下將以結論的形式對它們加以補充：

民族國家是一個達致現代性和發展的適當的目標。但是，在亞太地區如此眾多的國家裏，如果這些國家想獲得穩定和經濟發展的話，民族主義要放緩對於同質化的追求。它們要滿足於通過合作，以及對地區內部事務堅持要協商一致，也許還要堅持維護地區內部的相互依存，才能漸進地構建自己的民族。

國家服務於它的佔支配地位的多數種族，但是，在經濟迅速發展和在由政界領導人以及商界領導人構織成的不斷擴大的地區網絡的壓力下，國家可能採取溫和的行動，可能通過較長的時間追求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發展。在有的情況下，國家可能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民族國家。

美國模式和華人海外移民模式都強調了一點，即本地區各國在尋求民族進步和繁榮的過程中，需要有伸縮性和包容性，不要急於追求眼前的狹隘目標。

最後，亞太經濟論壇確實給本地區提供了重新開始和避開以新面目出現的老問題的機遇。但是，國家的多元形態和眾多的族群告訴我們，不應該過分地依賴於對未來所作出的想像。有關本地區的一切表明，如果我們要避免曾經摧毀了世界其它地方的共同體的錯誤的話，就需要培養一種歷史感。

*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9年春季號，頁17-30。汪新生譯，劉宏校。

注釋

- 1 Walker Connor, "Ethnonationalism", in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s.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Colin Nicholas and Raajen Singh, eds. *Indigenous Peoples of Asia: Many Peoples, One Struggle* (Bangkok: Asia Indigenous Peoples Pact, 1996).
- 2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 Blackwell, 1986); Paul Brass, "Ethnic Groups and Nationalities: The Formation, Persist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Ethnic Issues over Time", in *Ethnic Diversity and Conflict in Eastern Europe*, ed. Peter F. Sugar (Santa Barbara, Calif.: ABC-Clio, 1980), pp. 1-68; Paul Brass, "Ethnic Groups and the State", in *Ethnic Groups and the State*, ed. Paul Brass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p. 1-56.
- 3 Peter Kunstadter, ed. *Southeast Asian Tribes, Minorities, and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Frank M. LeBar, Gerald C. Hickey and John K. Musgrave, *Ethnic Group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Press, 1964); Michael C. Howard, ed.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the Pacific* (Tokyo, Japan: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89);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Stephan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James Jupp, ed. *Ethnic Politics in Australia* (Sydney: Allen & Unwin, 1984);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4 Tan Liok Ee, *The Rhetoric of Bangsa and Minzu: Community and Nation in Tension, the Malay Peninsula, 1900-1955*, Working Paper No. 52 (Melbourne: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1988).
- 5 Rupert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6 Boutros Boutros-Ghali, *Confronting New Challeng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5).
- 7 Germaine A. Hoston, *The State, Identity,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 and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8 Chien Chiao and Nicholas Tapp, eds. *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s in China. Special Issue of New Asia Academic Bulletin, vol. 8* (Hong Kong: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
- 9 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0 C.P. Fitzgerald, *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London: Barrie and Jenkins, 1972).
- 11 David Joel Steinberg, *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 (Revised edi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 12 Gehan Wijeyewardene, ed. *Eth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0); Charles F. Keyes, *Thailand, Buddhist Kingdom as Modern Nation-Stat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 13 David P. Chandler, *A History of Cambodia*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3).
- 14 O.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2); Kenneth R. Hall, *Maritime Trade and State Development in Early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 15 Chew Sock Fo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in Singapore*, Monograph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east Asia Series, No. 78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7).

- 16 Judith Nagata, *Malaysian Mosaic: Perspectives from a Poly-ethnic Society*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7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Editions and New Left Books, 1983).
- 17 Howard,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 18 Sol Encel, *The Ethnic Dimension: Papers on Ethnicity and Pluralism by Jean Martin* (Sydney: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 19 Gary P. Freeman and James Jupp, eds. *Nations of Immigrants: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0 Geoffrey Jukes, *The Soviet Union in Asia*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3); John J. Stephan and V.P. Chichkanov, eds. *Soviet-American Horizons on the Pacif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 21 Peggy K. Liss, *Mexico Under Spain, 1521-1556: Society and the Origins of Nation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James Lockhart, *Spanish Peru, 1532-156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8).
- 22 Bernard Bailyn, *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6).
- 23 John Lynch,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 (New York: W.W. Norton, 1973).
- 24 Ang Nghiem Van, Chu Thai Sn and Lu Hung, *Ethnic Minorities in Vietnam* (Hanoi: The Gioi Publishers, 1993).
- 25 LeBar, Hickey and Musgrave, *Ethnic Group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Wijeyewardene, ed. *Eth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 26 Richard Storry, *Japa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 Asia, 1894-1943* (London: Macmillan,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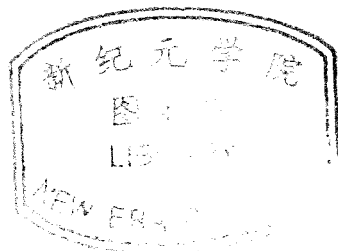
- 27 Shih-chung Hsieh, "On the Dynamics of Tai/Dai-Lue Ethnicity: An Ethnohistorical Analysis", i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pp. 301-328.
- 28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 29 Nagata, *Malaysian Mosaic*.
- 30 David Joel Steinberg, *The Philippines: A Singular and a Plural Place* (Third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 31 Geoffrey Benjamin, "The Cultural Logic of Singapore's 'Multiracialism'", in *Singapore: Society in Transition*, ed. Riaz Hassa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15-133; Chan Heng Chee and Hans-Dieter Evers,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in *Studies in ASEAN Sociology*, eds. Peter S.J. Chen and Hans-Dieter Evers (Singapore: Chopmen Enterprises, 1978), pp. 117-129.
- 32 Brij V. Lal, ed. *Politics in Fiji* (Sydney: Allen & Unwin, 1986).
- 33 Ralph R. Premdas and S. Pokawin, eds. *Decentralization: The Papua New Guinea Experiment* (Waigani: University of Papua New Guinea Press, 1980).
- 34 Benjamin Keen and Mark Wasserman, *A Short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0); Michael C. Meyer and William L. Sherman, *The Course of Mexican Histor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5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Heinemann, 1964).
- 36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0).
- 37 Tan, *The Rhetoric of Bangsa and Minzu*.
- 38 Thomas Sowell,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Rac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3).

- 39 Robert Conquest, ed. *The Last Empire: 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Miron Rezun, ed. *Nationalism and the Breakup of an Empire*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2).
- 40 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0); Edgar Wickberg, ed. *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Toronto, Ont.: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2).
- 41 Wang Gungwu,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December 1993): 926-948.
- 42 J.A.C. Mackie, "Changing Economic Roles and Ethnic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A Comparison of Indonesia and Thailand", in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eds.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17-260.
- 43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econd edi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Wang Gungwu,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Singapore: Donald Moore, 1959).
- 44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 45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區域和全球視野



海外華人
與中國



—— 中國革命與海外華人 ——

反思中國革命對華僑(海外華人)的影響，此其時也。至於海外華人，我是指那些未居住在傳統上被視為中國領土之內的中國人，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地區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例如，香港和台灣的中國人不能被視為華僑，儘管他們曾生活在外國勢力的統治之下。

去年(199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對於此時生活在中國之外的大多數華人來說，這本來可以成為他們經歷的第二次或第三次中國革命。許多老華僑經歷了推翻清王朝的1911年共和革命。許多人將記住完成孫中山反對各種軍閥的鬥爭以及1928年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成立。更多的海外華人積極參與了內戰、拯救中國的抗日戰爭及以共產主義的勝利而告終的一系列值得記住的事件。因此，海外華人並非中國革命的局外人。雖然看起來似乎有許多不同的革命，但對大多數海外華人來說，卻只有一個力圖將中國帶入現代世界的持續不斷的革命。需要強調的是，海外華人由於這一革命、由於對革命的不同概念和理解及代表不同概念革命的領導人和政黨，一直處於分裂之中。此外，一些華人由於中國之外的所在國政府對生

活在其境內的華人及積極參與中國政治的華人日甚一日的懷疑政策而進一步分裂。

海外華人的這些經歷與其它散居的族群有何不同嗎？我們應該看到，革命確實是近代以來才發生的現象。因此，革命與散居者之間的關係只有近代才可能發生。在離開故土遠赴海外的歐洲人之中，一些人也見證了各自國家發生的革命，如法國革命、德國革命及青年意大利革命。但是二十世紀前，除了少數法國愛國主義者和一些意大利人外，很少有證據表明，這些居住在海外的人直接捲入了這些革命。直到二十世紀散居者的政治活動才變得重要起來。其中最主要的有歐洲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和海外愛爾蘭人對愛爾蘭脫離英國統治的獨立運動的支持。當然，還有1917年後一些海外俄國人的反共產主義活動及一些海外德國人對希特勒的同情，及至二戰後一些海外捷克人和波蘭人的反蘇聯活動、一些波羅的海人的反俄羅斯人活動和一些克羅地亞人的反南斯拉夫活動。在中國週圍，則存在着散居的認為其民族在西方人或在土耳其和以色列政府下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阿拉伯人、庫爾德人和伊朗人。散居者中也有一些不惜一切想推翻將其驅逐的國內獨裁政府的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我們都瞭解這些散居者曾經怎樣的活躍。然而，大多數這些事例變得重要還只是二戰以後的事。

其它一些海外亞洲人的經歷與海外華人更有可比性。例如前歐洲殖民地的印度人、北美的日本人以及更近的美國和澳大利亞的越南人。在此，我不擬作更詳盡的比較。我提到這些只是想提醒大家，我們可以找到散居者與其國內革命變化之間的

相似的聯繫。但最主要的區別在於，唯有中國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裏，一直在進行革命，這一革命與內戰及外國的入侵相伴随；海外華僑從一開始就參與其中。此外，中國是冷戰期間接受共產主義的最大國家，今天她仍被許多反共產主義的國家妖魔化，而海外華人不得不生活在其中。這些因素使中國革命與華僑之間的關係具有某些獨特的特點。在此，我想擇其要者，概括過去半個世紀來中國革命與華僑關係中的這些最主要的特徵。

我一直在使用“華僑”一詞，通常翻譯成“海外華僑”，意即僑民。就是說這些中國人只是暫時居住在國外並打算返回中國。這一點是審慎的，因為中國革命正是在他們中間獲得了大多數，正如孫中山的名言所說“華僑是革命之母”。“華僑”一詞在二十世紀初得到了普遍使用，並從一開始就承載着政治涵義。與愛國主義相聯繫時尤其如此，就如“愛國華僑”一詞所包含的意味一樣。但是，嚴格地講，儘管“華僑”一詞得到了普遍使用，但並非所有居住在中國之外的中國人都自認為是“華僑”，即使是在太平洋戰爭之前。如已成為暹羅王國臣民的華人、菲律賓的許多華人天主教徒和已成為英、荷、法等殖民地臣民的部分華人等等。1950年代，這類型的華人人數在增長，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他們發現，使自己遠離“華僑”這一既不準確且已過時的稱呼，是很有必要的，而用“華人”或“華裔”來取代這一稱呼。這些反映了這一地區最近的政治和社會變化。如果說“華僑”是指僑居的中國人的話，那麼“華人”就是指已加入當地國籍的中國人即華族，而“華裔”是指那些雖然文化上還未完全同化但政治上已認同

於其所選擇的國家的“中國人的後裔”。雖然在究竟多少代以後才可被稱為“華裔”這一點上仍存爭議，但今天這確實代表了那些以擁有中國血統為榮、但認為自己主要不是中國人的人的態度。在這三個詞語中，第一個最明確，最後一個是自定義的。而第二個詞“華人”仍難以明確其含義而容易引起歧義。最大的困難在於，當用這一詞語指稱已成為非華人國家的公民或國民的華人少數民族時，其在英語中的字面含義為“中國人”。它常常與“海外”一起使用，因此，“海外華人”實際上被混淆為“Overseas Chinese”。當許多作者不作任何區別，仍使用“Overseas Chinese”來涵蓋中國之外的每一位可辨認的華人時，它毫無益處，或許還帶有種族主義的意味。

在這裏我詳細講述了這三個詞，因為它們的不同使用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革命影響的產物。當然，在東南亞，這是過去五十年來這一地區有關中國的國際政治的產物。這些區別在北美不甚被理解，但我認為，在那裏，它們或許最終也會變得很有用。在此，為了方便，我將這三個詞歸納為：“華僑”是指僑民，“華人”是指華人少數民族，“華裔”指當地的公民。為此，我需首先指出兩點：第一，回遡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海外華人社會內部已經存在這種劃分，這決定了他們對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政治的不同反應；第二，在海外華人對中國革命的不同反應中，東南亞華人曾經而且仍舊與北美華人截然不同。這兩點是以中國共產黨1949年在中國大陸勝利為代表的中國革命影響的大背景。

要論及1949年以來中國革命的影響，我們必須要搞清楚有多少海外華人捲入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在中國大

陸、港澳和台灣地區之外究竟有多少中國人，並無確切的統計。最可信的估計是，1950年代世界各地的華人大約在800-900萬人之間，其中90%居住在東南亞。今天，“海外華人”（華族），或說中國大陸喜歡使用的“華僑華人”（華僑加上華人少數民族）的數字更加不準確。大多數估計認為，這一數字在2200-2500萬人之間，其中約80%居住在東南亞，其餘則大多數居住在以英語為背景的北美和澳洲。在過去五十年中，海外華人的數量增長了近三倍，然而，由於一些地區有較高的同化與融合率，因此，並非所有具有部分中國血統的人都能被視為華人，許多人會反對這種身分認定。另一方面，如果條件發生了變化，如中國更加繁榮強盛、當地政府進一步與中國交好，那麼，這些華裔將有可能重新確認自己的華人身分，哪怕僅僅是出於特殊目的。當然，這也無助於我們確定海外華人的準確數字，我們不得不以這些粗略的估計為準。

然而，就我們的目的而言，總的數字並不重要。我們主要關注的是那些分佈在世界各地的華僑和華族，誰出於自身的需要而關心中國，誰在1949年時能被明確地稱為“愛國華僑”。從中國的角度看，所有的海外華人都可被稱作“愛國華僑”，但我的估計是：在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戰敗和中國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會之際，所有的華僑和大多數華人華裔都願意被視作愛國者。這並不是說他們將回國效力。大多數人將繼續生活在國外，並盡其所能地支持國內的家庭和同鄉。共產黨在1949年的勝利，使一些長期以來堅持民族主義的華僑的愛國熱情有所削弱，因為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馬克思主義陣營中所負的使命持謹慎態度。特別是國民黨的追隨者，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持敵對態度。但在年輕一代的華人中間，大多數為有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而自豪，許多人真誠地同情革命事業。

海外華人的立場也乏可靠的數據。最早顯現的是，海外華人的立場受其所在國政治傾向的影響。在東南亞，殖民統治的結束，產生了對居住在那裏的華人來說全新的環境。現在他們面對的是正着力於民族建設計劃的獨立政府。在那些承認北京政權的國家，大多數華人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那些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裏，則存在着支持台北當局的政治空間。因此，當地華人對中國政治的態度，受制於他們不得不生活於其中的新興政權的政策。大多數海外華人所關心的主要是外國政府對中國的尊重，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他們作為一個族群的尊重，從而消除這些國家的多數民族對他們的歧視。他們不希望當地政府將全球範圍內的意識形態對立作為變相歧視他們的一種武器。在那些華人構成爲少數民族的國家，尤其如此。例如，蘇加諾執政時期的印尼傾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駐印尼使館的官員保護那些希望得到幫助的華人。而菲律賓追隨美國，承認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因此，如果願意的話，菲律賓政府便可以懲戒那些被認爲是同情北京政權的當地華人。上述例子說明了爲什麼在1950年代，印尼的大多數華人傾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菲律賓的大多數華人則支持台灣。

在北美也存在着類似於菲律賓的情況，特別是在美國，儘管原因可能不盡相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華人未面對入籍的壓力，他們遠比東南亞華人較長時間地保留了中國國籍。美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對革命的意識形態是十分對立

的，尤其是共產主義。冷戰是一道嚴酷的分界線，幾乎沒有中立或猶豫的餘地。特別是如果大多數華人並非美國公民的話，情況更不可逆轉。當然，這並不能阻止一些愛國華僑在教育機構、國際組織和傳媒界爲中國的新政權工作，但他們幾乎得不到同情美國政府政策的華僑大社區的幫助。“中華民國”在紐約的聯合國佔一席之地達二十多年之久這一事實，足以保證它得到了大多數的支持。隨着時間的流逝，對蔣介石在台灣獨裁統治的失望，加之一些文藝作品對中國革命進行的進步的和浪漫的描繪，促成了年輕一代華人態度的轉變。但在其它美國年輕人開始改變對中國的看法之前，海外華人不得不保持沉默。最好的例子就是，有一段時間，1960年代晚期的“文化大革命”，喚起了美國具有反叛精神的年輕人的同情。這又在某種程度上激起了年輕華人積極參與如火如荼的反對日本佔領中國東海小島釣魚臺的保衛釣魚臺運動。這次運動使華人在不能直接、公開地表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和對台灣當局的反對的情況下，其愛國感情得到了渲洩。同時，也標誌着在美國對華政策發生重要變化的前夕，華人民族感情的重要轉變。

總之，在前二十年的時間裏，北美的國民黨官員得以宣稱，“中華民國”代表了中國革命，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使中國從屬於蘇聯革命的離經叛道者。最終，當美國的國家利益需要而導致了新的對華政策時，輿論與國民黨的這種宣稱發生了衝突。漸漸地，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種觀點，即國民黨變得越來越反動和反革命。這種觀點不僅在華僑本身創作的作品中反映出來，而且在華僑華人創辦的媒體中也有所體現。形勢開始向革命本來的意義上轉變，以致當美國政府準備從外交上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後果也被忽略了。相反，在1970年代初期，美國出現了兩種矛盾的情緒：一方面，是對革命青年的行為既讚美又厭惡；另一方面，卻做好準備迎接中國青年到美國留學，此外，還伴隨着一種要對中國的宗教進行啓蒙的新的宗教熱情。到了1980年代，情況又發生了變化，隨後我會詳談。現在先讓我們看看1949年以來的前半期東南亞的情況。

東南亞的情況迥然不同。在現在東南亞的十國中，有三國可以另當別論。我是指前英屬馬來亞（也即今天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亞。在這裏，有必要對它們作較詳細的討論。而另外七國的華人對中國的態度，在此不擬多加討論。我只想作一簡單勾勒以突出其共同點。這七國的華人社會相對較小，每國僅佔該國總人口的1-5%。各國華人社會中的不同集團，對中國革命的反應有相當大的不同。在這些國家中，大多數華人或多或少都經商。對他們而言，除了將對中國的左右為難的感情隱藏起來之外，別無選擇。因此，每一國家的華人大多數都接受了本國政府採納的對華政策。這意味着，當這些國家實行親華政策時，當地的華人會歡欣鼓舞；相反，當實行敵對政策時，他們則會感到低人一等。總之，作為商人，他們最關心的是既要不錯過任何與中方機構（總部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最好是在香港）做生意的機會，又不冒犯各自的政府。如果是定居在資本主義國家，那麼他們就懂得對共產主義不能有任何同情；如果是生活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那麼其大部分企業則肯定沒有發展機會。

現在讓我們回頭看一看這一地區其它三國的情況。從某種意義上說，印尼的情況類似於另外七國：華人人口較少（約佔總人口的3%），絕大多數華人除了服從民族政府的對華政策和對台政策外，別無選擇。但也有例外的情況。首先，整個印尼居住在城市的華人，其經濟境況顯然要好得多。其次，從1950年至1965年，蘇加諾總統很明顯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邊，而其繼任者蘇哈托總統則完全改變了政府的立場，在以後的廿五年裏，對中國持敵對和懷疑態度。這一轉變標誌着中國革命對印尼華人生活的直接影響。很明顯，這種影響既非持久不變也非可預見的。在1965年的事件中，當地發生了一些人認為是印尼華人共產主義者策劃的暴力革命，之後是鎮壓和屠殺，形勢對絕大多數華人而言發生了逆轉。其後果也並非全都是消極的。許多在蘇加諾執政的十五年中不得志的華人，由於這一轉變境遇大變，成為蘇哈托卅二年統治的財富受益者。

有證據表明，在1950年代，有許多年輕的華人確實欽羨中國革命的理想。一些人成為印尼共產黨的堅定支持者，而另外一些人則選擇回到中國，為新中國效力。然而，在1950年代中期，印尼究竟有多少人是中國公民，沒有確切的數字。在估計的二百五十萬人中，有約一百萬認同於革命。當然，我們知道，他們大多數人無從選擇，因為他們不具備印尼公民身分。在1960年代，當有機會選擇時，大多數人選擇成為印尼公民。因此，很難發現他們當中有人認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行徑。受環境所迫，大多數印尼華人被迫從事商業，以成為資本家為目標，因為許多正常的就業渠道，如公務員向他們關閉着大門。從贊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到堅定地信奉市場經濟，這

種劇烈轉變標誌着印尼絕大多數華人生存條件的嚴酷性。這種大起大落的經歷使印尼華人明顯地區別於其它地區的華人。

這使我想到了前英屬領地——現在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二戰結束時，一共有十五個這樣的領地：三個由英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四個由英國總督以馬來亞統治者名義代管的蘇丹王國、六個名義上受英國保護，還有兩個受英國的特殊保護，即沙撈越布魯克家族的遺產和今天稱爲沙巴的北婆羅州公司的屬地。我之所以強調今天被稱爲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兩個國家的細部特點，是因爲這些多樣化的統治方式，正是英國對各個不同州和領地的華人社區控制程度不同的原因，也正是這種多樣性使得這一地區的華人社區，能比東南亞其它地方更自由地組織起來。

直到 1947 年，馬來半島上的十一個屬地才走到一起，被統稱爲馬來亞聯邦。此時，馬來亞聯邦人口的約二百五十萬，也即 38.4% 爲華人。而在新加坡，七十三萬華人佔到了其總人口的約 77%。新加坡華人的這種優勢，是它未加入聯邦而仍保持爲英國殖民地的主要原因。從馬來人的角度來看，十一個州中，四個州的華人人數均已超過各州總人口的 50%，另外兩個州華人人數超過了 40%，這一事實，使未來的民族建設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因此，得到英國人支持的馬來亞領導人不願將新加坡納入馬來亞聯邦之中。¹

將新加坡島撇開的決定，與我們要講的內容有密切關係。如果將新加坡納入聯邦之中，那麼，華人人數將會超過土著馬來亞人，而這是馬來蘇丹、貴族以及新興的民族主義領導者都不能接受的事情。他們已經經歷了中國革命影響下華人民族主

義的興起及在 1920-30 年代這種民族主義將大多數華人團結起來，抗擊日本的侵略。太平洋戰爭之後，這種民族主義轉變爲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而如果讓共產黨取得對這一戰爭的領導權，那麼，華人將在一個獨立的馬來亞處於優勢地位。馬來領導人不能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並與即將離去的英國人緊密合作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因此，中國革命是促使後殖民時期的馬來亞各種反共產主義的力量進行結盟、並將當地華人排除在政府和軍隊核心地位之外的根本因素。

因此，在東南亞，出現了一種中國革命的最重要的表現形式——革命黨派的形成。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開始於歐洲、後傳播到東方並最終在海外華人中形成共產主義黨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帝國主義的鼓舞。在華人人數很少的地方，既不存在達一定規模的工人階級，也沒有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只有在英國和荷蘭的屬地，華人的數目具備產生革命的潛在基礎；也只有英屬馬來亞和北婆羅洲，才存在着可以被稱作激進無產者的華人集團。因此，毫不奇怪，正是在這些華人中間蘊藏着武裝革命的潛力。

對馬來亞共產黨的起源已有幾種主要的研究。顯然，儘管英國人成功地將共產主義扼殺在萌芽階段，但正是在 1928-1937 年的內戰中被迫離開中國的左翼理想主義者，奠定了共產黨的基礎；也正是其追隨者在馬來亞的抗日戰爭中堅持了共產主義。這一事實既激勵了革命的信念，也使革命在 1948 年馬來亞宣佈緊急狀態後陷入混亂。因爲這造成了馬來亞共產黨是從中國輸出的形象，並使馬共領導者如陳平及其少數的馬來人和印度人同仁無論怎麼樣努力，都始終無法改變這一印象。中國

印尼共產黨，大大加強了這一地區反共產主義和反華的力量。大多數同情中國革命的華人被迫退出政治舞臺。對那些幸存者而言，也幾乎沒有中立或回旋餘地。當受蘇聯和中國支持的越南革命將越南一分為二時，華人面臨着巨大的分裂。東南亞四分之三的華人分佈在反革命的、並最終於1967年成為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的那些國家。許多華人開始離開這一地區，不是到中國，而是去北美和澳大利亞等移民國家以及歡迎他們中間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的任何國家。這時，中國不再具有吸引力。而隨着“大躍進”的失敗和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海外華人更沒有多少選擇餘地。他們只能遠離中國及一切能遠離的地區，或者與他們所定居的新興民族國家和平相處。在革命在中國勝利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革命對東南亞的大多數華人已經失去了感染力。

1965年時，沒有人能預見新加坡獨立的後果。導致先形成馬來亞、後形成馬來西亞的複雜環境裏，蘊含着中國革命長長的影子。然而，1960年代中期，潮流逆轉，即使蘇聯和中國支持越南贏得了抗擊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爭，中國革命在東南亞華人中間也已失去了吸引力。儘管中國革命對海外華人社會的影響烙印猶深，但隨着社會主義陣營中兩大國家——俄羅斯和中國的決裂，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1970年代，積極的外交策略使中國取代了台灣得到聯合國的承認，這引起了對華政策的巨大變化，也為人們對革命進行不同的描繪掃清了道路。

或許在所有的變化中最重要的是中國自身對這種帶有自我毀滅性質的革命的揭露。毛主席重塑中國共產黨的巨大努力，使國內外的中國人大開眼界。而對革命的異化如此荒謬，以致

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給予馬共道義和物質上的支持，而英國、美國及其盟友包括台灣，在反共產主義的輿論宣傳上又將這種支持進行了極度的渲染，這樣就阻止了一般民衆走向革命。因此，雖然可以說中國的革命鼓舞了馬來亞相類似的革命，但也導致了它的最終失敗。在華人人數如此龐大的情況下，如果不是外部因素起了如此強大的作用，那麼，這一革命的結果或許會完全不同？又或許即使中國革命沒有對馬來亞產生任何影響，38.4%的華人最終也將只獲得不到38.4%的權力和多於38.4%的財富。在此，我不想再作任何推測，至於中國革命的其它方面及對這一地區的影響，我將在本演講的最後一部分加以討論。

讓我們回到1950年代，當時的新加坡本來可以成為被稱為馬來亞的單一國家的一部分。這種可能性增強了那些人的希望，他們認為革命就是反對殖民統治，東南亞必須接受這一現實。人們認為，新加坡華人衆多，因此，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就可以將自身的命運與中國革命聯繫在一起；而人數衆多，也肯定有助於華人獲得政治權利從而決定國家的命運。這些希望使英國人去思考如何使新加坡在將來納入獨立的馬來亞。受印尼對抗政策的啓發，英國人將其屬地進行了重新安排，將沙撈越和沙巴納入其中，使新加坡能加入被稱為馬來西亞的更大的聯邦。這一合併於1963年完成。但未持續多久。在一年多的騷亂後，新加坡被驅逐出聯邦之外。在此次騷亂中，華人的民族權利懸而未決，種族衝突造成了幾百人死亡。

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在已經展開的情節中，中國革命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在新加坡被逐出幾星期後，印尼軍隊消滅了

在1970年代末鄧小平復出時，“革命”一詞已完全失去了號召力。而當大多數海外華人對此表現出毫不掩飾的寬慰和喜悅時，標誌着最根本的轉變已經來臨。

難道說海外華人是自相矛盾、天真幼稚及虛偽的，對中國革命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和虛妄？或者說他們只是表面上如此？他們對此類問題的種種反應，我們還缺乏深入的研究。畢竟中國人本身對革命先是熱烈擁護繼而置之不顧的態度，人們還未能充分瞭解。在此，我能說的只是如何探討這一宏大課題的一些初步想法。

我相信，如果不從支持像孫中山這樣的人的民族革命的興起談起，我們對許多問題將難以理解。這些運動包括反對滿族統治的一般協會、渴望中國能在世界上發揮其應有作用的商人組織以及那些留過洋的推崇使西方列強得以實現近代化的革命的新型知識分子。當1897年孫中山看到，在中國之外，他不僅僅是叛逆而是革命者時，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因為他得到了世界的承認和尊重，這一新形象將他的行為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他從未停止不前。“革命”一詞伴隨其終身，直到今天，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還是在海外華人中間，當人們提起他時，仍將他視為革命的代名詞。

總之，“革命”是近代中國的遺產。隨着從民族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革命，再到共產主義革命的轉變，革命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已顯得遠不重要了，它只代表着新中國，代表着在英雄人物的領導下中國的再次繁榮昌盛。實現這一願望的方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尋求正確革命之路的人物應受到極大的尊敬。華僑對此所抱的熱誠不亞於國內的同胞。孫中山

在夏威夷、橫濱、神戶、舊金山及溫哥華的最熱情的支持者，提供了資金方面的支持。新加坡、檳城、怡保、吉隆坡、西貢及河內的華僑也同樣如此。最值得稱道的是無數回國為革命而戰的華僑，他們中不少人甚至獻出了生命。海外華僑與中國革命的這種聯繫變成了傳奇。華僑在中國之外為革命的興起做出了貢獻這一事實，在以後的幾十年裏如果不是也吸引了華僑的錢財，至少也牽動着他們的感情。對於這些遠離故土、對家鄉懷着既寬慰又內疚的複雜感情的人而言，這是他們最起碼應該做的。

所有的這些都在繼續，儘管半個世紀以來革命並不很成功。孫中山1912年的總統任期是有史以來最短的。在隨後的十五年中，軍閥和土匪割據了中國。後來成為僑民的孫中山國內的追隨者開始分裂為民族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西化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但是，只要他們仍代表通向革命的同一直標——一個近代化的中國的不同道路，他們就仍然受歡迎。整個1920年代至1930年代充滿了失望，但當日本侵略中國時，海外華僑被新的危險所激勵。因此，愛國戰爭、各種救國活動、抵制日貨以及回國參戰等都成為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太平洋戰爭結束後隨之而來的毛澤東軍隊的最終勝利，使得海外華僑歡欣鼓舞就不足為奇了，這一勝利在當時被許多華僑看作是所有革命中最純粹的革命。

海外華僑對中國革命的內容興趣濃厚嗎？較早期有康有為（也即前保皇黨）與孫中山（也即1911年以前的共和黨人）的支持者之間的論爭。中華民國成立後及其需要支持的時候，僑胞明顯地分為自私的軍閥和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理想的愛國主義者兩種傾向。在1928年以後的二十年裏，絕大多數華僑將國民黨

是毛澤東驚人的軍事勝利。隨之而來的中國大陸的統一是1911年以來的第一次，這一事實，對所有的海外華僑都有產生了強烈的影響。然而，其中也包含着渴望和希冀：這一次，新的領導人將給人民帶來一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不曾擁有的和平和繁榮。除此之外，中國之外的許多華人是否真正關心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經典著作所包含的內容，頗值得懷疑。他們所代表的思想確有感染人之處，例如毛澤東講話中的民族主義和平均主義思想等。但是，最令人讚佩的是使他獲取最終勝利並為中國帶來新的尊嚴的戰略思想。

能被稱為“愛國華僑”的華僑無論如何都會熱愛中國；華族大部分從事競爭激烈的商業活動而不願涉及任何政治；成為當地公民的華人則認同其政府的立場。除了馬來亞和新加坡華人中的一些學生和無產者外，幾乎沒有多少證據能證明，共產主義目標在海外華人中間具有重要性。在其它地方，共產主義在當地人中間的吸引力要大得多，也確有一些持理想主義的年輕華人參加了當地的共產主義運動。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自身的存在、它所樹立的強大形象、它所喚起的尊嚴以及它所表現出的權威。總之，華僑不可能完全擁有這一切，華裔為具有中國血統而深感自豪並希望中國的存在能有助於他們的安全和生活。而對那些擁有當地國籍的華人來說，他們一直盼望着這一天，即其中國血統是財富而不是累贅。因此，隨着鄧小平1978年的復出和經濟改革取代了社會和政治變革，歷史出現了一個新開端，其中革命不再是一個具有魔力的字眼。最終，在中國的主要目標與海外華人的渴望之間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切合點。

政權視為中國生存下去的唯一機會。民族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內戰使海外華僑憂慮重重，他們既不完全理解也不真正贊成這一戰爭，特別是當這一戰爭無邊無際地蔓延時更是如此。這些僑民所能接觸到的媒介解釋了這一意識形態對立之關鍵所在，許多人在激烈的論爭中作出了選擇。

在那些建有不少近代化學校的華僑社區中，政治化了的教師向那些準備回到中國（無論是學習還是工作）的年輕一代灌輸各種革命思想。究竟有多少華僑完全置身於中國革命，很難作出準確的統計。所能看到的是，大多數華僑關心革命，一部分人並為他們選擇的革命而戰鬥。但是長遠來看，由於在當地求生存佔據了他們的大部分精力，因此，當黨爭似乎是沒完沒了且毫無用處時，在每一華僑社區，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不再熱衷於中國政治。到二戰結束時，華僑和華人都渴望飽受戰火蹂躪的中國能得到和平，被嚴重摧殘的中國經濟能得以重建。對高層腐敗的日益厭惡及難以控制的通貨膨脹使許多華僑不再返回中國。至此，大多數華僑已認識到：他們的未來在國外，在國外能比在國內更好地幫助中國。

那麼，1949年以後的共產主義革命目標是否對海外華僑影響更大呢？海外華人中間的一些激進青年為前政權的腐敗政客和官僚的下臺、為在農村進行的激烈的土地改革及舊制度的粉碎而歡呼；其他人也為古老的傳統被他們認為是現代的進步的思想所取代而高興。一些人走得更遠，抱着他們能幫助中國重建的信念而回到中國。無論如何，對大多數海外華人來說，無論其年齡老幼、信仰如何，都清楚地意識到他們生活在中國之外。他們並不能決定中國真正需要什麼。最能引起他們喝彩的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漫長革命給了大多數海外華人巨大的希望，但也帶給他們極大的痛苦。今天，他們對此又作何評說呢？他們首先想知道這場革命是否已真的結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不管以後會出現什麼情況，是孫中山開始的這場革命的最後階段嗎？如果說是，那麼，經過痛苦的漫漫長路，中國走到了今天，欣慰中不免令人略感傷感。如果說現在對革命一詞的放棄，只是更曲折革命之路上的暫時停頓，那麼，要讓國外的華人再一次擁護中國的另一次革命，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是漫長的一個世紀，由於對倡導革命的領導人懷着極大的尊敬，中國人在革命的名義下已經承受了太多。世界本身已經發生了變化，在某些方面它可能比中國曾經經歷的更革命化。新的一代，無論是華僑、華族還是華裔，能比其先輩更好地判斷前路在何方。這些海外華人在世界各地的新家園中安居樂業，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和擁有專業技術者，在思想觀念上越來越國際化。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他們可能將中國革命當作歷史來看待，其中有鼓舞有輝煌，也有悲劇和失敗。革命對他們而言，仍是一個令人敬畏和惹人悲傷的話題，但是他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成敗，革命在中國已經告一階段，而他們仍需要繼續前行。

* 本文是王賡武教授 2000 年 3 月 28 日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是該校組織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系列演講的一部分。中譯文原載《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40-47。張秀明譯，劉宏校。

注釋

- 1 以下是 1947 年英屬馬來亞各地華人人人口最重要的數字：
 - 1 華人為 38.4%，也即 188.5 萬人（馬來亞聯邦）。與此相比較，馬來人為 49.2%（即在 490.8 萬的總人口中，佔 242.8 萬人）。
 - 2 在新加坡，數字為：華人佔 77%，即 729473 人，馬來人為 12%，即 113803 人。
 - 3 爲了作比較，華人較具規模的馬來聯邦其它州的數字如下：

| | | | |
|-----|-------|-----|-------|
| 檳榔嶼 | 54% | 雪蘭莪 | 51% |
| 柔佛 | 48.1% | 霹靂 | 46.6% |

大中華與海外華人

在本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中，一些最重大的發展，發生在亞太地區。其中，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中央實行計劃經濟轉變過來，實施建立市場經濟的中國人，已取得了廣泛的成果。這些使得人們對作為世界政治中一個有力扮演者的中國的重新崛起，進行更多的深思。大中華的理論就是這些深思的成果之一。“大中華”一詞雖然缺少精確性——不管它是應該包括香港-澳門(今後的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還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但要探討目前和將來的發展，仍將不能不使用它。在本文，將用它來考察大中華概念對海外華人的影響，顯然這一詞將不包括那些生活在國外的中國人。¹ 雖然如此，由於強調的方面不一樣，其包含的實際內容也各有側重。

例如，若將重點放在政治上，當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包括澳門)融於一體，那麼大中華將用來指一個未來聯合起來的中國，即一個統一國家的“中國”。如果強調點放在經濟融合的動態進程上，那麼大中華就僅僅指南方沿海省份、台灣和香港，也即中國南部經濟帶，也許更精確地應該說是“次中華”。然而，若強調的重點是從文化中國的角度出發，那麼這一詞即指中國的文化傳統及其在當代的衍生。在本文，可以這

樣說，大中華已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它蘊含着現代人借用它來強化了的文化價值、影響和傳承。其結果，是有可能使現在寓居在海外的上百萬華人少數民族融入其中。

大中華這一詞的缺點是，從政治意義上說，有着對週邊區域擴張的暗示；從文化意義上說，好一點會被誤為是誇耀，壞一點即被誤為吹噓。在目前的歷史階段，只有外觀上接近完成的指南部中國經濟帶的“次中華”這一詞經得住推敲。雖然如此，因為大中華一詞在今天使用已越來越多，本文將還是試圖用這一詞來說明它對海外華人的影響。

“海外華人”(Chinese Overseas)這一詞也並不比大中華一詞準確多少。我是有意避免使用“華僑”(Overseas Chinese)這一舊詞，它指旅居的華人，暫時居留在海外的中國國民或公民。到目前為止，它才作為一個詞，用來指所有中國人的後裔，也就是說，指所有那些有一個仍被看作是華人的華人父親的後裔們。現在，“華僑”不再包括那些已成為外國公民的人。由於大部分生活在國外的中國人已經取得了其所在地的國籍，所以把仍是中國國民的少數“海外華人”和已成為外國公民但被作為少數民族的多數華人區別開來，是很重要的。² 但為了本文的目的，這種區別可能不太必要。遺憾的是，目前並沒有一個普遍能被接受的詞，可用來包括所有居住在國外的中國人，把不管是中國國民還是外籍華人少數民族均包括進去。有時也會使用“散居外地的華人”(Chinese Diaspora)這一詞，但並不讓人滿意，因為它和猶太歷史的聯繫而不被東南亞所接受。所以我選用“海外華人”來指居住在國外大中華圈內中國人後裔中的每一個人。³

還應進一步注意一點，有些媒體的文章中已把“散居外地的華人”判斷為包括台灣和香港人，⁴雖然本書中的大中華包括了中國、台灣、香港在內，但“海外華人”一詞則顯然不把這些人包括在內。這裏它(海外華人)是指除這三個區域以外居住在國外的所有的華人，他們承認自己的華人籍貫，或者被人口統計學家如此認為。這樣的華人有多少還沒有準確的數字，最廣泛接受的數字，範圍是在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之間，其中五分之四居住在東南亞。⁵

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遠景中的大中華

在這本書的其它文章裏所描述的是大中華之內的发展，重點是以少數南方省份、香港和台灣為主體。我們必須重點注意到，大多數海外華人都來自於南方各省，即使在不是來自於南方各省的移民中，大部分人在移民之前，也都會在香港或台灣呆過一段時間，特別是二戰結束後不久才離開的那些人。這些華人和中國南部經濟帶之間的密切關係，可以說是有機的、根源頗深，然而同時亦是發展和動態的。這種關係具有巨大的潛力，充滿着對歷史的回憶，有豐富的情感紐帶。這種關係下許多目前的經濟測度，是和它深厚的背景分不開的。這並不是否認政治和大傳統下的文化中國、儒教國家之間一貫存在着的聯繫，但大多數時候對大多數華裔來說，他們只知道並只關心中國南部。對他們來說，他們和中國南部的緊密有機關係，與對大中華正式的象徵性的關係之間的差別，是他們在家參加社會活動的一個重要部分，不管他們受過什麼樣的中國教育。⁶

有另外兩種關係可以把它們明顯地區別開來。一種是中國沿海和鄰國之間的古老聯繫，如韓國、日本、越南和其他東南亞這些國家，他們之間已有上千年的商貿往來，幾世紀以來也不斷有人移民到這些國家。另一種相對來說是一種新的關係，即中國人——大部分仍是中國南部沿海的人——與美洲、澳洲、亞洲其它國家、歐洲以及非洲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於西方在中國擴張之後即已開始。在本文的相應之處會指出這種區別，否則在提到海外華人時，將包括所有在國外自稱或被認定為中國人的所有華人，不管他們已選擇定居在何處。

近幾十年來，從1949年到1980年左右，當中國大陸大面積地對國際貿易體系開放時，又出現了另外的一些差別，這些差別來源於廣東-香港-台灣之間不平衡的三角關係，以及海外華人怎樣對這種不平衡表示敏感。香港被認為是能與中國大陸發生最有效經濟聯繫的中心樞紐，特別是對所有與中國南部有着非正式關係的人來說。台灣建立於五十年代，在那之後至少二十年裏，它和許多非共產主義國家裏的華人有直接的、獲取商業利益的聯繫，尤其成功的是在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和美國，以及部分拉丁美洲、其餘一些亞洲國家、澳洲和非洲。但是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台灣並未與中國南方建立關係。⁷

曾經有一段時期，中國大陸和印度尼西亞、緬甸、印度支那，以及蘇聯和歐洲、亞洲、非洲的一些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前沿國家裏的華人保持着自己特殊的關係，但它更多的是一種動蕩不安的政治關係，而不是有利可圖的商業關係。⁸廣東-香港-台灣這種不平衡的三角關係，顯然對大中華的成長沒有直接

的幫助，或就這裏所定義的中國南部經濟帶來說亦是如此。無論怎樣，在八十年代中期它變得不那麼重要了，但在考慮當前的融合力量是如何對經濟起作用，海外華人作為一個整體怎樣去對它們作出反應的時候，它仍然值得留意。

在這樣一篇簡短的文章中，只可能去對大中華顯著發展的主要特徵作認辨，對這些特徵對大量海外華人產生的影響作一概覽。這將從三個前景方面去作觀察思考。在經濟事務中，新的投資機會和加強聯繫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從政治變化的觀點來看，在大中華的各個組成部分一直在上演着沒有結束的戲。大部分改革喚起了人們的希望，但是同時也有事件在加深着痛苦和絕望。對於接踵而至的文化爭辯，則導致他們既自豪又低沉。

顯然最引人矚目的是經濟方面的前景。⁹自從1984年《聯合聲明》簽署以來，香港的華人金融家、企業家、旅館經營者、富翁已經在中國南部進行越來越多的投資。漸漸地，台灣開始對這些地區也有了類似的投資。當然，大陸公眾組織近來也在香港大量投資。因此對一體化的展望，可能將使整個地區成爲一個完整的經濟區。在這期間，衆多報告稱海外華人加入到大陸投資熱潮。這有多麼重要呢？

東南亞一些成就突出的企業和商人近來頻繁地出現在報紙的大標題中，其中著名的有印尼的林紹良 (Liem Sioe Liong)，黃奕聰 (Sinar Mas 公司) 和李文正 (Mochtar Riady)，¹⁰ 泰國的謝揚初、卜蜂 (Charoen Pokphand) 和陳弼臣 (Sophonphanich) 家族，¹¹ 以及馬來西亞的郭氏 (Kuok) 兄弟和豐隆 (Hong Leong) 集團。¹² 在每一實例中，他們都與香港做生意，並在這個地區建立了基

地。許多人已把他們的商業王國擴大到美國和歐洲，可被稱爲多國商人。即使如此，在根源上他們仍被認作印度尼西亞人、泰國人或馬來西亞人，但許多本地政治家和媒體評論員，則傾向於強調這些企業的開創者和繼承者主要是華人這一事實。

早從八十年代初以來，這些“華人多國商人”就通過他們在香港的基地，開始尋找在大陸投資的機會。一些人已懂得去小範圍地在某些特殊區域內投資獲益，特別是在他們仍有親戚居住、祖輩生活過的鄉鎮。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到中國來投資不是爲了在生意上獲利而是爲了其它原因。但一旦時機成熟，他們也有明確的準備在更大程度上進行投資。他們等待的是，中國在擴大和穩定經濟增長，歡迎並保護外國投資者方面的堅定承諾。毫無疑問還有，一旦時機一到，這些企業和經營者具有的對中國的瞭解，以及他們對“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相當的熟悉，會被華人權威視爲巨大的優勢。在那種情形下，這些企業家期望能以此受惠。

這些東南亞華人與美國或別的什麼地方的一些成就突出的商業人士多少有些不同，後者在八十年代早就表現出投資於中國的熱情，並且他們不通過香港基地而直接同北京接觸。這樣的例子最著名的是美國的王安，但其他像唐仲英 (Cyrus Tang) 和王嘉廉 (Charles Wang) 這樣的人也很積極。¹³ 對他們所有人來說，這全是因爲鄧小平訪美後在政策上發生重要變化。¹⁴ 然而，這些華人作出了不同的反應，其差別甚大，從熱情的到極端謹慎的都有。過去與現在實踐上的真正差別是從1990年後開始的，很明顯，從那時起中國主要開始實行市場經濟，在這一點肯定之後，這些國外的公司就開始大筆地進行長期投資。

當然，也有許多來自東南亞、日本、歐洲、美洲和澳洲的較小的投資者，他們已經開始探索中國市場，從艱難的經驗中學習，為未來的冒險事業尋找合適的聯繫，這些人有多少，沒有可信的資料。雖然大部分材料如同軼聞，但他們的投資興趣和投入準備仍給人留下強烈的印象。目前階段下，也只能說，許多這些無名無聞的投資者，在過去十年左右裏給他們各自家裏都小有匯款，在生意上小有收益，為1990年後的強勁出擊提供貯備了大量的資金和經驗。¹⁵

這些大多數的小型公司都很難穩固下來，因為他們很少直接從他們自己國家拿出大量的資金到中國。最基本的操作也需要在香港建立分公司或代理機構，以便把基礎準備好並保持聯繫。這樣到中國為他們做好準備的時候，許多公司就實際上能像香港公司那樣去運作，這二者及其代表海外華人投資利益的公司，彼此之間的界線實際上也是模糊的，除非那些傑出的公司公開聲明，否則很難認出哪些是海外華人的投資。對這些華人多國商人——尤其是那些來自於東南亞的——來說，有一點是很明確的，他們是在充分瞭解其政府的基礎上去進行投資的，而且他們經常還得到他們本國政府領導人的直接支持。¹⁶ 關於此點的重要性在後面將討論到。

還應該注意到的是，在香港有基地的公司，開始跟隨他們的香港同盟及競爭者一起集聚到廣東，特別是深圳和珠海附近的珠江三角洲。對他們來說，中國南部經濟帶——逐漸已包括福建與浙江——不斷增長的經濟一體化是安全的。¹⁷ 八十年代晚期，越來越多的台灣公司的進入更加強化了這一觀點。¹⁸ 一直到1992年初，所有這些投資分別所帶來的利潤，逐漸鼓舞了一

些人在更進一步的範圍內投資。這以後，開放之門越來越大，一直到達揚子江流域，到達內地的湖北、四川，越過北京直到東北。¹⁹ 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內平等獲利的增長刺激是一個巨大的鼓舞。毫無疑問，這種效果就像開香檳酒瓶塞一樣。

其結果大中華成了這樣一幅圖景：瘋狂掠奪，困擾於混亂的無政府狀態邊緣，腐敗和法律缺乏的例子以及中央政府不能控制的事件越來越多。這種狀態因中國內部的結構性問題而起，對實際上和潛在的海外華人投資者所做的事情來說，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但也不會因為這些華人已做了或即將做長期投資而歡迎他們。他們中間一些人可能會時時受感情激動，但所有跡象都表明，他們每邁出一步，後面都有對利益進行冷靜的算計。²⁰ 如果中國的投資環境惡化，如果存在國內無序，如果在中央或中央與各省之間存在權利爭奪的激烈爭鬥，這些華人將迅速撤走他們的資金投放在別的地方。

然而政治上的大中華，隸屬於不同的層面。未來聯合統一的構想，指出一個強盛中國的前景，在世界事務中再次被提出來。海外華人對中國在國際中的位置一直有特殊的敏感，即使不能提高他們在各自家庭所在的國家裏已擁有的地位，也會給他們帶來自尊和自豪。今天的海外華人和他們的祖輩是否已很不一樣了？或許不是這樣，如果他們仍然把自己看作是華人少數民族，並且拒絕完全同化於主流社會。在客籍社會(host community)相對可以被接受、華人移民後代已很舒適和成功的地方，代與代之間的差別可能會越來越大。在普遍存在歧視、在明顯的群體之間存在種族隔閡的國家中，今天的華人少數民族可能會和他們的前輩一樣充滿防衛和自豪。²¹ 但各個國家都很

不一樣，其差異太大很難予以概括。代溝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其重要性仍比不上民族政策、他們所生活下的法律體系、教育和商業的機會，還有對待傳統文化價值的態度不同，也是彼此之間產生差異的因素。一方面，作為中國人他們感到舒適而自己也擁有一份自豪；但另一方面，在收留他們的國家裏，他們也有打算不真實表露自己華裔性的想法。

與此同時，還存在着世界上最後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強大國家，它是繼蘇聯之後的接替者。²² 海外華人也有不同的反應，這看他們居住在什麼地區。在東南亞——在此地區很容易感受到中國的力量——存在着很大的正反複雜感情。今天，對共產主義的美麗承諾已很少有人去作出反應。對“社會主義市場”的新政策，許多人都很放心，它也使得中國越來越能被東南亞政府所接受。大中華的提出不僅是為有利可圖，它還作出了共產主義不久就會消亡的承諾。假如這些情況發生，在其所居住國的自由經濟下通常受惠巨大的海外華人，他們將會更加沒有障礙地去經商、投資於大中華，以至於讓他們的孩子去學習漢語並把它作為經濟發展中的主要語言。

然而，不管他們對政治大中華抱有什麼樣的期望，海外華人對未來並沒有控制。對中國自身來說這大是一個問題，對海外華人他們各自政府在其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政策來說也大是一個問題。無論如何，文化中國更能被接受，他們自身去決定對此作出反應也較容易。在重振文化大中華的許多層面上，都能得到接受。這兒有一個最基本的層面，即單純熱愛並為中國的任何東西而自豪，從文字到語言、風俗、節日、食物以及有關中國的消息開始，範圍包括加入華人的組織並參加他們所有的

活動，迫切要求去中國訪問，為所有訪問的高級華人而捐助所有的華人慈善機構和社團，決定讓自己的孩子或孫子掌握漢語，維持甚至提高他們中國化方面的才能。在那樣的層面上，大陸、台灣和香港在文化中國上因為鮮明差異而有的限制似乎不成問題。²³ 他們可能有着令人迷惑的區別，有時還互相對立，但他們所堅持的仍都是中國化的。

然而在另一層面上，一種重新復甦和增強的中國文化在這些受過中文教育的人中已被喚醒，期望保持行動和知識分子的努力。這可以採取許多形式，取決於這些華人對文化改變的方向作什麼樣的預測。這些人，不管是對沉重的歷史傳統而言，還是對馬、列和毛澤東讓人疑惑的革命價值而言，或者對二者之間的其他情形而言，他們可分為認為大中華中的文化已被外國舶來物所扭曲的，和認為文化中國還太多地被傳統所束縛這兩類。²⁴ 這樣的華人他們想重回到大中華親自去看一看，好為未來提供一個更好的模式，這種模式更民主、對法律更尊敬。同時，他們可能也很關注讓年輕的一代去欣賞四書、漢唐詩歌、宋畫和散文，以至明清言情小說——不管是什麼，只要它能把中華文明從腐朽和污亂中拯救出來。²⁵

此外，也還有另一種層面存在於文化大中華中，它可以阻止年輕的海外華人同化失去自己的身分。在東南亞——那裏的華人少數民族不得不保持柔順——可以通過非中文的語言去學到大中華的文化、文學和藝術。例如，在十九世紀明清小說就已被翻譯成馬來語、泰國語和越南語。²⁶ 今天，經典文選已被譯成國際語言比如英語，供人們閱讀。同樣地，現代作品，不管在政治上正確與否，都被作為現代文化——文化中國乃其中一個重要

組成部分——全球化的一部分而同樣被關注。²⁷ 而非語言的藝術和表達可能會更有力。繪畫和音樂可能只會觸及對此有清楚瞭解的少數觀眾，而電影、電視、聲像和其他形式的技術則會產生更大的影響。²⁸ 一旦文化中國在它的各個領域內出擊，帶着神韻活力和高技巧，那麼今天的海外華人就沒有人會遠離它的魅力，幾乎沒有人能拒絕它對他們的召喚。

上面這些積極的看法，是假定關於中國方面今天大多數海外華人的透視都很淺近，他們對過去幾乎沒有什麼感覺，而同時又有一些較近的興趣，他們對喜歡還是不喜歡做一個華人少數民族有着一些直覺。此外它還假定，海外華人已贏得承認的那些國家，會相信在其華人少數民族社區內不會發生暴力，信任這些社區對中國所抱有的那些觀念和感情。但這在許多國家並不屬實，特別是在亞洲大部分的國家裏，尤其是在東南亞。甚至是在美洲和澳洲的移民國家裏——在這些國家公民的寬容和保護自己的法律會讓華人少數民族更能自由地保持華人的特點——主流文化的強大統治優勢也能對這些移民的後代們產生巨大的壓力。²⁹

這兩種假定必須併列起來，事實之一是海外華人的歷史已有好幾百年，事實之二是多數海外華人居住國的政治在二十世紀中已得到成長發展或已歷經激進的變化。今天沒有一個研究海外華人對大中華作出反應的，能夠忽略歷史背景變化的重要性。本文將考察最近歷史上的兩個問題，它們可能對今天大中華對海外華人產生的影響有所啓發。

海外華人想要知道的第一個問題是，迄今為止大中華的成功，是否是由近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和經濟政策轉變所決定的。這些華人希望大中華的前景應依靠於這樣的政策：有一

個穩固的政體支持它，並有其它力量的政策能使它保持不變。第二個問題是，大中華的這種發展，是否是在全球經濟和政治環境下不可更改的一種結果，在這種環境中三個政權（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全都沒有其它的選擇，而只能用他們已經實施了的那些不同方式，去提高中國南部經濟帶的發展。如果這些改變是根本性和永久性的，它們將深遠地影響海外華人對大中華未來的態度。

爲了回答這些問題，存在着一些歷史的相關要素。大陸中央政府新近的政策應怎樣去和更早期政府的政策作比較？這種變化能在多大程度上表明，它在根本性地邁向穩定政策，能在這個地區維持新的平衡？在面臨新的世界秩序或者至少在面對新的地區關係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未來的發展上有多脆弱？不同的海外華人群體對大中華所持的概念，都取決於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同的群體在他們各自的領域、國家和地區裏，也許需要對他們各不相同的角色重新認識。一個充滿經濟活力的大中華，給他們決定在大中華中將要做的、給他們對各自政府的效忠、給他們對自己族群性的感情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本文的餘下部分，將首先關注海外華人對中國對待他們的政策的經歷，試圖把目前的狀況放在遠景中考察；其次，將討論一個成功的大中華會影響不同海外華人群的方式，討論他們對他們的民族和文化認同、他們的政治和經濟未來所作出的決定。

中國國家與海外華人圈

對清代最後幾十年前的上幾個世紀的帝國政策沒有必要去詳細研究。完全可以這樣說，從唐代到宋代一直到元代，中國

與其它亞洲國家的個人貿易是伴隨着從屬於官方的自由貿易而發展的，數量從不會太大，包括於其中的中國人也永不會太多。但是到了十四世紀末葉時政策有了重大的改變，³⁰ 當明朝的創建者認為做生意的外國人給中國沿海帶來了混亂，便禁止個人和外國貿易以便有所好轉。這已是在有少數海外華人社群出現在東南亞之後一段時間了。明朝禁止個人海外貿易政策的結果是，割斷了這些社群與中國的聯繫。所有後來的貿易，就不得不被明朝官府緊密控制在手的官方貿易團所牢牢掌握。

政策雖然已經明顯地被改變，但是中國境外數目增多的這些華人商人團體，越來越多地和歐洲公司進行貿易，偶爾還會被隸屬效力於歐洲機構。由於中國商人缺少清朝滿清官吏的支持，而歐洲商人卻有他們各自的政府在財政和軍事上作後盾，這之間極大的區別，促使海外華人的貿易頭腦和文化也變得成熟精明。這使得他們怨恨中國官府對他們不加看管，同時夾雜着對歐洲商人擁有優遇的艷羨。但這也給華人社群帶來了高度的自立和自信。這種自信包含着對外國權威機構的適應能力。³¹

雖然如此，海外華人愈加最企盼的卻是有一個強大的中國來保護他們來面對有國家撐腰的西方人。不管是1850年代後的清代，還是1911年以後的中華民國，都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但是，西方競爭帶來的貧困和分裂雖然使它們很貧弱，這兩個政府還是確實注意和嘗試提供外交支持，這在國外的中國人中受到廣泛的歡迎，在1920到1930年代，這些人在商業方面的成功，在財富方面的增長以及衷心的感激之心，使得他們感覺正是海外華人，現在能拯救貧窮且遭戰爭蹂躪的中國，通過投資，通過愛國主義和新的民族主義，如果必要還可用革命的方

式，借此他們能夠再一次富強。這帶給他們中的許多人以鼓舞、理想主義、和為國捐軀的自覺。³² 1895年中國被日本打敗，直到1930年代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年復一年地遭受了許多侵犯，這加強了他們的愛國奉獻意識。華僑（即僑居海外的華人）向中國投資四十多年仍不是很成功的唯一原因，是因為中國遭受到了內戰的苦難和外國的侵犯。在整個那段時期，華僑投資不僅僅主要是為了利潤，而且還遠遠超出他們獲利的職責來支援中國的經濟。³³ 當他們認識到在這種環境下要想有所幫助，投資於中國並非是一個最好的方法時，許多人就在國外到處掙錢，這樣他們能夠將資金匯回來支持政府盡力去捍衛中國。

1949年以後，一個統一、強大的新形象的中國代替了分裂和無助的舊中國。但這會給海外華人帶來什麼呢？成百上千的人返回來要重建他們的祖國，但更多的人離開中國大陸去了台灣和香港，從這些地方，尋找可以接受他們移民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他們中間上百萬的人留在了他們過去所在的地方，並學會面對一個新獨立的民族國家，特別是大量已經選擇居住東南亞的人。³⁴ 當美洲和澳洲移民國家的國門敞開之時，華僑的新一代就去加入到早期的移民和他們的小群體中，其中包括相當數量來自東南亞的再移民。³⁵

當要考查現存於大中華之中的信心和熱忱之時，必須要考慮到海外華人對強大的中國、弱小的中國、強大的中國這種輪回作出反應的大致情況。大多數老一輩的東南亞華人對這種歷史都很熟悉。他們的兒子和孫子們可能也聽過這種常常被講述的關於中國對國外華人的政策的故事，但這些人不太可能對此作一系統的歸納思考。特別是在美洲和澳洲移民國家中的人，

甚至至今對此所知甚微。³⁶ 因此對許多今天的海外華人來說，這將有可能使他們誤解大中華的出現，誤解新政策的形成，而這些政策是歡迎他們幫助來重振中國偉業這一空前事業的。

歷史的來龍去脈可以幫助我們得知未來將會發生什麼，此處不宜詳加論述，但是下面用中國海外華人歷程或者 CG/CO 歷程這樣的術語，可以提供一個自清朝開始後中國和海外華人關係的概略。

(一) 從 1680 到 1840 年代清帝國的強大繁榮時期。³⁷

中國政府 (CG) 漠不關心海外華人的命運；

海外華人 (CO) 面臨着巨大的障礙，但是學會了自足和獨立，並在商業上不斷成功。

(二) 上百年的積貧積弱時期：1940 年代到 1949 年 (貧弱的清帝國之後緊接着是被內戰分割和遭受日本侵犯的中華民國)。

CG 承認並支持 CO，但希望從他們那裏謀求政治上的效忠，以及從富裕的 CO 那裏得到經濟上的投資；

CO 的數量較快地增長，華僑響應中國的需求，總體來說也變得較為關心；他們繼續在經濟上保持繁榮，但也對中國政府連續的失敗感到生氣與羞辱。³⁸

(三) 毛澤東時代 1949 到 1976 年：強大的國家，貧窮的人民，生活在冷戰和美蘇“中心平衡”的陰影之下。

CG 集權但並不順利，在外交孤立和意識形態迫使下對 CO 採取了一種無效政策，若不加區別可以說又回復到了以前的那種漠視態度。

CO 面臨着新的障礙，重須學會怎樣自足與經濟上的自治，開始變得政治上本地化與歸屬化，若不如此則將被中國政治強人所分開。³⁹

(四) 自 1978 年改革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對於中國週邊鄰國和它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來說，其潛力已愈強大而且繁榮，但是仍然處在第三世界貧困的邊緣。

CG 回復到承認並適度支持 CO，但出於防護祇歡迎投資而不企求忠誠。

CO 再度增長迅速，但他們仍保持着同情甚至關心；由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們已更適應國外的環境，被大中華的承諾所吸引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體制有保留。⁴⁰

上面概述的 CG/CO 歷程，只是對在中國政治強與弱的輪換時期中中國政府與海外華人間的相互關係作了一個相當簡單的描述。由此可得出一個較清楚的海外華人行為模式，這種模式對中國潮起潮落的政治鬥爭、中國對外和對經濟的政策都十分敏感。在他們有了長期的經歷之後，大多數已長久居住和本地化的這些華人，不太可能被大中華現時的发展所影響，而更傾向於等候新的跡象出現，這些跡象必須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穩定，以及北京政府對調整全球和區域關係的能力。有一些最富有的在香港有基地的海外華人，對中國南部的經濟表示興趣已有好多年了，並表示願意冒小範圍內的風險。到目前為止，事實是他們更寧願，至少是自己限制自己，通過他們在香港的基地做一些短期的投資。⁴¹ 即使在政治、經濟和財政方面給予他們最強辯的事實說服，這些華人企業家仍然受到懸浮於大中華未來增長上的不可靠性的影響而心存疑礙。

至於對一般的海外華人來說，他們已把自己分離了出去，傾向於去適應他們那非常複雜的本地社會。不管大中華這樣的構想對他們有什麼樣的吸引，這種吸引也常常受到這樣的阻

礙，畢竟他們各個階層已對新的國家效忠，已與祖國有了幾十年的分離。除此之外，他們對自身的家庭和他們的社區所承擔的義務也越來越多。他們年輕時所受的民族主義者教育和堅固的文化適應能力，以及他們價值體系的摩登化，都已大大地增加了他們和中國以及中國化的事物之間的距離。實際上許多人還保持着他們的漢語能力，還有一些人重新開始學習漢語以適應目前大中華的發展，但是絕大多數的海外華人已可能都承認，他們已喪失了這種語言的領會能力，而且並不打算去學，不管今天的中國正在發生什麼。⁴²

這裏不是說 CG/CO 歷程在海外華人的意識中是至高無上的，對歷史上這種關係的理解，並不對海外華人對大中華發展作出反應具有決定作用。但它形成了這樣一個背景，即海外華人在有可能作出權衡決定，自己打算以某些方式為大中華承擔義務時，同時也普遍伴隨着謹慎和警惕。

不斷變化的群體與不同的反應

任何研究海外華人的都知道，儘管本世紀來中國連屆政府與具有國家主義的愛國華人，努力去想把華僑們都湊到一起，但一個單一的華人社群在海外卻從未出現過。他們對中國既沒有統一一致的認識，對怎樣去回報他們各自的居留之地也沒有統一的認識。不同的華人群體，對他們在海外的角色有不同的理解，這已廣為人知。

大約二十年以前，在《中國季刊》⁴³ 和《現代世界中的東南亞》⁴⁴ 發表的兩篇關於東南亞華人的文章中，我就提出按他們的政治行爲，可以把華人劃分為三個群體。他們的經濟行爲

也會觸及，但不作為重點，因為可以假定他們的這些經濟行爲，是由他們對自己已成為該國公民的新民族國家在政治上力求廣泛效忠所決定的。本書主要即是關於政治效忠的某些方面，這是研究的重點。本文提供這樣一個機會，即通過東南亞，尤其是通過北美和澳大利亞不斷增多的那些社群，去重估這一問題。當政治和經濟上的忠誠不再一致，且可能在一個越來越開放與國際化的商業環境中會存在廣泛分歧時，新的情況就產生了：所有海外華人已廣泛地在全球範圍內作出貢獻。

有關政治上華人分為三個群體的詳細描述，可在上述提到的兩篇文章中找到。⁴⁵ 這裏，只提供劃分的一個概略：

A 類華人：此類相對來說是少數，已逐步在減少。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地和中國政治上保持聯繫，一貫關注並投身於中國的命運前途。

B 類華人：此類在各處都形成了主要的一群，他們頭腦冷靜而且現實，作為華人少數民族，為了取得自由的公眾行爲，他們在各行各業中專心竭力工作。在政治範圍中，他們傾向於採取限制自己活動的低姿態，在貿易、職業和公眾協會方面採取間接的政策。

C 類華人：他們通常投身於新民族國家建設政治，儘管自己作為華人少數民族他們對未來也把握不定，並且永不知道他們是否會被作為忠誠的國民完全得到新民族國家的承認。

結論是，在東南亞，A 類華人會越來越少，如果新的民族政策變得文明進步 B 類華人也會越來越少，而旨在反對華人少數民族的歧視政策的取消，則鼓舞了 C 類華人加強他們的效忠。其他的學者對這些群體也作了審視，並作了完善與補充。⁴⁶

在某些東南亞國家中，有人指出也可能存在第四類群體，這些人已被同化，已不再堅持被當作華人。⁴⁷

如果三個群體的這樣劃分（這裏不包括那個第四群體，他們已不承認自己是華人），對下列問題有所接近和裨益：海外華人對大中華所作的一般回應，他們現在與未來在本國內為大中華所起的作用，這就看起來相當有趣。我們知道海外華人社群彼此之間是不相同的，但這裏將問題只集中在兩個區域或者說兩種類型的客籍國家（host country）：東南亞的新民族國家，以及美洲、澳洲這樣的移民國家。在這些國家華人社群都很巨大。

A 類華人

在新民族國家裏，從香港、台灣或者中國大陸來的移民並不多，把自己和中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這一群人，實際上已比二十年前要少得多了，他們主要由年老和正在變老的人所組成。而在那些移民國家裏，有相當數量的新移民是來自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還有來自東南亞的社群。於是，在移民國家裏越來越多的華人就匯合成了標準的 A 類華人。⁴⁸ 可以概括地說，在目前有大量來自台灣、香港和大陸的新華僑的地區，相對於 B 和 C 類華人，我們發現 A 類華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那些關心大中華發展的地方，A 類華人希望能為中國再次強盛的潛勢所鼓舞和激動。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兩方面都加以批評，希望給大中華帶來民主和人權。在新民族國家中，對大中華的發展他們還沒有讓自己做出重大的貢獻，這是因為在東南亞華人社群中較早、也較成功的總體來說已經退休，他們在本地出生和受到教育、較少感傷、有可能被認為是

B 類華人的後代們已繼承了他們的事業，其中有些人甚至像 C 類華人那樣已完全認同於這些新民族國家。

而在美洲和澳洲這樣的移民國家中，新移民已壯大了 A 類華人的隊伍，他們與經濟大中華三個部分中的一個或另一個保持着緊密的直接聯繫，與中國大陸或者台灣甚至是香港，有着強烈的感情上的維繫。雖然他們中間很少人有經濟資源直接來支持大中華現時的增長，但是他們中間涉足於專門貿易已獲成功的傑出企業家已開始投資於中國。⁴⁹

把這兩種類型的客籍國家作比較時，在移民國家的 A 類華人，比那些來自新民族國家的更可能在大中華裏扮演一種政治角色。在移民國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最近才來的，他們組成了大中華中最有力的部分。許多人在科學和技術領域已是成功的專家，⁵⁰ 這些新來者所具有的專業上的成就，已使他們能直接對大中華做出貢獻。作為他們這些香港人、台灣人、大陸人的次一類群，還包括了那些看起來有能力在每一區域之間搭建經濟之橋的人，他們在海外選定的家庭中希望參與大中華冒險的每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下，對這些新來的移民來說，他們没必要公開地對中國表明任何 A 類華人那樣的政治忠誠。但是一旦他們感知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工作有一種特殊理解，或者仍然和大中華經濟中心有用層面上有更好的聯繫時，就會促使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在角色扮演上，超出他們相對來說人數較少所應佔有的比例。

有趣的問題是，如果在二十一世紀，大中華不屈不撓地向一個強盛的“統一中國”邁進，在移民國家中這一群體會變得越來越大嗎？由於大中華中愈來愈多來旅居的商人和專家，這

個群體會膨脹很大嗎？他們中間在美洲和澳洲出生且受教育的一部分人——可能會被劃分到 B 類或 C 類的華人，能把他們從目前已建立起的舒適位置上爭取過來而讓他們與 A 類華人一致嗎？當然，這主要取決於他們是否能把表面上對收養他們的國家的忠誠，與對大中華的利益結合協調；取決於這些移民國家是否能忍受以及忍受多久，這些種族潛在分裂的因素和讓他們的公民去扮演這樣一種橋接與矛盾十足的角色。次之，則取決於過去四十年裏在全球領域內相對開放的國際經濟是否還將保持，大中華目前發展的方向現在是否被緊鎖。否則，在移民國家的 A 類華人可能會去忍受那些在東南亞已歷經過的相應情況，他們會被迫在數量和影響上受減弱，因為他們的孩子去尋求融入一體和新的本地認同。⁵¹

B 類華人

爲什麼在那些新移民國家中這一類人總是多數並且可能一直保持如此，是有歷史原因的。與早期的東南亞華人貿易社群的大小，以及他們深深植根於中國南部——現在已成爲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地區，有直接關係。隨着他們對“低姿態與商業團會的間接政治”⁵² 的偏好，他們爲情感和現實的商業原因而對文化維繫的承擔，很明顯，要對大中華的機遇，以及現在活躍在亞太地區多民族和交叉邊界的經濟因素作出反應，他們是置身於東南亞的最佳人選。

在移民國家中，在多數的唐人街，由那些很多強調華人民族性的傳統組織就可以分辨出 B 類華人，但這些人在他們各自的社群中不太可能形成主流。總之，他們和 A 類與 C 類華人各

自之間的區別可能已有些模糊。在不是很強烈反對捲入中國政治的國家，而政治性融入和認同當地民族主義象徵的壓力較小而且並不直接時，對這些人不能像在東南亞新民族國家裏那樣能明確地予以描述。反之，在那些民族性和多元文化權利受到立法保護的地方，公開爲自己的華裔性自豪的 B 類華人，在思考和行動上都開始趨向於 A 類華人——這一類已被來自說漢語的台灣、香港和大陸的新移民所擴大。⁵³ 與此同時，在政治上參與和社會上融入主流客籍社群相對自由和開放的國家裏，第二和第三代華人已舒適地轉移進入了效忠的少數民族裏，有點兒已類似於較不安定地生存在東南亞的 C 類華人。⁵⁴ 簡而言之，在移民國家的 C 類華人，在公開活動於大中華事務之中而且數量在增長的 A 類華人，與大量自豪地成爲忠誠國民的 C 類華人之間，形成了一個好像是在不斷減少的中間階層。

這裏對比一下移民國家和新民族國家中的 B 類華人會特別有趣。還處於創業者之列的那些人，幾乎沒有人能像他們東南亞同僚那樣富有。照目前這種情況下去，他們之中很少有人能用像那些東南亞人能希望去做的方式，去對大中華未來的發展起到實質性的影響。實際上，在那些移民國家中，富裕的 A 類華人企業家，遠遠比 B 類華人更可能成爲投資於大中華的成功人士。⁵⁵ 而富裕並且強有力的 B 類華人大都是東南亞的一個現象，這裏許多的 B 類華人都認識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八十年代經濟改革時所帶來的良機，並通過香港進行投資，在至少兩個區域（即香港和珠江三角洲；或者是香港和台灣）裏已對大中華的出現作出了適度的貢獻，同時還在中國南部經濟外圍與他們各自所在國家的經濟之間建立了聯繫。隨着大中華全部沿海

地區的進一步發展和對大部分內地開放的展望，更多的人開始自問他們該如何來作出反應。新資金投入的需求是巨大的。雖然東南亞的B類華人企業家，比其它任何地方的同僚們擁有更多的資金且有更好的設備去投資於大中華，但他們限制自己去做自己所能夠做的。在此階段，他們會聰明地使自己明確，其投資不要超過他們在本國的投資，他們冒險投資中的某些部分要與本地人一起合力去做，還有另一些則是得到了他們各自政府的允許的。⁵⁶

他們確實還有利可圖，因為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都有進入家族聯繫和其他華人貿易網的門徑。此外，一些華人和他們本國內的跨國公司以及他們各自政府的機構和公司還有聯繫。⁵⁷ 這其中一些非華人公司已開始接受他們的幫助和建議，通過這些公司，於是他們自己能夠去做更大的冒險事務，而若只有他們自己或者與其他中國人合作，他們就不會去做。跟隨馬來西亞首相到中國來的隨行人員，即是最佳的例子。⁵⁸ 在八十年代亦有類似的印尼華人大部分是B類華人，替去中國的商業代表團作嚮導。⁵⁹

然而，總體來說，他們在大中華活動上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局促，部分是由於需要向收養他們的國家表示忠誠，同時也因為在其本國內也存在不斷增長的贏利投資機會。東南亞的許多國家，特別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已強烈決意加入到“小龍”俱樂部，他們需要得到他們本國華商同胞的幫助，尤其是那些已確立了政治忠誠和自己成功保持貿易網的B類華人。幾乎沒有例外，在本地區和本國內，這些華人現在已有着比大中華所提供的更大和更安全的機會，他們不會從這裏轉移到別處去。⁶⁰

但是不管B類華人是否對大中華的成功做貢獻，已增強的大中華未來會改變他們的本性嗎？他們對收養他們的國家的政治忠誠會強烈地受到考驗嗎？這些問題的回答是變化不會太大。在他們本國至少四十年以來，他們已經探知到了什麼能和不能的接受限度。一旦現代的民族國家還存在，區域的結構還在起作用，少數民族的認同參數就很清楚。⁶¹ B類華人從不適於挑戰權威，只適於對濫用政權進行防衛。在他們觀察了本世紀以來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和經濟變化之後，作為新民族國家的忠實子民，他們不會因為有一個恢復中國偉大的前景，而使他們離開自己艱苦掙來的地位。

雖然如此，他們仍可能會受到他們民族政府的懷疑和直接監視，這些政府總是害怕會崛起一個富裕、統一和強大的中國。這些華人不得不表明他們能夠抵制大中華的甜言蜜語，並把他們的儲蓄和利潤都投資到他們的所在國，花大力氣努力使他們的政府相信他們的政治忠誠。另一方面，作為華裔，一個經濟上成功的中國，也幾乎必然地會給他們之中大部分人帶來巨大的信心，雖然還沒有到這樣的程度——增強他們組織去反對各自的政府對他們的索求，然而，他們這種巨大的信心卻有助於支持制定這樣的政策，讓他們的後代中保持文化上的維繫，甚至鞏固華人少數民族成員觀念。

C類華人

二十年以前在東南亞對這一類人很難加以定義，在今天那些新民族國家中對他們加以確定也仍有不少困難。在東南亞，C類華人是指這些華人：大部分在本地出生，在民族系統中所

受到的教育，使他們避開了文化上採取保護的華人社群的那些信條與儀式，而準備讓自己在更大的民族認同中完全融為一體。在新民族國家中，民族認同仍有點易變然未充分發展，當地的華人有可能幫助新民族認同的形成。以致這些華人確實相信有可能，他們將在民族自建的努力方面給予較大的關注，在總體上放棄選擇那些能增強華人社群自身的事務。很明顯，這些華人不會被大中華的出現所吸引，不會有興趣去讓大中華的事業更進一步。⁶²

如果民族政策鼓勵越來越多的華人完全參與到新民族的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有可能這一類華人在數量上還會增長，在很大程度上這樣的情況已經發生。實際上，許多緊張關係仍然存在，主要是因為本世紀早期某些同化者的觀念——這種觀念在五十年代被東南亞政府廣泛接受——留下了這樣的饋贈：要確認對新民族國家的政治忠誠時，深深不信任那些沒有保證拒絕中國文化的華人。所以與這種現象相關的地區存在着較多變化，在新加坡較特殊，華人佔居主體，在馬來西亞則有着微妙的平衡，相對來說在泰國則存在已成功融入一體的C類華人。⁶³與另兩類華人相比，C類華人對本地情況更加高度敏感，他們政府對中國政策與基調的改變，也使他們更易受責難。

雖然如此，很明顯，C類華人有比原來所想像的更大迴旋餘地。這部分是由於在少數民族種類方面世界已越來越複雜，部分則由於全球貿易系統對民族事務已建立有邊界，而且更加富有彈性。能證明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已完全融入民族國家社群的這些華人，已贏得了他們各自民族政府的信任。從那以後，不管是專家、技師還是商人，不管是在私人還是公共部

門，他們已處在能代表較大民族事務的位置，能參與大中華的事務。他們對新民族國家的政治忠誠，當然沒有妨礙他們通過香港積極投入中國南部的發展，也不妨礙他們的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台灣簽訂的雙邊協定。實際上，許多這樣的華人，具有特別優厚的條件來用這種方式來為他們國家服務。同時，在華人少數民族團體與民族政府之間，他們也起到一個橋樑的作用，可以緩和他們政府對他們將來是否效忠的懼怕。

大中華的崛起對這些C類華人可能會有一些較長時期的影響。如果中國的發展以及該地區有序而且安全，他們亦能扮演一個這樣的角色，去調停在他們和具捍衛性的B類華人之間的差別，在每一個這樣的國家，真正建立起一個忠誠而且符合國內情況的華人少數民族本體。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富強的大中華最後變得受到動搖，他們不僅可能將不得不選擇完全同化於主流文化，去取得民族政府的信任，或回復到缺少忠誠和種性維護的B類華人中。

在美洲和澳洲的移民國家中，C類華人的情況又不一樣，相應的各類華人在這些國家定居下來並成為忠實國民，困難不大，並且在留居他們的這些國家中他們有着強有力的政治參與。在每一類情況中，所處本地情形都有相當大的差異，C類華人總是不得不對民族政策的變化以及政府對大中華發生情況的態度，保持警惕和敏銳。與東南亞不同，這些華人的數量增長快速可能將成為最大的一個群體，穩定地匯集了最近四十年來來自台灣和香港的移民（及非法移民），以及最近越來越多來自大陸的移民。雖然有時B類華人的後代們會作為一個大量增長的小群體加入其中，但隨着目前的趨勢，C類華人可能會保

持少數，然而最終當新的移民減緩下來時，即會成爲吸引大多數華人過來的群體，它將成爲一個比在東南亞更穩定的C類華人群。當與其它地方相比有更多的人消失在同化的隊伍中時，C類華人群在移民國家的出現，將會被他們各自政府實行的多元社會、多元文化主義和多元種族國家所承認。

大中華這概念和中國南部經濟帶的成功，未必和C類華人群的平常生活有什麼關係。但是，他們仍可以積極地關注大中華的發展而替當地國家服務。這些參與會否影響他們的政治忠誠，則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如果當地的民族認同感已健全，而這多元民族社會仍是些又公平又和睦的，那麼大中華如何變化不見得會影響C類華人的生活。他們會欣賞比較大的問題，大中華的一體化顯然是市場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是支配今後一切政治經濟發展的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所構成的。

很清楚，根據上面的概述，爲了研究東南亞社群，因處理海外華人而這樣分三個群體會繼續起作用，這樣劃分可以解釋，這麼多來自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的新企業家，是怎樣通過C類華人持續增長的經濟力量，來爲大中華的發展作貢獻並也獲利於其中。對去瞭解美洲和澳洲這些移民國家來說，還不是太能確定這種劃分能有多大用處。對於有較好資料的國家來說，如加拿大、美國和澳大利亞，這種處理當然就形成了和東南亞的對照。儘管B類華人在大中華事務中已有領域，但正是A類華人現在具有優勢，C類華人也具有——他們遠遠顯得更穩定和安全，他們也比東南亞同僚更能自由地去加入大中華未來的發展。

中國的歷史紀錄給大多數的海外華人留下的，是對密切直接涉入中國內部事務保持着小心謹慎。但很重要的是，應把多類的華人與每類華人參與大中華增長的多種途徑區別開來。有這樣的人，他們只狹窄地關心中國的復興；也有這樣的人，不管在哪裏他們只狹窄地關心少數民族華人社群的存活。但是所有的海外華人都想在未來發展的繼續進行中沒有矛盾衝突。因爲如果融入大中華失敗，而其組成的華人區在這個區域內引起了主要對抗，他們會一無所獲失去一切。即使他們處在不能直接作出貢獻的位置上，或從中無利可圖，他們也會意識到大中華的崛起，是全球內意味深長的一個進步，它可能改變這其中每一個人的生活。

* 本文英文稿原載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6 (1993), pp. 926-948.

注釋

- 1 Harry Harding,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December 1993): 660-686.
- 2 Wang Gungwu, "The Origins of Hua-ch'iao", in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New Edition)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2), pp. 1-10.
- 3 我已把它用在我的一本書的題目中,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 4 *The Economist*, 21 November 1992.
- 5 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1.1 (1987) 可以把這些

- 數字和我的預算相對比，見 Wang Gungwu, "External China", in *The Cambridge Encyclopaedia of China*, ed. Brian H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04-110; and its new edition (1991), pp. 84-90.
- 6 C.F. Yong, "Patterns and Traditions of Loyal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1900-1941", *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 4.1 (1970) 提供了這種經歷的有趣例子。
 - 7 從五十年代中期以來在台灣出版了關於世界華僑在各國所做貢獻的期刊《華僑誌》，如果這些期刊所載一貫不是那麼不準確的話，則有用地提供了他們成功的紀錄。
 - 8 Stephe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62-195.
 - 9 有許多報道，從最轟動到最平淡無奇的都有。 *The Economist*, 21 November 1992 中的有關報道，至今仍是最有用的。
 - 10 Leo Suryadinata, "Chinese Economic Elites in Indonesia: A Preliminary Study", in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eds.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69-277; Richard Robison, *Indonesia: The Rise of Capital*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86), pp. 278-288.
 - 11 Akira Suehiro,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Postwar Thailand: Commercial Bankers, Industrial Elite, and Agribusiness Groups", in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ed. Ruth McVe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92), pp. 42-61.
 - 12 Lim Mah Hui,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One Hundred Largest Corporations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82-112.
 - 13 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2)，頁 392-416, 437-463.
 - 14 鄧小平在 1979 年 1 月的訪問，受到了美籍華人在政治層面不同的招待迎接，有許多商人很欣慰地去拜訪他。

- 15 唯一的報道是在香港報刊中找到的，斷斷續續而且常常沒有確定的消息來源，但給人穩定而連續的印象則毫無疑問。
- 16 對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在香港的政府領事的訪問，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 17 在珠江三角洲投資的有關資料幾乎每天都能得到，但在潮州、閩南(福建南部)和寧波的較小卻相當重要的一些商人團體也很有把握，相信香港企業家會走得更遠。
- 18 在八十年代中期，當台灣政權關於兩岸關係的政策發生改變的時候，台灣商人就已以香港為基地衝在前頭。從 1988 年以來，從台灣到大陸訪問的直系親屬拉開序幕，台灣政權對企業家加強投入資金差不多已無法阻礙。
- 19 1992 年 1 月鄧小平南巡之後，香港商界在吳光正的帶領下，已對中國內地和北部的開放極感興趣。
- 20 從八十年代早期起，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東南亞商人的系列訪問，證實了他們在獲利的同時也伴隨着傷感。
- 21 在整個亞洲這仍很普遍和真實，特別是在日本和韓國，在東南亞儘管有強有力的同化政策然而亦是如此。
- 22 1991 年以後西方媒體越來越多的批評都強調了這一點，而東南亞的報道也時時演奏這一旋律。
- 23 在海外華人中出版的華人報紙已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在北美較多是這樣，在選用字句方面需倍加小心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是如此。
- 24 在新華僑中這有激烈的爭論，特別是從大陸來的受過較好教育的學生和持不同政見者，從 1989 年後不僅在北美而且在香港和台灣在報紙和雜誌上都可以發現到。
- 25 這一類別的文學作品現在已經很廣，大部分是在香港和台灣出版，但大陸的雜誌中亦有許多這樣的形式。
- 26 Claudine Salmon, ed. *Literary Migra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 (17th-20th Centuri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1990).
- 27 這個課題仍需要研究。八十年代早期在新加坡通過翻譯來介紹儒家價值的一系列舉措是最好的例子，見 Tu Wei-ming,

- “Iconoclasm, Holistic Vision, and Patient Watchfulness: A Personal Reflection on the Modern Intellectual Quest”, *Daedalu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16. 2 (1987). 蔡志忠的中國經典漫畫集，從莊重的到不怎麼荒謬的，現在已被翻譯成英語，被海外華人的年青一代所讀。Asiapac出版的Singapore版本，很容易就起到了作用。
- 28 香港電影、電視和聲像對海外華人的影響已廣為人知。
- 29 關於這方面的書刊越來越多。這一類作品中最好的例子是 Joann Faung Jean Lee, *Asian Americans: Oral Histories of First to Fourth Generation Americans from China, the Philippines, Japan, India, the Pacific Islands, Vietnam and Cambodia* (N.Y.: The New Press, 1991), pp. 99–139.
- 30 Wang Gungwu,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 A Background Essay”, in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and Sydney: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nd Allen and Unwin, 1981), pp. 43–57.
- 31 L. Eve Armentrout Ma, Yen Ching-hwang and Mak Lau Fong 的三篇文章最早明確提出此點，見 *Early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ies: Case Studies from North America and British Southeast Asia*, ed. Lee Lai To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88), pp. 159–243.
- 32 有兩個發生在英治馬來亞和菲律賓的例子很有趣：見《大戰與南僑》(新加坡：南海中國救濟基金會，1974年)，和 Antonio S. Tan, *The Chinese In Manila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Asian Center, 1981).
- 33 最典型的例子是陳嘉庚，見 C.F. Yong, *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又李發沉譯本，八方文化出版社，1990。陳氏有許多衷心的支持者，他們都照他的例子去做，見 pp. 175–297.
- 34 C.P. Fitzgerald, *The Third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Melbourne: F.W. Chesire, 1965); Mary Somers-Heidhues, *Southeast Asia's Chinese Minorities* (Melbourne: Longman, 1976).
- 35 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十一至十二章；以及 *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ed. Edgar Wickberg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2), pp. 204–267。這裏就北美所述而言。
- 36 在北美研究中國群體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進展；Him Mark Lai,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A Historical Survey”,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88): 11–29。又見 Wing Chung Ng, “Scholarship on Post-World War II Chinese Societies in North America: A Thematic Discussion”,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2): 177–210.
- 37 清政府並非始終繁榮昌盛，其對海外華人的政策也並非始終一致。參見 Jennifer Wayne Cushman, *Fields from the Sea: Chinese Junk Trade with Siam During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93), chs. 4 and 5.
- 38 Yen Ching-hwang,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1851–191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9 見 Cushman 和 Wang 的一些文章，*Changing Identities* 中提供了一些例子說明這段時期中在東南亞所發生的情況：如 J.A.C. Mackie, Chinben See 和 Tan Chee-Beng 最引人注目的那些文章 (pp. 217–260, 319–334, 139–164).
- 40 在本文的最後部分“不斷變化的群體與不同的反應”中對此作了分析，又見拙文“Among Non-Chinese”, *Daedalus*, 120. 2 (Spring 1991), pp. 135–157.
- 41 這裏有一些例外，一個新加坡公司的分支 Sino-Land，以及一個馬來西亞公司在香港的機構 Kerry Trading，在八十年代的中期就開始進行大量投資。
- 42 香港、台灣、中國大陸以及西方漢學家所寫關於海外華人的文學作品，趨向於關注那些對中文仍能說、讀和寫的海外華人。對於人類學家來說這顯得不太真實，其中引人注目的是 G. William Skinner 對泰國的研究，William Willmott 對高棉的研究，Donald E.

- Willmott 和 Mely Tan Giok Lan 對印尼的研究, Judith Strauch 和 Tan Chee-Beng 對馬來西亞的研究。最近的研究顯示出,絕大多數第二或第三代的華人正在喪失他們用漢語交際的能力。所以, Maurice Freedman 提出需要有關再漢化的材料, 見 John R. Clammer, "Oversea, Chinese Assimilation and Re-Sinification: A Malaysian Case Study",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2 (1975): 9-23; 又參 Tan Chee-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 43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43 (1970): 1-30; 又見於 *Community and Nation* (1981), pp. 173-200.
- 44 Wang Gungwu, "Political Chinese: Their Contribution to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Modern World*, ed. Bernhard Grossma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2), 又見 Wang Gungwu, *Chinese Overseas*, pp. 130-146.
- 45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pp. 4-6, 21-30; "Political Chinese", pp. 132, 139-146.
- 46 Loh Kok Wah,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Unity in Malaysia* (Singapore: Maruzen Asia, 1982) 是最好的例子。
- 47 Charles A. Coppel, "Patterns of Chinese Political Activity in Indonesia", in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Five Essays*, ed. J.A.C. Mackie (Melbourne: Nelson, 1976), pp. 19-76.
- 48 這種現象的詳細研究已開始發表出版, 例如關於紐約的兩部新書: Hsiang-shui Chen, *Chinatown No More: Taiwan Immigrants in Contemporary New York*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和 Min Zhou,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再讀 Bernard Wong 研究紐約華人社群的 *Chinatown: Economic Adapt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2).
- 49 H.M. Lai,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since World War II: A Diversity of Voices",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0): 107-155.
- 50 因為有了中國與美國不斷複雜的關係, 還有大量的美國漢學家, 他們對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相當瞭解, 這些華人可能並不察覺他們自身那麼有用。但不管是在美洲還是澳洲, 他們中間的許多人是能夠促使其政府給以相當的幫助的。
- 51 除非有大量的新移民繼續從大中華而來, 否則這將不可避免。另一方面, 要預測可能會改變發展進程的新因素也很困難。
- 52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p. 4.
- 53 這裏用了紐約的例子, 見 Min Zhou, *Chinatown*, pp. 219-233.
- 54 有對加拿大的估測, 見 Wickberg, ed. *From China to Canada*, pp. 244-267. 稍有不同的是在澳大利亞, 見 Marig Loh,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Chinese in Victoria, 1848-1985* (Melbourne: Barradene Press, 1985).
- 55 麥禮謙, 《從華僑到華人》, 頁 437-467。
- 56 我還不知道有任何這樣的例子: 一個東南亞華人企業家在不管是台灣還是中國大陸裏, 所投資的錢會比他在他本國所投資的更多。當然, 要判定其資金是否轉移到香港其後作為香港投資再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困難的。
- 57 Suehiro, "Postwar Thailand", pp. 54-57, 給出了與許多來自日本、德國、英國和香港跨國公司在事務上合作的例子。 Heng Pek Koon, "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 of Malaysia", in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pp. 127-144, 有許多與公共事業公司有密切聯繫的例子, 同樣, 在這部論文集, Richard Robison, "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he Case of Indonesia" 則提供了來自印度尼西亞的例子。
- 58 *Asiaweek*, 23 June 1993.
- 59 在 1987 和 1988 年會見了兩個印尼代表團。
- 60 在註 58 的文章也表明了這些企業家在他們國內所擁有的巨大機會。有關海外華人在大中華中所做的事務的報告, 應和他們在回到自家後所做的事務進行比較, 例如, 我們應該對 "SE Asian Chinese Head for Home" 這份報告加以警惕, 見 *Asian Business* (April 1993), 如果它認為像 Lippo, Kuok Group, Charoen Pokphand,

Bangkok Land 這樣的公司，把他們大部分的資金都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帶回了家”的話。如果它果真如此認為，那麼 Ian Stewart 在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2 May 1993 中的故事“Wrath of Asia as Chinese Venture Forth”則有公平的辯明。

- 61 Ruth McVey, “The Materialisation of the Southeast Asian Entrepreneur”, in McVey, ed.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ts*, pp. 7–33. 對那些華裔企業家在東南亞的成功舉措做了來龍去脈的分析。
- 62 陳志明 (馬來西亞) 和安多利亞·S·陳 (菲律賓) 的研究例子顯示出這樣的情況已經發生，收入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Changing Identities*, pp. 139–164 and 177–203.
- 63 泰國的例子可見於 *Asiaweek*, 23 June 1993, “The Growth Machine [of the Chearavanont Family]”。

中國在亞太區域的地位： 尋求盟友與伙伴

中國經濟發展在過去二十年中的驚人記錄使之在二十一世紀將發揮一種全新的作用。無論採用何種標準衡量，這種從中央計劃體制向鼓勵私營企業發展的體制的轉變，其影響是不同凡響的，與“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相比較，所發生的一切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結果是，世界普遍把中國越來越視為一個未來的大國，亞太地區更是如此。

對於中國成為東亞和東南亞具有支配力的國家這一點已確定無疑，只是一個時間遲早的問題，圍繞這一點出現了各種揣摩。這些揣摩使中國問題凸現出來，即中國對其鄰國構成潛在的威脅，是一個地區霸權國家和可能的擴張性帝國。這為中國在這一地區的作用投下了一層陰影，並有可能影響中國人自己在一個雖不充滿敵意卻充滿疑慮的世界中如何看待自己作用的方式。如果普遍存在這種看法，現實的作法是直接面對這一問題。我建議首先把焦點放在中國威脅論的外部看法上，然後再關注中國自己如何看待自身，特別是在自己被視為一種威脅的背景下。兩者對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可能發揮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我將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中國自己的觀點。我要提出的兩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在衆多的民族國家中，中國會從民族國家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作用並以一個超大型民族國家來施展這種日益增長的權力嗎？中國的文化傳統如何得以復興或改造以面對這些新威脅論，這對中國在本區域的地位會具有何種影響？

一 中國威脅論

首先是中國威脅論的外部觀點。把中國視爲一種威脅有幾個主要的理由：一個是基於對中國曾具有在亞洲稱雄帝國歷史的閱讀；另一個是基於這樣一些估計，即如果中國經濟繼續發展，中國將如何運用其財富和權力。其它的都與我所提出的中國會如何看待自己的兩個問題相關。本文將在後面回答這一點。

一個反復重提的主題是中國在本地區恢復其傳統的朝貢國體系，縱然是在現代的偽裝之下。顯然，這種對中國的畏懼出自於對中國歷史的閱讀。這使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在這個帝國形成、建立和鞏固的三千年中，一個擴張主義的中國的證據是什麼？導致被視爲“中國人的世界秩序”之基礎的朝貢國體系的作用是什麼？

從公元前二千年至公元十世紀這一時期，存在着兩個獨特的發展。中國的北部和西部邊界殘缺不全，幾乎沒有防衛可言。移動的疆界將黃河山谷定居性的農業地區與遊牧部落的乾草原區域分隔開來。向東和向南，有擴展的空間，一直延至海洋。那種擴展開始於貿易，但公元前的第一個一千年的國家形成過程導致了至少三百年持續不斷的内部紛爭，而由秦帝國於

公元前三世紀將中國北部和中部的交戰各國統一起來。對華南的征服部分是由於秦軍在向其南部大鄰國楚國領土進軍時一鼓作氣所造成的。但一旦帝國軍隊抵達海岸，擴張隨即停止。

那之後，華南的各民族逐漸通過貿易關係和漢族的遷徙而中國化。這種遷徙部分是由於外部遊牧民族對華北平原的入侵，從而出現經濟瓦解而造成的。南部獨立的“帝國”繁榮起來，與外部王國的貿易大有發展，包括外交和海事訪問。中國人用封建的華藻詞彙把禮物 (gift) 說成是貢物，把交換 (exchange) 說成是賞賜，以描述這些主要的貿易關係。這種貢物和賞賜的說法演進爲朝貢國體系。這種體系是一種大陸心態的突出體現，它將自己定位於對付北面的敵人而對於進行海洋探險沒有絲毫的興趣。唐朝時期 (618-907)，華南已成爲中國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卻沒有出現向南的領土擴張，中國反倒是失去了領土；十世紀時，越南分離出去成爲了一個獨立的帝國。

在過去的一千年，從十一世紀到二十世紀，中國總體來講是處於防禦、受壓制和關注内部事務的狀態。其中的三百五十年，中國完全被北部的遊牧部落聯盟所征服。起先是蒙古人，爾後是滿人，其間有二百七十六年的間歇。在大約五百多年的時間內，中國北部的那一半一直由非漢族的中國人統治着。清朝時期 (1644-1911) 土地邊界有過延展，但主要還是延伸至先前其管轄的地域或中國先朝統治所達至的邊緣地帶。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古和新疆，的確出現過征服的情形，這一方面是針對俄國向中亞和西伯利亞的推進作出回應，另一方面是出於鞏固其不太穩定的北部和西部邊界所實施的防務措施。對於在西藏謀求宗主權的要求並非直接了當，但這種要求在十八世紀得到

着五十年的分裂狀態，這個問題使中國在與美國和日本的外交關係中存在着深遠的分歧。

(2) 西藏：這不是一個具有太多爭議的領土問題，而是一個少數民族權利的問題。它有可能會使中國繼續處於文化和道德上的尷尬境地，但它不是一個超出已經被承認的中國邊界之外的擴展問題。

簡言之，中國的歷史並沒有為擴張主義中國的論調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援引某種朝貢國體系不僅曲解了這個體系，以暗示強權和潛在的擴張主義，且完全與時代不相適宜。世界已發生巨大變化。在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中，在市場經濟的相互依存的網絡下，回復到建基於封建關係基礎之上的某種朝貢國體系的任何企圖都是無法接受的，即使對中國人來說也是如此。

不過，存在着新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涉及海上爭端。這是中國過去從未表現出任何興趣的某種傳統的東西。我所指的是圍繞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和釣魚臺群島所存在的爭端。對海洋所發生的新興趣產生於其數世紀以來長期忽視與海岸、海洋相關事務的痛苦教訓。正是由於忽視了海洋和海岸事務，導致了中國人在鴉片戰爭中為英國所慘敗，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紀之辱。對這些新爭端的考察都應當把這一因素考慮進去，即此類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是無先例的，它們是國際關係中的現代問題，中國須以世界所能接受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

1972年和1996年發生的釣魚島抗議事件表明，如果中國和日本都想控制事態的發展，這種問題要想得到遏制是何其容易。問題的本身並不重要，但如果其它更具實質性的問題使中

了落實。另外，在元朝(1279-1368)和明朝(1368-1644)期間，其邊界向南推進至雲南。鑒於反滿威脅來自鄭成功(稱之為國姓名更廣為人知)，清朝於十七世紀將其統治延至海峽對過的台灣。

整個這個時期，所有的外交關係都是通過朝貢國體系實現的，這個體系作為控制對外貿易和保持最低限度的邊界安全的工具而一直發揮着作用。該體系從未被用於領土擴張，而只是被用來擴展自己的影響和證明中國自己聲稱的地處宇宙之中心的說法。該體系為中國提醒其鄰國尊重其中心地位提供了一種方式。從本質上講，該體系被用來穩定現狀。對於從來就沒有對帝國構成嚴重威脅的沿海地區而言，情況更是如此，這對於中國與越南和朝鮮之間的特殊關係來講是很關鍵的。儘管這種特殊關係歷史悠久，如今的中國，在朝鮮短暫地成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以及越南成為法蘭西帝國一部分後，接受了這兩個國家的獨立地位。除此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承認了蒙古共和國的獨立。

十九世紀期間，中國的邊界實際上在蒙古、滿洲、新疆都有所萎縮。主要是由於在戰爭上的失敗，中國對俄國喪失了領土；1895年由於被日本擊敗(此後不久，1904年日本擊敗俄國)，中國的地位進一步被削弱。中國被瓜分過程和虛弱的狀態一直持續到1949年重新統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除蒙古以外，其邊界和清帝國統治時是相同的。香港如今已回歸中國，澳門也將於今年回歸。

中國邊界內僅存的突出問題是：

(1) 台灣：這可以被說成是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但卻是中國的一個棘手問題。這是一個統一的後遺症問題，但由於存在

日關係破裂，這種問題就會突顯出來。西沙群島的情況也基本相同，這是中國與越南之間的歷史遺留性爭端，可以由中國和越南來加以解決而無需破壞地區關係。如果以越南一定對，中國一定錯的立場而請求美國，或日本，或東南亞國家聯盟來採取對中國的敵對行動只會起到相反的作用。

至於南沙群島，這裏倒是存在着真正的爭端。這是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其特徵在於，就有爭議的領土而論，南沙群島是唯一存在嚴重爭議的領土，且爭議各方沒有就這一爭議達成協議。爭議各方均沒有令人信服的歷史記錄加以證實或由國際法院所提供的依據。所以，這種不確定因素需要爭議各方中的每一方進行多次細心談判。若處理不當，會導致這一地區的關係緊張，但爭端的本身並不代表對中國的鄰國構成威脅。然而，如果爭議各方之外的大國單方面宣稱其它對這些群島聲稱擁有主權者更加具有擁有主權的理由，並代表他們試圖採取針對中國的干預行動，那將大大增加風險性。任何似乎具有針對中國的戰略結盟都會嚴重影響該地區的穩定。

二 財富與權力

認為未來中國是一種威脅的第二個理由是出於對這樣一個事實的估計，即如果中國經濟繼續發展，其將如何運用其財富和力量。中國的經濟增長會使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大國嗎？到二十一世紀的中期，她會由世界第三躍居世界第一嗎？

針對這一點所作的各種推測是使人迷惑的。它們沒能突出該國試圖在堅持列寧主義的政治架構的同時又強調市場經濟的

重要性的作法所面臨的巨大困難。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全國不均衡的發展狀態都是有據可考的。失業和半失業大量存在，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十分脆弱，特別是與國有企業結構性改造相關的問題衆多。中國將繼續依賴於外部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特別是來自香港和台灣是直接投資）。中國受其邊界的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也會增多，包括許多不受其控制的事務。

所以，對於中國而言，絕對有必要格外關注保持自己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這意味着盡可能長時期地確保有一個經濟增長的和平環境。這一和平環境對於中國的鄰國而言，意味着共享強勁發展的機遇，並能同中國的經濟增長保持同步。如果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保持不變，那麼，衝突發生的理由就會大大降低。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假設”，但這更多地與中國及其鄰國的良好內部管理相關，並有賴於中國具有一個實行進一步改革的領導層。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裝備和現代化情況如何呢？所有的研究顯示，其軍事開支的快速增長與防禦性硬件的更新同步。除此之外，其軍隊的訓練和技術在不斷升級。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有一個較低的基礎上起步的，特別是當我們注意一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大部分仍然在使用着過時的軍事裝備和武器，我們就能理解這一點。

這事實顯然有必要繼續予以關注，但至目前為止，主要由於美國具有壓倒性軍事優勢及其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繼續存在，其週邊國家沒有什麼感到驚慌的。顯然，所有的國家仰賴於自身的防務並盡其所能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如果各國，包括

中國，都或多或少地以一種開放的態度行事（現實的潮流正朝着那個方向發展），不必要的恐懼和焦慮就會減少，從而最終降低發生公開衝突的風險。

我並非想在這裏把事情過分簡單化。在中國與其鄰國，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中的確存在着緊張出現的潛在領域，有必要對此保持警惕。但與好戰和危言聳聽的言辭相伴而生的軍備競賽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本地區而言，由東南亞國家聯盟所創立的制度，特別是東盟區域論壇，就是減少誤解的很好範例。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論壇也可以作為促進相互關係發展的一種手段，這種關係的發展會促進相互尊重並有助於敏感和具有戰略重要性信息的交流。

中國與諸如美國和日本等強國的定期接觸以及中國與其鄰國，如印度、俄國和中亞的穆斯林國家之間接觸也十分重要。如果歐盟，或至少其中的幾個主要成員國擴大其在亞洲發展中的參與範圍，這種有更多相距遙遠的國際伙伴參與的情況會大大加強該地區建立的安全網絡。建立在為大多數國家都接受的民族國家體系基礎之上的多邊關係會減輕美國所承擔的負擔，它會以一種不對任何單個國家構成威脅的方式發揮作用。

三 一個正常的民族國家

讓我們回到中國如何看待自己這個問題上。中國會作為一個超大型和盛氣凌人的民族國家來運用自己不斷增長的力量對別的民族國家構成威脅嗎？中國經常被指控為行為舉止不像一個正常的民族國家，且被描述為一個漢族文明國家。這意味着

什麼呢？古老的儒教帝國是建立在普世思想觀念和高度文化同一性基礎之上的。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講，存在着一個儒教、佛教和道教的獨特融合，但這種情況至少在諸如西藏、青海、新疆、寧夏和內蒙古等省份卻並非如此。如果採用那種界定文明的傳統方式，那麼朝鮮、越南在道德、宗教價值和社會制度上的大部分融合結果應該使得這兩個國家的文化比中國邊疆省份與中國文化更具有共同性。

現在的中國領導人並不受那種觀點的影響。我們已經看到，自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具有官方性質的儒教已被拋卻。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三十年，佛教和道教也被拒絕。中國古代文明中幾乎沒有什麼被毛主義的革命政府所接受。近年來，明顯的證據顯示，以避開早期國際主義（以共產國際為代表）之方式，共產黨的理論家也承認現代民族主義是一支值得重視的強大力量，中國可以用之。

一個帝國如何變成為民族國家呢？現代民族國家是從西歐廣泛擴展開來的，並成為所有先前歐洲國家的殖民地選擇，倣的政治形式。即使是十九世紀後期亞洲非殖民地的國家，如日本、泰國和伊朗也認為現代世界不得不建立在民族國家基礎之上。一個最為重要的例外是印度，其獨立時，如果像在大多數歐洲國家那樣狹義地界定民族，顯然，印度是一個真正存在產生許多潛在國家的國家，類似於一個多民族的國家。

現代中國繼承了一個根深蒂固的帝國，其中，佔人口多數的漢族以農業為生在此居住了若干世紀，其間留下了游牧民族、山地部落和森林地帶少數民族的痕跡。在這個漫長的若干世紀中，漢族在人口數量上有了巨大的增長，而少數民族群體

也鞏固了自己的家園。用這種方式向共和國的轉變使二十世紀的中國成爲另一種類型的多民族國家。這個中國不像基本上按聯邦制國家運作的印度聯邦，在那種聯邦體制下中央保留着相當大的進行干預的權力。中國則不同，它是保留了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這使之總是尋求控制其疆域內的一切事務。自七十年代後期鄧小平引入經濟改革之後，這種體制經歷了重大變化。中央集權大大削弱，複雜的中央與省之間的關係似乎爲人們所熟悉，但這種複雜的關係十分微妙且具有多重性。它們並不取決於法律和憲法所作出的規定，而是部分地仰賴於共產黨的紀律和個人與非正式的聯繫。這種關係正在發展，並在這個國家的不同地區可能形成不同形式。

對於這樣一個大國而言，是否採用聯邦架構會運作得更好一些？是否存在着實行聯邦制的前景？要官方認同聯邦制和正式實行聯邦制是不可能的。這樣做太有悖意願，至少是與兩千年的歷史相悖。但是，作出某種必要的妥協以有利於地方和省級的決策無疑是可行的，特別是在財富的生產方面。這些發展的政治、行政結果尚未顯現出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些發展的結果不會像在蘇聯那樣導致中國出現危機性的分裂，也不會導致中國出現軍閥主義的狀態。這是中國在本地區未來地位的重要前提。把民族主義作爲一支國家建設的力量加以運用情況會如何？新近有大量的作品提及一種在民衆中極易替代共產主義思想的“民族主義”的新精神。假定如下情況成立，即中國對世界採取相對開放的狀態；中國社會內部出現快速的變化以及其經濟出現重大的重組，這種情況就不難理解。強烈理想的缺乏以及先前思想支柱的消失使中國社會出現了焦慮，甚至出

現了恐懼。對於那些尚未適應新的市場制度的人而言，這種無所適從性可能更爲強烈。然而如果這種新民族主義由內部因素所喚起，這就值得爭議。那些試圖代表這種新民族主義的最暢銷書希望說明的是中國正再次受到一個外部強國的欺壓，這裏所指的是美國。這些書是否真正反映了大衆的情感是值得懷疑的，但如果存在對中國無理的外部敵視，這種民族主義勢必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未來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期待這種民族主義者意識將更多地關注中國向何種類型的國家發展。漢人的統治（佔總人口的90%強）是明明白白的情況。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是聲稱其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利益。據官方統計，中國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群體。依據憲法，不同層級的自治體和行政機構已經建立起來。儘管少數民族子女會學習漢語，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漢語作爲中高等教育中的媒體語言，但不存在着民族同化政策。因此，中國事實上是一種多元文化、多種語言和多民族的國家。現代民族主義的任何發展都不得不考慮這一點，並需警惕它成爲漢人與少數民族之間發生衝突和出現不穩定的根源。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具有考驗的情況已有所擡頭。由於中亞諸穆斯林共和國紛紛從蘇聯獨立出來，新疆成爲最具敏感性的邊疆省份。那裏的維吾爾人不僅與鄰近的講突厥語的國家具有共同的歷史和文化，且具有對伊斯蘭教普遍而虔誠的信奉。宗教活動在新疆邊界並未停止，讓這些信徒稱心如意地去做邊緣的中國人似乎也不太可能。正是在這兒，民族主義充當着雙刃劍的作用。北京的漢族領導人如何能夠安撫新疆的少數民族並贏得他們對中國的向心力，這是對一個民族國家的現代

民族主義在中國作為一種統一的力量而不是作為一種分裂的力量所進行的重大考驗。

最後，簡單地談一下中國恢復領土完整的問題。在過去的十五年中，其重點放在香港問題上，澳門次之。香港是首個通過和平談判回歸中國的例子，這會對台灣這個有待回歸的最後一個地區的未來談判產生影響。但台灣是一個更具有複雜性的問題，需要有長遠的眼光，其與大陸的整合當然不能操之過急。另一方面，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巨大的危險，這種危險產生於台北內部的政治壓力以及來自北京的與之相抵的力量。就其所涉及的國際範圍的因素而論，美國和日本不容忽視。估計失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特別是情感力量在派別政治以及中國對台政策形成過程中發生作用的情況下。

然而，最為麻煩的可能是台灣人的民族主義的問題，以及未來在台灣出現一個民族國家，這會與強調民族和文明特性的歷史傳統發生直接的衝突。一個與少數民族問題糾纏在一起的現代台灣國家的觀念會使中國走向民族國家的進程大大受到影響。諸如此類的棘手的問題會驅使中國領導人在中國這個多民族的國家內回復到更加強調國家的至高無上性的立場上去。本世紀早期，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導人都發現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權威。面對台灣問題，北京政府將尋求恢復其執政的前三十年所享有的更大的中央權力。在一個國家內，國家力量處於主導地位的情況將對該國人民所具有的自由、民主要求構成嚴重的遏制。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問題以及其所具有的象徵性價值就不僅僅是使用或不使用武力實現統一的問題，它還具有對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自我形象發起挑戰的可能性，並激發起北京難以控制的力量。

四 文化傳統

讓我們回到中國用何種方式看待自己的第二點上。我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問題：中國的文化傳統如何得以復興或改造以面對要麼中國構成威脅，要麼中國受到威脅的新威脅論？那種傳統對盟友和朋友具有何種影響？

背景是很明白的。多年的改革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存在着發生文化變化的前景，這包括樂於向資本主義學習的傾向和尊崇中國歷史和崇尚中國過去成就的反轉傾向。在這種反轉與革命兩種傾向之中，前者目前在政策和目標上佔住了主導地位。在表面的言辭之下，一場更為深刻和持久的價值觀革命正在發生。如果這場革命不因為未來具有威脅的形象而使強大的鄰國或鄰國集團感到恐懼而受阻，就可能成為一系列不可逆轉的變化。

缺乏強有力的統一思想對於一個習慣於統一思想的社會固然是個弱點，但這種缺乏卻可能是一種耳目一新的變化，且可能是一種福音。值得人們關注的是，中國人民會長期處於一種無文化核心、無共同認同的道德價值觀念的狀態。從表面上看，在堅信社會主義和準備完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之間存在激烈的爭執，兩者都處於道德上的尷尬境地。但是，更能激發人們興趣的是兩種價值觀之間的競爭方式，一種是根植於中國的道德——精神和實利主義的混合價值觀，另一種是帶有泊來性質卻具有現代意義價值觀，後者已開始贏得普遍認同以及知識界人士的理解。

儘管有人提出將儒家學說部分地恢復為國家官方思想的傳統地位，但即使有這種可能性，這種發展要為中國人民廣泛接

機會。對此作出解釋而經常提到的理由是，現時的領導人希望繼續當政，而自由民主對他們具有危險性。然而，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的一種觀點認為，一個如此廣袤和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擁有世界之最多人口，時處現代歷史之最重要的轉變時期，它付不起進行風險實踐之代價。另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由強人執掌之良好政府對於經濟的迅速發展更為重要。亞洲許多國家的情況證實了這一結論，儘管有很多強人把握不良政府的負面例子。不過，今日之中國已經具有較大自由，這不僅體現在貿易與競爭上，而且表現在言論與學問方面，這是二十年前所無法想像的。那種自由與更大的經濟發展相結合共同為文化的變化提供了可供選擇的道路。這種變化是否會形成一種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可以發揮的新的、有特色的作用將取決於如何使之被用來發展眾多的新盟友和新朋友。

五 處於亞太區域的中國

在政治關係中，存在着確定盟友和朋友概念的標準和準則。中國從其歷史中領悟到，國家間的聯盟和友誼的確要求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和諧。當文化上存在不和諧時，聯盟和友誼可能是靠不住的。亞洲的許多國家越來越意識到，此類關係中的言行準則是由西方建立的。這些準則源於歐洲某一特定的國家制度演進而來的獨特政治文化，該制度後來由十九世紀歐洲文明的侵略擴張而傳播到全世界。

我曾建議中國理解並接受這些標準，將此作為保護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種手段。中國已嘗試在國際行為方面按強國的

受也是不太可能的。許多人正在尋求選擇和信教的個人自由，這包括成千上萬的重新信奉佛教、道教或信奉伊斯蘭教的信徒。中國的少數基督教團體雖在規模上無法與別的群體相比，但其虔誠之程度和其所具有的代表性足以提醒人們，在中國之外存在着值得尊崇的別的世界觀。在這些信教的人中，許多人感到，就個人層次而言，人們可以從這種儉樸的、要求嚴格的儒家思想中獲得令人驚奇的滿足。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信仰和思想將會找到真正的宗教的或半宗教的表達方式，並使個人及其家庭回復到比過去幾十年更能享受精神生活的狀態。

據報道，在一個無確定方向的變化迅速發生的社會，由於缺乏道德核心，故產生了對毛澤東的念舊情緒，甚至已經有人提到了新毛澤東主義。但這種對毛氏過去的統治所存在的混雜而具有彌漫性的依戀只是一種膚淺的表現。這與其說可悲，倒不如說值得警惕。在不存在毛式或鄧式領導人的今天，這些新的領導人不得不適應更多的現世的變化，特別是那些與市場經濟的持續演進相伴所出現的各種變化對他們提出了各種要求。他們至多會盡可能地去保留現時的形式和架構，並逐步摒棄那些已不再有用的東西。當事態發展要求他們這麼做，而他們又没能做到這一情況時，其公信度和道德權威就會受到侵蝕，進而嚴重損害中國希望最終所能發揮的作用。

自由和民主與現代民族主義結合起來的力量可以為新的文化規則的建立作出貢獻。前者可以及時柔克後者之無度，而民族主義則可為自由民主注入更多活力，並為之提供一種更為集中的方向意識。此種形式之民主有機會在中國形成嗎？所有的事實表明，情況並非如此，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有這種

風範行事，並已擺脫作為過去臣屬關係基礎的等級觀念。但是，大國的國家制度本身已經發展了。國際關係理論隨着新的現實而發生變化。新近，冷戰的結束使兩個超級大國所經營的中心平衡被消除。中國深受這一變化的影響，特別受到以下這種思想的影響：即世界如果不是完全仰賴於一個超級大國——美國，也會由其所支配。中國人受到自身歷史的提醒，當衆多國家為權力和財富而爭奪時，一個強國一定得警惕另一個統治其它國家的強國的出現。中國人雖不能確信現實的形勢是否與過去具有類比性，但他們發現這種思想在分析未來與美國的關係上具有幫助。

中國人度過了八十年代的幸福歲月，那時的中美關係再好不過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美國的公衆意見變得敵對起來，對此，中國的領導人感到無奈。在他們認識到這場悲劇是一種倒退的同時，他們視之主要為良好管理中的一次暫時失誤。教訓得以吸取，錯誤不得再重復。他們對於一些有影響的美國人在這整個事件上如此不予諒解真正感到大為吃驚。

如今，許多的中國領導人認為，美國這種對中國態度上的轉變反映出其試圖使中國繼續保持貧困和不穩定狀態以維持美國在亞洲統治之大戰略的一部分。他們有時認為出於保持在這一地區的突出地位美國沒有必要那麼做。他們對現代國家制度的理解使他們認識到，在一個變得越來越小，且相互依賴性變得越來越強的世界，由於現代通訊技術超級力量的粘合作用使世界出現了許多非正式的商業性帝國，衛星國和相互間日益緊密的各種關係。有些中國人更加認為美國會依據這樣的思路來鞏固聯盟關係。要使中國人確信這樣一種體系的結果不會使中

國陷於被相互結盟，且對中國之敵對強國示好的一連串國家所束縛的境地尚需時日。

對大多數中國領導人而言，如果中國不具有與其規模和歷史相稱的地位，那意味着世界仍處於不平衡狀態。經歷了多年思想糾正的過程之後，如今中國在處理其與鄰國的關係上採取了一種實用而靈活的方式。中國在本地區現實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標是交朋友和尋找真正的盟友。如果他們在繼續其成功的經濟改革的同時堅持這種作法，這就比較理想。如果他們能夠這樣做，而同時又不引起美國懷疑中國試圖取代他們而成為具有支配力的地區強國，那就更好。

因此，其重點是相當明確的：在國內繼續保持經濟增長和維持政治穩定，這將為中國的邊界安全和穩定其與鄰國的關係奠定基礎。三個危險點也是很明顯的：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的企圖；朝鮮半島以及尋求統一的努力可能產生的不確定的結果以及試圖利用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分歧的任何企圖。對於上述問題中的任何一個，美國和日本各自的作用都應予以高度的關注。

在我作出結論之前，我想粗略地考察一下這些問題。我已經在中國是否對本地區和平構成威脅的問題中提到過台灣問題。如果像美國和日本這樣的大國在台灣積極尋求國際空間的作法上直接或間接地予以干預，從而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構成了威脅，這就具有不同尋常的性質。低估外部干預對地區穩定所帶來的威脅是危險的。儘管美國和日本多次聲明其防務安排並無意適用於台灣地區，但中國人對這種防務安排極易擴展開來仍抱有深信不疑的態度。如果這種情況真的出現，它就會使力爭將這一問題限制在兩個系列中國政治演員之間而作出的努力落空。

至於朝鮮半島問題，中國對此保持着一種低調。由於這裏的兩個主角與中國的關係是如此親密（這不僅僅是由於地域上的原因），人們會驚奇地發現中國在減低南北韓之間的緊張關係上具有更為積極的作用。然而，對於中國而言，這種形勢具有十足的矛盾性。它在朝鮮參加過戰爭，並與北方為伍達三十年。後來它轉向與南方發展密切的經濟關係並擯棄了北方仍堅持的閉關政策。其地位如此之微妙，中國格外需要採用謹慎的外交技巧。如果有什麼事需要中國集中精力來處理，它會以萬分的敏感行事。這是否因為中國在傳統上就尤為注重與朝鮮半島的關係，或這是否表明中國已諳熟現代國家制度的外交手法，在目前這種階段還難以確定。其用微妙的方式來避免緊張關係和衝突的出現是出於這樣兩個原因。中國對其邊界和安全所存在的危險具有特別的敏感性，在尋求長久而和平解決棘手問題方面，它也具有謹慎處理的願望。

中國與所有相關強國合作的能力顯示，其近期在東南亞開展的外交活動會沿着相同的政策發展下去。如果其繼續對國際微妙問題謹慎行事，這將有助於中國在本地區贏得朋友和盟友。中國在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論壇和東南亞國家聯盟區域論壇的表現已經平息了許多對它的強烈批評。至於中國與每個國家的雙邊關係，有報道說，中國人在涉及主權和文化尊嚴的問題上已經表現出謹慎性。如果這種情況持續，它將顯示中國願意致力於支持和加強由現代國家制度所制定的國際準則，並為這種制度適用於地區性情況作出貢獻。

中國將是一個地域遼闊，具有潛在富有之前景和強大力量之大國，所以其鄰國有必要建立制衡制約的機制以確保相互之

尊重。它們已經表明，做到這一點的最佳方式是使中國盡可能全面地參與地區活動。與東南亞國家聯盟一道參與涉及諸如西太平洋，或亞洲其它地區，或歐洲，或美洲等非本地區性事務似乎是有益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在減輕中國與美國和日本的困難關係方面正處於發揮作用的地位。它們似乎也認識到這麼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如果獲得成功，這會有助於中國接受國際制度的參照指標，並對其在世界事務中發揮更大更積極的作用產生一種鼓舞。

* 本文原載《亞洲評論》，第9期，1999年，頁69-80，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29期（2000年），頁47-51。張定淮譯，劉宏校。

社會紐帶與自由： 移民社會的選擇問題

我想以有關陳嘉庚先生的幾句話來作為本文的開始，我們對在國際社會聲名卓著的陳先生深表敬意。¹ 他是一位典型的移民實業家和慈善家。他在英屬馬來亞致富，由於在當地的華僑社會，同時也在中國從事慈善事業而聞名，尤其在他的故鄉福建講閩南語的地區更是十分著名。他的重大貢獻在於不僅在華僑社會，而且也在他們的故鄉引進了現代教育。在本次討論會上，他把移民社會與現代教育聯繫起來的事跡也鼓舞着我們。在這裏我就不再談他非凡的一生。他的事跡已經說過多次，尤其是中國的學者和許多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學者。² 我想向大家推薦陳嘉庚先生的自傳——《南僑回憶錄》，該書已由A. H. C. 沃德 (A. H. C. Ward)、雷蒙德·朱 (Raymond Chu) 和詹尼特·沙拉夫 (Janet Salaff) 合作譯成英文出版。³ 另外還有楊進發先生的權威性傳記《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⁴

我將着重論述陳嘉庚先生與本次會議主題密切相關的幾個問題。許多人對陳先生所做的一些事感到驚訝，並對是什麼驅使他對教育如此熱衷深感困惑。有的人則提出疑問，他究竟是那個時代的典型或只是個例外？如果不瞭解其他人的所作所為

和陳嘉庚先生的人生準則，那將很難回答上述問題。顯然，他的所作所為並不符合傳統。就像他對待他的企業，無論是商業、農業，還是工業的態度一樣，他對教育以及設立各級學校的奉獻精神無疑是相當激進的。他的目標是使新加坡的華僑和閩南家鄉的人民實現現代化，通過教育來實現他的目的本身或許不是他的初衷，但陳嘉庚先生用他的財富興辦教育確實是直接並幾乎完全為了實現這個目的。⁵

例如，他關於教育的理念，超越了他本人在集美村所受的傳統教育。⁶ 他從他在新加坡這樣的現代化城市的經歷中學到很多東西，認為孩子們不僅需要學習古代經典，除此之外還應該向最先進的人學習實用的知識。在他的那個時代，他認為西方的代表是在亞洲的英國人。他認為應該鼓勵孩子們去學習有關事物發展的最新成果，他們的教師必須經過訓練以適應時代對所必需技能提出的要求，如果將來孩子們要適應迅速變化的世界，就需要這些技能。他很快就認識到商業與接受工業培訓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像商法，會計和航海技術等科目。⁷ 同樣他也認識到成人教育對許多為他工作而從未受過教育的人的意義。他是最早認識到女性受教育必要性的先驅者之一，特別是在中國，大多數女孩根本得不到上學的機會。⁸ 他還認識到外語知識的實用意義，鼓勵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人們使用雙語。然而，他對更高層次教育的大力支持也許是這種遠見卓識最好的例證，當時他創辦了東南亞地區第一所正規的華僑中學，這所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至今仍聞名於世。⁹ 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以及稍後創辦的廈門大學，陳嘉庚先生都十分重視學習科學，特別是那些作為現代醫學和工程學支柱的應用科學。

陳嘉庚先生意識到在東南亞華僑社會，少數為當地出生的孩子建立的舊式學校中，老式的文化教育方法還非常普遍，並對此現象很不滿意。這些學校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早期華人移民領袖的自身性格和所受教育水平。對他們而言，傳統的私塾傳授簡單的閱讀、書寫、算術以及一些規範中國人，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生活和行為的價值觀就已經足夠了。¹⁰也許這些舊式教育與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宗教學校所提供的教育很相似。陳嘉庚知道西方人的教會學校為了在年輕一代中傳播基督教信仰是非常注重宗教經文的。但他也注意到，無論在英屬馬來亞還是在中國，教會學校更進一步地開設了吸引中國人的現代課程和應用課程。他對既教育孩子們尊重他們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同時又讓他們自由地學習對陳舊知識構成挑戰的新課程這樣的辦學理念甚為讚賞。

陳嘉庚先生按照傳統的方式為他畢生從事的慈善事業打下基礎。這些傳統把對窮人的同情與因長期施捨行為而得到的社會承認結合起來。進行施捨將給施予者帶來很高的社會地位，如果他們願意的話甚至可以掌握社團的領導權。用當地統治者和殖民官員的觀點來看，這種領導權如果運用得當的話，將發揮類似於政治的作用。當現代化目標正在以民族主義為形式形成之時，這僅僅是社團領導人追求充當更加社會化的政治角色而邁出的一小步。¹¹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抗日戰爭進入高潮期間，華僑欽佩陳嘉庚先生，把他視為成功的楷模，在他的領導下，華僑以與他們對經濟發展所作的貢獻相同的方式參與當地事務。但從英屬馬來亞的角度看，他成功地喚起了華僑的愛國熱情，則對殖

民政府自相矛盾的政策形成了嚴重挑戰。為了維護其貿易和殖民帝國，英國人需要華僑，並保留一定數量的華僑，但他們也希望同化華僑，使其成為效忠於英國當局的新移民。此外，英國人對馬來統治者也承擔了義務，保證尊重他們的權利。因此，並不令人驚奇，陳嘉庚先生的行為終究與他們的規則是不一致的。¹²在陳嘉庚先生努力使他的同胞突破舊傳統的地方，當局卻認為太多的華僑社會凝聚力是對他們造就的多元社會的一個威脅。

這使我對現代教育形成了一種觀點，可以陳嘉庚先生的信念為例，那就是現代教育對加強移民社會的團結和豐富移民社會的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所取得的成就中的兩個因素有助於說明這一觀點。首先，他關注海外華僑社會怎樣實現內部團結以及他們如何與其他華僑移民社會保持聯繫。此外，他還認為，每個華僑社會都應與他們的中國故鄉的人民保持聯繫。這就是社會紐帶的要素，這種要素使社區與國家具有社會凝聚力。其次，他相信正規教育的作用，這可從他在馬來亞和福建故鄉積極興辦現代化學校和大學上得到證實，特別是他獨力創辦廈門大學。¹³從這點上看，他可以說是一個現代教育功效的崇拜者。他充分認識到教育可以加強社會的整合並決定一個社會所需的何種紐帶，而且他更加關注新思維和新方法的傳播，新思維和新方法的傳播可以解放年輕人的思想，因此對社會自由具有潛在的作用。

這兩個因素是我思考這次演講主題的出發點。自陳嘉庚時代以來，移民的環境已經大為改善，在當今大多數國家裏，一旦移民被接納，就享有遷徙和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儘管並非

都是如此。從奴隸身分的和不同程度非自由的移民，包括早期的契約勞工形式，過渡到自由和自願的移民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在過去兩百年裏，一個移民社會的形成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導致這種變化的因素包括居住國經濟條件的改善以及體現保護少數民族自由和權利的新法律。¹⁴

同時，也包括新移民更容易得到教育的機會以及教育質量的不斷提高。此外，新移民比以往更有可能從無論是種族、宗教還是文化上都與他們相同的當地移民社會那裏得到幫助，以及接受有關當地狀況的建議。當然，居住國也有他們自己的要求。比如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新移民在政治上效忠於居住國，以及有些單一民族國家實行狹隘的同化政策，這也許會使新移民感到難以適應。¹⁵然而，其他國家則不同，認為實行多元文化政策更有可能達到社會融合。今天的移民或許可以發現，過去一個世紀的變化已經導致社會紐帶和自由發生變化。¹⁶

紐帶和自由是個大題目，顯然無法在一篇演講中着墨過多。我所希望做的是從幾種方面來考查它對移民社會的作用。本文將討論社會紐帶問題，這種紐帶是社會和國家對其成員的要求。在此討論的新移民社會紐帶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在早期移民中男性佔主體，女性則在連結兩代人上發揮重要作用，以及教育的作用。至於自由，無論在哪一個社會都總是受到限制。我首先關注的是社會共同體容許其成員做出選擇的條件。對移民而言，他們接受何種教育將最終決定他們在選擇接受何種社會紐帶方面享有多大的自由。為此，我將重點論述四種類型的移民經歷，並主要以過去這一世紀的華僑經歷為例。這四種類型的移民經歷是：

- (一) 在同源文化地區的移民，社會聯繫的紐帶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 (二) 在不同文化地區的移民，建立社會聯繫的紐帶是非常必要的。
- (三) 在邊遠地區的移民，有可能獲得選擇的自由。
- (四) 加入當地移民社會的移民及其選擇。

同源文化地區：移民容易建立社會聯繫紐帶

這一類型的移民不存在很大的選擇問題，我將作簡單的論述。我把它歸入於最常見的移民類型，與其他三種類型的移民相比較，或許可稱為標準移民類型。簡而言之，當人們移居到與他們本身的文化相似的地區，他們生活在“文化近親”之中，被其吸收是自然的。雖然他們是處在不同政權的管轄之下，但是融入當地並沒有遇到很多困難。這是一種最少痛苦的移民類型。在古代，無論是印度次大陸、中亞、基督教歐洲，還是伊斯蘭世界，不同國王統治下的臣民，即使越過領地的邊界，仍然可以生活在與他們有相似文化的民族之中。其他的早期生活在“文化近親”中的移民例子是南印度和穆斯林的移民，前者到先是印度化的、後是伊斯蘭化的馬來群島進行貿易。¹⁷馬來人本身也在群島的各社會間自由遷徙。¹⁸甚至佛教和和尚和法師帶着他們的宗教信仰，通過陸路到中亞和中國，或飄洋過海來到東南亞和南中國，然後在那裏定居，儘管嚴格要求地說他們不是移民。古代中國儒家學者移居到朝鮮、日本和越南地區，並幫助傳播儒家學說和中國宗教習俗也可說是相似的經歷。¹⁹

無論如何，在早期，這種移民沒有理由引起人們的關注，也沒有要求他們必須接受正規教育。大多數移民與當地相似文化背景的人民結合不存在什麼問題。當經濟狀況許可時，他們的到來並未遭到阻力。而那些有家庭的移民則對他們孩子接受當地傳統的教育，以保持宗教信仰和適應新環境感到滿意。一直到十九世紀後期，由於後工業革命環境變化的關係，連續不斷的跨國移民勞工才成為政治問題。只有到此時，有關不同社會的觀念才表現出來，移民家庭開始需要現代學校和正規的教育安排，因此產生了不同的有關社會紐帶和選擇的問題。但是大體上說，在處於“文化近親”之中的移民並沒有導致移民社會的分裂，孩子們接受的現代教育也有助於證實他們可較輕易地加入到主流社會。²⁰

不同文化地區：移民必須建立社會聯繫紐帶

第二種情況是移居到不同文化地區的移民，在那裏他們與當地社會的聯繫比較少，因此內部的聯繫紐帶被視為移民獲得成功的工具，這與第一種情況截然不同。首先這種移民處於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不同文化地區存在潛在的敵意，他們的統治被認為是專制的。移民群體與之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強烈感到有自衛的需要。但是，在狹隘的國家認同意識興起之前，這些地區在一定程度上允許不同的移民自由地管理他們自己的社區。在限制的範圍內，允許這些社區自行處理內部事務，來維繫其成員，以維護公共利益。尤其是處於巨大的文化、政治實體中心的繁華城鎮更是如此，當然這種情況在當地主流社會之外的地區也是允許存在的。在古代，羅馬、亞歷山

大、大馬士革、倫敦、長安、威尼斯、熱那亞和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等城市，以及漢薩同盟的港口，吸引來許多外國商人，以及他們的家庭和僕人。它們都是容忍所謂的“移民文化空間”存在的例證。²¹ 其它著名的城市還有亞洲較小的貿易城市，如廣州、馬六甲、刺桐(泉州)，以及十八、十九世紀的孟買、曼谷、馬尼拉、巴達維亞、檳榔嶼和新加坡。²² 這些城市都為外國商人提供了從定居到成為移民相似的條件，當他們的人數達到一定規模時，通常都發展成為重要的社區。

在東南亞城鎮和商業港口城市有大量的典型案例。在那些官僚統治薄弱的地區，以及需要中國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商人及工匠的地區，則為移民提供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同時，這些社區為了自身保護，向其成員精心灌輸那種思想，即要尊重強有力地維繫社會內部忠誠的紐帶。在那些訓練與教育年輕人的學校裏，重視的是文化的連續性和實用知識。因此，需要發展關係網絡。隨着社會變得更加複雜，在每一個原有的社會裏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認同。在一些為年輕人而設的學校，特別是宗族和寺院學校以及穆斯林學校，都傳授各自的宗教學說。中國人的私塾也非常重視必要的技能和傳統，因為這是商業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在這些移民社會看來，這種社會聯繫紐帶是必不可少的，對他們的年輕人來說，別無其他選擇。這種紐帶可以產生信任感，而信任感決定他們商業冒險的成敗。這些對他們的基本生計和生存都關係重大。但他們並不是在現代學校中接受教育。

還有其他的情況要求移民群體應付初次遭遇危機時要有不同的方法。例如，當英國人和法國人在北美洲遇到懷有敵意的

印地安部落時，他們不僅很好地組織起來與他們戰鬥，而且還建立了新的聯繫紐帶，從而形成了新社會。這包括重新確立宗教信仰並對土著傳教。到澳大利西亞的英國人也有這種情形。在穆斯林世界，也可以看到以宗教為聯繫紐帶的例子，如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在他們的帝國內廣為傳教，還有穆斯林商人到印度次大陸、馬來群島和南中國沿海傳播伊斯蘭教。²³

由於十九世紀的大規模移民對現代國家性質產生的影響，歷史舞臺拉開了新的一幕。西方的統治導致了整個亞洲民族主義的興起。隨着二十世紀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正規教育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敏感，移民社會的選擇也變得更加困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東南亞地區。從中國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在外國的土地上維護他們各自內部團結的紐帶，轉變為在新獨立國家裏維護民族統一的紐帶，這不再是一個自然的進程，所有的社會不得不做出調整，新的國家認為認同於他們的新民族是壓倒一切的。至於對東南亞的華僑來說，壓力是雙重的。新國家對高度忠誠的要求是強烈的，這導致了直接與宗族和其它組織形式的傳統紐帶相衝突，傳統紐帶表現為移民社會的全體成員要求有一種為“公共利益而奉獻”的孝行。社團領袖對削弱這樣的“孝行”都不情願，更不要說放棄了。²⁴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陳嘉庚先生對現代教育的重視，既集中體現在社會可行的應對策略上，也體現在實行這種策略無意間產生的結果上。他出於對現代教育的狂熱，將一種複雜的因素摻合到教育中。他希望下一代掌握最先進的知識來回報社會，並加強他們自身的競爭能力。他或許沒有預料到，接觸富

有挑戰性的新思想，可能使年輕人擺脫把他們束縛於社會的紐帶。後者的發展標誌着所有的傳統社會開始陷入困境，他們的年輕人必須應付現代化帶來的挑戰。

最近，伴隨着以北美和西歐等經濟發達地區為主要目的地的新移民浪潮，在不同文化和敵意環境中，紐帶問題變得更為突出和困難。確實，今天為新移民建立的現代城市學校，也給他們的孩子帶來了更為尖銳的選擇問題。²⁵但是，對大多數新移民來說，更大更直接的問題是，他們如何被相同種族背景的當地移民社會所接受。這個問題將在我談第四種移民的經歷時再加以探討。

邊遠地區：移民可有選擇何種社會紐帶的自由

在此我將對不發達邊遠地區的移民做些簡要的論述，來說明另一種移民的經歷。在這些地區，移民有更多的自由來選擇與誰結合，如何做和做什麼來保護他們的自由。與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因文化差異造成的緊張關係不同，在邊遠地區，拓荒者處境所帶來的挑戰對那些沒有必要受公共社會約束的冒險者來說更具有吸引力。但這種移民至少可分為截然不同的兩種類型。一方面，有些個體小商販來到小村鎮和農村集市。那裏的移民如果不是未被發現，也是非常罕見的。另一方面，他們可能是前往開發原野的勞工隊伍中選擇逗留下來的殘餘人員。²⁶在這種環境下，那些自立能力和適應能力強的人才能得以興旺發展。例如，儘管他們也帶來他們的社會和文化準則，但他們並沒有把這些準則視若神明加以堅持，從而束縛住自己。他們僅創造性地保留了為他們競爭成功所需要的那些價值觀，同時在

與別處的親戚和家族聯繫中，他們也仍然遵守那些準則。但有可能的是，當這些準則不再符合邊遠地區的需要時，他們就不再受這些準則的約束。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生活在當地社會中，至關重要的是他們與那些不同種族人民建立關係的能力。

對東南亞的華僑來說，冒險來到主要港口和城市之外地區從事買賣的商人，以及在當地群眾中間定居並開設小店舖的商人很早就開始了這個進程。在他們建立與供應商網絡的聯繫之後，他們就選擇了當地社會化，甚至與當地人通婚。由於長時期與其他華人隔絕，他們必須自給自足，從而造就了與他們的顧客相結合的機會。這對母親是當地人的孩子來說，更是如此。此外，在年輕人與當地孩子共同接受教育的地區，像在泰國和菲律賓，²⁷ 一種不同的紐帶自然地產生了，他們的後代認同於這一地區的人民，最終認同於這個國家。在那些得不到這種教育的地方，華僑建起了自己的學校，努力使孩子至少受到基本的教育。雖然他們的選擇是有限的，但是對他們來說，求助於與他們同文同種的其他移民是不必要的。這種自由的選擇導致他們認同於當地社會。當他們與保留家庭關係的當地婦女通婚時，他們的孩子可以進入當地學校學習，情況尤其是如此。

另一方面，在那些少數勞工被送去拓荒地區，無論是在錫礦或在金礦做工（在邦加和勿里洞島、西加里曼丹、馬來半島各州、泰國南部），還是在甘蜜園、胡椒園和橡膠園工作（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社會關係紐帶開始變得十分不同。由於人數的增多，就有了另外一種選擇。在這些建立了等級關係或伙伴關係組織的飛地內部，通常都是男性的環境促使他們創造出一整套的伙伴合作關係，來有力地捍衛公共利益。²⁸ 如果在這些

行業中取得成功，他們就從中國故鄉帶來了他們的女人，這使飛地變成爲更加密閉的網絡。在那裏，他們爲孩子建立了自己的學校，這也將加強保護他們自己社會的能力。一旦條件許可這麼做時，這就是他們的選擇。²⁹ 直到二戰後建立了國民學校，國家政府對此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這種模式才被打破，選擇的自由明顯地減少了。

這裏我想起了廣爲流傳有關中國“苦力變成頭家”的神話，這個的神話使許多成爲企業家的移民對教育的重要性產生了懷疑。契約勞工，通常稱爲苦力，並不是那些著名的華僑成爲成功企業家的搖籃。最近通過對成功的華僑商人傳記的調查表明，如果他們在中國確實是農民和臨時僱工出身，如果没有社會關係的話，他們將没有機會上升到這樣的社會地位。³⁰ 在這個世紀，確實只有有文化和受過現代華文學校的教育，他們的孩子才有機會與那些出生於商人家庭和有文化背景的人競爭。簡言之，對苦力本人來說，生意成功取決於他們是否與商業有家庭關係，或者說是商業背景。只有以這種關係作爲起點，通過他們的努力工作加上運氣，才能幫助他們取得成功。如果受過某些教育則更爲有利，無論是像陳嘉庚先生在中國鄉村受的那種教育，還是在移民社會建立的現代初級學校受的教育。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事實，即“從乞丐到富豪”是通過家庭網絡和一定的基本教育相結合才發生的，而且一般都發生在那些來自經商家庭或家道中落者身上。對那些到邊遠地區的華僑而言，最重要的是勇氣。除此之外，這樣的結合也使社會紐帶成爲取得商業成功的強有力工具。顯然，對他們而言，受過一些教育並不是件危險的事。

加入移民社會：新移民及其選擇

最後，讓我談二十世紀初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一個更普遍的現象。我談的是那些居住在已經在當地移民社會生活，具有相同種族背景的人之中的移民。在某些情況下，新移民投靠他們在海外的親戚和朋友。³¹ 與他們的同族就近生活具有很多有利條件，如獲得學習、就業和得到幫助的機會。其他人則被同鄉招去做工。通過這種途徑，新移民最終選擇在當地移民社會的邊緣生活，並希望擠入這個社會內部；或者通過自立，自由地發展自己的新社會。一旦有可能，他們就會從這個社會外部尋找新的伙伴和同盟者，從而成爲潛在的對手和競爭者，對老移民構成挑戰。那些追求更多的教育並獲得更先進技能的新移民將爲這麼做作充分的準備。目前已經對這種移民模式的最新表現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³² 但這裏不是充分展開討論該問題的地方。相反，我將討論有關英屬馬來亞的華僑定居者和新來者歷史的一些早期案例，也將涉及英屬馬來亞獨立後的某些情形。

這是我認爲在這一領域值得進一步關注的特殊模式。這種模式使我對早期華僑不同集團之間的相互關係產生了興趣，當時他們曾徒勞地爲統一成一個更大的社會而進行鬥爭。然而我主要關注的是中國因素，尤其是中國的政治，以及隨華人而來由於歷史和傳統所形成的敵對關係。這種敵對關係不斷地造成他們的分裂。海外華人遠非像人們形容的那樣是高度網絡化的統一社會，而是分裂爲許多不同的集團。這導致了在許多集團之間或是合作，或是衝突，變幻無常。當然，這種分裂狀態有

時是因當地統治政權所致，尤其是在殖民地區域內。在那些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加入到老移民社會的各個地區，這種分裂現象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發生。³³

我想特別提請注意的是，在當地僑生社會與新來者形成的社會間存在着社會和文化裂痕。在漢語中，他們稱之爲土生(tusheng)和新客(xinke)。在馬來亞當地語中，前者稱爲伯拉奈干(peranakan)或峇峇(baba)，後者稱爲托托克(totok)——閩南話稱爲新客(singkeh)。爲了簡便起見，我將只使用兩個術語，峇峇指當地出生的移民社會，新客指那些起先需要峇峇幫助，以後形成自己的社會的後來者。在英屬馬來亞，這兩者間的文化裂痕被利用來爲英國人的利益服務，儘管華僑社團領袖曾致力於彌合裂痕。這種努力有時候是相當成功的，移民共同體的變化和分裂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³⁴ 當地政治因素和中國政治因素的相互影響已經得到一定的關注，但是還不清楚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爲建立新的多元化社會國家是如何解決分裂問題的。特別是，不同類型的社會紐帶和對崇尚自由的教育理念的不同反應應該得到更深入的研究。³⁵

需要研究的問題之一是，探究峇峇和新客兩個概念的含義和用法。最初，峇峇是指數世紀前定居在馬六甲和馬來群島其他地方的混血華裔社會。當峇峇一詞更廣泛地用作指土生即當地出生的華人時，像伯拉奈干一樣，它涵蓋了更多以英屬馬來亞爲家的華僑。關鍵是文化而不是血統。這個概念被用於強調對當地的認同並承擔義務，以及與非中國政體聯繫的網絡，這一切都是新客，或者在中國出生的華僑所不具備的。³⁶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中國出生者變得更爲成功時，同時民族主義

和反殖民主義意識興起，峇峇一詞被中國出生者用來指那些強烈效忠於英國並拒絕與中國發生聯繫的人。到現今，新客這個術語已不是非常有用，因為很少有中國人被允許進入馬來亞。兩個術語都讓位給了更廣泛使用的“華僑”，即中國旅居者，這一術語被使用來鼓勵所有中國人都認為他們自己是一個單一的社會。³⁷ 華僑一詞與新客極為相近，儘管它並沒有將峇峇排除在外。這樣一來，華僑一詞就為全體中國人設定了標準，即大致是指那些說漢語並認同於中國的人。從那時起，使用峇峇一詞，指的是那些曾在英文學校上學，對中國文化和語言不是很熟悉的華人，他們處於不利的地位，以致不能輕易進入華人的商業社會。

在這裏，紐帶和教育的聯繫體現在峇峇和新客兩個術語轉變成了由於所受現代教育的不同而分為英文教育集團和華文教育集團。這個過程反映出定居的華人與僅是旅居的華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問題是，在早期的歷史上，誰將提供現代教育以使孩子們在當地取得成功做準備，以及一旦需要，能做什麼才能使孩子們做好為中國和華人社會服務的準備？如果受正式教育是新紐帶的關鍵，那麼對那些頭腦中目標明確的人來說，就必須掌握對紐帶運用的控制權。因此引發了對這種現代教育性質進行解釋的爭論，這也是英國和中國之間發生爭論的一個原因，即到底如何判斷一個人是定居的華人還是旅居者。從政府方面來看，英國人擁有優勢，可以決定對當地社會的教育政策，並使這些華人團體選擇認同效忠於當地政府和世界性的教育。但從其他方面來看，在那些對中國感情強烈的地方，華文教育家佔據優勢。即使不是由他們控制教學的內容，最起碼在

每所華文學校的每間教室都有他們培訓出來的教師。其結果造成社會紐帶的分裂，即華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來分類。

在此我們不需要對眾多的原因進行深入討論，當華僑一詞受到質疑的時候，峇峇-新客的關係似乎變質成了受英文教育者和受中文教育者的關係。對中國的態度變得不如對當地政府的忠誠來得重要。但更重要的事實是，在廣大的馬來人世界裏，華人被認為是一個強有力的少數民族，以及他們熱衷於努力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他們才不會被同化並合法地保留中華文化。因而，這種雙重的壓力要求所有華人不再使用峇峇和新客的老概念彼此爭鬥，受英文教育者也不再反對受中文教育者。峇峇有時用於懷舊的場合，新客則是開玩笑才使用。有時峇峇也在一些極少見的場合使用，指那些不能適應新環境的老古董們。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都鼓勵他們使用雙語或多語，並教育他們團結在國家框架之內。這種狀況依然還不穩定。定期地審查和改進現行的教育政策和設施，反映出了它們使團結獲得成功的迫切願望。如何制訂下一個時期的發展的政策，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最重要的問題之一。³⁸

但是現代教育，就像陳嘉庚先生從一開始就看到的那樣，不僅與社會紐帶問題相關，而且還與從舊傳統中把思想解放出來，以及從其他企圖束縛人生選擇的教條中解放出來有關。學校被用來培養年輕人特定的忠誠和灌輸意識形態方面並不總是成功的。如果它們是真正的現代學校，並非是過時教條課程的簡單複製品，那麼它們可以開闢一個科學的世界，同時傳播建立更人道、更進步社會的新理想。這些新理想包括愛國主義、自由和從文化方面理解多元世界的能力的信念。這樣，相互競

爭的教育體系將有利於通過提高技能和理解的水準，為自由創造條件。這種教育體系有助於培養新一代敏銳的思想，為未來的社會和國家做出更理性的選擇。

對於加入當地移民社會的移民必須做些什麼？可以設想十九世紀新客來了之後，即與英屬海峽殖民地峇峇社會發生了對立。讓我們將那些新來者與同樣現代意義上的新客相比較，不論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新客是否是華族。新新客（即外國人才，在新加坡是這樣稱呼他們的）將發現當地出生的，或新峇峇與他們一樣，都富有經驗，更具世界主義，並為當地提供了高質量的技術和聯繫。但是，就像過去的老峇峇那樣，如果當地社會太注重社會聯繫紐帶而不解放思想以適應變化，就必須面臨被取代的可能性。如何對待不斷增加的受過良好教育和善於應變的新客，同他們一道學習外部世界，將決定移民社會的前途。無論在哪裏，只要有新移民加入到移民社會，那麼，一些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後果就值得關注，一些教訓也值得吸取。而峇峇-新客的經歷本身也提供了歷史的參考價值，如果能更好地理解，對那些有着類似處境的人來說不無裨益。

如果陳嘉庚先生仍在世，他將會認識到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都需要高度的凝聚力。儘管時代緩和了，但是各國考慮到向全球範圍移民的願望不斷增長以及便利的交通也使移民變得更加容易，所以在實際中提高了移民入境條件。即使被接受的移民不受歡迎，但他們的素質仍繼續提高。現代教育是給人民帶來更多選擇的解放因素，但一個人往往不能有太多的選擇機會。現在只有非常少的邊遠地帶可以讓移民去尋找新的自由，現有的邊區只存在於知識世界之中，關鍵在於能受到最好的教

育。現在世界各個大型大學為成千上萬來自各國的華人提供了教育，如果陳嘉庚在世的話，將為此感到欣慰。他將感激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為受過良好教育的移民流向文化相近地區提供了更多的機遇。如果在移民社會的生活中，教育繼續成為社會聯繫的紐帶，他將更加感激。

* 本文是王廣武教授為2000年8月新加坡“移民社會與現代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所作的專題演講。中譯文原載《南洋問題研究》總第105期，2001年第1期，頁1-10。王望波譯，廖大珂校。

注釋

- 1 陳嘉庚國際學會在1992年成立於香港，1996年搬遷到新加坡。它的貢獻包括了支持新建立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化學大樓和陳嘉庚故鄉的集美大學之商學院。
- 2 中國已出版了許多有關他的生活與成就的著作與論文。其中專門研究他對現代教育的貢獻的是王增炳，《陳嘉庚興學記》（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使他在華社裏出名的第一和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黃炎培1919年12月15日刊登於上海的《東方雜誌》的論文，描述了他如何單槍匹馬地創建了廈門大學。
- 3 大部分的《南僑回憶錄》是他在印尼躲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所寫的。這本書後來加上了注釋，在1946年出版於新加坡，迄今已有許多版本。我本人擁有是香港1979年出版的。另可注意的是 *The Memoirs of Tan Kah Kee*,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A. H. C. Ward, Raymond W. Chu and Janet Salaff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 Yong Ching Fatt, *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此書已翻譯成中文：李發沉，《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新澤西：八文文化企業公司，1990）。

- 5 黃炎培以“回家興學”一詞來表達陳嘉庚在這方面的特大貢獻(見注釋2)。
- 6 《南僑回憶錄》，頁393。
- 7 *Memoirs of Tan Kah Kee*, pp. 11–25.
- 8 尤其是在他所創立學校裏的婦女師資訓練，*Memoirs of Tan Kah Kee*, pp. 21, 39.
- 9 《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創校六十週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1979)。
- 10 顏清滄，〈戰前新馬閩人教育〉，《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頁283–340；崔貴強，〈新加坡華人：從開阜到建國〉(新加坡：教育出版公司，1994)，頁150–168。
- 11 C. F. Yong (Yong Chin Fatt), “Chinese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Journal of Island Society* 1 (December 1967) and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1900–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9. 2 (September 1968); Both republished in 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pp 1–22; 47–81.
- 12 Yong, *Tan Kah Kee*, Ch 6, pp. 180–224.
- 13 洪永宏編，《廈門大學校史》第一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頁1–17，22–28，33–36。
- 14 Wang Gungwu, “Migration History: Some Patterns Revisted”, and Aristide R. Zolberg, “Global Movements, Global Walls: Responses to Migration, 1885–1925”, in Wang Gungwu, ed. *Global History and Migra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pp 1–22, 279–307.
- 15 Lynn Pa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and Landmark Books, 1998), pp. 114–126, and relevant chapters in Part V of the book.
- 16 Stephen Castles, “How Nation-states Respond to Immigration and Ethnic Diversity”, in Steven Vertovec, ed. *Migration and Social Cohesion*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1999), pp. 3–

- 18; Wang Gungwu, “Migration and Its Enemies”, in Bruce Mazlish and Ralph Buultjens, eds. *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pp. 131–151; and “Upgrading the Migrant: Neither Huaqiao Nor Huaren”, in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6*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6), pp. 1–18.
- 17 George Coedes,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Walter Vella, translated by S. B. Cowing from *Les etats hindouises d'Indochine et d'Indonesie 1948*)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68); S. Q. Fatimi, *Islam Comes to Malaysia*, ed. by Shirle Gordon (Singapore: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1963).
- 18 Wang Gungwu, “Migration Patterns in History: Malaysia and the Region”,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8.1 (1985): 43–57.
- 19 周一良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和《中外文化交流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Iwai Hirosato, *Some Historical Studies of Buddhism in China & Japan* (Tokyo: Toyo Bunko, 1957).
Kenneth J. Saunders, *Epochs in Buddhist History: Buddhism in India, Nepal, Tibet, Ceylon, Burma, Siam, China, Japan and Korea* (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1996) and his *Heritage of India, China and Japan* (New Delhi: Vanity Books, 1989).
Marius B. Jansen, *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onrad M. Schirokauer,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iviliz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 William H. McNeill and Jean W. Sedlar, *China, India and Japan: the Middle Peri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20 華人移民到北美是個好例子，見 Oscar Handlin, *Immigration as a Factor in American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59); Bernard Bailyn,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y* (New York: Norton, 1960) and *The*

-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Knopf, 1986); Bernard Bailyn and Philip D. Morgan, eds. *Strangers within the Realm: Cultural Margins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Chapel Hill, N. C.: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Williamsburg, Virginia, and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 21 有關此特色的經典著作包括 Henri Pirenne, *Media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 translated by Frank Halsey (N. Y.: Doubleday, 1956) (first published in 1925);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first published in 1961); Leonardo Benevolo,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translated by Geoffrey Culverwell (London: Scholar Press, 1980).
- 22 有關一些正式或非正式之安排的簡短例子，見 Dilip K. Basu, ed. *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Colonial Port Cities in Asia*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Rhoads Murphey, *The Outsider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 23 這是一個被忽略的題目。除了 S. O. Fatimi (注 17)，可見 Dale F. Eickelman and James Piscatori, eds. *Muslim Travellers: Pilgrimage, Migration, and the Religious Imagin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24 Edgar Wickberg. "Localism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Overseas Migr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Gary G. Hamilton, ed.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pp. 35–55; and his "The Chinese as Overseas Migrants", in Judith M. Brown and Rosemary Foot, eds. *Migration, the Asian Experi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 12–37.
- 25 最近的例子可見於 Ronald Skeldon, ed.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4) and his "Hong Kong Communities Overseas", in Judith M. Brown and Rosemary Foot, eds. *Hong Kong's Transitions, 1842–1997*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St. Martin's Press,

1997), pp. 121–148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ithin and From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 A Review Essay", in Robin Cohen, ed. *The Sociology of Migration*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6), pp. 403–450.

- 26 一般的歷史與族群研究都提及前者，如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and Francis Loh Kok Wah, *Beyond the Tin Mines: Coolies, Squatters, and New Villagers in the Kinta Valley, Malaysia, 1880–1980*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至於後者，已有較多的刊物討論川行北美各城鎮的契約勞工，包括 Chan Sucheng, *This Bitter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Ling Huping, *Surviving on the Gold Mountain: A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 and Their Lives*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 27 兩本有舉此類例子的著作是 Richard J. Coughlin, *Double Identity: The Chinese in Modern Thailan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and Edgar 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28 Wang Tai Pe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Kongsis*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4); James C. Jackson, *Chinese in the West Borneo Goldfields: A Study in Cultural Geography* (Hull: University of Hull, 1970); Mary F. Somers, *Bangka Tin and Mentok Pepper: Chinese Settlement on an Indonesian Isl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Francis Loh, *Beyond the Tin Mines*.
- 29 Victor Purcell, *Problems of Chinese Education*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1936) and *The Chinese in Malaya* (Issued by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 30 一般著名華人富商的簡略傳記都強調他們早期的貧苦。但經過小心的解讀或通過較詳細的傳記，我們都很清楚地知道他們曾依靠了來自多方面的親戚與朋友們的關係。

- 31 有關華人移民的經典著作是 Chen Ta,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English version edited by Bruno Lasker) (New York: AMS Press, 1978). 其他的著作包括 Wang Sing-wu,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1888: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Emigration to Australia*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8); Adam Mckeown, "Chinese Migrants Among Ghosts: Chicago, Peru and Hawai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7 (Ann Arbor, MI: UMI, 1999); Lee Lai To, ed. *Early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ies: Case Studies from North America and British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88).
- 32 一份優秀的研究是 Ng Wing Chung, *The Chinese in Vancouver, 1945-80: The Pursuit of Identity and Power*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9).
- 33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Second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1951) 提供了對不同政策的最全面性之研討。
- 34 C. F. Yong,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林孝勝, 《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 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1995);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35 教育史的書刊越來越多。有關馬來西亞教育史, 見 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Kua Kia Soong, *The Chinese Schools of Malaysia: A Protean Saga* (Kuala Lumpur: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1985); Loh Kok Wah, Phang Chung Nyap and J. Saravanamuttu,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Malaysia-China Ties: Elite Perspectives*.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981).

新加坡教育史的書有 S. Gopinathan, *Towards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1945-1973*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 his edited volume, *Language,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ssues and Trend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4).

宏觀與比較角度的著作有 Gwee Yee Hean, *Some Aspects of Chinese-Medium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elected Readings and Bibliography*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xtra-M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65); Ingrid Glad, *An Identity Dilemm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imary Education for Ethnic Chinese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Oslo, Norway: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6 Khoo Joo Ee, *The Straits Chinese: A Cultural History* (Amsterdam: Pepin Press, 1996); 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 37 Wang Gungwu, "The Origins of Hua-ch' iao", in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Sydney: Allen & Unwin, New edition, 1992), pp. 1-10.
- 38 Ju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Aldershot, UK: Ashgate, 1998); John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東南亞華人與中國的發展 ——

最近世界各地的華人，尤其是東南亞的華裔，對投資中國，經營商務，興趣日濃。報紙的報道，包括幾篇有關投資中國取得可觀成績的記事，對中國經濟經過多年的閉關自守後自行發展的成功，不免感到驕傲。有關東南亞華人對華投資的程度，有一直引起各種不着邊際的誇張說法。好些這類的報道，無法區別東南亞華人和港台華人之間對華投資的不同。這一點的確可能造成極大的混亂。

其他的報道則強調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步伐和規模，以及它所以引起國際廣泛注意的緣由。中國已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對於整個事態的來龍去脈，我們確有認識的必要。然而，又有其他的報道，集中探討東南亞地區，特別是亞細安國家各族人民的反應。這個地區的華人，在過去二十年中，尤其取得成功。應該特別一提的是，北美洲、歐洲，以及亞洲其他地方的人士所深感興趣的一點，那就是東南亞人民對中國以外有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名華人的存在，會有何種反應。而這些華人與香港和台灣的華人合在一起，總數達到五千萬以上的時候，他們表面上的經濟勢力，在外人心中多少會感到驚恐的。¹

這種種矚目的關注，對於迅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構成同一反應的一部分。我們必須瞭解外人為什麼會表示關注，同時我們要怎樣才能夠對那導致目前發展趨勢的客觀環境作一番解釋。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的許多評論，反映出過去東南亞華人，特別是本世紀上半葉的東南亞華人，對政治與經濟活動的各種反應。因此，我們有必要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今天海外華人投資中國有什麼新奇可言？它具有多大的意義？我的論點是，目前所發生的一切是獨一無二的，意思是說，它來自若干因素的獨特結合，值得作仔細的研究。

要瞭解最近有關華人投資決策的意義或獨特性，最好的辦法是把他們同過去一百年的發展情況作個比較。你們從一名歷史學者的口中聽到這樣的話，也許不會感到驚異。但是，我卻認為作上述比較，能夠大大幫助我們瞭解過去和現在所發生的事，有很大的區別。

若干定義

首先讓我提出幾個定義，關係到我們稱之為東南亞華人者，究竟是指哪一些人，以及我們進行商業投資、協助中國發展，究竟意義何在。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當我們談到華人時這個字眼所指的是，那些居住在中國版圖以外，也就是居住在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及澳門以外的華裔。²當然，在過去幾百年中，這些華裔大多數是僑居者，但是在本世紀下半葉，這些僑居華人變成當地公民的過程，卻是一種新穎的，也是最重要的歷史現象。

也許我覺得對世界其他地方經常運用的一個字眼，加上一個注腳。這個字眼可能適用於華人，但也可能引起極嚴重的誤導作用。這個字就是 Diaspora，意思是散居在外的人。我注意到這個字眼在北美洲和歐洲經常用來稱呼居住在本國以外的各色人種。“散居在外的猶太人”是最常提到的字眼之一，但是在歐美也有散居在外的阿拉伯人和非洲人。³在美國和加拿大，幾乎所有非本地人的少數民族，都經常被稱為散居在外的這種那種人，當然其中也包括散居在外的華人在內。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個字眼總有一天散播到其他地方去。我不同意把這個字眼應用在華人身上，因為它所具有的含義，也許在某些方面適用於過去的僑居華人，但卻不適用於今天的華人。在許多方面看來，

“僑居在外”這個字眼所含的政治內容，可以同華僑一詞相比擬，其實後者也具有不少政治意義。衆所週知，要把某些政治涵義從華僑一詞中除掉，是很困難的事。這就是我們今天在東南亞不應用華僑一詞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中國卻依然照用不誤，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在北美洲，這個字眼仍舊被廣泛應用。我們應當抱着異常謹慎的態度，以瞭解這個字眼的確實意義和真正來源，才能夠正確地應用。我們尤其應該設法確保這個字眼的政治內容，不會遭誤用、濫用和曲解。

讓我們回頭談談僑居華人變成公民之前的情況。僑居華人這個字眼原本是指華族商人、工匠和他們的親戚和宗族。這些人處於一個偉大帝國的經濟邊緣。他們在海外貿易中謀求盈利並把異國商品帶回本國。他們從宋朝到清代，一直進進出出中國，而且多數不在海外定居。他們出外經商，好多連續幾代留在國外，特別是留在東南亞。有一些最終定居海外，但是作為

商人，他們通常無此必要。嗣後，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出外謀生的是勞工。他們以苦力身分離開中國，既無意圖，也沒有希望成為商人。他們是以契約勞工的名目或根據合同，出外討生路。而且多數日後返回中國，其中確有一些留在異邦，並且像商人一樣，本身也成為僑居者。

我們不曉得這些東南亞華族商人是否把所得盈利投資在中國。但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所謂投資，指的是為了盈利而進行的商業投資。我們知道華族商人是從華南諸港口，特別是從福建和廣東的海港出洋去，其中有許多相信把所賺到的錢帶回中國。他們怎樣處理所賺到的錢呢？他們是否把利潤再度投資在貿易上，然後又再前往東南亞？他們是否應用所得利潤，支持中國國內規模更大的帝國經濟，或是把利潤分散到所屬鄉村和市鎮，因此購買土地和產業，使得他們的家族和當地社會機構受益？我們必須假定他們的財富有一部分用以資助所屬縣郡的經濟發展。

至於在十九世紀期間出外謀生的大批勞工，他們辛勤工作，平時把一些血汗錢寄回家，回國時帶着儲蓄，資助家庭生計。他們當中許多能夠活着返鄉，深感慶幸；另有些則留在國外，成為商人和工匠，但多數過了幾年便返回中國。不論他們對故鄉的發展做出多大的貢獻，卻沒有證據說明他們對本省或本區的較大規模經濟，發揮重大的作用。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我們知道有更多華人散居在中國疆土以外。這之間便產生了“華僑”(Overseas Chinese)的概念。這個字眼的內容包括多方面，它強調所有在海外的華人具有僑居者的地位。他們無論在國外蟄居多久，都準備有朝一日

返回中國。事實上這個字眼更準確地形容那些準備同愛國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發生聯繫的僑居者。這個時期正逢中國同西方列強和日本發生戰爭而國勢大衰。從這個前後關係看來，“華僑”這個字眼的政治意義大為加強，使到華僑更難談論單純爲了商業利益而投資中國的事了。中國方面則越來越盼望他們，如果不是基於慈善原因，也應該本着愛國緣由，把在海外賺到的錢匯回中國。換句話說，他們匯款到中國進行投資，是一種愛國行動，即使此舉無利可圖，也不在乎。

由於有僑居華人參加推翻滿清，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愛國華僑的概念，便顯得更加突出。這之後的四十多年間，同樣的愛國主義精神，導致他們涉入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權力鬥爭，同時也涉入中國的抗日愛國戰爭。在東南亞及其他地方，華僑的概念得以進一步闡明和加強，事緣有越來越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僑居華人，特別是教師和記者，在大多數地區裏，加入商人和工人的行列。此舉有助於使得他們更加投入中國的政治。

這些歲月的種種經歷，無形中增加了“華僑”概念中的政治內容。由於我在其他地方寫過許多有關這方面的文章，我在這裏不想多談。⁴ 我將轉而探討下一階段的發展過程，也就是從政治概念濃厚的“華僑”，轉變到“華人”這新概念的經過情形。“華人”這個新概念，是用來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南亞新興國家的華裔公民。對於大多數華裔來說，這種轉變是不容易適應的。我們當中多數經歷過這種轉變的人，都知道對於那一代的人，是多麼困難和痛苦的事。當然對於下一代的子女就容易得多了。到了他們的孫輩一代，則更加容易了。不過，我們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從華僑的身分轉變到效忠當地的

公民，無疑是一個艱難的過渡，在東南亞至今仍有一些地區的華裔，有待完成這種過渡。

如今我們可以安妥妥地談論“華人”這個字眼了。這是六十年代以來成爲東南亞國家公民的華裔所通用的名詞。中國方面經常運用的名詞則是“外籍華人”。顯而易見，這個字眼所反映的事實是，他們定居在不同的國家裏，而不同的國家又有不同的語言、文化、歷史和政治經濟政策，這意味着我們如今所談論的，是更多類型的華人了。每一個群體的華人的性格，都是在他們成爲公民的新興國家的不同影響和不同條件下形成的。他們當中已經產生了一個由專業分子構成的中產知識階層，包括新世代的具有國際眼光的現代商人在內。這也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因此，華人本着愛國和慈善精神匯款回中國的時代，便自然而然地轉變爲在一個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環境中，着重投資取利的時代了。

這把我引到其他兩個重要的定義，我們必須把逾越國界的商業投資，同匯款回國，供養家、愛國和慈善用途區別開來。在中國經濟發展這一點上，前者純粹只是尋求有利可圖的投資。對華商業投資並非直接關係到它是否對中國經濟能做出貢獻的問題，事實上，投資如果取得成功，對中國經濟是會做出貢獻的。另一方面，匯款之舉卻給中國經濟帶來迫切需要的外匯，並且給家族、社區和國家創造不少臨時財富。除非他們的投資有利可圖，否則他們對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恐怕不會有多大作爲的。

今天，每一個東南亞國家的華人企業家和商業主管，自然把資金投在本地的工業和發展事業上。他們在過去三十年中，一直受到鼓勵，把資金投在本地。他們對本地的投資越取得成

功，就有越多的剩餘資金可進行其他投資，其中多數再度投於他們所入籍的國家。然而，隨着剩餘資金的累積，這種資金自然會流到新的地方，投在更有利可圖的企業上。在商業世界裏，跨越國界進行投資，根本是很自然的事。所有的商人和他們的政府，都曉得有某個數量的資金，從一國越界進入另一國，特別是在亞細安國家之間流動，但也進入香港和其他地方；而在最近期間，更經由香港進入中國沿海地區。在公開的資本主義經濟裏，投資的原則是以能夠獲利為標準。當跨越國界的投資取得成功的時候，預料他們也會加強企業家在本國內的根基。既然如此，這種投資活動應該不會對本國政府造成過度的麻煩。

清朝末年的華僑投資

這裏讓我轉到我的主要課題，即東南亞華人對現代中國的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在十九世紀以前，中華帝國政府從來不會想到從廣東福建等華南省份出外的僑居華人，不論是商人或勞工，能夠助中國一臂之力，把資金投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上。但是，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當中國的外交官經常向滿清政府匯報有關大批富有或成功的華人，散居在海外，特別是散居在東南亞的情形時，當局的態度便開始轉變了。清朝政府對這些成功的華人表示興趣，乃邀請他們到中國進行投資。隨着 1898 年的百日維新，謀使中國政府現代化的努力過後，情形尤其如此。中國派駐新加坡、東京和舊金山的領事館官員，籲請當地華商增加對華貿易，並把資金和技能投在中國。凡是響應這項

呼籲的華商，皆獲授勳銜，使他們提升到“商紳”的地位。這一來，滿清政府遂能取得富有和備受敬重的僑領，或當地華人企業家的支持了。

華僑（這個名詞開始通用）的財富，清朝官員承認華僑所掌握的現代技術，以及華僑盼望中國政府承認他們所取得的成就，這一切都是清朝官員開始同海外華商接觸，並設法使他們對投資中國發生興趣時所必須考慮的事項。他們當中好些的確是需要得到一點鼓勵的。他們已經在中國及其東南亞業務之間來回穿梭，其中有些正在尋找投資的地方。不過，當時中國的良好投資機會畢竟有限，而且要投資在故鄉或本村以外的地區，會碰到許多障礙；何況把資金投下，也很少有保障。最容易辦到的事，也是大多數華僑之所為，就是把款項匯到最靠近家鄉的郡縣，在那裏尋求妥當的投資機會。

要把這些匯回中國進行地方投資的款項，同華僑匯給家屬的錢區分開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後一種匯款分別用在下列幾方面：即給父母親及其他近親建造房舍；購買土地，務使其宗族的前途得到保障；興建學校及其他社區設備和服務設施，以及在總體上提高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手頭上很少有關他們進行大規模商業投資的證據。即使是幾個例外，也大多是進行地方投資。這幾個例外已成為廣東福建各地人士所追懷的著名事跡。

例如，曾經在東南亞發跡的陳啓沅把繅絲廠引進其故鄉佛山（在廣州附近），從而幫助提高其鄉區所產絲綢的品質。⁵張煜南出資開闢潮安通至汕頭（在廣東省東部）的鐵路。⁶至於位於廣州西南，比前者更加有名的新寧（台山）——江門鐵路，則是在

陳宜禧的努力下鋪設而成的。這期間，最偉大的企業投資先驅，有張弼士和簡氏兄弟。張弼士是個客家人資本家，在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發跡，並在滿清帝國許多地方投資。簡氏兄弟的商業網從日本發展到馬來群島；名聞遐邇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是他們兩人所創設的。⁷

以上的例子顯然可以稱為現代投資。它們也是居住在中國以外的華人，把技術轉移到中國的首批實例。那些修築鐵路的華僑，深信鐵路能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陳宜禧的例子尤其值得一提。⁸他曾經在美國西部擔任鐵路工人。其他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許多華人，也有過同樣的經歷，而且跟他一樣的熱心。因此，他不難向他的朋友和四邑（包括台山）的鄉親籌得資金，投在修建台山連接主要市鎮江門的鐵路上。

可惜這條鐵路如今已經不存在。最近我有機會到台山和江門一遊，並且拜讀了陳宜禧的紀念碑刻。顯然，他的事業心大受激賞。許多著作認為他是基於愛國精神而投資在鐵路上，藉此改善中國的鐵路交通，幫助中國振興經濟。愛國成分是有的，但同樣重要的是，他給家鄉地區所提供的服務。我們永遠無法曉得他是否純粹為了獲利而從事這項工程，因為在那個時代，如此談論其投資動機是不恰當的。這條鐵路花去他和他的朋友大筆金錢，事緣地方上有人反對鐵路穿過農莊和先祖的土地。如果在過去幾十年裏，他和他的朋友在整個投資中取得任何利潤，人們會把它看成是他們的愛國精神所得的回報。

我們手頭沒有清朝年間海外華人匯款回國的可靠數字，即使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數字，也告闕如。可是，我們不曉得上述幾項投資項目，是否屬於少數或例外。如此看來，類似的投資未必只佔海外華人匯回中國，支助家庭收入，興建新家

屋、新學校、新公共禮堂，以及改善地方服務設施的大批款項的一小部分。

與此同時，在海外華人當中也出現反滿或反清活動的新現象，特別是中國於1895年遭日本擊敗後，這種現象尤其普遍。不論改良派或革命派分子都設法籌募經費，以便在中國進行武裝起義。他們發出強烈呼籲，促請海外華人支持愛國行動，包括籲請他們把資金投在中國科技和商業的現代化上，孫中山及其革命派友人最早嘗試運用海外華人的資源。他們對希望早日推翻滿清政府的華南人，特別具有號召力。但是，他們所接獲用以購買武器和徵召愛國志士的經費，卻大部分來自貧苦階層和秘密會社。

康有為、梁啟超及其他改良派分子也如法炮製。但他們所籲請捐輸的對象是受過較高教育的華僑和中等富有人家，結果在富裕的商界人士，特別是日本、東南亞和北美洲的富有華商當中，產生了一些影響力。不過，他們所接獲的款項，是富裕華商基於愛國的理由而捐出的。華商投資於改良派支持的報紙和新學堂，當然不是為了盈利。像稍早時所提到有關華僑進行特殊的工商業投資謀求盈利的實例一樣，改良派和革命派收到華僑對他們大事宣傳的政治目的而捐獻的款項，很可能只佔華僑匯回中國的款項總數的一小部分而已。

1911年到1980年代的華僑投資

下一個時期的華僑投資是從1911年到1980年代，大抵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裏，也就是從中華民國成立到

1949年，有許多報道說，中國政界人物不斷到海外華人當中活動，競相爭取後者的支持和捐款。其中有些得到不少的宣傳；其他一些則私下進行秘密活動。一直到最近時期，國民黨的檔案和其他記錄公開，世人方曉得他們當年所收到的款額有多少。⁹

更加激動人心的是，各種有關拯救中國，免遭帝國主義禍害的呼籲，特別是中國民衆對凡爾賽條約的憤怒反應，發展成1919年的五四運動；1925年所發生涉及五卅運動的全國性示威；日本進軍山東省導致1928年濟南慘案的發生；1931年至1932年之間，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所引起的義憤；1937年7月7日開始的八年抗戰。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後，中國方面也號召華僑重建祖國經濟，以至出現短時期的樂觀局面，有許多款項匯回中國。

除此之外，中國方面也多呼籲華僑獻捐，以救濟洪水、饑荒與流行病等天災的災民；資助教育事業與基礎設施的建設，以促進國家經濟；支持其他愛國行動，購買國貨，以協助中國製造業的發展等等。在1911年至1949年之間，華僑除了平時把大批款項匯回中國，以滿足家族、地方以及家鄉和本村其他經濟上和內部的需求之外，很可能還有大約三十五億美元的巨款，從世界各地匯到中國去。¹⁰

在這個時期裏，我們也知道更多有關僑匯的事。這些僑匯給中國經濟提供了一大部分的外匯。這一來華僑對中國的發展可說貢獻了一些急需的資金。不過，華僑爲了盈利而在商業上進行直接投資，卻是另外一回事。在以往數十年中，各個學者所進行的調查研究，使我們能夠收集到可用的數據，說明從

1911年到1949年的三十八年間，華僑的匯款總數有多大，以及華僑對廣東福建之類的省份和上海市的工商業投資有什麼記錄。我要感謝林金枝教授及其同僚仔細計算這個時期的僑匯數字。¹¹在所記錄的投資數字中，他們認爲大約百分之六十的資金投在廣東省；稍微超過百分之二十投在福建省；其餘的數額，稍微少過百分之二十，投在上海。

同樣令人感興趣的是，華僑對廣東的投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資金是投在不動產上；對福建的投資，將近百分之五十也是投在不動產上。相比之下，華僑對上海的投資，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資金，是投在工業（將近百分之五十）和商業（大約百分之三十）方面。很少華僑的資金，投在廣東的工業上：在投在廣東的其餘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的資金中，依照重要次序，是分別投在商業、交通業和金融業上。以工業投資來說，福建的情形略比廣東爲佳；即工業投資的數額稍微超過商業和交通業。

根據林金枝的研究結果，拿一般所知的華僑商業投資總額，同華僑匯回中國的總款額相比較，可以看出最重要的指向是，投資總額佔匯款總額的百分之三到四左右，最多是百分之五。這些數字說明華僑最爲關心的事項，是如何協助他們的家族，如何設法滿足當地社會、文化和經濟的需求，同時要有愛國和善心的表現。這並不是一種不合情理的結論。凡是對這個時期的中國情況進行調查研究的人，都會確認中國並未提供安全和有利可圖的投資環境。在中國境外賺錢，畢竟比在中國境內容易得多。到了本世紀二十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話），大多數華僑都知道他們把在海外賺到的一些錢匯回家鄉，比在中國進行商業投資，對中國更有幫助。

如今我們能夠指出這個時期華僑對中國的呼籲所產生的兩種反應。第一種也許可以稱為先施-永安模式。它是澳洲華僑投資於百貨商店，以及先後在香港和上海投資於各種輕工業的成功實例作為借鏡。¹² 這種投資決策合乎現代化，也是出於理性的，背後絲毫沒有感性的因素存在。他們的資金並非投資在自己的家鄉。而且在人們眼中，他們的投資並不在於幫助中國的經濟發展，也不在於挽救中國免遭帝國主義的侵略。這雖然不是創舉，但卻代表着資本家投資取利的最成功實例。由於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盈利甚巨，其他公司如大新、新新等競相倣效，紛紛在上海開業。它們固然成為吸引人們倣效的模式，但是倣效的公司畢竟有限，它們所投下的資金，比起華僑的匯款總額來，數目也很小。這種模式有一種顯著特徵，就是華人企業家在香港和上海進行投資，作為他們最後返回中國的前奏或準備。¹³

第二種反應歷史較早，到了本世紀初葉已經相當普遍了。這種模式的最突出例子，是陳嘉庚。他的多姿多彩生涯，始於對本家本族的支助，繼而惠及本村、本區、鄰近的廈門市以及福建南部各郡縣，最後是惠及全中國。¹⁴ 他的例子所發揮的影響力很大，應該稱為陳嘉庚模式才恰當。根據這個模式，慈善事業擴展到工業投資，但主要是為了支助已展開的慈善計劃。其中一些投資的確牽涉到國家經濟的發展，甚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生活中起着某種作用。但後者是陳嘉庚的特有性格使然，而不是這種模式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上這兩種模式，在記載 1911 年至 1949 年這一階段華僑對中國發展所作貢獻的文獻中，顯得很突出。但兩者皆不適用

於今天，原因何在？我將在演詞的最後部分，談到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歲月時，加以說明。

這個時期的第二階段所涵蓋的歲月，是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 1980 年左右。在這三十年中，資本家的家屬和他們的投資，一般是不受歡迎，他們肯定受懷疑，最後卻遭懲罰。以下三個時期可一一加以說明。¹⁵ 從 1949 年到 1957 年之間，有個時期華僑返回中國，被認為是愛國行動。雖然匯給僑眷的款項對中國很重要，歸僑把錢帶回中國，也受歡迎，但這主要是出於政治動機；部分原因是要避免他們支持台灣；同時否定台灣政權的合法地位。

從 1957 年到 1966 年之間，大多數東南亞華人把注意力轉向如何成為本地區新興國家的忠誠國民，如何投資於本地的建國工程，以及如何利用許多的新機會，協助國家發展等問題上。¹⁶ 這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緬甸，情形尤其如此，甚至於在形勢越來越複雜的印支國家，也不例外。正當本地民族主義領袖對華人的效忠，深表懷疑之際，此舉是有必要的。可是，華人避開中國之舉，卻引起中國對拒絕與北京政府認同的華人表示懷疑和不滿。另一方面，一般認為北京理論家所推行的兇惡的反資本主義政策，卻進一步促使東南亞華商把精神集中在本地的經濟發展上。在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更進一步助長這種趨向。當初，中國對歸僑以及所有僑眷的反應，證實華人對中國經濟發展所作的任何投資，都沒有前途可言。

鄧小平所推行的改革運動，標誌着中國的經濟政策進入一個新時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從 1978 年到 1989 年的時期

裏，東南亞華人對匯款到中國，仍然抱着相當謹慎的態度，尤其是投資中國，更是小心翼翼。中國的開放，的確很受歡迎，傳統的反響，如匯款給家族和故鄉，大受鼓勵。然而，在1989年之前，東南亞華人對中國的工商業，並未進行認真的投資。

總而言之，在整個歷史上，包括八十年代之前的最近時期，大多數海外華人，把錢匯回故家，以增加家庭的收入，同時在家鄉和本村購置土地，修建新居；他們也興辦慈善和教育事業，而且資助本地的福利和社區計劃。除此之外，當年中國也呼籲全體華僑，在救國課題上助中國一臂之力。所謂救國課題，不論是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反對日本侵略者，反對貪得無厭、好爭好鬥的軍閥，或是反對國民黨對立的共產黨和其他爭奪最高權力的敵手，都包括在內。凡是涉及投資中國工商業的呼籲，往往是以支持國家發展、購買國貨、抗拒西方和日本資本主義侵害的愛國情懷為出發點。

然而，中國所發出的各種呼籲，在基本上或實質上來說，從未以投資取利為目的。如果他們嘗試這麼做，他們所發出的呼籲，就不會有很高的信譽了。在這個時期裏，假設中國繼續受到內外敵人的威脅，並時時面對混亂和崩潰的可怕危險，那麼，投資取利也會受到嚴重的限制。實際上任何純粹為利的投資，都很難有保障。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和經濟的突飛猛進

中國進行改革初年，海外華人的傳統匯款，必須同投資取利的問題分開來。當時，海外華人對投資中國感到猶豫，是

可以理解的。只有在1987年以後，他們才逐漸認識到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不僅在發展中，而且還堅決推行市場機制。最後，事情變得很清楚，盈利是合法合理的；敢冒風險才会有報償；而最有力的一點是，投資中國會真正取得利潤，可能比諸投資東南亞，獲利更多。況且，目前的展望是，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上乘的投資目標。

但是，這一切絕不可同港台的對華投資混為一談。雖然我們很難把香港華人的投資，同東南亞華人經由香港的分公司和有關機構的投資區別開來，但是每當我們談到東南亞華人的對華投資時，必須弄清楚我們在講什麼。

如果我們把東南亞華人和美洲、大洋洲及歐洲的華人作個比較，倒是饒有趣味的一回事。事實上，美洲、大洋洲和歐洲只不過在今天才有大批華僑聚居。這些華僑是最近的移民，他們所持的護照和旅行簽證，是由北京、台北、或是香港、澳門發出的。因此，他們的“愛國”情緒比其他地方的華人更為強烈。但他們所擁有的錢財卻遠比東南亞華人為少。倘若有誰擁有可觀的錢財的話，這些錢財往往是投資香港和台灣所得來的。另一方面，美洲、歐洲和大洋洲的政府對國際投資採取較開明和寬容的態度。事實上，它們本地的資本家對投資中國也深感興趣，因此，他們的華裔居民投資中國，不會面對嚴重的障礙。

我開始演講時表示今天所出現的情況，是幾種因素的獨特結合的結果，現在讓我提出三個主要變化，以解釋這種獨特的情況。有關的三個主要變化，使得當前的情況，跟東南亞華人一路來投資中國發展事業所面對的任何情況完全不同。

第一個是東南亞國家的興起所引起的主要變化。首先，一般華裔商家都變成當地公民，他們的舉止有需像本國企業家一樣。在殖民地時代末期，由於華裔體驗過本地民族主義的強烈敏感性，他們不是深切瞭解入籍國的新現象，就是完全效忠於各自的入籍國。如果他們要想到中國進行投資，首先必須考慮到本國政府的關注，以及如何以本國的利益為前提。

此外，現代的中國一向不曾把開放的經濟，同頗長時期的主權完整和政治穩定結合起來。當然，在中國現代史上，也許除了1928年到1937年之間沿海某些省份以外，中國從未有過任何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然而這幾個年頭，正好是世界發生經濟的蕭條，以及中日戰爭爆發前夕，日本進兵東三省和華北的時候。不論期間有過什麼經濟效益，也經不起八年抗戰的消耗。相比之下，從1978年到現在（除了1989年6月4日的創傷以外），鄧小平所推動的改革開放，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特別是沿海省份的經濟，卻產生持久的影響。在過去十五年中的多數日子裏，但見中國越來越開放的經濟中的大多數領域，都取得快速的增長。如此長久不斷的增長，在中國現代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接下來，我們應當注意本區域以及其他地方的華人，對中國的態度發生多大的變化。他們已經完全乖離同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救國運動的認同，他們也沒有返回中國定居的念頭。假設東南亞華人有意移民的話，他們往往選擇美國、加拿大或大洋洲的移民社會。無論他們到哪裏定居，他們都謀求成為中產階級人士和現代專業分子。其中有些仍然願意幫助中國家鄉的親戚，並從事某些慈善工作，但他們大體上專注於經

濟和專業方面的聯繫，彼此互惠互利。以貿易和投資來說，做生意純粹為利，第一次公開承認為他們同中國建立新聯繫的首要目的。

當然，其中有些人的作為不免與過去有相似之處，但是差異之處則更加顯著。例如，以上所說的兩個著名模式，即陳嘉庚模式和先施-永安模式，表面上看來，似乎還可加以辨別，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兩者的不同點就異常顯著了。

陳嘉庚模式是按期捐獻大筆款項，支助故鄉家族，地方中小學、大專院校，以及其他社區設施。這種模式在東南亞並未留傳下來，只有少數幾個老一輩的華人倣效，而且總的來說，規模也小的多。然而，參與中國政治，並願意把財產帶回中國，像陳嘉庚當年的做法一樣，卻成為歷史陳跡了。

至於先施-永安模式，是投資於中國的工業與市場以求利，在今天倒有若干表面的例子，說明有人正好這樣做。但是，主要的差異是，現代華人企業家在自己的國家裏保有他們的根據地；他們只準備從遠處向中國進行投資。他們既不準備把業務遷移到中國（或香港），跟當年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情形剛好相反，也不準備在入籍國內喪失任何足以鞏固其民族資本家地位的機會。其實，他們依然希望增加本身的財富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以期增進他們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

現在讓我設法把一切作個結論。中國是一個有利可圖的投資地方，海外華人被吸引前往投資，是歷史上所罕見的。不過，目前東南亞華人對中國的投資，千萬不可誇大，而且必須從舉世對中國經濟飛躍發展深感興趣的角度着眼。讓我把這兩點分開論述。

第一點是，我們有必要把本地華人匯給家族和故鄉的款項（包括匯給學校、寺廟、家用住屋和投機房屋的款項），同廣泛在貿易和工業方面的資金區別開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前者純粹是以支助海外華人在中國的原籍地方為目的，後者則大體出自各自有關國家及本區域的商業發展，以求將業務活動擴展到中國去。本區域有厚利可圖，但非純粹為華人所擁有的企業，一向在香港進行投資，或是把資金投到其他各大洲（包括北美洲、大洋洲和歐洲）。現在，它們的雄心也包括設法在中國市場取得一席之地。

第二點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外國對華投資的總額，然後把它同東南亞華人投資的部分作個比較。這需要仔細研究與分析東南亞華人，分別對中國、香港和台灣所進行的投資。我們也需把這些投資，同華人在東南亞其他地方，以及東亞、北美洲、大洋洲和歐洲的投資數量作個比較。此外，我們也有必要把華人如此對中國大陸所進行的投資，同東南亞每一群體的華人在各自的國家投下的大量資金作個比較。我們也不應該忘記考慮東南亞華人在吸引外資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吸引東南亞地區以外的資金，包括香港、台灣乃至中國本身數量越來越大的資金，投入東南亞地區。這種情況與前者也須取得平衡。

顯然，目前東南亞華人以利潤為目的，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所進行的投資，使到他們同中國的關係，完全建立在全新的基礎上。所有的投資都應當以合情合理和有利可圖為基礎，這是值得鼓勵的投資，而且應當受到特別的注意。這裏讓我總結有關如何更詳細地研究近五十年來每一個東南亞國家的華人投資模式的議論。

從 1945 年到 1960 年的時期裏，我們知道由東南亞注入中國的資金，為數甚少，但當時華人資金與投入本區域的資金總數相比，仍然只佔很小部分。一般資金主要操在西方機構、殖民地機構或新跨國公司的手裏。我們有必要曉得更多關於可證明為華人的資金所佔的確實比較。

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華人的商業活動集中在如何使本身受承認為國家發展的主要部分。許多華人與著名的土著企業家一同經商，最終被承認為國家資金累積的主要部分。假如我們想要曉得華人對本區域各國經濟的影響和支配程度，我們就得想方設法，以確定什麼才算是真正的華人資金。任何關於華人支配當地經濟的情緒化和誤導性言論，只有更加混淆視聽，於事無補。

從八十年代一直到現在，雖然在每一個東南亞國家裏，受承認的華人資金投在貿易和工業上所佔的比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來得高。據說在幾個亞細安國家裏，竟然有高達百分之五十的，這顯然是被誇大，比數高得出奇。如果實際情形是如此，我們需要考慮的是，把這些資金重新投在各有關國家裏，是否比投在國外更加有利可圖，事緣投資本國利潤高得多，而且把經濟擴展到國界以外的機會也更大。例如，以下的考慮是很重要的：

(1) 當一國之中的華人資本已經很大的時候，如果進一步增加其所佔本地資本的比例，在政治上是否切合實際？如果利用手頭所有的資金投在國外，從而擴大整個國家經濟的領域和範圍，是否會更好？當然，把國家經濟進一步同國際或區域的網絡聯繫在一起，長遠來說，對國家本身是有益無害的。

(2) 如果把投資當作國家政策的事，那麼華人在進行對外投資時，應當把資金投在顯然更加有利可圖，並且符合國家利益的區域。對亞細安國家來說，這可能意味着投資於越南、柬埔寨、緬甸等鄰近國家，或是投資於北美洲、西歐、大洋洲、南亞等較遠地帶，甚或香港、台灣、中國等利潤公認不錯，發展前景較佳的地區。主要的因素依然是：投在本國以外的資金，必須有利可圖，最好是比投在本國內能取得更高的利潤，而且必須符合國家的長遠利益。

(3) 華人進行這種投資，以及許多有利可圖的接觸和貨物與人員的交換，無形中建立了廣泛的經濟和金融聯繫。這種聯繫可以作為一種基礎，以吸引外資，包括香港、台灣和中國的資金，投在本區域裏。如果這種情形發生，將進一步對規模更大的現代化國際網絡作出貢獻。這個網絡構成亞洲 - 太平洋區令人振奮的經濟前途。

最後，讓我提出四個命題，給大家考慮考慮。每一個命題都指向海外華人在中國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發生了基本的變化。

第一個命題是，如果對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投資，在一個長時期不斷有利可圖，特別是如果對這三地的投資，比投資於本國或世界其他地方更加有錢可賺，那麼，參與中國發展事業的海外華人將會增加。他們所取得的利潤甚至可以再度投於這三個地區，但他們也將使本國內的華人富裕起來，可在國內進行消費和投資，從而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可說是史無前例的。

我的第二個命題是，如果海外華人對中國進行這種投資，不再比投資於本國內或其他地方更加有利可圖。那麼，這種投資顯然將會減少。當然，如果辦得到的話，資金將被抽回，或是轉投在其他較有錢賺的國家。要不然就是以其他方法，使投資多樣化。這依然能夠給華人本身帶來利益，最終也給本國經濟帶來好處。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讓華人有施展拳腳的機會。

第三個命題是：如果中國的發展宣告退縮或緩慢下來，隨之出現的是騷動和混亂的局面，那麼，海外華人可能回復以往的作法，對他們在中國的家族和其他社會機構，只給予一些傳統上、感情上和慈善方面的協助。但他們將會在本國內或其他國家集中發展有利可圖的事業。至於中國傳統式的協助，將很有限，特別是因為家庭聯繫的力量，隨着時間的流逝而削減。而他們匯回中國的款額，比起今天海外華人的龐大資金來，也將顯得微乎其微。乍看起來，他們似乎回復過去的作法和態度，但是支助的規模，跟過去完全不能同日而語。

我最後的命題是：如果中國的經濟真正起飛，中國對海外華人的投資，興趣將會減少，同時也不再多依賴。今天，整個世界似乎熱衷於對華投資。總有一天，中國對本區域的發展，將扮演重大的角色。這一來，每一個東南亞國家的華人都可能成為發展本國經濟的可貴資產。他們將協助每個東南亞國家在日益增長的中國經濟中，取得一份利益。如果事態的發展是如此，中國經濟在亞太區所發揮的作用，不論對華人或非華人而言，都跟整個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事項完全不同。

- * 中譯文原載於林孝勝主編《東南亞華人與中國經濟與社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5)，頁14-38。張江清譯。

注釋

- 1 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1.1 (1987). 該文採用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的數字。1992年11月21日面市的 *The Economist* 把台灣和香港的人口也包括在內，故聲稱有五千萬以上的數目。
- 2 Wang Gungwu,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December 1993), pp. 926-948. 我反對“大中華”一詞把所有海外華人都包括在內，認為沒有什麼用處。
- 3 Robin Cohen, *Notions of Diaspora: Classical, Modern and Global*. 這是指呈給1994年1月3日至5日，由香港大學主辦的第三屆全球烈士會議的論文，在 Wang Gungwu, ed. *Global History and Migr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 4 Wang Gungwu, ed.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and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nd Australia* (Sydney: Allen & Unwin, New Edition, 1992).
- 5 陳天傑，〈廣東第一間蒸汽繅絲廠繼昌隆及其創辦人陳啓沅〉，《廣州文史資料》輯2(1963年)；孫健，〈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出現〉，《學術研究》3(1979年)。
- 6 Yen Ching-Hwang, "Chang Yu-nan and the Ch'ao-Shan Railway, 1904-1908", *Modern Asian Studies* 18.1 (February 1984). 有關陳宜禧的事跡，見附注八。
- 7 Michael Godley, *The Mandarin-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1893-19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 8 劉玉遵等，〈華僑、新寧鐵路與台山〉，《中山大學學報》4(1980年)。
- 9 例如，關於國民黨，參閱《革命文獻》，卷45，《中華革命黨史料》(台北：1969年)；又參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編《中國國民黨在海外》(台北：1961年)。
- 10 我接受林金枝在其所撰〈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所提出的數字。該文載於《近代史研究》，期1、2(1980年)。對於1949年以前海外華人匯款回中國的異常複雜課題，最有用處的研究成果有：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33)；以及 Chen Ta,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至於在1945年以前日本人對東南亞華人匯款回國所作的可貴研究，見 George L. Hicks, ed.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From Southeast Asia, 1910-1940* (Singapore: Select Books, 1993)。
- 11 林金枝所撰的《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概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一書，用處尤其大。至於有關華僑投資福建、廣東兩省的資料集，見林金枝與庄為磯合編的《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兩卷，由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福建卷”於1985年出版；“廣東卷”則於1989年問世。林氏早期的論文集：《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研究》，也很有用處。該書於1983年由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 12 關於先施公司，香港有關方面私下出版過《先施公司二十五週年紀念冊(1900年-1924年)》和《香港先施公司(1900年-1975年)》二書；至於永安公司，亦有《香港永安有限公司二十五週年紀念錄》一書私下出版。
- 13 Wellington K.K. Chan,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7);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4 Yong Ching Fatt, *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5 Stephe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16 Linda Y.C. Lim and L.A. Peter Gosling, eds.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ume One, Ethnic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Singapore: Maruzen Asia, 1983).

華人新移民： 何以新？為何新？

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簡稱 ISSCO)一般每三年舉行一次正式的研討會。在每一次研討會上，雖然研討的主題不盡相同，但關於華僑華人移民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的意義多有論及。在舊金山舉行的第一次研討會上，主要探討了有關移民定居的問題，主題為“落地生根”；在香港舉行的第二次研討會上，主要回顧了過去五十年的移民史；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三次研討會上，文化之間的關係成為會議主要關注的內容。今天，我想在這裏談一談“新移民”現象，也就是又有為數不少的大陸中國人移居國外的現象，中國官方的僑務機構以前把這些移居國外的人統稱為“華僑”或“華僑華人”。“新移民”這一新稱謂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特別是“新移民”的主要前往地——歐洲和北美對此尤為關注。這一新的稱謂是意味着對華僑華人的一種新的認識呢？還是意味着一種新的動向？抑或它不過是老稱謂“華僑”一詞的委婉用語？若果真如此，那麼可以說它是得之了老稱謂的精髓要義，也就是說不用“華僑華人”這一籠統含混的稱謂來稱呼這些新的移民，並不意味着新稱謂的內涵有什麼太多的改變。這一稱謂可以避免那些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境內得按歸僑、僑眷待遇對待的人數的增加，它也能讓那些已定居海外但拒絕承認自己是華僑的中國人，以及那些已定居海外但並非“新移民”的人感到滿意。

從長遠來看，把“新移民”與“老移民”區別開來意味着什麼？具體一點兒來說，這一稱謂會對華人族群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它會使他們原本作為華僑華人所享有的優待受到影響嗎？同樣，他們在國內的家人所享受的待遇會不會也因此而受到影響呢？我注意到有幾篇提交此次研討會的論文對業已出現的有關新移民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考察。我在此只是想談一談我個人對開展新移民研究的看法。

在這裏我要強調的是，“新的”中國移民的出現，以及“新移民”這一稱謂的出現，最早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政府部門自己提出來的，其所指和所稱均是其本國近年來移居國外的公民。“新移民”這一稱謂不僅並未取代“華僑華人”，而且更像是華僑華人這一龐大群體中的一個子群體。如果這一稱謂用於指近年來從香港、澳門、台灣遷移至它國的人，乃至用於指在過去三十年中從東南亞再移民至各西方國家的華僑華人，或者這一稱謂為這些人自己所接受，那會是很有意思的事。隨着這一稱謂被越來越多地使用，它也提醒我們留意目前在海外定居生活的華僑華人對中國大陸的有關政策措施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我們可以由此而預見未來幾十年中華僑華人的一些情況。另一方面，即使這一稱謂並不會越來越廣泛地成爲一種泛指，而僅僅只是用於指那些近年來從中國大陸遷移出來的移民，那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意味着這樣一個時代將會到來，即那些在中國本土以外出生的華僑華人的後裔將最終因

其不同的出生國而形成不同的認同，特別是對於那些並非直接來自中國大陸的華僑華人的後裔來說，尤其如此。

這些變化是新的變化，且隨時都有可能再出現新的轉變。一切都尚在未定之中。但這也許是我們考慮如何研究各種“新移民”群體的好時機——姑且不論是否該把他們稱爲“新移民”。我個人認爲應當重新考察下列關鍵問題：

- (一) 近年來華僑華人移民的來源地；
- (二) “新移民”們所希望移居的國家；
- (三) 關注某些重又出現的老問題；
- (四) 用一種新的思路重新認識同化的問題。

一 近年來華僑華人移民的來源地

中國大陸是前往歐美國家的“新移民”的主要來源地。這些人在所有華僑華人中只佔很少的一部分，但他們與那些早年離開中國的人有相似之處。他們與那些同樣來自中國大陸，但先去了台灣和香港後才成爲華僑的人也有相似之處。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後者（從台灣和香港移居國外的人）只能前往極少數的幾個國家。最初他們多半只能通過投資移民的方式被接納，後來越來越多的人通過留學的途徑到了美國。雖然，自六十年代中期以來三個主要的英語移民國家——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改變了它們的移民政策，但這一部分人的人數始終不多。1978年以後才有直接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成爲這一移民隊伍中的一支。開始是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在完成學業後滯留美國和澳大利亞，後來也有人因與早年移民海外的人有親屬關係而

的？同時，我們還需要瞭解他們在國內的家人都經歷了些什麼，因為新的政策具有與此相關的特殊意義；也可以說，不管新的政策是否具有與此相關的特殊意義，這些都是我們所需要瞭解的。

至於台灣，則只有“新近(移居海外)的移民”，或者“最近(移居海外)的移民”這樣的說法。台灣最早的“新”移民出現於五十年代，他們最初主要是為了到美國去留學。那些沒有返回台灣的人在“台灣政府”看來是旅居在外的中國人，甚至那些已獲得美國國籍的人也被按此看待，老稱謂“華僑”一詞用在他們身上似乎是合適的。九十年代以來，許多“老移民”，特別是那些反對國民黨的人，回到了台灣。隨着台灣自由民主政治的發展，現在希望像過去那樣移居海外的人少了，也就是說，人們對通過到外國留學、然後再定居於外國的做法已不太有興趣了。通過這種方式出國的“新”移民現在比較少了，根本無法與中國大陸的“新移民”相比。

要區別已獲得外國永久居留權的持“中華民國”護照的和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華僑還是很容易的。如果後者是被冠以“新移民”這一稱謂的唯一群體，那麼我們很快就會認識到如何研究他們與如何研究前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甚至我們是否能按慣例把他們也稱為華僑都成了一個問題。更何況，“台僑”這一分類也能成爲一種通行的稱謂嗎？如果“台僑”也成爲一種約定俗成被認可的稱謂，又會對海外華僑華人的研究產生什麼影響呢？也許有一些人正在爲統一二者的稱謂尋求一種變通的辦法。如果能找到變通的辦法，那麼這是一個值得予以密切關注的過程。

通過家庭團聚的方式到了國外。再後來，隨着不顧一切的非法移民的出現，中國大陸“新移民”的人數出乎人們意料地迅速增長。

這些“新移民”中的多數人，特別是那些前往美國的人，會遇到三個難題。第一個，是他們與效忠國民黨的，或者推而廣之地說，是與效忠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老華僑群體之間的政治關係。這一老華僑群體中的許多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有強烈的敵意。第二個，他們的願望並非僅僅是能移居當地，他們還希望能迅速地融入當地，特別是在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那樣鼓勵移民入籍的國家，就更是如此。第三個，許多人無法擺脫他們關注中國未來發展的強烈的中國人意識，多數人在內心深處希望他們的後代能夠傳承中國人的價值觀。

同樣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駐這些國家、與這些派系林立的華僑華人打交道的官員們也有着他們自己的難處。當不同的華僑華人群體因不同的政治效忠而出現對立時，他們如何對所有的華僑華人“一視同仁”呢？這些官員被要求努力做好海外“新移民”中精英分子的工作——如果不能使這些“新移民”在政治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一致，那麼至少也要使他們成爲一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友好的力量。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再重蹈在對待老華僑的政策中所犯錯誤的覆轍。因而，幫助“新移民”與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家庭和家鄉建立一種新型的聯絡和交流方式就成爲了一項至關重要的任務。對於這方面的研究，我想僅靠研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發佈的大量政策文件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瞭解“新移民”自身在當地的實際遭遇，需要瞭解他們對於自己目前的處境有何感想？又是如何應對

香港又是一種不同的情況。雖然並非絕對沒有外人居住，但被在海外的當地族群稱為“小香港”而將之與傳統唐人街區別開來的這一類稱謂，未嘗不是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變化的徵兆之一。在加拿大幾個城市中出現的具有強烈特徵的香港人聚居區使得香港移民更像“老”移民而非更像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在澳大利亞的一些城市中人數正日漸增長的香港移民聚居區也是如此；此外，在加利福尼亞和夏威夷還有幾個這樣的香港人聚居點。到目前為止，“新移民”的稱謂似乎尚不適用於他們。這或許無關緊要。隨着香港回歸中國，那些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最終可能不再會介意被中國政府稱為“新移民”，或者不管怎麼樣，只要他們仍然能作為一個他們能稱自己為香港人的有別於其他人的群體存在就行了。而且，只要他們有這種意識，他們就會力圖把自己與其他華僑華人移民群體區別開來，特別是在北美地區，這種情形很明顯。

我們還需要注意另外一種移民的來源，那就是尋求更安全的棲身地或者另覓它國謀求更好發展的“再移民”。我主要指的是那些決定離開他們在東南亞的家鄉、前往西方，特別是前往北美和澳大利亞的華僑華人的後裔。這些再移民的來源地有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以及越戰以後有成千上萬難民出逃的三個印支國家。但是，在“再移民”的來源地中還有另外幾種類型的國家，如毛里求斯、斐濟和巴布新幾內亞、加勒比海國家以及拉丁美洲的其它一些國家。這些“再移民”無疑是移民，但顯然不是“新移民”。我在此提及他們，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大量的華僑華人“再移民”，其祖國並非中國。當他們稱自己為華僑華人或華僑華人的後裔時，即

使他們並不談及自己在東南亞或在其它某一前殖民地的原籍地，以及他們新定居的國家，我們也會很容易覺察出他們彼此之間的不同之處。“新移民”這一新稱謂的出現不會影響這些“再移民”與他們新定居國家的華僑華人族群之間的關係。相反，這一新稱謂倒可能成為他們與那些直接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之間的分界線。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出現使得華僑華人的多樣性——如果不說是多層次化的話，更為明顯，這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華僑華人移民經歷中豐富的內容。

二 接收移民的國家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移民接收國。對“新移民”來說，他們希望移居的國家主要是美國、澳大利亞和歐洲國家，而十九世紀末以及二十世紀上半期這些國家恰恰是最排斥華僑華人移民的國家。那個時候，這些國家只接收為數極少的華僑華人移民，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只能進入歐洲國家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自六十年代後期以來，美國和加拿大兩國接收的華僑華人移民是最多的。前者主要接收的是來自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移民，後者開始主要接收的是來自香港的移民，後來也歡迎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華僑華人移民已在這兩個國家被公認為是以其專業技能做出了貢獻的有價值的“新”公民。但是，與過去不同的是，這兩個國家對移民也是嚴格甄別挑選的。華僑華人移民只是從世界各地湧入這兩個國家的“新”的移民大潮中的一部分。

隨着移民接收國社會文明的進步，新的、更人道的移民法已經付諸實施。同時，這些移民法也對移民們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華僑華人移民已和其他移民一樣受到了一視同仁的對待。現在任何像以前那種諸如“華僑華人例外論”之類的帶有種族歧視的移民法都已難以立足，這實際對中國人的移民活動起了推動作用。如今的法律制度更為透明，對於排斥華僑華人的舉措可以訴諸法律。這些都從總體上促使這些移民接收國對接受“新”移民持更為積極的態度。但也有不太容樂觀之處，特別是在美國，目前“同化論”和“多元文化論”之間的爭論從長遠來看意味着仍然會給定居於當地的移民帶來麻煩，“新”的美籍華人也同樣難以置身事外。下面我還會再次談及這一問題。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形，雖然在這兩個國家多元文化論表現為是官方堅持奉行的政策，種族衝突和民權鬥爭問題不像美國那樣突出。但與北美不同的是，來自東南亞的華僑華人的後裔表現出更強的多樣性，由於巨大的信仰差異，他們不是身不由己地被捲入，而是積極主動、立場鮮明地分列於台灣和中國大陸兩大政治陣營的對峙之中。

至於歐洲，華僑華人的人數始終很少。因而，在過去二十年中進入歐洲國家的中國大陸移民人數之多很容易就能顯現出來。從陸路經俄羅斯和東歐到達西歐的華僑華人移民是尤為突出的、真正的“新移民”現象。與“新大陸”和澳洲的移民國家不同，歐洲各國政府難以適應大量移民的進入。同時，歐洲人還面臨着一些新的問題。如，西歐無邊境國家共同體（歐盟）的不斷擴大以及東歐和中歐國家邊境之防範不嚴、漏洞百出，

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些問題使得移民接收國的政策和態度經常是矛盾和含糊不清的。

十年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全面控制式的統治的終結，導致東歐和中歐出乎意料地成為了中國非法移民的便利通道。這一戲劇性的、前所未有的各種移民均經此通道進入西歐的情形引起了有關各方的警惕和驚恐，這在從歐洲開始的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中已有明顯的反映。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這一新研究在歐洲的開展使得它與世界其它地方的研究有了進行比較的可能，但是，在我們對在這一地區形成的新的華僑華人族群有更多的瞭解以前，我認為把這些“新移民”作為迄今為止一系列特殊歷史條件所導致的“例外”來對待，或許是明智的。很顯然，以前有關其它地方華僑華人移民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這一新的現象提供不了太多的幫助。在歐洲出現的華僑華人移民模式似乎是獨特的，當然，其中一些顯而易見的新的要素很有可能也會出現在今後其它地方相關的華僑華人研究之中。

亞洲國家的情況我只想簡要地談一談。自五十年代以來，得以移居東南亞的中國人相當少。少量經過嚴格挑選的人進入了新加坡，其他一些人設法進入了菲律賓、緬甸和泰國。與早期的華僑華人人數相比，這些新的華僑華人的數人是微不足道的，因而把他們作為“新移民”現象來描述可能沒有太大的意義。同樣，雖然中國人還移居到了亞洲的其它地方，例如，俄羅斯的遠東地區以及中亞的穆斯林國家，但人數也很有限，對於研究來說，沒有什麼吸引力可言。唯一的例外是身為發達國家、因勞動力短缺而從中國大陸吸收“新移民”的日本。但是，在日本的“新移民”既無法與在北美和澳洲那些移民國家

的“新移民”同日而語，也無法與在歐洲的“新移民”相提並論。作為一個與中國和朝鮮有着共同傳統，又與東南亞有着歷史瓜葛的東亞國家，日本始終糾纏於各種問題之中。它已經長時間關閉了接納移民的大門。它在過去幾十年中所接納的勞動力移民，只是很小的規模；而且，對於日本政府來說，它只是一個與稅收有關的問題。要瞭解中國“新移民”在日本的地位，恐怕得把它與在日本的朝鮮族族群以及與華僑華人在其它地方的情況結合起來考察。

三 再又出現的老問題

現在讓我們來關注一下幾個重又出現的老問題。什麼是“新移民”現在所面臨的最緊要的問題呢？我選了五個老生常談但又是永恆的問題想在此簡要地談一談，然後我將通過對同化問題若干影響的闡述來結束我的發言。

第一，是對移民進行甄別和控制的問題。移民需要辦理的手續變得越來越繁瑣但也越來越透明。移民接收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注重對移民進行分類甄別。對於能獲得批准的（符合分類條件的）移民來說，這無疑有着人道主義的進步意義。然而，在這一表面現象的背後，這一進步的另外一種意圖也正日漸顯現，那就是將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法移民拒之門外。這一現象本身沒什麼新鮮的。計分制方式方法的不斷花樣翻新和升級使得華僑華人的數目始終保持在最低水平。但是這些障礙的設置並不能阻止非法移民們釀成聳人聽聞的事件而一再給華僑華人族群抹黑。全球化使得這種衝突越來越暴露出來。我不知道學術

研究是否能在這方面有所作為，但只是任由媒體來評說未免不是一件遺憾的事。

第二，是移民的家庭團聚的問題。新的移民，像過去一樣，既有舉家遷移的，也有隻身一人漂洋過海的，但後者的數量是否也像過去一樣，從總體上來說多於前者，尚不得而知。許多新的移民都是舉家遷移的，特別是屬於香港中產階層的專業人士以及東南亞的再移民。但是據報道說，中國大陸前往海外的移民仍以單身居多。家庭移民與大多數單身移民之間的差異可能會加深和加大來自中國大陸的華僑華人與來自其它地方的華僑華人之間的隔閡。如果情況真是這樣，那麼在當地已建立了家庭基礎的、並已形成族群的華僑華人在未來的一個較長時期內最好就被稱為“定居於某某國的移民”。他們將是確保華僑華人族群的維繫、並會對新的單身移民們產生示範效應的社會安定因素。對此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

另外，隨着越來越多女性移民的出現，特別是越來越多能夠獨立地重新創業謀生或任職於現代化部門、機構中的單身職業女性移民的出現，婦女的地位問題也成為與此相關的、同樣重要的問題。這些職業女性移民與過去沒有受過教育、毫無準備、滿懷恐懼地被帶出中國，或者是跟隨丈夫到了海外的婦女有着天壤之別。如今，她們甚至比她們的兄弟和丈夫還要勝出一籌，她們在工作中所贏得的尊敬是當之無愧的。已有學者對她們的成就，特別是她們在北美和澳洲的情況進行了研究，但這些研究多只側重於描述她們與她們早年的姐妹們形成的強烈對比。她們在未來的家庭生活中將發揮的作用還有待於進一步關注。

第三，是工作的問題。與他們在熱帶東南亞地區從事採礦和種植、在北美修築鐵路和種菜的先輩們相比，“新移民”明顯集中於城市。這使得“新移民”的經歷更類似於歷史上的歐洲移民而非他們的先輩。具體說來，他們中處於較低層次的人就像是到北美和澳洲的城市和工廠打工的歐洲人；另外，他們中也有如歐洲學者和專業人士那樣進入大企業、實驗室和大學任職的較高層次的人。這意味着這些新出現的“新移民”並不具有特殊的華僑華人移民特徵，但把他們作為現代移民中的個案來研究則未嘗不可。這意味着所有西方移民的共性現在都能套用到這些新的華僑華人移民身上嗎？這種可套用的共性似乎很有可能不斷增多，而有關“新移民”的研究也會集中於移民的共性而淡化他們華僑華人的特性。這會導致華僑華人族群中出現懸殊的階層差異嗎？只要華僑華人在每一個接收國的人口中所佔比例仍少於3%，這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問題。

第四，是教育的問題。“新移民”前往的是教育條件一直優於其原居地的發達社會。與過去不一樣，他們中的多數人熟悉接收國的文化。許多人仰慕那裏的精英教育方式以及可為那些學業優異的人提供的機會。顯然，這些條件對於他們的孩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北美和澳洲對此已有相當的研究，因而我無需在此贅述。但是不同移民階層之間的比較，也就是“新移民”與那些已定居了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移民、以及與那些來自東南亞和其它地方的“再移民”之間的比較，卻是值得注意的。通過比較，我們可以得知更多諸如直接來自中國的“新移民”的素質，特別是那些在“文革”後期想方設法遷移出來的人的素質等情況。我下面談到同化問題的時候還會涉及到這一點。

第五，是宗教的問題。不同於那些來自香港的、乃至來自台灣的移民，也不同於大多數來自東南亞的“再移民”，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很少帶着強烈的宗教信仰遷往它地。他們多奉行的是現世主義的人生觀，這種現世主義的人生觀是經歷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數次革命運動後印入多數大陸中國人思想觀念之中的。他們多數人對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推崇備至，如果沒有俄國的“十月革命”，他們也會以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中所產生的光輝思想和理想作為奮鬥目標。他們對在當地信奉各種宗教——主要是信奉基督教和佛教的華僑華人家庭的生活方式作何感想？特別是當他們已經在接收國生活了這麼多年以後？考察這一點會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另外，其他華僑華人在這些國家各自所信奉的宗教對他們有所觸動嗎？他們有尋求新的信仰的打算嗎？瞭解他們的心態有助於我們瞭解為什麼有些人容易接受如“法輪功”之類顯然“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的東西，而非是在他們長期所受教育中那些被禁錮的信仰。

四 老生常談的同化問題

我現在再來重提一下同化的問題。如同“認同”在中文中尚未有能準確對應的概念一樣，“同化”也是一個長期以來在中文中一知半解、從未能被全面準確地表達出來過的現代用語，由於該詞揭示了華僑華人被其他族群同化的可能性，因而自二十世紀初以來一直是為衆人所關注的問題。

衆所週知，縱貫中國歷史的都是這樣的情況，服從中國統治的番邦異族，或沿用中國的風俗習慣，或接受儒家思想及其它的價值觀，有的時候，他們還主動或被動地把自己認同為中國人（也即歸順或歸化），他們幫助中國人確立了其文明的優越地位。但也確有一些中國人與此背道而馳，他們選擇了認同於其它政治或文化。他們在政治上被認為是皇帝的叛臣賊子，更為嚴重的是，他們還會落下忘根忘本、離經叛道和不忠不孝的罵名。每當中國國勢衰弱的時候，人們對這種行為的憎恨之情尤為強烈，這些人會被痛斥為“漢奸”。每當中國被入侵和佔領的時候，對於數以百萬計在外國佔領者統治下生活的人民來說，這種忠誠都會受到考驗。中華文明似乎總能劫後餘生，而且，無論它被賦予什麼樣的定義，它都能憑借對其傳統價值觀博大精深的坦然自信而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因而，同化為一族的情況，多見於其他民族成為中華民族的例子。

然而，多數中國人都認為文化，特別是其作為共性表現出來的東西，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適時而變的。例如，漢人留辮子是被滿人征服的標誌之一，當初他們是被迫這樣做的。他們留辮子留了那麼長的時間，以至於1911年以後他們被要求剃掉辮子以示獲得解放的時候，許多中國人又堅決不肯剃掉辮子。但是時代變了。多數中國人不僅接受了現代科學和各種新的知識，而且還改換了新的裝束和髮式。現代化改變了他們許多原有的、長期信奉的信仰。

這是今天的“新移民”與他們十九世紀的先輩有很大不同之處。孫中山和毛澤東領導的兩次革命引導他們走向了現代世界。移民們不再覺得他們必須捍衛既有的傳統，抵禦外國文

化。在過去九十年中中國人在海峽兩岸、在香港以及在海外華僑華人中為實現自身的現代化所做的努力，已經使得新一代的移民足以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應付他們在海外將會遇到的更大的變化。簡而言之，“新移民”與接收國人民之間文化的鴻溝已經大大地縮小了。雖然有一些人仍然是盲目地出國去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但多數人都知道他們是要往何處去和為什麼而去。有些人不僅不害怕同化，而且他們正在努力尋求着同化之道。那麼同化的進程對於今天這些“新移民”來說又意味着什麼呢？

回答是多種多樣的。首先，同化有着對於現代教育來說至關重要的另一涵義。這關係到吸收新知識、新思想的能力，中國的進一步發展需要這些新知識、新思想。這些新知識、新思想也無非就是這樣一些東西：通過那些出來學習和掌握了它們、又最終回到國內的人而使中國人民受益的東西。這裏又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用什麼來捍衛他們先輩所創造的文明？幾乎不會有“新移民”像早期僑居在外的中國人那樣看重自己的傳統並致力於維護它們。相反，他們很有可能更多地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來維護，或者他們維護的只是中國作為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所應具有的尊嚴和長遠利益，或者他們維護的只是他們作為華僑華人個人所應有的尊嚴，或者是這三者兼而有之。他們得在海外對他們給予相當自由和寬容的國家才能夠如此，如果能這樣，那是最理想不過的事了。

當然，他們也得為此付出代價。他們的孩子將在一流大學的教育體制下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沒有任何東西能保證他們還

會同他們的父母擁有同一份情感。接收國的文化以及接收國所實施的政策將使所有的東西都發生變異。在與此密切相關的研究中做的最好的是美國。美國研究移民的學者從二戰以前就開始對同化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他們最早的研究是關於對美國印地安人部落的同化。接着是針對來自歐洲的非盎格魯-薩克遜移民而提出的“熔爐論”，有關這一類移民如何在一兩代之內成爲美國人的個案研究不勝枚舉。與他們有着類似情況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也進行了同樣的研究。我們知道這三個國家在六十年代以前都排斥中國移民，“華僑華人不可同化”是他們排斥中國移民的一個主要理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這三個國家接收的“新移民”人數最多。同時，這些“新移民”現在也較好地做好了適應這三個國家文化、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準備。爲了同化於他們所希望學習和掌握的政治文化以及他們所見識到的生活方式，他們已經做好了比以往任何時期的華僑華人都充分的準備。爲了那些我已指出的緣故，他們不僅沒有理由拒絕被同化，而且還會希望他們的孩子被教育成美國人、加拿大人或者澳大利亞人，同時又保持他們作爲華僑華人的種族認同。

當然，現有的有關這三個國家的同化和多元文化問題的爭議也是應該正視的。多元文化將會是這三個國家永恆的特徵嗎？抑或它只是走向同化的一個權宜階段？“新移民”出現於這一重大爭議相持不下之時，其第一代將成爲全球化時代移民大軍中的一支。這些移民可以說是真正的“新移民”，因爲新的全球化移民活動的基本規律尚在形成之中，而他們已經爲應付未來的變化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隨着這些規律的形成，華僑

華人“新移民”一方面會爲確保實現多元化的目標而奮鬥，一方面又會不斷融入到自己在海外的族群之中，融入到許多其他的族群之中。與過去不同的是，他們的奮鬥目標中增加了諸如受教育的權利、性別平等、勞動保護、政治參與，以及全球化的溝通和交流等新的內容。這或許又是與早期歐洲移民相類似的一種同化模式，但對於華僑華人來說，這些的確是一種新的經歷。

分佈於世界各地的ISSCO會員具有研究這一經歷的有利條件。在東南亞這一華僑華人發源地的會員們已經目睹了華僑華人族群同化的進程及其文化保持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他們也注意到了從這一地區遷移出去的“再移民”對精英階層的同化行爲所持的讚賞態度。另外一些會員發現生活在自己週圍的“新移民”隨着環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有意識地給自己重新定位，也準備着手對此進行研究。還有一些會員本身就是“新移民”，他們也許是記錄將會不斷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歷程的最好人選。他們的經歷是一種在前所未有的條件下出現的獨特機遇。他們不僅僅只是“新移民”。他們所處的位置使他們能夠幫助老一輩的學者——無論是中國國內的還是海外的——續寫華僑華人移民史。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還能夠把新的理論視角引入移民研究之中——在這一領域中有關穿越大西洋的移民活動的研究佔據主導地位的時間已經太久了，現在是可以將穿越太平洋的移民活動與之進行比較研究的時候了。

* 此爲王慶武教授在2001年4月底於台北舉行的“第四屆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原載《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程希譯。

研究課題與資料建設

從地方史
到世俗主義

—— 海外華人社會與地方史文獻 ——

今天選的題目是“海外華人社會和地方史文獻”。首先談“地方”這個概念。在中國學術及傳統政治制度中對“地方”這個詞的解釋相當清楚明確：地方就是指中央以下的行政區。這個概念的引申便發展成爲後來的地方學或方誌學。此學科的形成反映了人們對“地方”的關心和瞭解，其程度的深化，根本可把這學科歸類爲社會科學的一支。事實上，此學科內涵包容甚廣，行政管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歷史學、倫理學等皆包羅其中。

方誌學的孕育與成長，除了得力於士紳階層的推動之外，中央政府的積極支持亦不能忽視。從實際的用途來看，方誌本身有助於地方行政的運作，地方官可借助方誌去瞭解地區的概況，它是地方行政的最佳參考資料。我自己對方誌學並未有直接的研究，不過倒是想利用方誌資料增加我對中國歷史的瞭解，所以也曾看了好幾十種方誌。我自己的觀點是：方誌基本上是文化、地方行政、倫理基礎的綜合，故此它是社會科學的一種。

寫方誌的人，或是當時的執政者，或是告老歸鄉的士大夫階級，其撰述方誌的原因主要是發揚中國文化，用中國文化的

精神來批判地方行政。簡單來談，方誌把所有的地方資料作有系統的整理，其中饒有行政管理科學的味道。

稱方誌為科學，蓋因它是一個綜合的報告，基本上資料的分類是有大致相同的標準。士大夫可以利用方誌來得出一般性的結論，可以說大多數方誌比較重視共同性的資料。我的印象中，比較少的史料是關心到其特殊性和獨特性。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些有關地方風俗、自然現象、山川、河渠、地勢、名勝、物產的資料雖然記載得比較簡單，但卻充分地展示出地方的特殊性，內中甚有意義。

正如剛才所說，中國的地方誌大部分都是求其共同性，而相對來說是忽視特性，尤其是關涉到文化社會、社會行政方面。事實上，以往的情況是：不管方誌是當政者撰寫或是地方士紳纂修，均是強調共同性，即不講究獨特性。有時候更可以是千篇一律，每部方誌大都差不多。這種社會科學是士大夫的科學，是尋求一般化，只概括出文化的這一種觀點。換言之，我們大一統的中華帝國的傳統是只注意相同點，不注意獨特處。

“地方”這種概念應用在海外是否同樣有效？抑或需要採取另一種觀點？在國外的華人社會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他們生活在相異的環境，接受非傳統中國式的教育，也沒有傳統士大夫的包袱，他們所關心的是自己的現實環境。故其出發點就根本不同，與士大夫的傳統脫節，這點是值得注意的。

那麼在海外“地方”這個概念是怎樣的？我認為這個很值得我們注意。我簡單地介紹一下。在此之前，我們首先要分別出幾種不同類型的華人社會：

第一：以華人為主的城市與鄉鎮，包括像新加坡這個以華人為主的都市和馬來西亞內的一些中型的城市，檳城、吉隆坡等。

第二：以華人為少數民族，集居在一起的居住區，這是另外一種華人社會。如北美、西歐、澳大利亞、紐西蘭等，這些地方都有所謂唐人街(Chinatown)，在這種情況下，以少數民族形式集居的一種華人社會中的所謂“地方”，又有不同的意義。

第三：這一種是否能夠稱作華人社會，還是個問題。事實上這些華人散居，不能構成一個大型的華人社會。這種情況之下，是否也可以稱為“地方”呢？它雖有地方史，但有沒有華人社會，還是有點問題！而這一點我親身經歷過。二十年前我從馬來西亞搬到澳大利亞坎培拉的時候，當地華人極少，只有兩三百人。怎能成為一個華人社會？華人散居，大家分散，每個地方都有些華人住，既不集中，也沒什麼組織。這種散居式的華人社會，是否能叫做“華人社會”？這種情況，在北美、西歐、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地多的很；連東南亞都有這些散居的華人。不過既然散居，難成社會結構，其地方的觀念是怎樣的呢？

我認為這個世紀：二十世紀初至五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常見的“華僑”這個名詞。由於因每個地方的情況不同，各有不同的發展問題；而各地方與各國的政策也不同，政治制度也不一樣，因此“華僑”這個詞便概括在一個名義之下。大家都是華僑，不管在華人多的地方，或是少的地方也好，聚居或散居的也好，都是“華僑”。我認為這個用法基本上帶有政治性與民族性，強調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所以這種用法，

不完全是一種科學的用法，事實上亦不怎樣科學。不過，卻很有意義。同時在華人社會的觀點來看，他們也很鼓勵用“華僑”這個詞，“華僑”代表着他們認同中華民族與文化，並表達出他們的愛國觀念，這是當時歷史上很重要的變化。我認為這時期可以說是華僑時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時代。

但是，在五十年代以後，由於客觀情況逐漸轉變，“華僑”的定義又值得重新再考慮。是時國內與居留地形勢迥異，海外華人在考慮當地實際情況之後，對“華僑”、“地方”等名詞有不同的理解。現在利用南洋社會的概念來作為解釋。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並沒有詳盡的華僑史料解釋“地方”這個概念。最早好像是余有進在1848年用英語寫的“The Chinese of Singapore” in *The Journal of Indian Archipelago* 這篇文章是反映當地的情況，當然這是以華人為主的一個地方。到1887年的時候，李鍾珪到新加坡時，曾寫有《新嘉坡風土記》，這是用士大夫的觀念來寫新加坡，與我們中國傳統的地方概念比較接近。但並不一定完全適合新加坡華人社會。

在外國也有人開始注意這方面，他們注意的理由和方法又有所不同。在1879年，J. D. Vaughan也寫新加坡華人，其文跟李鍾珪的《新嘉坡風土記》的出發點根本不同。一個是士大夫的觀念，是中國傳統的觀念；一個完全是西方的觀念，從帝國主義、殖民地政府的觀念來看。這是當時十九世紀的情況。

新加坡本地人最早寫的，我剛才講過有余有進。後來林文慶辦了雜誌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內中發表了不少有關地方觀念的文章。他們眼中的地方觀念是由土生土長的商人立場出發，根本有別於傳統士大夫的觀念。就像林文慶，本來就

是一個醫生，並希望在當地參政，事實上，雜誌中的資料取材和撰寫方法與傳統亦截然不同。

到了二十世紀，情況又有所不同。二十世紀可分為戰前與戰後兩個階段。在中日戰爭以前的二十世紀，很少用地方史料。因為這時期，大家只着重南洋華僑這個概念，追求統一性和共同性，把所有華僑說成一樣的。不管什麼地方的華僑都是華僑，華僑都是要愛國，要嚮往中國，要認同中華民族。雖然如此，我剛才所講的“華僑”一詞，仍很有用處，在當時實在是它的功用。

但其中也有一些例外：就是宋旺相在二十年代用英文寫的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他完全從新加坡華人的觀點來看當地華人社會，其寫作的方法，引用的史料，所關心的問題均與傳統有別。如果把宋旺相那本書“新加坡華人一百年”，跟那些當時由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所寫的幾十種關於南洋華僑的書作比較的話，就不難察覺出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國傳統的地方觀念，跟在當地出生的南洋華僑像宋旺相等的看法大不相同。在印尼又有林天祐，在三十年代寫的三寶壟歷史 (*Riwayat Semarang*) 這也可以算是一個例子。從這兩本書可以比較出當時的地方概念，跟中國的完全不同。戰前的地方史的史料是極有限的。假若有的話，也是從南洋華僑的出發點來寫的比較多，注意地方上的獨特性。但由於他們都是社會學家，所以到最後，他們的方法就是將每個地方的特點歸納為一般性的通則，找出所謂科學的結論。結果雖然如此，不過他們在研究每個地方的第一步時，就會找出許多新的資料，而且亦關心到地方的獨特性——包括地方政策對華僑的影

響，文化的融和與衝突的問題等，例如印尼的 Mely Tan 寫 *The Chinese of Sukabumi* 就是用了西方的社會科學方法來研究，跟我們士大夫的社會科學是兩樣的。其著作講到 Sukabumi 的華人社會的特性，並指出與 (耶加達) 的華人不同，而 Jakarta 的華人社會，又跟 Semarang 的也不同。別的學者，像 Willmott 到三寶壟做研究，也是如此，他發覺到當地的華人社會發展，跟其他地方的有不同。

固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也關心到共同性的地方，像 Maurice Freedman 研究新加坡社會的時候，同時也研究福建、廣東的社會，去求其共同性。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彼此同時注意共同性，同時注意獨特性的時候，就有許多新的資料可以發現。大家也明白，為什麼有些地方“共同”，為什麼有些地方“獨特”。就從研究工作方面來講，就深刻得多了。如 Jacques Amyot 寫 *The Manila Chinese*, William Skinner 研究泰國華僑社會，及 Boonsanong Punyodyana 寫的有關泰國曼谷華人社會的同化問題，寫得很好，寫得很有意思。另外，還有 Willmott 的弟弟寫有關柬埔寨的華人，寫得很特別。他將柬埔寨的華人，跟西貢的華人，以及曼谷的華人作比較，且把共同性與獨特性，分得很清楚。即使後來的 Claudine Salmon 寫 *The Chinese of Jakarta: Temples and Communal Life*，雖然沒有故意去找什麼獨特性，不過裏頭的材料可以表示出耶加達社會的華人變化。

其實，以上這些書所寫的還是華人為少數民族的為多。在以華人為主的海外社會中，會否跟中國地方史有着相同的地方概念呢？像新加坡、馬來西亞，其中就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李寶平的“十九世紀的新加坡”一方面用 Maurice Freedman 的

寫法，求其共同性，同時也發掘它的獨特性。基本上他那本書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是表示這個社會的特殊地方，跟別的華人社會完全不同。又如楊進發在他的“華人的領導層在新加坡的領導”一文中，一方面試圖尋找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獨特點，另一方面也表露出許多與中國社會的共同點，我覺得很有意思。另外，顏清煌對新馬社會的研究也能夠同樣發掘出華人社會的獨特性與共同性。

在研究以華人為主的城市與鄉鎮方法甚多，而且與研究以少數民族為集中區的地方是完全不同。我看到好幾本有關這方面的書，像 Lawrence Siaw 寫的有關“森蘭美”一個小鄉鎮叫做“Titi”，是客家人的社會，內容很有意思。最近，羅國華研究霹靂州近打區，怡保那一帶，以客家人、閩南人、廣府人為主的礦業中心的華人社會，討論到許多很獨特的問題。此外，Diana Ooi 曾對以英語為溝通媒介的華人社區 (Penang 檳城) 的文化性質加研究，探索其與華語社區的異同。

最近有一本我特別有興趣的書是陳志明所寫的 *The Baba of Melaka*。“Baba”這個問題已有好幾百年的歷史。究竟此字源出何處？我們並不知道。不過大家用慣了，幾百年前就有，例如印尼、馬來西亞、馬六甲就有 Baba。研究這問題的學者並不多，但是都比較片段的。陳志明的書相信是至目前為止最精彩的一部，我覺得 Baba 這問題很值得研究。華人不一定承認自己是 Baba，事實上他們本身又確是華人，而且是很保守的華人。雖然他們既不能書寫中文及講中國話，但卻維持了不少中國的風俗習慣，而且在程度上更認為比在中國地方的華人更華人。這正是他們自傲的原因。可是這些人一般在南洋華僑社會中被

看不起，被視作變了質的中國人，必須盡快將他們加以同化，使他們不再有 Baba 這種意識。其實這些特殊的中國人，一直很忠誠地保留中國文化達幾百年之久，那麼我們應該不應該輕視他們，並不把他們當作是中國人呢？我覺得這個好像也不應該。陳志明的著作中解釋得很清楚，很真摯。這問題很特殊，很值得我們注意。這是士大夫階級所輕視的一群。而且亦反映出海外的華人社會中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順帶一提，最近新加坡年青的一代，有幾個我覺得他們的貢獻很大，如莊欽永、柯木林、林孝勝，他們都是利用地方史的資料去研究。他們的成果有些是相當傳統的，跟中國士大夫的看法相同，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劉子政在研究沙撈越方面就有很大的貢獻。

在地方史研究上，我覺得在注意共同性之際也不能忽略社會間的獨特性，需要有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觀點，去對付不同的社會情況，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明白到這個會議重點。剛才林教授談的我覺得很重要，就是一方面探討中國人移居外國的因素與活動，一方面考察華人對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之建樹和影響，和對中國的貢獻。

從兩方面來講，我覺得我們對地方上的獨特性應該多下點工夫。我覺得我們以前太注意共同性，不重視獨特性。因為我主張從地方誌裏去找獨特性的地方史料，以個人的經驗來說，地方的獨特性雖然難找，但卻很重要。我曾跑到國內的小地方去，發覺就以閩南地區為例，泉州與漳州便有很多不同，甚至泉州的縣與縣，也有不同的地方，像集美，跟晉江、安海又有

不同。不同的海外關係對地方發展也有不同影響。漳州人很早便到南洋，但後來漳州人反而不如泉州人。泉州人到菲律賓去發展，特別快，特別成功。泉州的發展與菲律賓的關係，跟漳州與印尼及馬來西亞早期的關係，對當地社會的影響，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談到華人移民的問題，閩廣社會中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閩廣移民與江浙移民又有不同。浙江人，寧波人也好，溫州人也好，到美國去的，到西歐去的，與閩廣人到東南亞，到美國去的情況大不相同。他們相異之處是我們值得注意的。所以，我認為談起地方文獻，要多注意一些獨特性的地方，不要完全採取共同性和一統化的觀點去看。

最後，我簡單地再作一個小結論。華人在不同的時期離開中國，便有不同的影響。到的地方不同，影響亦異。這跟當地的民族的固有文化、制度有密切關係。就以現在來說，到資本主義的社會去，跟到共產主義社會去大有不同。更進一步來說，即使到不同的共產主義社會，情況亦有別。我們現在很容易看到，到蘇聯去的華人與到越南去的便有不同。至於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華裔移民又怎樣？這都是值得討論，而且是應該討論的題目。而題目的本身包含了政治、文化、和經濟各層面。最後，我希望大家對於地方材料研究的時候，稍為轉過來，多談一些獨特性，少談一些共同性。最少暫時少談一點共同性，多談一些獨特性。謝謝大家。

* 原載林天蔚主編《亞太地方文獻研究論文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1)。

香港華人的過去和未來

今天香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是進入中國的便利門戶。這個基本條件在近一百多年的歷史進程中一直沒有改變。作為英國佔領的殖民地，她也是設在外部世界的窗口。只有香港華人的活力和進取精神，才是香港發展的主要可變因素。在這篇關於香港過去和未來的結論篇中，我將論述香港華人，分析他們的組成情況，以及他們對中國和本區域可能發揮的作用。

儘管香港人生活在殖民統治下，但他們無疑是中國人，也可稱作香港中國人。在此我們留意一下，有許多詞彙描述中國人，例如：中國人、漢人、唐人、華僑、華人等是最通行的用法。

但在現代中國社會，有兩個詞具有特別的歷史意義。它們就是上海人和香港人。這兩個詞反映出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沿海省份、大陸帝國邊緣新港口城市的顯著發展。從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到遼東半島的人迅速城市化，並向海外世界發展。把他們稱作沿海華人也許更為適合。這一稱呼並不指局限在某一特定區域的人們。它表示的是那些出生在中國沿海地區，通過口岸與外部世界進行頻密的貿易活動，在

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起到橋樑作用的人們。他們跟得上時代變化，對事務反映敏銳，充滿活力和朝氣。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儘管他們中的許多人和他們的祖先曾經在外國人的管轄之下生活，但他們從未染上殖民地特徵。他們中的多數人從不屈於外國利益，而且自從現代民族主義興起之後，他們投入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滿腔熱情地為中國的昌盛和尊嚴而奮鬥。

事實上，沿海華人中的重要一群便是香港人，他們的認同意識產生於1970年代。香港人是指那些即使不公開反對殖民統治，但至少與少數欣賞英國統治的人截然不同的人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他們的認同意識，把香港人與澳門人一同稱作“港澳同胞”。他們有別於台灣人。他們也不是華僑，即那些“暫時”居住在海外或中國領土以外的中國公民。香港人也包括許多新近從大陸來港居住的人，效忠台灣政府的人，甚至取得外國國籍又回港生活和工作的人。

香港人基本上講標準的廣州方言，但他們並不都是廣府人。人口統計數據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人來自珠江三角洲以外地區。他們分別講潮州話、客家話和來自廣東、廣西的其他廣府方言；還有的講閩南話（漳—泉）、客家話和來自福建的其他方言；還有一群人被籠統地稱作上海人，這個當地的稱呼是指從中國其他省份來的人們，但主要是從沿海地區來香港的人。

香港人還包括一、二十萬的“歸國”華僑。他們多數是在1950和1960年代回歸中國，在1970年代又移居香港的東南亞華人。他們中很少有人還能返回自己在東南亞的家園，所以他們已經把自己當作香港人，或者說沿海華人。

總而言之，不論祖籍何方，香港人包括了那個地區幾乎每一個中國血統的人，只要他們在香港定居，並且承認他們與中國有着深厚的文化淵源。儘管多數人講廣州方言，但每個人都略懂自己的方言。例如，有人講普通話，有人講兩種或多種方言。還有人能講外國語言，像英語、法語、日語和不同的東南亞語言。香港是一個流動性很大的城市，人們來自附近地區和至少三大洲。

香港人主要來自中國南部沿海省份的事實，意味着他們與那些依靠沿海和海外活動為生的人們，特別是那些參與海外貿易的人們有着許多共同之處。這些人一直處於中國地區的邊緣，與內地人差異頗大，因而也值得特別關注。正是他們的邊緣地位，使得我們需要瞭解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生活方式、甚至他們對世界的看法。

如同世界許多地方一樣，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人口構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流動和融合的過程。考古學的發現早就證明了南部沿海土著文化中含有許多外來的成分；而秦漢以後國家的統一，大大加速了中原人口的南移和南北文化的交流。到了唐代，以廣州為中心的中國南部海上貿易和對外交往到了一個高峰時期，而這個時期影響的延續，可以從明清時代中國南部沿海人在海外自稱“唐人”，把中國故土稱為“唐山”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

但是，散居中國沿海的人們除了共用像“唐人”或“閩粵人”這樣一些稱呼外，他們彼此之間卻使用不同的方言。儘管他們中的精英分子共同奔赴京城參加科舉考試，但卻不願在彼此間買賣。他們中間的勇敢商人熱衷從事海外貿易，使用自己

的港口，分別與不同的西方和東南亞國家和港口做生意。因此，很久以來，這一地區的人們對外界就採取相對開放的態度。

這些唐人毫無疑問具有中國帝國的歷史經驗和文明。但在帝國時代，派遣來管理他們的官員和軍隊並非都瞭解船和海對他們生活的重要性，一些掌握實權的官員反而鼓勵發展農業，甚至以犧牲海外貿易為代價。儘管如此，這些唐人還是追隨他們的傑出人物和文化領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至少是中國唐人。

時至今日，唐人這個詞除被老一代海外華人所用，而且還保留在中國南部沿海的主要方言中，它聽起來似乎有些離奇古怪。香港人則不同，它不再簡單地等同於唐人。從文化和歷史角度看，香港人是中國人。這種與國家認同感的聯繫，今天比以往更加強烈。但是，不少香港人卻自認為是有不同意識的中國人。他們拒絕殖民地中國人的概念，對這種“反面形象”已經反感了幾十年，但也不等同於具有大陸或台灣的當代主流意識。

香港人這種想法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先例，瞭解它對我們理解香港歷史和香港未來非常重要。在南部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也可發現相同情形。從漢代開始，廣州就是外貿口岸。宋朝以來，泉州以及隨後的安海和月港都曾經在短時間內成為重要港口。在幾個世紀中間，還出現過其他港口，如福州、廈門、寧波和長江三角洲上的一些港口。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後，也出現由葡萄牙人管治的澳門。但是這些港口的貿易量從不穩定也無法計算，而且在明清時代，官員對這些港口實行嚴格控制。我們有充足證據可以證明，在十九世紀以前，亞洲

和歐洲國家在與中國政府進行貿易時遇到各種困難。這些證據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這些港口的中國商人沒有能夠形成自己的明確的意識。日本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竭力敲開明朝緊閉的大門，荷蘭人和英國人則試圖迫使清政府開放口岸。然而，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人才通過打敗滿清帝國取得突破，通商口岸制度成爲放大的澳門經驗。這個制度是由西方強權的軍事實力支撐的，也是西方國家在經濟上滲入中國的不懈努力的結果。

此後一百年，開放口岸發展成爲共生中心，在那裏，外國治下的貿易組織與中國官員、商人和買辦共存。由於地理位置北靠中國最廣泛的內地，上海成爲最大的一個中心，它的人口迅速膨脹，來自全世界的外國人都匯集在這裏。那裏的中國人不僅來自南部中國的其他口岸，而且來自鄰近的每個省和縣。在不長的時間裏，上海便成爲在中國沿海地區形成的新型社會的都會，被廣泛承認爲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

起初，上海社會以非華人的貿易活動而著名。到清朝末年，大批當地優秀華人也享有盛譽。上海吸引了大官僚和富商家族，他們移居此地並在那裏建立他們的基地。社會開始分化成兩部分：一部分是通商口岸小社會，包括非華人；另一部分是具有新意識的上海人的大社會，包括從各地來上海定居的華人。

在同樣時期，香港也混雜居住着不同的人，但在非華人人口中，英國人的比重特大。華人人口主要是來自廣東省的商人、勞工或逃難者。在這種環境中，他們不可能變得英國化。他們中的多數人保持着中國人的傳統。只有兩種人例外。一種是與英國人密切接觸並且帶有英華特點的人。他們中的一些人

被通商口岸小社會所接受，但後來大多前往上海，或者在其他口岸進進出出，並不僅僅依賴香港。另一種是往返東南亞、美洲和澳洲途中經過香港的人。這些人被稱作“華僑”。他們並不認同香港，僅僅把香港作爲移民中心或轉口貿易地。只有一些在英國殖民地居住過的人，會把自己視作英華殖民地居民，但多數香港人並不贊同如此自稱。

簡而言之，直到1940年代，香港勉強屬於新的中國沿海社會。在世紀之交，當廣東籍領袖孫中山等人興起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時候，香港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當大多數中國人被廣泛喚起民族意識的時候，民族主義的熱情卻向北移到上海、北京和其他內地城市，而香港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又回到邊緣去。

不過，因爲香港華人比在通商口岸的華人更直接地生活在外國管轄之下，所以他們也具有共同的特點，特別是與上海人有許多相同之處。中國沿海華人的關鍵特徵主要來自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和挑戰，但是上海人的反應明顯，香港人則不直接。讓我來例舉他們的一些共同經歷。

首先，法律框架（香港採用英國習慣法），它保護自由，特別是私人商業利益。雖然一小部分中國律師受過訓練，但他們無暇深入到上海的華人中間。但毫無疑問，法治的益處得到承認，來自中國各地的知識分子、藝術家和政治家都尋求法律的保護。

其次，資本主義經濟，表現爲自由貿易和低稅收，它加速生成了現代中國企業家，特別是在上海，形形色色的外國商人提供了更多的實習機會。這是早期工業化階段，資本的構成形

式簡單，廉價勞工充足。更為重要的是，長江和珠江三角洲的潛在市場廣闊。對當地商人來說，這是一個有深遠意義的刺激因素，能夠促使他們發動中國的工業革命。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商人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上升，他們更多地參與公共事務。兩個城市的新一代商人能夠逃脫官僚的支配，在國際商人中間找尋自己的位置。

另一個特徵是新聞、教育和宗教方面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反映在外語和華語商業報紙上，隨後也日益反映在政治雜誌上。由於上海缺少單一的政治結構，這使得所有社會和政治組織最大限度地享有自由。上海成為持不同政見和造反的人的溫床；而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則因為顧及英國與中國的關係，對潛在的叛逆者和搗亂的人嚴加管制。上海的自主學校、學院和大學教育了新一代中國人。一種新的政治意識開始萌芽。也許社會價值觀念的最大變化是對待婦女受教育的問題，尤其是高等教育。香港的教會學校對香港早期意識的形成也有所貢獻，但學校的數量有限。高等教育方面，大型的教會學校和大學都在上海，例如主要由美國人創辦的聖約翰、德國人創辦的同濟、法國人創辦的震旦。此外，新型的國立大學和私立學院也在本世紀初在這種開放的環境中湧現出來，它們使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極大地增長了學識。

這些經歷增加了作為沿海中國人的上海人的文化差異。上海人成為全中國人眼中的仿倣樣板，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他們被視作新型現代中國人。與此相對照，英國人沒有在大陸卻在香港建立了大學。但是當香港大學成立的時候，它只是為維繫中英關係所作的一種努力。它確曾培養了一些具有中國沿海

特點的華人，但並不僅限於香港人。與上海相比，香港官方並沒有培育出一種特別的香港華人意識。

上海成為中國出版業的中心。她也是中國最先接觸現代技術和西方文化的城市，尤其是在科學研究、工程管理、電影、工藝美術、音樂、戲劇和舞蹈等方面。上海吸引了中國一些最優秀的人才，他們成為此後百年中廣為人知的最富創造力的人物。他們為現代華人意識奠定了基石。這種攬和着上海人特點的意識，在其他沿海中國人，特別是在香港人中間傳播。

近百年來，香港作為中國與英國的一個次要中心，她具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她顯然是廣東華僑、難民和移民的重要中轉站，也是與東南亞和英語世界保持商務聯繫的通道。她與廣州一起成為珠江三角洲的兩大要港。從更廣闊的角度觀察，此時的香港人已經開始逐漸形成與其他中國人不同的特點。對於敢於冒險的現代廣東人來說，這個城市不僅僅是他們的家，同時也是他們與其他英國殖民地的英華居民，與東南亞其他地區“南洋華人”保持聯繫的中樞。

與香港和上海華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多數中國人還生活在農耕社會。過去，讀書人和考得功名的家庭擁有土地，在中國不同地區的情形大體相同。地區之間經濟和文化的差距縮小到最低限度，至少在清帝國衰落之前是這樣。在民國時期，即1911-1949年，出於多種原因，中央政府經常處於軟弱和分裂狀態，沿海地區（特別是通商口岸地區）與內地的差距加大。在這種情況下，富人和受過教育的人們，紛紛向安全的城鎮遷居。本世紀內，他們明顯地移向沿海地區，因為那裏的現代貿易、教育和文化以可觀的速度發展。

最終，政治差距也開始加大。沿海城市在自由的條件下，產生了現代政治民主主義，開始出現城市文化，甚至具備了“公民社會”的雛形。但在中國內地，排外情緒有時混雜對沿海發展的不滿和妒忌。國家經濟崩潰和外國干涉的惡果導致了革命，而正是這場革命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在1949年接管政權。由於外國干涉的存在，人們竟然一度不把沿海地區的相對成功當成一種現代化和進步。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的頭二十年，香港是怎樣奮鬥求生存以及是什麼使他們成功等題目，本書都已經論述過。在此，需要論述的是香港人概念的形成，並且簡要探討三個與香港如何成為中國沿海華人的家園特別相關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香港被從非殖民化委員會的議事日程上取消，這意味着香港不再是殖民地和事實上的最後一個通商口岸。香港人概念得到承認和香港人新意識的產生並不是巧合，雖然也許存在其他的外在影響。華僑作為一般稱謂已經淘汰，即使仍是華人，但他們往往冠以居住國的名稱，如“澳籍華人”、“美籍華人”，以此標明差別。“馬華”、“印華”、“泰華”和“新華”則是另一種區別方式。那些跟隨國民黨政府去到台灣的大陸人，被稱作“台灣人”。所有這些稱呼都具有各自的新含意，香港人的稱呼當然也必須在特定的環境中使用。

把香港看做最後一個通商口岸具有重要意義。當上海和其他口岸被中國收回時，許多沿海華人來到香港。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恢復了傳統的均衡發展政策，要確保全國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大致相等。這個政策的結果是減慢、縮小

了沿海華人和其他華人之間的經濟和文化差距，但沿海的發展速度則不能充分發揮。從沿海向內地搬遷工廠甚至整個產業，把新產業和研究中心深入北部和西北部的地區便是例子。與此同時，非常相反的事情發生在香港。整個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這裏是移民的聚集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移民人數更為可觀。這些新集中來的人口，使得香港可以進行以前因勞力不足而無法開展的計劃。

第二個問題是香港成功地移植了“上海模式”。現代企業家精神和製造業大規模地引進，使香港成為亞太區域以及更大範圍的金融和通訊中心，而且她還逐漸成為華語和英語的出版、電影、電視以及其他傳媒的文化中心。1970年代，我們看到新一代沿海華人產生出來，他們與前輩不同，具有當地的特色。他們以身為香港人而自豪。他們講廣東話，而不是上海話或普通話，他們也懂得英語這個國際語言。

第三個問題源自兩場區域戰爭和近於內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裏頗具諷刺意味。兩場戰爭，即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使西方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承諾，因為他們希望這裏成為防止共產主義蔓延的堡壘。香港人從這些戰爭中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更為重要的是，戰爭幫助香港企業家擴大了經營範圍，特別是向北美洲發展。

至於“文化大革命”，它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最具有破壞性的一個階段。它不僅導致了全中國的動亂和貧窮，而且助長了對外國人無區別的憎恨和對中國傳統的輕蔑，這在中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這些令人驚恐的發展更加突出香港人的與眾不同，使他們數十年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更為優越和更為文明”。

中國 1970 年代的動亂，迫使香港人反思自己與中華遺產的關聯以及作為中國人的特性。他們的信心有所動搖，並且以意想不到的開放程度接受外來影響。

縱觀香港經濟與技術的顯著成功，我們可以發現，香港人偏離了曾是主要面向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上海模式”，而是轉為主要面向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的開放的國際中心。我相信，經過四十年的戲劇性的變化，香港人已經成為不同於上海式的中國沿海華人，因此，這為“一國兩制”的方式埋下了基石。人們必須重新和獨立地看待新型的香港式的中國沿海華人的未來作用。

香港華人在 1997 之後能夠發揮什麼樣的作用，這取決於他們面對變化的機智和勇氣，這也取決於區域和世界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認識到香港作為窗口和渠道的重要性，希望借助她來促進現代化建設。香港在中國現代化中的地位已經得到充分承認，在這個前提下，香港可能有助於培育出二十一世紀的沿海華人。

1949 年以後，許多中國沿海華人來到香港，因此，香港意識與上海和其他沿海省份大口岸的意識產生了血緣聯繫。雖然香港意識是在外國管轄之下形成的，但她近年來比上海意識更受關注。自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公佈以來，她不僅成為更加自覺的意識，而且受到仔細研究。在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香港人作為特別一類華人而被加以定義。1997 年，香港人將成為特別行政區裏的中國人。他們有時間在衆目睽睽之下為這種變化做準備。許多香港人已經意識到自己在特別歷史環境

中所形成的優勢和缺點。人們將會看到，沿海社會是怎樣能使香港成為中國和區域內其他城市和口岸可資參考的樣板。

當中國其他地區的沿海華人移居香港時，他們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作為香港人，一種新型的沿海華人，人們則期望他們為發展沿海其他地區發揮不同的作用。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香港可以做上海當年促進香港發展同樣的事情，反過來促進上海的發展，也促進其他口岸的發展。但這並不是香港人可以長期發揮的作用。

在中國港口城市，如廣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上海、天津、大連、廈門、汕頭、福州和寧波等地，新型中國沿海華人其實已經逐漸形成。他們都有像香港人一樣成功的抱負。除開珠江三角洲，多數地區還保留着前中國沿海華人的特點，只是特點的形成條件與香港非常不同。在過去四十年中，他們與內地的多數人口一同經歷了變化。他們大多數已經接受了國家的政治和管理文化。因此，他們處於更佳位置向中國欠發達省份提供直接的樣板。

在這並非必然發生的過程中，香港人能夠提供一種刺激性因素。香港人可以在新型現代中國人的演化過程中充當一點催化劑的作用。中國更為開放和與國際市場體系聯繫更緊密之後，以香港人為代表的中國沿海華人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動力的一個部分，有助於形成一種為中國的現代化所需要的經過改革的社會結構。特別行政區將有助於中國人吸取外部世界最有活力的文化，以新鮮的觀念豐富中國通俗文化。

的成功依靠與中國內地、日本、西方和東南亞的廣泛合作。當香港回歸之後，更多的中國人，特別是沿海華人，將能夠給香港企業增添更多力量。爲了在那些懂得如何取得快速和持續的現代化發展的人們中間尋找合作伙伴，香港人不僅要着眼於中國大陸沿海城市和海外華人，他們還應注重台灣人。

這又引出了“大中華”的概念。有許多關於這個詞的錯誤解釋。這一詞彙容易引起模糊不清的帝國主義的聯想，必須予以澄清。這個詞唯有在表述中國大陸南部沿海地區與台灣、港澳之間的經濟實際整合時才具有意義。沿海華人，包括香港人，應該積極推動“大中華”的發展，把她作爲向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地區拓展經濟實力的基地。有了這個擴大了的基地和增加了五十倍的人力資源，香港的中心地位可以確保相當長的時間。

* 中譯文原載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7），第二卷，頁859-867。

香港及其他中國沿海華人會成爲促進國家發展的重要力量。香港的生意正在向北遷移，也有向內地發展。香港企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已接近飽和。當廣東當地人的競爭力增強的時候，更北部的內陸省份向香港投資者提供了更多機會。新加坡投資北部城市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也表明了這些新機會的可能性。此外，世界上的跨國公司也在中國大陸大量投資，但並不局限在沿海地區。香港企業家當然毫不遜色，他們與台灣伙伴以及那些透過香港金融與商業網絡的海外華人一起，大舉投資中國大陸。他們需要的是沿海華人所具有的勇敢的企業家精神，這已經被證明是他們的優勢，而且他們依然具有這種優勢。

爲了增強他們的作用，香港人需要重新評估自己早年在南部中國和東南亞地區所扮演的引人注目的角色。政治局勢已經改變，東南亞國家和區域組織如東南亞國家聯盟的經濟狀況也已發生變化。香港人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和知識也需要加強。他們的作用不僅僅着眼於龐大的跨國界的東南亞商務網絡中的華人。如果只與這一區域的少數華人企業交往，那將是錯誤的。這一地區出現了土生土長的中產階級，他們在本國經濟中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香港人能給此區域的貿易提供特殊幫助，特別是當土著精英與當地少數華人合作，共同通過中國南部沿海城市，與中國建立穩固的投資聯繫的時候。

香港人會發現，把自己局限在任何一個單一的區域內將越來越困難。開放貿易體系的確是全球性的，香港已經證明可以通過她的環球聯繫應付這樣的貿易。但是香港確實缺乏足夠的人力去維持和享用這個龐大網絡的所有分支。至今爲止，香港

同化、歸化與華僑史

本書的題目《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實在非常有趣，也很重要，從東南亞地區的觀點來看，我覺得更有意義。這個時期是南洋華僑社會發展而達到最高潮的時期，也可以說是華僑時代的最高峰。在這“華僑時代”，引起許多學者注意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各國學者都提起並且頗有爭論的一個問題，就是華僑被同化的問題。這並不是什麼新的問題，其實中國學者早已注意到。在清末民初的時期，關心華僑社會者已經以為是個嚴重問題；中國政府也關心，華僑父母更擔心。至於各地政府官員和當地政治家，包括東南亞當地的政治家，也以為這是很值得他們注意的。今天我想把這個問題作一個初步的分析。題目實在很複雜，我自己資料也看得不夠，但是因為我覺得重要，所以值得介紹。希望學者注意，做多點研究。

先從同化跟歸化這兩個概念說起。同化這個詞句，什麼時候開始用的，我還不十分清楚。似乎是近代翻譯英語 assimilation 而用起。但是同化的概念並不新鮮，可追溯到舊中國社會。孔子對這個概念似乎已有認識。他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當然“被髮左衽”到底是不是同化的意思，很難說，就是同化，也不過是表面，是衣裝而已，不一定影響到當時華夏民族的語言文化。而且，用後來歷史來說吧，滿清人入關以後，中國人也可以說是“被髮左衽”，但是被同化的並不是漢人，反而是滿人被漢化。更重要的概念其實是夷狄不入中國，或天限華夷。這是秦代以後的事。中國民族的地位鞏固，自信心也越來越強。經過五胡亂華的一段歷史，有少數漢人是被胡化了，但結果還是胡人被漢化的多。到隋唐，這個趨勢就更明顯了。宋、元、明時代，則華夷分得很清楚，不管是契丹、女真、蒙古和女真後裔的滿洲旗人，都是強族大國。這一千年來華夏民族，雖曾被外族戰敗，華人受過外族的控制，也受他們文化的影響，但是基本上沒有被同化，而反而把這些外族同化為中國人或華人。這些化外的民族終於歸化中國。因外夷來降之化外人，漸漸被中國同化，同化這個概念漸漸不受中國學者注意，也沒有用這個詞句。這個概念僅是用作外族被華人同化，而所用的詞是“歸化”。主要意思是說外人嚮慕中國文化，因此有許多詞句，如感化、慕化、嚮化，都是被中國教化的意思。

歸化這個概念也很有意思，本來並不限於外族嚮慕中國文化。原來意思好像是任何一批人被人家感化，像歸心、歸順、歸服、歸仰，這類的詞彙很多，意思就是漸濡德教，漸歸善俗。特別是與儒教思想文化有直接關係，當然，外族被感化，也屬於歸化、儒化的一個階段。因此，從中國的觀點，只有外族歸化中國，沒有中國人歸化外國。如果有的話，就說是被髮左衽，或是“胡化”。傳統態度認為中國文化優秀，中國人的

優越感是合理的，別的文化不如中國，外族歸化是可以瞭解的。中國人被人同化，就是反常的，不自然的。因此，就沒有同化這個詞彙。如果漢人被同化，或是可能同化，就用別的詞句了。好像“以華從夷”，更不禮貌的就是“通番”或者是“叛附夷人”或者是“投奔外國”，諸如此類的詞句。其實這些詞句也不能代替同化，不一定代表華人被外人同化。華人通番等等，可能不過是爲了生活所迫，或爲了想賺錢發財，或是有利用外國、外族勢力來侵犯中國的主權的野心目的。還有恰恰相反的，例如有些在宋朝和明朝的遺民到越南和日本去，像朱舜水之類的，並不被同化，反而長期堅持中華文化，還影響到當地文化，受當地人尊敬，使當地人對中華文化有更清楚的瞭解。

但是，外族人用中國字的時候有所不同。例如日本人的用法就不一樣。日本書籍裏用歸化這一詞跟中國人不盡相同。早期日本歷史裏有漢人和朝鮮人到日本定居，日本人就稱爲歸化日本。這就是近代所謂“入籍”的意思。從日本人的觀點來看，漢人接受當日本國王的臣民，尊敬日本國，當然可以說歸化日本國。所以後來明朝有漢人“投番”，這是中國人用的詞句，日本實際上就乾脆叫“歸化明人”。“明人”就是明朝的人，即歸化日本的明朝的人。所以剛才說“歸化”和“入籍”，至少按日本人的用法，好像有同樣的意思。

到十九世紀，清朝的政府和英、法等各國簽訂條約的時候，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入籍”問題。因此，在1868年，和美國訂條約時，規定設置駐外國使節，條約上就說：“本條約不賦與在中國之合衆國人民，（即美國公民），或在合衆國之清國臣民（即中國人）以歸化權。”由此可見，兩國都不允許他們的人

民，他們的臣民或者公民歸化，就是不許入籍。所以中國也用“歸化”來翻譯英語詞 naturalization。清末高級官員已很明白，海外華人有歸化，就是入了外國籍的，另外也有同化。這是兩個有關係，但並不相同的問題。我注意到清朝初年的時候已經有所謂華人在海外“存留不歸”，“即行留住”，這些句子；還有說“蓄髮居住，婚娶生育，竟不作故土之想”。這是講清初福建、廣東人在東南亞移民的趨勢，當時已經批評得很厲害。

到1887年，張之洞接到專員訪察南洋後的報告，已注意到華人被“迫令入彼國籍”，尤其是在英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荷屬東印度這幾個地方。但是他以爲同化問題也要注意。所以他建議設立書院，“選擇流寓儒士，以爲之師，隨時爲華人子弟講授，使其習聞聖人之教，中國禮儀彝倫之正”。可見他也是特別強調儒教，就是教化、感化的重點。滿清時候當然不方便講什麼“胡化”、“漢化”的，這些話根本不能用，所以只能講“儒化”。

當時叫人擔心的由呂海寰描寫得很清楚，也很生動。這是1901年的事。講的是荷蘭殖民地政府，以華人之生長於此者，充瑪腰 (Major) 等職。他說：“他們以中國之人，欺中國之民，可謂喪心昧良。然其入和籍（即入荷蘭籍）已久，漸不知爲天朝之百姓，固無足怪。”意思就是入了籍，久而久之則會被同化。他又說：“該處寓居華人共四十七萬餘人，但大半已入和籍。查雅瓦地方所有華民入和籍者，較之不入籍華民多至十倍。”他這數目不一定對，我只想以此例說明他很關心華人入外籍的問題。但這裏講的入籍或者歸化，到底不是同化。薛福

服兵役，要改換華人的遺產法等等，所以好像要華人被同化才能享受平等。

現在談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了，到五四運動以後，對於同化的概念，更加敏感。當時最明顯的就是對泰國和菲律賓華僑的新見解。選幾個句子作例子。當地的華人“語言風俗已同化於外人，不自認為中國人”。另外又說，他們忘了祖國，甚至於同化以後，以虎作倀，欺壓同胞，或是魚肉同胞。在這個時候，歸化這個詞似乎受到日本的影響，即當作入籍，就是改換國籍的意思。例如，日本在台灣，把華人當作日本籍民，就說成喪失國籍，歸化日本。就是說日本務於同化所有的台灣籍民，“務欲同化而消滅之”。荷屬東印度也同樣強制其歸化，逼華人入籍，但並不僅是法律上的定義而已，而已經帶上被同化的意思。至於那時期的北美、澳大利亞、紐西蘭這類地方，則有不同的問題。要入籍的話，就要全部歸化，似乎要到融化、消化為止。

總而言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同化這問題令所有華僑都關心。中國的各機關及一些學者以為，在海外各地的華僑，有不同的態度或不同的組織或不同的觀點，最少他們以為有三大類的華人或華裔。剛才我說的所謂不自以為中國人的、完全被同化的，可以說已經不是華僑了，簡直是叛附，或者是投番了。既然如此，也無法可以挽救。但很值得大家警惕的則是將來如何避免再會有這樣的發展，需要竭力地教育，宣傳，使得下一代的華僑不再如此。另外一類就是熱心愛國的華僑，越來越多。一方面是受孫中山的影響，又因為華僑教育發展得又快又成功。另一方面，交通更加方便，回中國的機會漸多。在這

成“奏請豁除海禁”，是1893年勸光緒皇帝把海禁取消的一篇文章。他說這些海外華人“雖居外洋已百餘年，正朔服色，仍守華風，婚姻賓祭，亦沿舊俗”。之所以不回國的理由，他解釋說，主要是因為回國後被人稱為“捕逃者”或“通番者”，被人欺負。“一遭誣陷，控訴無門，因是不欲回國”。換句話說這主要的還是個國籍或歸化問題，並不是個同化問題。這是薛福成所看到的。

最後，清朝末年遇到荷蘭政府在印尼，就是荷屬東印度，把當地華人，不管是土生久居的或是新客華僑，都稱為“帝國之居民者”。所謂居民，給華人沒有什麼好處，僅是把華人在法律上限定在不平等的地位。這又引起大家關心國籍問題，和荷蘭政府爭了很久。到1909年3月的時候，清朝頒佈了《大清國籍條例》，用血統這一原則來對付荷蘭及西方一般國家的出生地原則，產生了後來雙重國籍的極複雜的問題。這個大清國籍條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轉變。從歷史以來的文化響慕論，即儒教感化論轉為西方的法定國籍論，原則上變化很大，但實際上仍保存不少矛盾。例如又加上了許多新的概念，如血統論的概念，種族和民族的觀點，使文化跟國籍都成問題，很難澄清。到民國以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精神影響到多數中國人。文化和國籍的爭論延及到同化和愛國的爭論。舉個例子吧：清朝和荷蘭所爭的是華人的國籍問題，本來是法律上的保護權和華人的地位以及平等待遇等問題。到民國以後，荷蘭所頒佈的《荷屬東印度籍民條例》，就被稱為（中國人翻譯的）《同化法令》（不是“入籍”，也不用“歸化”，而用“同化”）。因為條例裏面說明，華人要享受同等待遇，就必須要瞭解荷蘭語，要

期間，中國已經把熱心愛國當作華僑的一個標準。每個華僑應該盡心地朝熱心愛國這一理想去努力，在種族、民族、國籍問題上都表現出熱心愛國。但是同時，大家又承認還有第三種華僑，尤其在東南亞。這些華僑上外國人的學校，讀荷蘭文或英文，不懂得看中文，不會寫中文，其中有一部分差不多已同化於外人了，只會講些馬來話或英語、荷蘭語、爪哇語等等，穿馬來裝或西裝，赤腳走路，飲食也大受外人影響，可是也不完全同化，並沒有否認是中國血統的華裔或華人。選幾句話描寫他們，他們“唯姓氏尚存中國之舊，歲時祭祀，亦如中國”。另外一句，“然尊重祖制，古禮未忘，姓氏宗族，世守勿失”。所以這問題不簡單。其實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最被關心的不是第一種似是而非的華裔，而是第二種和第三種。如何叫第二種華僑更加愛國，僅僅有中國國籍，自己說歸化還不夠，還需要積極地愛國。第三種呢，則如何叫這些華僑不要被同化，反而要歸依中國，歸依中華的德教文化。這兩個責任如果合起來的話，可以說是用歸化中國或歸化中華文化來抵制、抗拒為外人所同化，即以歸化來抵制同化。擁有中國國籍的，就是歸化了的華僑，受中國政府的保護，他們欣賞中國的偉大，這方面很簡單。但是不簡單的問題層見疊出。各國的華僑不少已入了國籍，或許要申請入外國籍的；或許是逼得入外國籍的，有雙重國籍的；或許無所謂國籍的，沒有護照，也沒有中國領事館給他們登記的等等。應該如何處理這各種各樣的華僑？兩次大戰間有各種的爭論提出多方面的解決方法，史料很多，非常有意思，值得研究的題目也非常多。舉幾個例子，要避免華僑被外人同化，這不但要用教育、用學校來教化他們，還要宣傳民

族主義和甚至於國家主義，來把他們的鄉土觀念和地方觀念提高一層，使他們國民化，或者是愛國化，其實這還不夠，因為華僑經過孫中山和康有為時期革命和保皇黨的政治鬥爭，也為之感化，也可以說是政治化。對中國國內的政治更加關心，甚至於在國外參加國內政治，把中國的政治帶到國外去。後來因為辛亥革命成功了，所謂革命的政治鬥爭也在國外發展。因此華僑不但被教化，不但被國民化或愛國化，還同時也有些華僑，尤其是年輕有思想的，直接參加政黨。連當時的華僑教育裏也常談到黨化教育，這是從中國帶來的名詞。尤其有進步思想的那些青年人，可以說是被革命化，甚至於把國內的政治內戰也移到華僑社會裏面，引起當地政府和土著的反感。

這幾年來看到的史料使我感覺到這個同化問題以及如何叫所有華僑子弟都歸化中國的問題，似乎有貫穿一切的可能。因為自己研究得不夠，不敢太肯定，現在只想用幾個材料豐富的大題目來給大家考慮是否能說同化、歸化，這兩個概念真能夠貫穿一切。華僑史專家都知道這個歷史時期資料是十分豐富的，海外華人史料從來沒有過這麼豐富的時候。固然，非常可惜的是這些豐富的資料分散在各個國家，遺失的、被燒毀的不知有多少，就是幸存的資料也很少被各地政府保存，更沒有人去整理。散在民間的仍然不少，但收集、保管的機關實在太少。因此，雖然史料豐富，用的人和機會還較少，所以我們對這一時期的瞭解仍然不充足，仍然是片斷的。

照我所知道的，擁有充分史料，而且值得大規模研究的至少有八個大題目。讓我來簡短地介紹這八個大題目及這八個題目同我剛才談到的同化、歸化這兩個概念的主要關係。

一 華人移民和人口問題

人口統計數目是不容易確定的，需要有人口學專家去研究。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最重要的變化是華僑婦女大量出國、移民。在這一時期，多數華僑已經在國外成家，生下了不少子女，而且已經影響到華僑子弟在當地生根，初步建立一種新型的華僑社會。一方面因為子弟多，被同化的問題更嚴重。教育這些子弟變成個迫不及待的責任。另一方面，相反的，因為人數增加，華僑家庭比以前完整，留在當地成家的機會也增多，被同化的可能性應該減少，歸化的步驟、依靠家庭的結構也比以前容易得多。

二 工業發展的規模和方向

最值得注意的是華裔的新的活動範圍。華裔出國做生意，最少有千餘年的歷史。他們歷來的生意集中在買賣、貿易出入口生意。也有些技術人材、工匠，做些手工業的生意。但是因為向來受到各國和各政府法律規定上的限制，又缺乏資本財源，不能有什麼積累，也沒有適當的保障，所以很難在工業方面有所發展。到二十世紀前半期，只初步打進世界大型工業，開始有現代化的工廠。而因為華工移民出國多了，華工人數增加，本地出生的華僑子弟也被任用，這工業發展的條件也進步了，並且多少有了成績，又能利用在海外的經驗回到中國去投資，也開工廠，對國內工業有相當的貢獻。這個發展跟同化、歸化問題也有關係。學習應用外國工業的方法和技術，是否是現代化，而不是被外人同化呢？外國的工商條例、工廠組織不

依靠家庭，跟華僑的家庭制生意不同。如果用外人的方法，將來會不會消滅華僑的家庭貿易和工業傳統呢？當時很有爭論。有人寫文章說，華僑工商界競爭不過西方的資本家，因為他們的家庭觀念太深，任何發展都被親戚感情限制住，所以總不能建立真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也有人反駁地說，脫離了家庭親友、同鄉本土觀念，華僑就沒有可靠的組織，他們的事業也建立不起來。那麼，現代化並不是同化，而是經濟競爭上的基本條件。如果怕同化，一切都要歸化中國，那麼華僑在國外競爭能力有限，也會影響到他們的事業及生存。所以華僑工商業要發展，也牽涉到同化外國好呢還是歸化中國好呢這類的問題。當然問題不是那麼簡單，這個疑問還需要仔細地研究。其實，到現在的中國，仍是值得研究的。

三 有關華僑匯款回國、回鄉的問題

這類材料很多，但是可靠的程度是有限的，需要小心地整理。這個題目的範圍在兩次大戰期間擴大了不少，最重要的變化在匯款的對象。以前僅限於匯錢回家養親、蓋房子、買田、買地而已；這期間除匯款投資地方工業以外，還捐款辦學校和資助各種公共慈善事業，另外還資助黨派政治活動，國家的發展計劃，以及捐錢給各種救國運動。這種擴張範圍當然和歸化中國有直接關係。華僑歸化中國，則匯款更多；就是歸化中國文化，更愛護家鄉宗祠、陵園，也匯款更多。但是被外國同化呢，華僑子弟就會失去鄉土感情，更談不上愛國，也談不上匯款回國去。

四 各國和各殖民地政府的對華政策

外地對華政策最少有三種。一種是屬於本地土著人自管國，像泰國和日本之類。他們都採取同化政策。經過通婚、歸化入籍之後漸漸融合，全部接受泰國文化和日本文化。其主要因素在泰國比較明顯，在日本好像是要經過好長的時間才能同化。泰國所用的方法是用平等待遇或優待的通婚方法來同化華僑、僑裔。另一種政策屬於西方移民所建立的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他們的種族主義很深，當時對華僑偏見特別厲害。但是不屬於亞洲，所以我現在不談。第三種政策就是屬於殖民地政府。在亞洲，只有英國、日本、荷蘭、美國、法國和蘇俄。他們在對華僑的政策上特別注意貿易，如英國、荷蘭和美國，尤其在新馬各州、緬甸、東印度和菲律賓。但是有些地方就比較關心勞工問題，如法屬印度支那、日本、蘇俄。日本在台灣，蘇俄則在西伯利亞。但是殖民地政府主要關心的是居民守法、努力，不講究同化，也不講究歸化，只要華僑對當地經濟有適當的貢獻，要同化也有用，不被同化也不妨礙殖民地政權。當然那些被殖民的土著的觀點就不同。土著被人征服了，又受外來主人的控制，心裏已經不滿，加上看到多數華僑努力成功，更加眼紅。又有些華僑看不起土著的文化，受的是華僑教育，宣傳愛中國為祖國，參加中國的政治，又似乎佔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匯款回國，而不留用在當地，發展當地的經濟，這就引起爭論，令當地人反感。固然，有些地方，像菲律賓、印度支那和緬甸，有華裔被當地人所同化，和土著同胞有共同的觀點，又肯幫助支持土著的反殖

民政府鬥爭，但這些還是少數。所以一般土著政治領袖們希望和鼓勵殖民地政府採取更苛刻的排華政策。最特殊的當然要算日本佔領的台灣。日本不把台灣大多數的華人當作華僑，而把他們叫作籍民，有點像荷蘭在東印度，所謂帝國的居民的意思，迫華人看成等於入籍，已經歸化日本帝國。這個大題目就根本離不開同化、歸化的問題；怎麼樣把華人社會當地化，用華人的資本、勞力和天才來幫助殖民地經濟發達。

五 外交上的華僑政策

外交史資料是很豐富的。中國為了華僑和外國交涉是常有的事。但是還有更複雜的，而與歸化問題有密切關係的，就是華僑愛國，參加中國國內政治，而且把國內政治帶到外國去所發生的。中國的各政黨在海外華人社會裏明爭暗鬥，使得中國政府不得不和外國政府常有爭論，主要的問題是歸化和國籍的國際法定義。如果華僑被迫入籍，中國外交部反抗，設法保護華僑的權利，這是一方面。但是如果華僑自願入外國籍，歸化當地政府，那又應該怎麼辦？換了國籍的華裔，應該不應該參與中國政治？泰國在這個問題上給中國政府很多難處。但遠在各地的殖民地也常有和中國外交部爭執不下的問題。已開始有學者在整理這些大量的外交史料，但是還沒有能把中國資料和外國各種資料同時有系統地整理出來。所以到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部分仍舊是片面的。

六 對日本的外交

這第六個大題目可以說是第五個大題目的積極的部分。這不是純粹的外交問題，實際上是屬於中國政治史，就是抗日救亡運動，可說是中國人愛國運動的最高峰。這種愛國高潮當然和同化、歸化問題有深切的關係，不需要我一一贅述。值得注意的是華僑的熱烈的反應。這裏還需要詳細研究各地、各處殖民地和一些不同的華僑地方集團，像福建閩南幫，廣東省各個幫派，有什麼不同的反應。比如，菲律賓、新馬和爪哇的閩南幫反應比別的地方的華僑似乎更激烈，是否與他們閩南人對台灣同胞更親切有多少關係？他們可能更關心台灣同胞，更明瞭日本帝國主義的真相，所以更替中國政府，國內同胞痛心，更知道團結救國的重要性。眼看台灣同胞歸化日本帝國，將要被日本同化而消滅之，當然苦痛。再看日本在他方進軍，還有野心南進，南下東南亞，那時菲律賓就是前線，新馬、爪哇的殖民地政府遠靠歐洲軍隊援助，到底能否抵抗日本帝國的大軍？歸化、被同化，如果不統一抗日的話，豈不更危險？

七 華僑教育

中國學者對這題目知道得最多，尤其是兩次大戰期間華僑教育擴張的速度真是驚人。很明顯，這擴張是直接對付被外國人同化的嚴重問題。研究這個題目的人比較多。教育界、新聞記者都特別關心這個重要問題，所以他們的著作不少，我們已初步瞭解這個問題的歷史地位。關於華校的建立和組織、教科

書的編輯、教學的成績和影響以及校內外的政治活動，都有人寫過。這些華校如何將許多華僑子弟盡心地歸化中國？這些子弟以前容易被同化的，現在已經脫了險。可是這些不過是部分的華僑子弟。其餘的土生華僑，到殖民地學校讀書的（這些是外語學校），或入當地土語學校，或者未受教育的，就不一定避免了會被同化。或者有些是自願，自己願意接受當地的同化政策，他們的態度應該如何解釋？他們在當時的南洋華僑社會裏有什麼地位？是否應該劃清界線，不把他們當作華僑？或許可以說這不過是個時間問題。如果中國富強的話，如果華校多辦一些，或者設備好一些，華校學生出路更好，更進步，那麼這些土生華僑，到最後還是會歸化中國吧，會完全拒絕被外人同化吧。這方面的研究，我覺得還不夠。我們需要把華僑教育和其他各種華僑子弟所接受的教育結合起來研究，才會對同化、歸化問題有深一層的瞭解。

八 華僑社會的形成

這個題目牽涉的範圍很廣，但是無疑的都與文化有關，那當然和同化、歸化問題有直接關係。華僑社會形成以後，被同化的危險就減少了。華僑的會館組織（包括商會、宗親會、行會、私會黨等等），卻能保護中華傳統文化。他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以及文娛活動，他們的宗教，和各種媒介物（即報紙、雜誌之類），都能使華僑子弟保持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這種認識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華僑子弟歸化中國。這個題目研究的人還不多，收集的資料還有些片面，參差不齊，需要比較有系統

備，買辦階級，剝削工人等等，變成兩代的衝突。由此，這個多方面的、多樣的反同化和叫華僑能再歸化中國的這些方法，未必能統一華僑社會。有時候適得其反，竟使得華僑社會更顯得互相矛盾，不合作。這還是我的一個印象，是否真正如此，真正分裂到什麼程度，到底團結的成分多，還是矛盾的成分多，還待詳細研究。

(3) 華僑社會內的婦女功勞特別值得注意。對反同化、歸化中國的工作，中國婦女很有貢獻。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的直接影響特別明顯。那些救亡、抗敵運動也常靠婦女盡心服務。教育當地婦女，尤其是土生婦女，對下一代土生華僑的歸化感那一類工作就不必說了。

(4) 從同化程度和歸化中國的成果，我們可以把東南亞跟當時的北美、澳洲比較，也可以跟日本的台灣政策比較，很有意思。相同的地方固然有，不同的發展更顯得清楚。例如：在北美、澳大利亞、紐西蘭各國，限制婦女移民，當地的華校很難維持。一方面是因為婦女不能去，沒有生孩子，一方面又規定那些極少數的土生子弟一定要入本地學校。工商業不平等的待遇限制華人在當地競爭。在排華方法之不同，在北美、澳、紐這些國家，只有被同化才可以避免被排擠。但是同時也不歡迎華人同化，露出他的種族歧視的態度。

最後，華僑對同化的反感，一般來說是很深的，但是也有不同的程度。至於歸化中國也似乎各有不同的程度。這與兩個詞彙的定義當然有關係，在當時華僑眼裏，到底同化的意思是絕對的呢，還是相對的？歸化中國這個詞句也是如此嗎？當時

的整理，使我們真正地瞭解華僑社會到底形成到什麼地步，形成的過程是怎麼回事。後來抗戰時期受到大考驗，戰後又被當地國家主義衝擊。但是部分的華僑社會還維持幾十年，這種成就如何解釋？

上面所提的大題目，我覺得都跟同化、歸化的概念有關係。如果從這兩個概念出發，可以對當時期的華僑史有什麼新的見解？我有些初步的認識，提出來給大家批評。從上面八個題目來進一步解釋華僑史和同化、歸化的關係，有下面幾點：

(1) 因為反抗同化的危險(或危機)，華僑社會裏面把做中國人的資格提高了。早期在海外華人能信一點中國式的宗教：佛教、儒教、道教在內，保留一些鄉下的風俗習慣，拜拜祖宗，仍用原來的姓氏，自己以為是中國人，就是稱為中國人，就夠被公認為華人、漢人、唐人等。

新的華僑社會要求就比較高，除了保留文化儀式以外，最少要說方言，懂得中文，參加華僑組織，送子弟上華校，甚至於還要多方面表現愛國思想。參加國民黨或別種愛國運動，才能稱是真正的華僑，真的中國人。

(2) 因為做中國人的水平提高了，有些華僑家庭反而感覺難以應付。愛國觀念本來是用來團結所有的僑生和新客，結合起來變為華僑。但是愛國宣傳也帶來了許多中國國內的政治鬥爭，因此並不一定能叫華僑社會真正的統一。有時候好像迫使僑生和新客對立起來，有時候好像把新客華僑也分裂成兩三個政治派系。另外對年輕一代又灌輸些進步思想，使他們用來批評老一代的工商資產階級，攻擊他們的貪錢，做帝國主義的傀

的資料裏有各種意見，有爭論，有矛盾，有極端派的，有溫和派的，相當複雜。有些人認為最簡單的是回國，住在外國總會有被同化的危險。有些人則以為，入了外國籍，並不是被同化，只要保留些中華文化的因素，則隨時可以放棄外國籍，回國去，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再歸化中國嗎？有些人說國籍和文化是兩回事，不應該混在一起談，只有極端的國家主義者堅持說入了某個國籍則必定要接受某個文化。到最後有些人以為法律上的定義和文字上的爭論還是假的，最自然的還不是人的感情嗎？愛鄉、認親、想念前輩比任何定義都要重要。這許多許多的問題，到現在還受學者的注意，也不是一個純粹的歷史問題。

兩次大戰期間的華僑史，是避免不了同化、歸化這兩個概念的，我以為如果詳細分析，一定可以增加我們對華僑史的瞭解。

* 本文原載於吳倫霓霞和鄭赤琰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9)，頁11-21。

關於文化中國的四個疑問

前兩年杜維明教授用文化中國 (Cultural China) 來解釋現今和將來國內外各地文化、各地華人華裔如何面對中華傳統文化和中華未來文化許多複雜的問題。提出這麼一個詞彙，受到不少人的關注，我也認為很值得注意，給我個人來說得到相當的啓發。

“文化中國”這個詞彙，可以包含國內的或者海外華人，或者連外國漢學家等等不同的觀點，也可以表示杜維明教授跟許多在海外的同行認識到這些都是想找些共同出發點和中華文化有共同的見解的一種願望。尤其是他們關心中華文化、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也就是說中華文化或許用杜教授的名詞“文化中國”，跟世界文明潮流的關係。這個題目牽涉的範圍太廣，所以就選擇了一些有關的海外華人如何會瞭解“文化中國”這個意念，提出幾個問題。

從海外華人的立場來看，他們會問：為什麼是文化中國而不是中國的文化呢？居住中國領土的人有文化，就是中國文化，這似乎不是個問題。當然歷代文獻裏面有些階級的區別，士大夫的禮教概念，是一種上層的文化，其他的所謂風俗習

慣，這是屬於平民文化。用現代的詞彙，就是所謂大傳統和小傳統的不同的文化的素質要素。但是不管大還是小，都可以稱為中國文化，也都是我們中國人，我們中國的歷史遺產。既然如此，一般的海外華人就會問：為什麼不用中國文化而要叫文化中國呢？是不是因為海外華人（如果要包括海外華人的話），對中國帶有領土或國籍的含義的名字，有所期待？如果有的話，文化中國本身也是保留有“中國”這兩個字，所以也並不是可以那樣解釋的。也可能是一個外語跟中文翻譯上的問題，China 這個詞，不一定要譯成中國的，也可以譯為“中華”或“華夏”，都可以。但是或許翻譯成中文，譯成“文化中華”或“文化華夏”，又很不順口。如果說只要避免中國領土和國籍的含義，為什麼不叫“中華文化”或“華夏文化”，而要叫“文化中國”呢？“中華文化”、“華夏文化”這些詞語都是很容易懂的，大家也講慣的，為什麼不用呢？我不十分清楚，不過我或許知道或許感覺到“中華文化”、“華夏文化”這些詞彙，或許太普通了點吧，不夠醒目，不夠新鮮。另外還有一種翻譯上的問題，不管是“中華文化”、“華夏文化”、“中國文化”，都可以翻成“Chinese Culture”，用外來語來講是分不開的。其實外語也好像沒有一個適當的辨別的方法。但是外語裏的這個 Chinese，無論是當名詞用還是形容詞用，無論怎麼樣的小心的翻譯，仍是很難避免“中國人”、“中國語文”、“中國的”這類的含義。其實我們一般的海外華人，尤其一些土生的或者入了外國籍的華人都知道這是個問題，常常都遇到許多這種多種解釋的用法。既然無法避免，那麼就乾脆地把“文化中國”當成一個新詞語或者是外來語吧，給它新的定

義。杜教授是有他的定義的，他很重視他的所謂 Symbolic (象徵世界)，這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這樣一個抽象的“文化中國”概念跟比較具體的中國文化可能是不一樣的。可以說“文化中國”這個詞彙的重點，似乎在中華文化的普遍性和通性，換句話說，可以遠離中國的領土而存在，而有影響。這個概念我認為是很有意義的，雖然有許多定義上的困難，但還是很有意義的。

如果來自中國的文化能在地生根，能引起世界各地的人接受和尊敬，給世界文明有相當的貢獻，那是中國和中國人的光榮。那麼不管是內地的還是海外的華人，都應當盡力推動。但是海外華人出國的時候身邊帶的一些中國文化的要素，是比較具體的。有許多的傳統的風俗習慣、飲食、戲劇、禮節、宗教概念、宗教迷信，他仍要保護和支持這些，他們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尤其是一般海外華人很注意的，家庭的溫暖、社團的組織，這些，海外華人都能把主要的傳統文化流傳到好幾代。但是這些具體的文化要素，是不是“文化中國”裏的重要成分呢？就很難說了，我也不知道杜維明教授會不會重視這些比較普通的一般的平民化的風俗習慣。

又值得注意的，是海外華人也分好幾類，這些顯著的是三種：移民到不同的儒教、佛教社會中去的，好像韓國、日本、越南的，這是一種；還有一種是到南洋各地港口去做生意的、經商的，尤其是南中國海沿岸的國家；第三種是北美、西歐、澳大利亞、紐西蘭在內，到這些地方去的。他們到不同的區域，接觸不同的當地文化和政體，又會各有不同的反映。譬如到日本、韓國去的，那些地方的人對儒教、佛教文化還很尊

敬，比較瞭解華人移民社會的文化和特質，當然瞭解並不是說他們對當地的華人有什麼優待。至於到南洋去的華人或華裔，都受到不同的待遇。當地文化不一定輕視中華文化，但也不一定羨慕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倒過來，許多到南洋去的華人也並不欣賞當地有什麼文化，甚至於看不起土著的生活習慣，也有很多人決定不給他們所同化也不要他們的子女給他們所同化。至於到歐美、西方文化圈的這些華人，這又可分為工商和學界（學生學者）。工商界一般是受歧視的，他們就盡量地組織起來，來維護他們所帶去的一些文化。學界之間就反應不同，有部分非常羨慕西方的科技文化，誠懇地學習，有部分還回國進行中國本身的思想革新，和技術上的進步。有些就在某種情況之下，對中國傳統文化失去了信心，願意接受西方的哲學、科學、他們的上層領域的文化，否定傳統的中國文化在現代的世界還有什麼實用的價值。所以有各種不同的反應。

從這個背景去看，海外華人會怎樣去瞭解“文化中國”這個概念呢？這還需要我們做比較深入的研究，現在只能初步地預測這三種海外華人的反應為何？我自己認為在像日本、韓國的這些地方，當地的華人對“文化中國”的概念，可能沒有什麼反應。在南洋的華裔可能部分會很受感動，但是也有部分就不會理會。或許還有些畏懼，很怕引起當地的人反感。到西方去的又不同，可能給到西方去的海外知識分子很大的鼓舞，使他們更愛護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的精英文化。但是也可能對一般人的生活習慣沒有多大的影響，最多嘛，引起他們情感上的驕傲的感覺吧。雖然如此，我還認為“文化中國”這個概念，對於海外華人來講，還有相當的號召力。這我認為是

杜維明教授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使得一般的海外華人有反應。

雖然如此，但是我們也不能夠否認，這個概念的提示之後，還使大家有許多疑問。對我來講，有四個疑問。

第一個疑問：“文化中國”的概念裏頭，語文的因素重要不重要。外語 Culture 這個字，原來的意思是培養、栽培、養育，與語文沒有關係。中文中把它翻譯成文化，就帶有一點不同的含義。“文化”裏這個“文”字，是代表我們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質的，與中國文字是分不開的。照理講，傳統文化是應該由語文傳達的，讀過書的人強調這一點。但連不識字的人也認為：讀書識字也算是真有文化，這也是一個定義的問題。西方人類學不重視“文”字，沒有文字的人也有他們的文化，這是我們也可以接受的。那麼如果“文化中國”是一個比較抽象的“象徵世界”，那麼認識不認識中文字有沒有關係？要欣賞的是中國文明的精神。這也可以是從翻譯成外文的四書五經也好、唐詩宋詞也好、明清小說或各種各樣的藝術品，漆器、石器、服裝、絲綢裏面研究，有深入的瞭解，或許也可以明白和欣賞中國文明的精神在哪裏，換句話說，海外華人讀外文翻譯的古典經、史、文學、哲學等等，看一些外國收藏的書畫、美術工藝，也常到中國大陸去旅行，就算屬於“文化中國”的一分子嗎？我猜想老一代的海外華人是容易接受這一觀點的。不識中國字的人怎麼能懂得中國文化？怎麼可以歸入“文化中國”的圈子裏頭？

最近這幾十年，移民到海外的中國人，他們最關心的就是孩子們的中文教育問題。他們認為脫離中國文字就很容易失去

中國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孩子們僅學好外文，而中文不會寫不會看，是件很傷心、很遺憾的事。但是最主要的是一般海外華人都認為，如果真的如此的話，他們對中國文化也不會有真正的瞭解。

當然還有一點，生長在海外的華裔的觀點就可能不同一點。當然也有例外，不過是普遍的來講，他們多半受的外國教育、不懂中文、少數會講些方言和普通話，雖然如此，即使不認識中文也好，他們還是認為自己是華人或華裔，還保留一些華人的風俗習慣，也多少知道一些中華的禮節，部分也欣賞一些譯本的古典文學、劇本、語錄、音樂之類的，很欣賞中國的美術藝術之類的。那麼這些華裔，東南亞區最多，但可以說世界各地，各個城市裏面都有。

那麼“文化中國”這個詞語，包括不包括這批人呢？抽象的象徵性的“文化中國”，似乎包括不了他們。但是如果“文化中國”的概念並不需要他的成員懂得多少大傳統的價值觀，那麼廣義的“文化中國”能否包括所有自認為華裔的人，不管他認識不認識中國字，也不管他是不是中國血統的後裔，只要他接受中國文化，就可以包括在內。是不是如此呢？如果能夠包括他們，那麼我就對這個“文化中國”的定義感覺到不太滿意。這是第一個疑問。

第二個疑問：“文化中國”是古代就有嗎？還是近代或者說現代才會發生的現象？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固然沒有穩定的國界，中國的國界也不知改變了多少次，也沒有一個現代所謂國籍的概念。只有忠於皇帝、愛鄉愛家、孝敬父母，又祭祀祖墳等等這些概念。也可以說一方面是服從朝廷政權，一方面是尊

重中國文化。無論在任何時代，中國文化似乎是脫離不了鄉土和領土概念的。愛護這文化的中國人，也會接受當時的政權，又會認同所有的中國人的。古代的中國文化是不可以跟土地廣大、人口稠密的中國人分開的。那麼近代或是今後的“文化中國”的概念，能不能夠脫離政權和中國的領土？我不相信這是一個長遠的現象，就是從象徵世界這個定義當出發點，或從象徵世界這個角度來看，我相信也不過是某些地方或是某些階層的知識分子的對一時的形勢的反應。要具體一點，海外華人跟中國和中國人會同樣地承認：中國文化來自歷史悠久的中國，那麼“文化中國”這個概念，也非有中國存在、健全不可，這是我第二個疑問。

第三個疑問：談到近代、現代的中國文化，其性質何在？比較象徵性的文化中國怎麼樣的區別？區別在哪？現在大陸的中國文化，有古代傳下來的文化，有各種地方性的文化，也有各種外來的文化要素，包括佛教、回教、耶穌教等等。也有世俗的科學知識、西方的科學思想、文藝作品的欣賞，也被一般中國人接受了不少，就在台灣，現有的文化也如此，港澳的中國和華人文化也如此。也只有比例上的差別再加上政治思想和社會制度的不同。海外華人還保持多多少少的中國文化，古代的也有，地方的也有，外地科技和宗教習俗等，差不多什麼都有。當然各個要素的比率，大陸的跟台灣的跟港澳同胞的各不相同，也更加複雜。既然如此，那些屬於中國文化的海外華人，他們在他們生活中湊起的文化要素，哪一些是屬於中國文化？哪一些就屬於“文化中國”呢？我實在不清楚，是否因為海外華人對現今的中國文化不滿，或者害怕中國文化的精英已

經失去效用，而希望他們能夠找到挽回或搶救的方法或精神，這是個問題。是否現今中國文化之不足，因此而更從國外將它彌補，這也是個問題。是否現代中國需要被再文化？這些都是海外華人恐怕會提出的問題。就是需要的話，說中國的現代化就是一種再文化，我認爲還是要中國人去創造出來。海外華人是無能爲力的。這是我第三個疑問。

第四個疑問：中國的大傳統文化燦爛的成分很多，是在中國富強時期產生的。連小傳統文化的伸展和持久性，也跟中國的擴張和統一是分不開的。那麼，象徵性的“文化中國”又怎麼樣呢？現在的中國人跟一般海外華人同樣地反對封建帝國的朝廷、官僚和他們的文化，但是並不一定反對他們所建立的文化，也並不一定反對他們強權政治所奪來的統一而富強的國家精神。也不否認未來的中國想富又想強，是完全可以瞭解的。可能他們大部分的願望，不管在國內也好還是海外也好，就是要中國富強。“文化中國”這個概念能否避免這種願望？我想是不可能的。“文化中國”的號召力是在它能夠給中國人，尤其是海外華人一點新希望，叫他們認清現代文化是古今並存，中外共享的。健全的文化跟國家的興旺、開通、富強密切相關的。若重視文化而不重視經濟、政治，不僅中國會漸爲貧困，文化也會漸漸地削弱遲早被放棄的。這是我提出第四個問題的理由。

我這些疑問並不是要反對文化中國這個概念，而是想指出這概念裏面很可能有一定的時間限制，或者是區域限制。但我仍舊想，只要這個概念能保持它的啓發性，它的號召力，那麼

我相信海外華人也會認爲這個概念是有價值的，值得他們去注意的。

“文化中國”雖靠中國文化本身要健康才能有所作爲，但是在國外的所謂海外華人，也未必沒有貢獻。海外華人的歷史是值得研究的，值得注意的。他們的經驗豐富，有成功的，有失敗的，有掙扎抵抗的，也有苟安求存的，有盡量吸收外國文化的，也有堅持保護中華風俗習慣的。無論如何，不管成敗，他們都表現出一整套的文化精神，我們大家因此必須包涵或肯定海外華人的文化經驗。

* 本文原載陳其南、周英雄主編《文化中國：理念與實踐》（台北：允晨，1994），頁3-10。

— 亞洲價值觀與世俗主義的前景 —

我對“亞洲價值觀”的看法很簡單。這個觀念並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實體。它其實是一個古老二分法的新版本。它的源頭來自於“西方”(Occident)和“東方”(Orient)的觀念。日本人和亞洲人也促成這種二分法。日本人在很早以前便使用“東洋”和“西洋”(當然不包括日本自己)的說法。東洋指的是日本以外的亞洲；西洋則是歐洲和西方世界。這套說法影響了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的想法，助長了西東二分法的流傳。

對我而言，新舊二分法的不同，在於以前的西方人，利用“東方”這個詞來分辨那些同他們不一樣，比他們差的人。在十九世紀時，這確實是西方人對東方人的觀念，如馬克思所認為的那樣：落後，沒有發展，缺乏西歐歷史中那些大變革。這是“西方”和“東方”二分法產生的歷史背景。

亞洲價值觀源自歐洲的世界觀

今天不同之處在於，當人們提出“亞洲價值觀”的時候，他們似乎把原來的那套倒過來。他們似乎在斷言亞洲價值觀(雖然我覺得這種言論並不令人信服，而提倡者也不一定那麼理

直氣壯)，比一個世紀以來傳播的一些西方價值觀更優秀。這就是新舊二分法的不同，新瓶裏面的舊酒，一種亞洲人對本身尊嚴的肯定，以及對以前西方人蔑視亞洲的反彈。但是這兩套觀念，不論是“東方”、“西方”；“歐洲”、“亞洲”，首先都是以前歐洲人的習慣用法。

最近關於亞洲價值觀的講法，有些人會覺得是產生於西方的壓力。西方在冷戰結束後的洋洋自得，尤其是一些西方政論者，認定全世界從此都得排隊按西方的那一套辦事，西方的勝利將決定全世界今後的發展，造成一些人痛苦的反應，並反擊這些趾高氣揚的論調。

我覺得應該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亞洲價值觀，不是因為它確有其事，而是因為它代表一種情緒上和心理上的反應。尤其令人玩味的是沒有多少亞洲國家提倡亞洲價值觀。因為大部分的亞洲國家只提倡它們本國的價值觀。日本、中國、印尼、泰國都有本身的一套價值符號。只有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大談“亞洲價值觀”。因為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不能利用它們國內任何一個族群的價值觀而取信於全國。因此使用“亞洲”是最合適的。從這個角度理解，我們便會明白這種特定的使用法，在文化異同的大問題上並沒有普遍意義。它只不過是我先前提到的，一個舊二分法的重新包裝。

亞洲價值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國人和日本人使用的“東洋”和“西洋”二分法。我想這也可以聯繫到一個也許對我們更有意義的問題：那就是日本人對於“國體”的觀念。我指的不是二十世紀具侵略性的國體觀，而是十九世紀的那種。當時的日本人覺得中國的觀念和制度對日本已經沒有價值。他們可

以利用西方的觀念和制度加以取代，讓日本變得更進步，更有能力來應付外部變動的世界。因此，西方的觀念和制度被利用來鞏固日本的國體。我覺得這無疑對中國的“體”和“用”，固有的傳統與西方科學技術的二分法起影響。這是當時中日兩國對於如何回應西方挑戰的一個共識。“中體西用”在十九世紀的中國是一個主流的論爭。在今天的類似討論，無論討論者是否有意識到，還是有啓示作用。我將在稍後再加以討論。

文明的衝突其實是大國的衝突

現在讓我來談談價值觀有意義的部分。我認爲今天世界上有三套主要的價值體系。

我相信各位都有聽過亨廷頓關於“文明的衝突”的說法。這套說法所使用的詞語，讓人以爲它真的在指文明之間的戰爭。我個人不相信亨廷頓是在談文明。作爲一個政治學者，一位國際關係和策略的專家，他主要在思考大國之間的重新組合。大國之間的關係將變得不同，因爲那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鬥爭，不是意識形態之戰或者冷戰。一種新的大國秩序必須出現。他預期這種新秩序將受到他所理解的價值系統影響。他把它稱爲“文明”。但是這個衝突其實非關文明。這是大國之間，有意無意間，利用它們所代表，或自稱代表的文明或價值系統，在世界中爭霸所造成的衝突。我相信這是他的理解，也是他的擔憂。他擔憂西方在冷戰後的主導優勢正受到挑戰。他斷然拒絕西方贏得全面勝利，或歷史因此終結的看法。對於未來，他比較悲觀。在某種程度來講，我相信他

被證明是對的。說資本主義已經勝利，全世界將可以平穩地發展，仍然言之過早。

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多談。我只想說，在借用這套來自各個宗教和價值系統的舊二分法，亨廷頓真正關心的是舊式世俗的動力和權利。在他來說，是如何保護西方(在他眼中)所代表的科學及人文精神。在他過於簡單化的認爲需要保衛西方的價值，我以爲他錯誤地相信，對人文和科學精神的主要威脅，來自回教和儒教國家的勾結。我認爲在這點上他是錯誤的。

當今世界三大思想體系

讓我來談談我怎麼看今天世界價值體系的分類。我認爲它們今天應該分爲三大類。第一，從一神教產生出來的價值系統，尤其是它的兩大分支。基督教，我們知道它顯然有許多宗派。但是最重要的是兩百年來，那些促成世界朝世俗主義發展的部分。它承認政教分離的原則，主張世俗的發展，至少在主流的部分，更甚於精神的發展。與之對立的是另一個宗教——回教。雖然我們知道它本身也有許多宗派，但是它們都同意一件事：它們不把政治和宗教分開，而且它們並不低估政治與宗教在世間結合的力量。它們不接受世俗價值的主導地位。然而，這兩種一神教都代表一種世俗的動力，一種相同的，要把唯一的真神和真理帶給世間的衝動。換句話說，這兩個宗教之間已經持續對立超過了一千年。我相信這種對立不會很快消失。

第二類我無以名之，只好稱它作“南亞洲的宗教”。它們的價值根基於一種尋求內在純淨的概念，有時這種追求要通過多神，如興都教的多種姓。但是它們不排斥世俗主義，而能與

之並存。其中從南亞產生的一個宗派——佛教，和興都教不同。它有一種傳教的傳統，但是又注重尋求內在的平靜和純淨，可是卻不是消極的平靜和純淨。興都教和佛教都不排斥世俗主義。它們對世俗主義採取中立的態度。

第三類我稱之為世俗的信仰。這在古代世界的希臘和羅馬文明顯赫一時。在以往的東亞，它以儒家以及與之相關的面貌出現。新時期的世俗主義更充滿活力且更為強大。這個時期的世俗主義以西歐，以及由之派生的美洲和澳大利西亞 (Australasia) 為主導。我想討論的世俗信仰有兩種。雖然它們源頭不同，卻同時堅持世俗價值，並堅信其價值有其普遍意義。西方的世俗主義通過科學和法律的精神來表現；儒家則強調社會道德。當然，這是非常簡單化的講法。兩者都從自身的傳統中獲取力量。我們都知道希臘及羅馬精神已經被基督教價值所改造。同時，它們也改造了基督教價值，讓它在十八世紀以來便讓世俗主義和人文主義取得主導地位。但是，就我們所知，希臘及羅馬精神卻在改造回教時失敗了，甚至在未來也將非常難成功。因此我們看到，世俗信仰向兩種一神教，提供一條通往世俗主義之路，但是只有對其中一支宗教取得成功。就在它成功的地方，它自身也被基督教傳統所馴服、改造和豐富。它也為希臘及羅馬文明帶來曙光，兩者在很長的時間裏已經幾乎銷聲匿跡。

政教分離的重要原則

但是我們也知道，就在基督教世界遺忘了這些希臘及羅馬的理想的一段很長的時間裏，回教世界其實也接觸到這些文

明。但是回教世界最終拒絕接受它。因為它們不接受希臘及羅馬的理想所含有的預設立場、言外之意和產生的後果。但是基督教世界後來居上，通過文藝復興，接受並轉化這些理想，最後變為己有。最終，基督教退位給世俗動力，為西方帶來科學及技術。我相信政教分離讓科學和技術在十八世紀得以產生進步和革命。

我形容儒家社會為一個道德的世俗主義。“世俗”的觀念在中國傳統裏是一個古老的觀念。我們可以說源自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譯者注：《論語·先進篇》）的講法。當然，這也是簡單化的說法。但是一般中國人覺得，孔子關心今世的思想，本身並不足以滿足大部分人的精神需要。因此他們轉而向佛教求取慰藉，求取一種儒家精英思想所主導的，煩躁而苛求的今世所不能允許的平靜。我認為，儒家和佛教的結合，是佛教的許多思想，在佛教傳入中國後被改造的絕佳例子。兩種理想的結合為以後的中國人提供了絕大的力量。當然，儒學也因為其他民間宗教，我們勉強稱之為道教，而有所豐富。但是道教這個名詞並不足以形容中國人所信仰的各種民間宗教。無論如何，民間宗教在結合了儒家和佛教後，對中國社會的演進貢獻良多。與一神教的排他性相比，你可以說正是這種包容性，使儒家社會具有本身的特色。所以儒家是一個結合許多不同力量所形成的東亞文明。日本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這個文明的部分元素，這個儒家、佛教、民間宗教的結合體，並加入日本固有的傳統。

一個值得注意的情形，與歐洲不同的地方是，東亞並沒有政教分離。這是一個不需要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因為它沒有教廷，也沒有西方意義中的國家 (state)。我們是很鬆散地使用



state 這個名詞來形容日本國和中國。嚴格來講，這兩個帝國的政體裏面並沒有像西方觀念的國家，可以讓人們輕易分辨何者歸國家，何者歸教廷。亞洲政體根本沒有這種區分，因此也沒有討論的必要。雖然如此，它沒有政教分離，卻也沒有政教一體，如回教那樣。而回教的政教一體正是它的力量來源之一。在我來看，以東亞的情形，雖然它沒有也不需要政教分離，它也沒有政教一體。世俗主義的價值系統，在那裏是那麼的根深蒂固，那麼廣為大眾所接受，根本沒有必要把宗教與當權者區分開來。

中日兩國自我認知的不同

就我所理解，或許唯一的一個小區別是，關於中國和日本對自身“國體”的認知。我對於如何把這種區別通過形象來認知，有着這麼一個奇想。我是這麼來理解的：在中國人的觀念裏，他們的國體像一個球狀的，立方體的概念。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結實，完全結合的整體。而我所理解的，日本人的國體觀念，是他們在接觸不同文化價值系統時，用一種層疊式的方法來接納它們。在最底層是日本固有的基礎，然後他們把新的外來的文化疊上去。無論是來自中國、印度，以至於後來的西方文化，他們都一層層地疊上去。當然我這裏是簡單化的說法。日本對外來思想的反應是層疊式，必要時甚至是層壓式(laminated)。中國由於是一個自足的球狀體，外來思想無法滲透。要把新的思想體系引入這個，自宋代程朱儒學所架構的，球狀的，完全結合的整體，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打破。這就是為什麼這一百年來中國人經歷了這麼多的痛苦和折磨。因為你

必須把它打破，才可以引進新思想。但是日本人就不必那麼樣。他們只要信手拈來，把新的疊上去，甚至可能的話層壓上去。這就是我的奇想，是我如何解釋中日的不同。對我來說很有用。我現在提出來供各位參考。

最後，我斗膽談談世俗價值的前景。首先，我並不認為世間有所謂的純世俗價值。顯然的，無論是西方或東亞的世俗信仰，它們都深受兩種影響。一種是西方的宗教思想：基督教思想滲透了西方的世俗主義。在中國，佛教和民間宗教緩解了儒家的精英主義，使它的世俗主義更能夠被人接受，為一般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因此兩種世俗主義都不純一。

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對今天世俗主義的影響

但是，在我看來，歐洲的世俗主義還受到另一種強有力的思想的影響，我稱之為兩百年來的民族國家意識形態(nation-state ideologies)。這是很獨特的。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無論是亞洲、非洲或其他地方，產生過民族國家的觀念。在沒有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地方，那裏的世俗主義是可以滲透的、沒有定限的，不是閉關自守的。那是一種定義鬆散，不是那麼深閉固拒的世俗主義。然而，受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影響的世俗主義，卻帶有一種新的宗教熱忱，一種民族國家的愛國主義，對國家的忠誠，反而使世俗主義變得封閉起來，而且利用世俗主義，作為民族國家對外擴張和侵略的工具。我認為這多少改變了世俗主義的本質，而這種西方版本的世俗主義正主導當前的世界。我覺得這是不可接受的，因為我認為這是西方給予世界一個有負面因素的世俗主義。

讓我們回來討論東亞所代表的，較鬆散，結構不那麼嚴謹，較有包容性的世俗主義。我認爲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在很多時候同一神教掛鉤，使它變成一個更爲困難的問題。民族國家也利用神的支持以及宗教傳統，來保護民族國家狹窄的利益。唯有在最近的二十年，西方才開始在反省這個問題。西歐目前所做的努力，包括組成聯盟、跨國界、環球性的經濟和科技同盟，以打破民族國家意識形態，我認爲是朝正確的方向前進。對我而言，這是進步的力量。我樂見其成。無論如何，我指出西方世俗主義問題產生的根源在於民族國家。我認爲西方世俗主義是人類一個主要的進步力量，但是卻被狹窄的民族主義所抵消，並在過去二百年來給世界製造了無數的麻煩。

我想說的第二點是，在世界各地，宗教信仰和基本教義派的復興，以及對世俗主義的抗爭，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種復興是普遍的，不只局限於回教，基督教、佛教以及幾乎所有的宗教都能夠發現這個現象。這是一種反抗民族國家意識形態（一種思想狹窄的意識形態），以及世俗權利環球化，長久以來對世界和平的破壞。我認爲這種復興將會持續不衰，並對那些相信而且希望世俗主義勝利的人，形成一個主要的挑戰。

世俗主義的內戰

我想說的第三點關於爲什麼這個挑戰在當前變得更爲重要。在過去四十年，世界被一場世俗主義者 (secularists) 之間的內戰所支配。這場世俗主義者內戰 (civil war) 的兩方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他們都是世俗主義者，或都自稱代表現代主義和世俗主義，要利用相同的手段改變世界，通過科學和科技，通

過恐怖主義，通過經濟和軍事力量，來達到他們自認爲應得的地位，來支配全世界。但是基本上這只是一場世俗主義者之間的內戰。雙方都有相同的世俗主義的淵源和野心。有人正確地指出，共產主義的威脅其實是源自西方的異端，從同一個母體產生，卻倒過來反對它。那一場內戰在很多地方損害了世俗主義的信譽。它打了四十年到五十年。雖然一方獲勝，一方打敗。但是我認爲雙方都打敗了。因爲它證明了世俗主義的種種弱點，它進行持續破壞和致命戰爭的能力，造成成千上萬的傷亡，把上一個階段的民族主義推向這個終極的內戰。這些都削弱了它的信譽，甚至鼓勵那些在今天反對世俗主義的人，給予他們力量和決心。我也認爲內戰嚴重削弱了世俗主義四十年來主導世界的局面。事實上，這四十年來，幾乎沒有任何更要緊的意識形態或議題。整個世界就被兩個超級強國，以及它們代表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所支配。

我在總結之前有另一個看法，我們將可能看到一個有趣的發展，環球化可能讓我們看到一個環球化的世俗主義，以及它的環球化敵對者的對立。對立的來源可能產生自世俗主義的某些因子，但是它主要還是來自強調宗教和精神的人物。他們由衷地相信，世俗主義對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一個主要的威脅。這是一個在我成年以來，從來沒有預見過的局面。但是它在今天變得越來越可能，值得大家留意。

結論

我會嘗試做一個結論，老實講，我並沒有任何結論。既然我們要討論日本的選擇，我嘗試問自己日本將何去何從？它如

何在東亞與中國相比？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所發生的事情，突然讓我有一個想法。毛澤東時代的其中一個引起我注意的口號是“古為今用”。雖然我知道我的解釋並非口號的原義，我相信它真實地反映了十九世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的逆轉。逆轉的地方在於“古”必須對“今”有用。什麼意思呢？基本上，“今”是西方科學技術，以及它所帶來的物質繁榮的現代世俗主義，而“古”，我們希望它仍然對我們有用。這是一個根本上的逆轉，就好像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傳統中國的東西，唯有我們為它找到今天相應的用途，才算對我們有用。這就是“古為今用”的含義，雖然我相信這不是毛主席和他的同事原來的意思。無論如何，它使我有理由相信，東亞的世界發生了真正的變化。過去的世俗主義，那種道德的世俗主義，無論我們能否接受，已經退位給西方所提供的，由科學，法治精神組成的另一種世俗主義。日本或中國在這裏並沒有任何選擇。事情早成定局。他們當時並沒有機會考慮本身選擇的後果，現代化發展的動力，以及選擇西方科學技術所帶來的成功，使到它最後取代了東亞以及亞洲原有的世俗主義。

我們今天所應當關心的，是我們是否還能夠挽救我們的傳統，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古”，並讓它對我們仍然有價值，使我們不至於在這個缺乏身分認同，“去部落化”(detribalised)的全球化世界裏迷失，以至遺恨終生。

* 本文是王賡武教授2001年10月5日在新加坡“亞洲價值觀與日本的選擇”研討會上所作的專題演講。中譯文原載《聯合早報》，2001年11月11日。葉鵬飛譯。

王賡武教授主要論著目錄

一 專書(著者)

1958

The Nanhai Trade: A Stud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onograph issue of *Journal of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1, pt. 2, 135 pages. 中譯本見王賡武《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1988。

1959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Background to Malaya Book, no. 13. Singapore: Donald Moore for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42 pages. [中譯版：《南洋華人簡史》，張奕善譯，台北：水牛文庫1969年，5+208頁。Republished in *Wen-shih ts'ung-shu*, no. 65. Taipei: The Buffalo Book Co., 1988, 5+208 pages.] (日文版：*Nanyo Kajin shoshi*, Ajia Keizai Kenkyujo, 1972, 54 pages.) (新中譯本見王賡武《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1988)。

1962

Latar Belakang Kebudayaan Penduduk di-Tanah Melayu: Bahagian Kebudayaan China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Peoples of Malaysia: Chinese Culture].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69 pages. (Second edition, 1978. 75 pages.)

1963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57 pages. (Reprinted in 1968). [Also published i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57 pages.]

1977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949: The Impact of Independence,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xi + 190 pages. [Translated into Spanish and published in Mexico City, 1979, 244 pages.]

1981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elected by Anthony Reid. Kuala Lumpur: Heinemann Asia, and Sydney: Allen and Unwin, ix + 292 pages. (New edition, with 11 new essays, published in 1992.) [部分論文的中譯本見王賡武《東南亞與華人》，1987.]

1987

《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Collected Essays of Wang Gungwu*], 姚楠譯，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6 + 267 頁。

1988

《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 [*The Nanhai Trade an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姚楠譯，香港：中華書局，8 + 295 頁。

1990

《歷史的功能》 [*The Use of History*], 姚楠譯，香港：中華書局，3 + 240 頁。

1991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Federal Publications, 1991, 7 + 312 pages. (Reprinted in 1992, 1993, 1994, 1995, 1997, 2000). [中譯本見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1994.]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 354 pages.

1992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viii + 359 pages. (New edition, with 11 new essays, and retaining 11 essays from the edition edited by Anthony Reid,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1981.)

1994

《中國與海外華人》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天津編譯中心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 xi + 366 頁。

1995

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bel Institute Lectures 1995).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89 pages.

1998

The Nanhai Trade: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ew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8.)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34 pages.

1999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Myths, Threats, and Cultur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79 pages.

2000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8 pages.

Joining the Modern Worl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159 pages.

《坦蕩人生 學者情懷：王賡武訪談與言論集》 [*A Collection of Interviews and Lectures of Wang Gungwu*], 劉宏主編，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0, 275 頁。

2001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320 pages.

Sino-Malay Encounter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304 pages.

二 專書(主編)

1964

Malaysia: A Survey. New York: Praeger, London: Pall Mall and Melbourne: F.W. Cheshire. 466 pages.

1968

The Cultural Problems of Malaysia in the Context of Southeast Asia (with Sutan Takdir Alisabana and Xavier.S. Thaninayagam). 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Society of Orientalists, vi + 252 pages.

1973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 (with Donald Leslie and Colin Mackerra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xii + 378 pages.

1975

Self and Biography: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Asia.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ix + 217 pages.

1980

Hong Kong: Dilemmas of Growth (with C.K. Leung and Jennifer W. Cushman).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x + 655 pages.

1981

Society and the Writer: Essays on Literature in Modern Asia (with Milagros Guerrero & David Marr),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v + 322 pages.

1988

Changing Identities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with Jennifer W. Cushm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xi + 344 pages. [Translated into Indonesian as *Perubahan Identitas Orang Cina Di Asia Tenggara* by Achmad Setiawan Abadi. Jakarta: Penerbit PT Pushtaka, 1991, xiii + 480 pages.]

1995

Hong Kong's Transition: A Decade after the Deal (with Wong Siu-lu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v + 163 pages.

1997

Global History and Migra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309 pages.

《香港史新編》 [*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主編), 香港: 三聯書店。兩卷本, 903 頁。(第一卷: 416 頁; 第二卷: 487 頁。)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ising to the New Challenges (with Wong Siu-lu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66 pages.

Dynamic Hong Kong: Business and Culture (with Wong Siu-lu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72 pages.

1998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with Wang Ling-chi). Two volum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Volume One: 290 pages; Volume Two: 300 pages.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with John Wong).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373 pages.

1999

Hong Kong in China: The Challenges of Transition (with John Wong).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324 pages.

Towards a New Millennium: Building on Hong Kong's Strengths (with Wong Siu-lu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12 pages.

China: Two Decades of Reform and Change (with John Wong).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172 pages.

2000

Reform, Legitimacy and Dilemmas: China's Politics and Society (with Zheng Yongnian).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375 pages.

三 演講

1966

The Use of History, an inaugural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December 14, 1966, Kuala Lumpur, 17 pages. [Also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Malaya, vol. 6, 1967/68, pp. 1-12; and in *Syarahan Perdana*, 1959-84, edited by Ungku A. Aziz and Shaharil Talib. Kuala Lumpur: Jabatan Penerbitan Universiti Malaya, pp. 255-271.] (中譯本見王賡武《历史的功能》，1990.)

1968

The Use of History. Preface by J. Norman Parmer.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east Asia series no. 4,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vii + 17 pages.

1970

Scholarship and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Adelaide: Flinders University Asian Studies Monographs no. 1, 35 pages.

1973

The Re-emergence of China. (Lecture to University of Otago Foreign Policy School). NZIIA pamphlets, no. 26. Wellington: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1 pages.

1974

The Rebel-Reformer and Modern Chinese Biography, Annual Lecture to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3 pages. [Also published in *Self and Biography: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Asia*, edited by Wang Gungwu, 1975, pp. 185-206; and in *Proceedings, 1974,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Sydney, 1975, pp. 185-206.]

1978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 1,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me,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 Singapore: Chopmen Enterprises. 16 pages. [Also published in *Mindanao Journal*, Mindanao State University, Marawi City, vol. II, no. 1, 1975, pp. 5-19.]

1980

Power, Rights and Duties in Chinese History. The 40th George Ernest Mor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 1979.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30 pages. [Also published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 1980, pp. 1-26.]

1983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 Past & Present. Faculty of Arts Public Lectur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30 pages.

1985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 Sir Hermann Black Forum on Contemporary Asian Affairs, no. 2. Sydney: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ydney, 12 pages. [Also published in *Hong Kong and Japan*:

Grow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Interactions, 1845–1987. Edited by Yue-him Tam. Hong Kong: The Japan Society. pp. 176–182.]

1988

Trade and Cultural Values: Australia and the Four Dragons, Melbourn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Current Issues no. 1). 16 pages. [Also published in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Review*, Sydney, vol. 11, no. 3, pp. 1–10.] (中譯文載《南京大學學報》，南京，no. 1, 1988, pp. 25–32.)

1990

The Culture of Chinese Merchant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7). 22 pages.

1996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Leiden: IISS. 26 pages.

1997

Nationalism and Confucianism, and 《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 [*The Nationalism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Wu Teh-yao Lectures. Singapore: UniPress, Centre for the Art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64 pages.

The Modern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and Asia. The Menzies O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1st October 1996.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2 pages.

China's Place in the Region: The Search for Allies and Friends. The 1997 Panglaykim Memorial Lecture. Jakart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5 October 1997. 20 pages.

1999

Shifting Paradigms and Asian Perspective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 CAS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 10. Singapore: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2 pages.

四 論文集中的論文

1962

“Feng Tao, 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 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Stanford: Stand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3–145, 346–351. [Also published in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sation*,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New York: Atheneum, 1964, pp. 188–210, 344–350.] (中譯文見《中國歷史人物論集》 [*Col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Historical Personages*], 台北: 中央研究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委員會, 1973, 162–198.)

1964

“The Open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Malacca, 1402–1405”, in *Malayan and Indonesian Studies: Festschrift for Richard Winstedt*, edited by J.S. Bastin and R. Roolvin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87–104. (中譯文見王慶武《東南亞與華人》，1987.)

“Nation Form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South Asia Pacific Crisi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edited by Margaret Grant.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pp. 125–135, 258–272.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 in Malaya”, in *Bunga Ema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Malaysian Literature*, edited by T. Wignesana. London: Anthony Blond and Kuala Lumpur: Rayirath (Raybooks) Publications, pp. 249–256.

1965

“The Uniqueness of Europe”, in *The Glass Curtain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edited by Raghavan Iy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3–243. (Translated into German, in *Der Glaserne Vorhang Zwischen Asien und Europa*. Munich: Verlag Georg D.W. Callwey, 1968, pp. 249–260.)

1968

“Traditional Leadership in a New Nation: The Chines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in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A Symposium*, edited by Gehan Wijeyewarden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pp. 208–222.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 A Background Essa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34–62, 293–299. (中譯文見王賡武《東南亞與華人》，1987.)

“Comment on C. Martin Wilbur’s Paper on Warlordism in Modern China”, in *China in Crisis*, Vol. 1, Book I, edited by Ho Ping-t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64–270.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Historiography”,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David L. Sills. New York: Macmillan, volume six.

1970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402–1424”, in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Jérôme Chen and Nicholas Tarl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75–401. (中譯文見《南開史學》[*Historical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天津, no. 1, 1982, pp. 268–301; 並見王賡武《東南亞與華人》，1987.)

“‘Public’ and ‘Private’ Overseas Trade in Chinese History”, in *Societes et Compagnies de Commerce en Orient et dans L’Ocean Indien*, edited by Michel Mollat. Paris: S.E.V.P.E.N, for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pp. 215–226. (中譯文見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1994.)

1971

“Die Kulturen Sudostasiens von 1200 bis 1800”, in *Saeculum Weltgeschichte*,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et al. Freiburg: Herder, vol. 6, pp. 205–218.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published in *Historia: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edited by A.B. Muhammad, A. Kaur and Abdullah Zakaria, 1984).

“On the South-Eastern Edge of Asia: An Asian View”, in *Everyman in Australia* (Octagon Lectures, 1970), edited by G.C. Bolton. Perth: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 pp. 39–53.

1972

“Political Chinese: An Aspect of Their Contribution to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Southeast Asia in Modern World*, edited by Bernard

Grossma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pp. 115–128. (中譯文見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1994.)

1973

“The Middle Yangtze in T’ang Politic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93–255.

“Nationalism in Asia”, in *Nationalism: the Nature & Evolution of An Idea*, edited by Eugene Kamenk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82–98.

“Some Comments on the Later Standard Histories”, in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Donald D. Leslie, Colin Mackerras & Wang Gungwu,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pp. 53–63.

1974

“Chinese Civilisation & the Diffusion of Culture”, in *Grafton Elliott-Smith: The Man & His Work*, edited by A.P. Elkin.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pp. 197–209. (中譯文見王賡武《歷史的功能》，1990.)

1975

“The Limits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1912–1937”,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D.G.E. Hall*, edited by C.D. Cowan and Oliver W. Wolter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405–421. (中譯文見王賡武《東南亞與華人》，1987.)

1976

“‘Are Indonesian Chinese Unique?’: Some Observations”, in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edited by J.A.C. Mackie. Melbourne: Thomas Nelson, pp. 199–210.

Biographies of Chang Fu, Fei Hsin, Hsia Yuan-chi, Huang Fu, and Ma Huan,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edited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Vols. I and II, pp. 64–67, 440–441. 531–534, 653–656, 1026–1027.

1977

“Mao the Chinese”, in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edited by Dick Wil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Publications), pp. 272–299. 中譯文收入《外國學者評毛澤東》[*Foreign Scholars on Mao Zedong*], 北京: 中國工人出版社, 四卷本, 1997. 第一卷: 《在歷史的天平上》[*On the Scales of History*], pp. 138–165.

1978

“Recent Re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Leverhulme Conference, Hong Kong, December 1977.) vol. I, edited by W.S.K. Wau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3–18. [Also published in *Chung-Kuo Chuan-t'an wen-chi*, Hong Kong University, 1978, pp. 11–38 an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in the second edition, 1979.]

Biographies of Han Tung, Li Ch'ung-chin, Li Yun and P'an Mei, in *Sung Biographies*,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Four volumes, pp. 384–387; pp. 546–549, 597 and 818–821.

“China-Vietnam: Nostalgia for, Rejection of, the Past”, in *The Vietnam-Kampuchea-China Conflicts: Motivations, Background, Significance*, edited by M. Salmon. Canberra: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42–51.

1979

“The Writing of Pre-modern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in *Proceedings: Seventh Conference of Asian Historians*,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ians of Asia, vol. 2, pp. 1405–1429.

1980

“The Study of the Southeast Asian Past”, in *Perceptions of the Past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Anthony J. S. Reid and David Marr. Singapore: Heinemann, for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pp. 1–8.

1981

“Introduction”,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 A Report*, by Wang Gungwu, J.A.C. Mackie, Anthony J.S. Reid, David Marr, I.F.H. Wilson, Peter McCawley, James J. Fox & Gavin Jones.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1–9.

1982

“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 Early Su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urs”, in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urs, 10th–14th Centuries*, edited by Morris Rossabi.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47–65. (中譯文見王慶武《歷史的功能》, 1990.)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External China”;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907–959); Tangut empire (Xi Xia dynasty); Khitan empire (Liao dynasty)”, in *The Cambridge Encyclopaedia of China*, edited by Brian H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1–34; 104–110; 193–196. [New edition, edited by Brian H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4, 84–90, 173–177.]

“Introduction: ASEA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Understanding ASEAN*, edited by Alison Broinowski. London: Macmillan, pp. 1–7.

“The Interests of Revolutionary China: An Overview”,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Southeast Asian and Southwest Pacific Region*, edited by Tom B. Miller.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pp. 78–91. [Also published in *Dong-a Yonkyu* (East Asian Research), Seoul, 1983, pp. 71–87.]

“Interdependence and Moral Order: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1923–1982)*, edited by Chan Ping-leung et a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406–414.

“Human Values, Science and Learning from History”, in *Proceedings: The 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a, Korea*. Seou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p. 79–98.

1983

“The Chinese Urge to Civilize: Reflections on Change”, in *Proceedings: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1982–83*, Canberra, pp. 19–42. [Also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Wiesbaden), 18/1, pp. 1–34.]

“Strong China, Weak China: What Has Changed?” in *When Patterns Change: Turning Poi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ited by Nissan Ore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and Jerusalem: Magnes Press of Hebrew University, pp. 193–207.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llected Essays in Sinology, Dedicated to Professor Kim Jun-yop*. Seoul: Korea University, pp. 657–671.

1984

“Southeast Asia between the 13th and 18th Centuries: Some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Historia: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edited by A.B. Muhammad, A. Kaur and Abdullah Zakaria. Kuala Lumpur: Malaysian Historical Society, pp. 1–12. (中譯文見王賡武《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1988.)

1985

“Loving the Ancient in China”, in *Who Owns the Past?*, edited by Isabel McBryde.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5–195. (中譯文見王賡武《歷史的功能》，1990.)

1986

“Introduction”,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Ninth to Fourteenth Centuries*, edited by D.G. Marr and A.C. Miln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xi–xviii.

1987

“Pre-modern History: Some Trends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Tenth-Thirteenth Centuries)”, i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China, edited by Michael B. Yahuda, London: Macmillan, pp. 1–27. (中譯文見王賡武《歷史的功能》，1990.)

1988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edited by Jennifer W.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1–21. (Indonesian translation by Achmad Setiawan Abadi published by Penerbit PT Pushtaka, Jakarta, 1991, pp. 1–30.) [中譯文見《南洋資料譯叢》，廈門，no. 4, 1986, pp. 92–108; another version in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aipei, 1992, vol. 30, no. 2, pp. 143–174.]

“The Life of William Liu: Australia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in *Stories of Australian Migration*, edited by John Hardy. Sydney: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Press, with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pp. 109–124.

1989

“Sung-Yuan-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Some Comparisons”, in *Proceedings: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December 29–31, 1986)*. Taipei: Academia Sinica, volume 2, pp. 1115–1128.

〈同化、歸化與華僑史〉，in *Overseas Chinese in Asia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edited by N.H. Ng Lun and C.Y. Chang. Hong Kong: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11–13.

1990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Observing Change in Asia - Essays in Honour of J.A.C. Mackie*, edited by R.J. May and W.J. O’Malley. Bathurst, NSW: Crawford House Press, pp. 33–48. [1985年版的早期中譯文原載《東南亞歷史學刊》[*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廣州, no. 2, 1985, pp. 1–10; and 也載於王賡武《歷史的功能》，1990. 1990年版中譯文見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1994.]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edited by James D. T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00–421. (Chinese translation in *Research into China Overseas Communications History*, Quanzhou, 1993, no. 23, pp. 111–125.) [Also in *Merchant Network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edited by Sanjay Subrahmanyam, 1996.]

“The Chinese as Immigrants and Settlers”, in *Management of Success: The Moulding of Modern Singapore*, edited by K.S. Sandhu and Paul Wheatle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552–562.

1991

“Ming Foreign Relations: Southeast Asia”, in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pp. 41–78.

“Little Dragons on the Confucian Periphery”, in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pp. 258–272.

“Education in External China”, in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pp. 273–284.

1993

“Migration and Its Enemies”, in *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 edited by Bruce Mazlish and Ralph Buultje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p. 131–151. [Revised version in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edited by Selo Soemardjan and Kenneth W. Thompson.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ina’s Overseas World During the Reign of Yongle (1402–1424)”, in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ao Tsung-i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5th Anniversary*.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281–292.

“Wealth and Culture: Strategies for a Chinese Entrepreneur”, in *A Special Brew: Essays in Honour of Kristof Glamann*, edited by Thomas Riis. Odense: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pp. 405–422.

1994

“Empires and Anti-empires: Asia in World Politics”, in *The Fall of Great Powers — Peace, Stability, and Legitimacy*, edited by Geir Lundestad (Nobel Symposium 87),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5–258.

“The Australia Asians Might Not See”, and “Australia’s Identity in Asia”, in *Australia in the World: Perceptions and Possibilities*, edited by Don Grant and Graham Seal. Perth: Black Swan Press and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p. 233–238 and pp. 239–243. [Also published in *Australian Quarterly*, vol. 64, no. 4, Summer 1992, pp. 350–358; and *The Sydney Papers*, vol. 4, no. 4, pp. 45–53, 124–127.]

“The University as a Global Institution”, in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Future: Roles in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The First Richard A. Harvill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November, 1992),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p. 38–43.

〈關於文化中國的四個疑問〉 [“Four Questions about Cultural China”], 《文化中國：理念與實踐》 [*Cultural China: The Concept and the Reality*], 陳其南、周英雄編, (台北：允晨) pp. 3–10.

1995

“The Hakka in Migration History”,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kkaology*, edited by Hsieh Chien and C.Y. Cha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for Asia-Pacific Studies, pp. xxv–xl. [並見《客家研究集刊》 [*Journal of Hakka Studies*], no. 2, 1994, pp. 1–39.]

1996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in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edited by Anthony Reid.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pp. 1–14. [Re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2001.]

“Openness and Nationalism: Outsid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Chinese Nationalism*, edited by Jonathan Unger. Armonk, N.Y.: M.E. Sharpe, pp. 113–125.

1997

"Migration History: Some Patterns Revisited", in *Global History and Migrations*, edited by Wang Gungwu.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p. 1-22.

〈香港現代社會〉["Modern Hong Kong Society"], 收入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 Hong Kong: Joint Publications, Two volumes. Vol. 2, pp. 859-867.

"Hong Kong as the Home of China Coast Chinese: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dited by Wang Gungwu and Wong Siu-lu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145-166.

〈華商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Merchant Culture"],《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張炎憲主編,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第六冊,pp. 1-7.

"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ism in Chinese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in *Islam and Confucianism: A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Edited by Osman Bakar and Cheng Gek Nai.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University of Malaya, pp. 191-204.

1998

"Introduction: Migration and New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Upgrading the Migrant: Neither Huaqiao nor Huaren".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edited by Elizabeth Sin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1-12; 15-33.

"Ming Foreign Relations: Southeast Asi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2*,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 Mot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01-332, and 992-995.

"Introduction"; and "Nationalism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Edited by Lynn 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and Landmark Books. [中譯文〈導論〉和〈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載《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出版社,pp. 10-13; 102-105.]

"Commentary on Wolf Lepenies' Paper", in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Westernisation of the World?* by Wolf Lepenies. Singapore: Goethe Institut and Asia-Europe Foundation, pp. 21-31.

"The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and "Preface",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Edited by 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 Two volum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pp. v-vii; 1-12.

〈談香港政治變遷〉["Coping with Political Change in Hong Kong"],載《轉化中的香港:身分與秩序的再尋求》,劉青峰,關小春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pp. 31-42 (Selected essays from《二十一世紀論叢》[*Twentieth-first Century*] 1997).

1999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 In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Edited by Gary Hamilt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 118-134.

"A Single Chinese Diaspora? Som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in *Imagining the Chinese Diaspora: Two Australian Perspectives*. Canber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p. 1-17.

"ASEAN and the Three Powers of the Asia-Pacific", in *Southeast Asia's Changing Landscape: Implications for U.S.-Jap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Gerrit W. Gong.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9. pp. 19-26. 中譯文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no. 29, 2000, pp. 47-51.)

2000

"Memories of War: World War II in Asia", in P. Lim Pui Huen and Diana Wong, eds., *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11-22.

〈華人移民變遷史〉["Changes in Chinese Migration History"],載饒美蛟等編《一世譚譚:黃石華先生〈八一〉榮壽徵文集》,香港匯訊出版公司,pp. 225-246.

五 學刊論文

1957

“The Chiu Wu-Tai Shih and History-Writing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Asia Major*, London, New series, Vol. VI, part 1, pp. 1-22. 中譯文載《食貨月刊》第八卷第五期(1984), 頁237-247.)

1958

“The Chinese in Search of a Base in the Nanyang”, *Nanyang Hsueh-pao*, Singapore, pp. 86-98.

1959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Nanyang Hsueh-pao*, Singapore, pp. 55-68.

1960

“An Early Chinese Visitor to Kelantan”, *Malaya in History*, Kuala Lumpur, vol. 6, no. 1, pp. 31-35.

“Memperkembang Bahasa Kebangsaan: Peranan Perseorangan dan Badan Kesusasteraan”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The Role of Individuals and Literary Bodies), *Bahasa*, Kuala Lumpur, pp. 86-95.

1961

“The Emergence of Southeast Asia”, *Bakti*, Journal of the Political Study Centre, Singapore, no. 3, pp. 9-11.

“A Letter to Kuala Pilah, 1908”, *Malaya in History*, vol. 6, no. 2, Kuala Lumpur, pp. 22-26.

“Mr. Harrison and the ‘Western Bias’ in the Nanhai Trade”, *Asian Perspectives*, Hong Kong.

1962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Commonwealth Journal*, London, vol. 5, no. 2, pp. 85-90.

“Malacca in 1403”, *Malaya in History*, Kuala Lumpur, vol. 7, no. 2, pp. 1-5.

“Malayan Nationalism”, *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London, vol. 49, pts. iii and iv, pp. 317-325.

1963

“The Melayu in Hai-kuo Wen-chien Lu”,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vol. 2, pp. 1-9. (中譯文見王賡武《東南亞與華人》, 1987.)

“The Sino-Turk Alliance in Wu-Tai History”,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Kuala Lumpur, pp. 94-106.

1965

“Chi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Sydney, pp. 39-54. (中譯文見王賡武《歷史的功能》, 1990.)

“The Vietnam Issue”,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Malaya, pp. 1-5.

1966

“Communism in Asia”,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pp. 1-12 (first published in *The Asia Magazine*, November to December, 1966; published in Malay translation, Dewan Masharakat, 1968).

“1874 in Our History”, *Peninjau Sejarah*, Kuala Lumpur, vol. 1, no. 1, pp. 12-16.

“Malaysia’s Social History”, *Peninjau Sejarah*, Kuala Lumpur, vol. 1, no. 2, pp. 1-5.

1968

“The First Three Rulers of Malacca”,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Singapore, vol. 41, no. 1, pp. 11-22. (中譯文見王賡武《東南亞與華人》, 1987.)

“The Compulsion to Look South: Asian Awareness of Australia”, *Meanjin Quarterly*, Melbourne, vol. 28, no. 116, pp. 49–58.

1970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London, no. 43, pp. 1–30. (中譯文見王賡武《東南亞與華人》，1987.)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sia”, *Pacific Community*, Tokyo, vol. 1, no. 4, pp. 687–696.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in Asia”, *Tenggara*, Kuala Lumpur, no. 5, pp. 93–98. (Reprinted in *Westerly*, Perth, 1971, pp. 61–65). [Also published in *Westerly Looks to Asia*, edited by Bruce Bennett, et al., The Indian Ocean Centre for Peace Studies, with the Centre for Studie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erth, pp. 29–34.]

“Malaysia: Contending Elites”, *Current Affairs Bulletin*, Sydney, vol. 47, no. 3, December, pp. 1–12.

1971

“Asia and the Western Experience”, *Quadrant*, Sydney (reprinted in *Quest*, Bombay), pp. 9–14.

“Secret Societies and Overseas Chinese” (review article), *The China Quarterly*, London, no. 47, pp. 553–560.

1972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ese History”, *The Round Table*, London, pp. 283–295.

1973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pp. 616–624. (Reprinted in *Strategic Digest*, Delhi, vol. 3, no. 7, pp. 46–53.)

“Bureacracy in Imperial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Special issue on the Politics of Bureacracy), Sydney, vol. 32, no. 1, pp. 62–71.

1974

“Burning Books and Burying Scholars Alive: Some Recent Interpretations Concerning Ch’ in Shih-huang”,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Canberra, no. 9, pp. 137–186.

“Some Aspects of Southeast Asian Attitudes towards Japan”, *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 Tokyo, no. 33, pp. 1–18.

1975

“Juxtaposing 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 Today”, *The China Quarterly*, London, March, pp. 1–24.

1976

“The Origins of Civilisation: An Essay on Chinese Scholarship in Transition”,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New York, vol. 1, no. 3, pp. 247–257.

“The Ques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76*,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Studies, pp. 101–110. [A revised version, “The Chinese: What Kind of Minority?” was published in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1991, pp. 285–302.] (中譯文見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1994.)

1977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Hua-ch’iao*”, *Masalah-Masalah International Masakini*, edited by Lie Tek Tjeng, vol. 7, Jakarta: Lembaga Research Kebudayaan Nasional L.I.P.I., pp. 71–8. (中譯文見王賡武《東南亞與華人》，1987.)

“Second Chance for Viceroy Yeh”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Sydney, no. 12, pp. 120–123.

1979

“China and the Region in Relation to Chinese Minoriti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vol. 1, no. 1, pp. 36–50. (Chinese translation in

Singapore Monthly, 155, pp. 16–18. A fuller translation in 王慶武《東南亞與華人》，1987.)

“May Fourth and the GPC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medy”,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52, no. 4, pp. 674–690.

1981

“Southeast Asian Hua-ch’iao in Chinese History-Writing”,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vol. 12, no. 1, pp. 1–14. (中譯文見王慶武《東南亞與華人》，1987.)

〈關於華僑史的一些問題〉[“On Some Ques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載《南洋問題》, [*Southeast Asian Problems, Commemorative Volume for the University’s 60th Anniversary and the Institute’s 25th Anniversary, vol. 1*], Xiamen University Nanyang Research Institute, pp. 92–104.

1983

“Review Article”,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II,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edited by J.K. Fairbank and K.C. Liu,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Cambridge Mass., vol. 43, no. 1, pp. 365–372.

1985

“External China as a New Policy Area”,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58, no. 1 (Spring), pp. 28–43. (中譯文見王慶武《中國與海外華人》，1994.)

“South China Perspectives on Overseas Chines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Canberra, (13) January, pp. 69–84. (中譯文見王慶武《中國與海外華人》，1994.)

“Migration Patterns in History: Malaysia and the Region”,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uala Lumpur, vol. LVIII, pt. 1 (no. 248), pp. 43–57. (中譯文見王慶武《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1988.)

“Two New Sources of Hokkien Local History”,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Review*, Sydney, vol. 8, no. 3, pp. 54–59.

1986

“Reflections on Malaysian Elites”, *Review of Indonesian and Malay Studies*, Sydney, vol. 20, no. 1, pp. 100–128.

1987

“The Scholar in Chinese Society: Historical Background”, *Asian Culture*, Singapore, vol. 9, pp. 141–151. (中譯文見王慶武《歷史的功能》，1990.)

1989

“Lu Xun, Lim Boon Keng and Confucianism”,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Canberra, no. 39, pp. 75–91.

1990

“Outsid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Canberra, no. 23, pp. 33–48.

1991

“Among Non-Chinese”,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Spring, pp. 135–157. [Issue republished as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edited by Tu Wei-m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7–146.]

“China: 1989 in Perspective”,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90*,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Studies, pp. 71–85.

〈五百年前的中國與世界〉[“China and the World 500 Years Ago”], 載《二十一世紀》[*Twenty-first Century*], 香港, no. 2, pp. 91–100.

1992

“Universities in Transition in Asia”,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Oxford, Vol. 18, no. 1, pp. 17–2

Comments on “The Traditions of the University” by Walter Ruegg, *Minerva: A Review of Science, Learning and Policy*, London, vol. 30, no. 2, pp. 234–237, 286–287.

1993

“To Reform a Revolution: Under the Righteous Mandate”, in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Spring, pp. 71–94. [Republished as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Tu Wei-m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71–94.]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London, 136: 926–948. [Republished as *Greater China*, edited by David Shambaug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74–296.]

“The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4*,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San Francisco, pp. 1–18. [Also published in 《亞洲文化》 [*Asian Culture*], Singapore, vol. 17, pp. 5–13.]

1994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Singapore, vol. 2, no. 2, pp. 1–19. [Also published i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and China: The Politico-Economic Dimension*, edited by Leo Suryadinat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pp. 12–30.] (中譯文見林孝勝編《東南亞華人與中國：經濟與社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pp. 14–38.)

1995

“Upgrading the Migrant: Neither *Huaqiao* Nor *Huaren*”, 《亞洲文化》 [*Asian Culture*], Singapore, 19: pp. 1–8. [Also in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6*,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San Francisco, 1996, pp. 1–18; and in *China em Estudo* (《中華學誌》), Sao Paulo, pp. 9–23.]

1996

“A Machiavelli for Our Times” (Review Article on Samuel Huntington’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Washington, no. 46, Winter, pp. 69–73.

1997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Tradition”, The Ruth Wong Lecture, 26 November 1996, Singapore. In *The Australia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 24, no. 1, April, pp. 49–62. [Also in Jill Blackmore and Toh Kok Aun (eds.), *Educational Research: Building New Partnerships*. Singapore: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pp. 49–62].

1998

“Allies and Friends: Culture in Asia-Pacific State Relations”,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Singapore, vol. 5, no. 2, pp. 23–36.

“Malaysia-Singapore: Two Kinds of Ethnic Transformations”,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ingapore, vol. 25, no. 2, pp. 183–187.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the Asia Pacific”, *Public Policy*, Manila, vol. II, no. 2, April-June, pp. 13–36.

1999

〈民族主義、族群性與亞太區域〉，《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香港, No. 25, 1999, pp. 17–30.

〈單一的華人散居者？〉 [“A Single Chinese Diaspora?”],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 [*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北京, no. 3, September, 1999, pp. 1–17.

〈中國在亞太區域的地位：尋求盟友和朋友〉 [“China’s Place in the Region”], 《亞洲評論》 [*Asian Review*], 香港, No. 9, 1999, pp. 69–80.

2000

“Ethnic Chinese: The Past in Their Future”,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2000*.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nd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2000, pp. 1–9. [中譯文載《華僑華人歷史研究》 [*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北京, no. 4, 1999, pp. 1–11; Indonesian translation by Ignatius Wibowo, “Orang Etnis Cina Menchari Sejarah”, in *Harga yang Harus Dibayar: Sketsa Pergaulatan Etnis Cina di Indonesia*, edited by Ignatius Wibowo. Jakarta: Penerbit PT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00, pp. 1–34.] (An earlier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Asian Culture* [《亞洲文化》], Singapore, No. 23, 1999, pp. 1–11.)

“Political Heritage and Nation Building”,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LXIII, part 2, 2000, pp. 5–30.

2001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Histories”, *Asian Culture* [《亞洲文化》], Singapore, no. 25, pp. 1–14. [An earlier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Newsletter*, No. 11, 2000, pp. 124–138.]

〈社會紐帶與自由：移民社會的選擇問題〉 [“Between Bonding and Being Free: Problems of Choice in Immigrant Societies”], 《南洋問題研究》, no. 105, pp. 1–10.

“Diaspora, a Much Abused Word” (Interview by Editor), *Asian Affairs*, Hong Kong, no. 14, winter 2000/2001, pp. 17–29.

六 書評

1968

Jonathan Spence.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nn Arbor, MI., vol. 27, no. 4, p. 876.

1969

Howard Boorman and Richard Howard,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II Dalai-Ma.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42, no. 2, p. 224.

1971

Jerome Ch'en. *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Sydney, vol. 17, no. 2, p. 302.

E. Wheelwright and Bruce McFarlane. *The Chinese Way to Socialism*.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Sydney, vol. 17, no. 2, p. 302.

“Secret Societies and Overseas Chinese” (review article), *The China Quarterly*, London, no. 47, pp. 553–560.

1972

Edward H. Schafer. *Shore of Pearls*.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45, no. 1, p. 96.

1973

Brian McKnight. *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Sydney, vol. 19, no. 1, p. 120.

1974

C.P. FitzGerald. *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Historical Studies*, Melbourne, vol. 16, no. 62, p. 119.

1975

Frank Kiernan and John K. Faribank, eds. *Chinese Ways of Warfare*.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48, no. 4, p. 595.

1976

Howard J. Wechsler. *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 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49, no. 1, p. 119.

1977

Lawrence D. Kessler.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50, no. 4, p. 687.

John W. Haeger.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50, no. 3, p. 496.

Robert B. Oxnam. *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Sydney, vol. 23, no. 1, p. 144.

Vitaly Rubin. *Individual and State in Ancient China: Essays on Four Chinese Philosophers*.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Sydney, vol. 23, no. 3, p. 495.

“Second Chance for Viceroy Yeh”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Sydney, 12, pp. 120–123.

J.R.V. Prescott. *Map of Mainland Asia by Treaty*.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Sydney, vol. 23, no. 3, p. 495.

1978

John Curtis Perry and Bardwell L. Smith, eds. *Essays on T'ang Society: The Interplay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51, no. 3, p. 505.

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Sydney, vol. 24, no. 2, p. 255.

Bill Brugger. *Contemporary China*.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Sydney, vol. 24, no. 3, p. 431.

1979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Washington, DC., vol. 84, no. 3, p. 827.

1980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 Sui-T'ang China*.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53, no. 4, p. 726.

Fang Hsiu (translated by Angus W. McDonald).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Malayan Chinese New Literature, 1920–1942*.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nn Arbor, MI., vol. 39, no. 2, p. 438.

1981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54, no. 3, p. 510.

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Sydney, vol. 27, no. 3, p. 432.

1983

John K.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1911*.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Cambridge, MA., vol. 43, no. 1, p. 365.

Charles Backus. *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Washington DC., vol. 88, no. 2, p. 457.

1984

David Wyatt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Moral Order and the Question of Change*.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57, no. 3, p. 521.

Rosemary Quesed. *Sino-Russian Relations: A Short History*.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Sydney, vol. 30, no. 3, p. 453.

1986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Six,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Two: Agriculture*. By Francesca Bray.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s 2, vol. 39, no. 2, p. 329.

1988

John K.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one, 1949–1966*.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63, no. 3, p. 503.

1990

Ray Huang. *China: A Macrohistory*.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63, no. 1, p. 88.

1997

Marilyn A. Levine.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I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Honolulu, vol. 3, no. 2, p.

1998

Constance Lever-Tracy, David Ip, and Noel Trac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 An Emerging Economic Synergy*. In *The China Quarterly*, London, no. 154, June, pp. 427–428.

Rajeswary Ampalavanar Brown. E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sia*. In *The China Quarterly*, London, no. 154, June, pp. 428–430.

2000

Lu Hanchao.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vol. 73, no. 3, pp. 428–430.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
——王賡武教授論文選

主 編 劉 宏 黃堅立

出 版 者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1060 Main Street, River Edge,

NJ 07661, USA

印 刷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初 版 2002年4月

國際書號 ISBN 1-879771-61-6

版權所有 ©2002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